



陳伯達

最後口述回憶

陳曉農 編纂

陳伯達，毛澤東的首席秘書
中共最有影響的理論家
十年文革期間
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下的
中共第四號人物
1970年夏天突然被毛澤東點爲
「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
特務、修正主義份子」
其後林彪事件爆發
又被指爲林彪黨羽
關進秦城監獄
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囚徒生涯
……
……

【記憶歷史】叢書

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陳伯達從延安時期開始就一直擔任毛澤東的首席秘書，並被公認爲中共最有影響的理論家。在「十年文革」中，他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成爲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下的中共第四號人物。1970 年夏天的第三次「廬山會議」上，陳伯達突然被毛澤東點名打倒，被指爲「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等各種罪名。一年後林彪事件爆發，陳伯達又被指爲林彪黨羽，關進秦城監獄，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囚徒生涯。陳伯達在 1981年 11月被准許保外就醫，1989年 9 月去世。

陳伯達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毛澤東爲何突然要打倒陳伯達？陳伯達究竟有沒有與林彪結盟？這對許多讀者來說始終是個謎。陳伯達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許多重要文稿皆出其手。他不僅是毛澤東打天下、治天下歷史過程的見證者，也是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要事件的親歷者。毛澤東在延安是如何逃過一劫的？反右、人民公社、大煉鋼鐵是怎樣搞起來的？毛澤東與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恩恩怨怨的真相究竟如何？毛澤東爲什麼要發動文革？陳伯達對於這些問題無疑是最有發言權的。因爲迄今爲止留下的種種回憶錄中，沒有一個人跟隨毛澤東的時間比陳伯達更久，離毛澤東的距離比陳伯達更近，觀察思考的能力比陳伯達更高。

本書作者陳曉農是陳伯達的兒子，自幼與其父一起生活在中南海。從陳伯達被准許保外就醫到去世的八年間，一直與作者朝夕相處。由於此時陳伯達幾乎過着與世隔絶的生活，明知自己來日無多，心中的諸多冤屈和不平又無法與外人道，只有兒子可以無話不說。陳曉農又是一個有心人，往往將父子間的交談引向對歷史的回顧，且有意識地將陳伯達的談話做了筆記。如今陳曉農參照這些筆記，仔細回憶了父親的談話，并搜集了相關的史料文獻作爲佐證，編纂了這部書。由于是父子交談，陳伯達沒有想到將來會公諸於世，故不必像當今大多數歷史著作、傳記和回憶錄那樣需要故意迴避許多事與人。因此，本書的出版，對研究毛澤東和中國現代史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記憶歷史】叢書


ISBN 988-98295-1-7
9 789889 829513
港幣 $ 218

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SUN GLOBAL PUBLISHING
HONG KONG LTD
www.sunglobalpublishing.com

陳伯達

最後口述回憶

編纂
陳曉農

陽光環球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陳伯達

最後口述回憶

陳曉農 編纂

ISBN 988-98295-1-7

First Published by *Sun Global Publishing Hong Kong Limited*

出版人：魏承思

香港英皇道663號萬誠保險千禧廣場2樓202-203室
202-203, 2/F, MLC Millennia Plaza, 663 King's Road, Hong Kong
Tel (852) 2579 0551 *Fax* (852) 2579 0016

發行代理：田園書屋 電話：2384 8863

定價：HK$218

目 錄

2 延安時代

3 建國初期

4 困難與轉折

5 黨內矛盾逐漸激化

6 "文化大革命"的歲月



晚年陳伯達

本書編纂者陳曉農
五歲時在中南海瀛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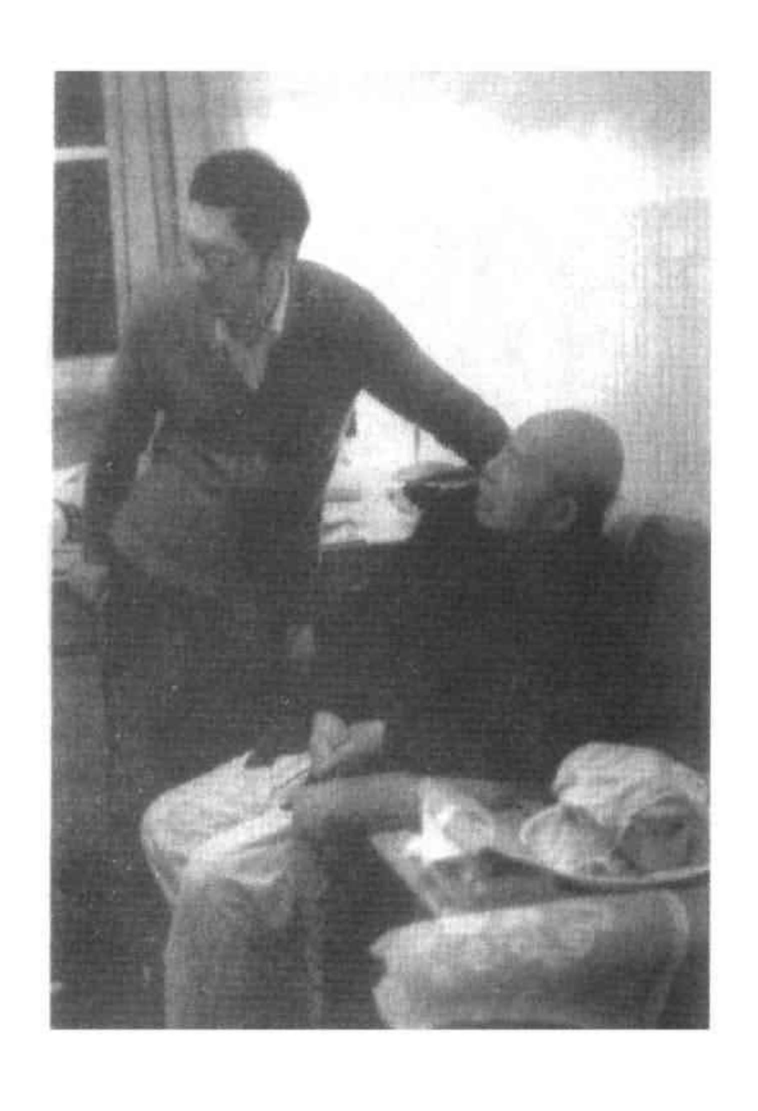


倖存的一張文革前陳伯達與兒子曉農、女兒嶺梅合影（陳家被抄後家庭相片全被扣押，至今未還），1956年在北京香山



1947年夏，蘇聯國際兒童院部分師生合影

中排右起：陳小達、劉允斌（劉少奇之子）、蔡轉（蔡和森之女）、張梅（林彪前妻、兒童院老師）、朱敏（朱德之女）、張梅膝上女孩為林彪長女林小林。



1988 年 10 月 17 日晚，陳伯達在北京朝陽醫院聽來客談話

（王東升攝）



1988 年 10 月陳伯達在北京朝陽醫院

（王東升攝）

秋夜有感

綺羅幕後送飛光，
柏栗叢邊作道場。
望帝終教芳艸變，
迷陽聊飾大田荒。
何來酪果供千佛，
難得蓮花似六郎。
中夜鷄鳴風雨集，
起燃烟卷覺新涼。

一九三四年九月
二十九日

陳伯達 85 歲時錄魯迅詩《秋夜有感》

前　言

近十來年，很多人勸我寫點有關家父陳伯達生平的文字，原因大抵在於，一是家父服務於中樞機構甚久，曾親歷許多重要事件，從他的經歷中或可窺見歷史的某些奧秘；二是他原係中共知識份子羣中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不列顛百科全書》所說，他從延安時代起就是"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可是自從他因堅持"唯生產力論"和贊成所謂的"天才論"，被定為"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的頭子之後，他即被戴上了"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帽子，這固然展示了階級鬥爭的嚴重性，但細心者不免心生疑惑，欲問個究竟。再者，父親畢生忠實於中共，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針出了紕繆時，他受制於環境，仍一如既往地服從領導，以致落得李代桃僵，在十八年的漫長刑期中度過餘生，然而七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明文宣佈："陳伯達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秀才和頭面人物"，"他名義上是中央文革的組長，實際上反對中央文革"，如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這些白紙黑字的論斷卻被故意遺忘，凡此種種，頗多蹊蹺之處，故而許多人期待能聽一下任憑擺佈的弱者的聲音，以便做到兼聽則明。

幾年前，一位官方的軍人作家說過這樣的話："陳伯達的歷史，也許永遠是個謎。"他故弄玄虛地表露了某些權勢者不放棄文革中專案組給陳羅織的罪名的旨意。他的話從另一方面促使我拿起了筆，因為他所說的謎，完全是一個人為製造的謎。如果對這種以"謎"的幌子將假案永遠維持下去的企圖緘默不語，將有背於我的良知。儘管我勢單力

薄，孤身對陣，但我相信前人說過的這句話："作偽者心勞日拙，蓋偽固未有不破者也。"

1989年9月，家父溘然去世。兩年後，我因患病離開了工作崗位，並於1995年提前退休。此後，我利用養病的閒暇，陸續完成了對父親遺稿的整理和註釋，於1998年委託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了《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一書（該書2000年再版，校正了初版排印時的許多錯字）。該書的出版受到了廣大讀者和中國現代史研究者的注意。不過，父親遺稿中的自述部分，多數都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按照權力部門下達的審問提綱寫出的，其內容涉及的方面很窄。有許多重要的歷史情況，父親只在口頭談話——主要是在私人談話中涉及過，而並未寫出過書面材料。因此，父親遺稿的出版，只是工作的一半，只有將父親晚年的談話內容也一併加以整理，公之於眾，才算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從1981年11月至1989年9月，父親與我朝夕相伴，彼此幾乎無話不談，我也有意識地對父親的談話做了簡要的筆記。在父親遺稿的出版事務結束以後，我即參照過去的筆記，對父親的談話情況重新進行了仔細的回憶，着手將談話中比較重要的內容依時間的順序，逐事記錄下來，並盡可能搜集了一些相關的史料作為佐證。因是抱病寫作，工作時斷時續，前後歷時四載，方才編綴成書。

鑒於本書主題的嚴肅性，書中涉及的史實均據事直書，文字上以簡約、素樸為旨，力避浮誇、渲染。同時，為讀者閱讀的便利，文中不避父諱，並盡量少用親屬稱謂。清代康熙皇帝玄燁曾對《明史》編纂者提出："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我想這也是所有須要對歷史負責的實錄性書籍所應遵循的一個編寫原則。

在轉述父親的談話的過程中，我對過去官方文件中以及某些書刊

中的失實之處進行了一些分析和考證。由於這些分析和考證沒有迎合通行的或正統的說法，可能會引起某些人的不悅。然而，"只有忠實於事實，才能忠實於真理。"我認為，對待歷史的最高原則，只能是"實事求是"。實際上，過去的出版物中，失實之處數量之多，是不勝枚舉的，所以我以個人的微薄之力，所做的分析和考證是十分有限的，只能是擇其要者，略加質疑而已。古人曾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有不得已者而後言。"予亦若是。

陳曉農

2004年9月20日於北京寓所

1 早年經歷

1. 家世

福建南部的泉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隋唐時以其地少寒，別稱“温陵”，五代時留從效重修城垣，多種刺桐樹，因稱“刺桐”、“桐城”。《馬可波羅遊記》即以“刺桐”稱泉州。在宋元時代，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號稱“梯航萬國”，從而成為數百年間最重要的中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之地。自南宋的朱熹在此地活動以來，儒家學説深入民間；而各種外來文化也在當地有所傳播。在各種文化思想相互融會和撞擊的過程中，在明代，泉州誕生了反叛封建社會的大思想家李贄。在清代，泉州的清源書院在陳壽祺的主持下，產生了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識份子，其中就包括有陳伯達的曾祖父陳金城。

在清末中國社會不斷發生動盪和變革的時期，陳伯達於1904年7月29日（光緒甲辰年6月17日）出生在距泉州城約二十裏的惠安縣嶺頭村。他自小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薰陶，並接受過近代西方式新文化的教育。

陳伯達晚年，針對“批陳整風”運動的文件對他的家庭的歪曲説法，曾多次談起過家世：

“人家説我出身於‘四代書香門第’的‘封建官僚家庭’，其實，我父親陳其潛只是個窮教書先生，靠教私塾收點學費為生，生活很清苦。雖然我的曾祖父陳金城（字念庭，號殿臣）中舉後任過清朝刑部主事，但那是道光年間的事了，距1949年後的土地改革有一百多年之

久。主事只是一個六品官，薪俸不多，他又沒有田產和其他收入。我的祖父陳玉書（又名玉德，字子符）也是一個舉人，卻未曾做過官，只當過惠安文峯書院的山長，而憑教書為生，不可能成為富人。所以，祖上除了書籍外，並沒有財產留下，到了我父親這一輩，家境已經十分貧窮了。

“我的祖父在惠安比較有名，因為他一生都在惠安教書。曾祖父在家鄉卻沒有什麼名，倒是在外面有點名，因為他一生大部分是在外面做官。我小時候對曾祖父的事知道的很少，只知他在鴉片戰爭時期替禦史陳慶鏞寫過《劾琦善、奕山、奕經疏》，還為在吳淞炮臺殉國的陳化成寫過神道碑，這兩篇都收入了《怡怡堂文集》，他還曾在由北京回福建的途中，在上海組織過羣眾抗英，是一個支持林則徐的抗英派(林則徐有五通致陳金城的親筆書劄，現被官方機構封存——筆者注)。後來我在上海念書，看到包世臣寫的《藝舟雙楫》裏收有〈與陳孝廉金城書〉，才知曾祖父和包世臣的交往。解放以後近代史所的劉大年同志告訴我他看到過魏源和姚燮寫給陳金城的詩。魏源的著作很多，除《海國圖志》外，多數我未細讀。姚燮號大梅山人，他的詩、文、畫都有名，他曾給陳金城畫過一幅像。我後來把這幅像從老家帶來北京，請人修補裱好。那幅像畫得很好，是全身像，腰間佩有一把刀。1970年廬山會議後把我禁閉在家，一時還沒有抄家，我擔心抄家後他們會把像拿去展覽，辱及先人，就把像燒了。”

我在談話中提到《清史稿·儒林三》中的〈孫經世傳〉裏寫有：“壽祺課士不一格，遊其門者，若仙游王捷南之詩、禮、春秋、諸史，晉江杜彥士之小學，惠安陳金城之漢易，……皆足名家。”

陳伯達說：

“《清史稿》的材料大概取自地方誌。陳金城與他的岳父孫經世都

是著名學者陳壽祺的學生。孫經世有著作傳世，所以《清史稿》有傳。漢易是指漢朝的《易》，吳派學者惠棟就專治此學，撰有《易漢學》。陳金城這方面的文字大概沒有流傳下來，流傳下來的只有《怡怡堂文集》抄本。我年青時在上海看到商務印書館將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和孫經世的《經傳釋詞補》合印出版，曾向堂兄陳敷友提出將曾祖父陳金城的《怡怡堂文集》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陳敷友那時在緬甸辦仰光日報，對此事不積極，我也忙別的事，就放下了。清代刻印書是要自己出錢的。陳金城沒有錢，書也就沒有印，孫經世錢也不多，所以除《經傳釋詞補》有過刻本，其他很多書稿，如《清史稿》中所列的那些，多數也未印。我倒了以後，這些放在惠安的書稿能不能存下來也是問題。"

據筆者所知，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編輯《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中，收有陳金城《怡怡堂文集》的五篇文章。另外，郭沫若曾寫過一篇評介陳金城的文稿，現被官方封存。至於孫經世的著作，近年出版的由李學勤、呂文郁主編的《四庫大辭典》第508頁著錄有孫經世的《惕齋經說》、《經傳釋詞續編》和《讀經校語》三種著作，均為道光年間刻本，是林則徐摯友蘇廷玉（字韞山、號鼇石，曾任四川總督）出資刻印的。《惕齋經說》中有陳金城撰寫的孫經世傳。與陳伯達家世有關的文獻情況，大體如此。

陳伯達憶及兒時的情況：

"我出生時，祖父早已去世了。我父親成年時家境已很困窘。父親以教書為業，開始只在村裏教，我7歲時，他到我大伯父辦私塾的地方，也辦了個私塾，不久大伯父來攆他，說他把學生都搶走了，要他換個地方。我父親從來不跟人吵架，就換了個地方。不巧那地方正流行鼠疫，父親也被傳染了，病情很嚴重。母親叫我跟幾個鄉親去接他。鄉親們借了個破轎去抬他。大概是由於病痛難忍，我記得父親一路上煩躁不

安，幾次從轎上跳下來，回到家不幾天，他就去世了。

“父親給我起名聲訓，字尚友。從五歲起，父親教我念書，他對我很嚴格，背書背得不好就用尺子打手心。父親去世後，私塾的賀先生按鄉里陳姓排輩，給我改名為健相。賀先生教書着重講解，教的比父親好。

“父親死後，家道更艱難了，母親只好去給人家做針錢，洗衣服。家裏還有兩畝薄地，只能種地瓜，我哥哥輟學在家種地。家裏最困難的時候，撿大路上別人扔下的香蕉皮磨成粉，做成團子蒸熟吃。一家人就這樣省吃儉用，供我念書。我先是在大伯父辦的私塾念書，他不收我的學費，但我還是對他有意見，因為是他把父親攆走才導致父親早逝的。後來我到姑父家就讀，姑父黃逵德先生是個清末貢生，學問很好。姑父去世後，我轉到二伯父辦的梅山小學，但在那兒念的時間很短。”

2. 從讀書到教書

“私塾只教四書五經，我從五歲由父親授課開始，一共念了十年私塾，除《易經》先生未教外，其他都學了。先生每講一課，先要求會背，《左傳》有十多萬字，我整部都能背。另外，先生還讓我們讀《綱鑒易知錄》。

“我在私塾的另一功夫是毛筆字。在梅山小學時，先生在黑板上寫講義，要求學生抄下來，一次先生寫完講義回過頭來，見學生們都在寫，就我一個坐着沒動筆，便問我：別人都在寫，你在幹什麼？我回答：我已寫完了。先生很奇怪，下來看，見我果然早已全部抄好，很驚訝，說：哎呀！你不僅寫得快，字也寫得比我好。

“十五歲那年，看到集美師範的招生廣告，這個學校不收學費，管吃管住，我就去報考。考國文時，我第一個交了卷子，但考算術時，我

卻楞住了，因為過去完全沒學過。別人都交了卷子，只剩我一人。主考教師已看了我的國文試卷，很滿意，這時見我做不出算術，就想特別照顧一下，讓我吃了飯後接着考，意思是可以利用吃飯的時間去問其他會做的同學，我沒有接受。公榜時我的名字排在候補生最後一名，自料怎麼也取不上就回家了，在母親跟前大哭了一通。後來聽說那一批學生的候補生也全錄取了。不久我又參加了第二次考試，情況還是一樣，校長在我的國文試卷上批了'國文尚可'幾個字，把我列在正式錄取的最後一名。那時集美師範是在閩南十多個縣招生，每次只錄取幾十人，一個縣只錄取幾個人。

"集美師範的校舍很漂亮，各方面的設施在當時的閩南是最好的。學校的課程是國文、英文、數學、美術、音樂；物理學過一年，但是沒有學過化學。數學開始成績不好，到第一學年的期末，我考了100分，算是跟上來了。"

談到當時的師生，陳伯達說：

"陳嘉庚先生的兒子陳博愛跟我是同班，解放後我向陳嘉庚問起他，陳嘉庚說陳博愛已因病去世了。集美師範陸續從外省請了一些有水平的人當教師，記得有位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教國文，這個人後來離開集美回到北方，抗日時期當了冀東維持會的頭子。有位教代數的老師叫章育文，對我很好，他後來在商務印書館編書，解放後我曾請他吃過飯。著名哲學家吳康，擔任過集美圖書館主任。那時的校長葉淵，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治校有些方法，但有一件事他做得不好。那是第三年上學期，有一個學生偷東西，被學校抓住了，偷東西應受處分，但學校把他捆到樹上體罰，一下激怒了學生，引起了一次大學潮。我們集體罷課，表示抗議。後來學校限期歸校，不歸校者除名，我和一些同學不肯接受學校的勒令，從此離開了學校。這樣，我還差半年沒有讀完，沒

有畢業。那時我十七歲，就直接回惠安當小學教員。”

“那時教師很缺乏，我當小學教師時，曾同時兼過三個學校的課，國文、英文、算術、美術都曾教過，月薪一共只有20塊大洋，我大部分都交給母親，她很高興。過了一年由熟人介紹，我到廈門當教師，先後教過幾所學校，教的時間長的是一所教會學校。業餘，我在同文書院進修英文。我當時還常給《廈聲報》寫稿，結識了莊希泉、張余生。在《廈聲報》除了用‘陳健相’的本名外，我用得較多的一個筆名是‘十九歲少年生’，那時已是五四運動以後，青年人都很活躍，記得後來在南洋以主張獨身主義出名的一位女青年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答陳健相君》，曾引起過很多人注意。”

寫到這裏，筆者順便插説幾句。陳伯達在廈門期間發表的作品，能找到的已很稀少。1991年我將父親骨灰送回老家，一位友人曾把他過去從廈門大學圖書館舊藏期刊上抄下的一篇父親1922年的詩作交給我。這是迄今發現的陳伯達發表時間最早的作品，當時他才18歲，現全文照錄如下：

我覺悟了

陳健相

啊，我們沒有立足的地方！

似這般地佈滿了荊棘。

啊，我們不能夠生存了！

似這般地充滿了豺狼。

哦，我覺悟了：

快磨我們的快刀，

把荊棘伐盡；

哪怕無立足的地方？

哦，我覺悟了：

快造我們的子彈，

把豺狼殺盡；

哪怕不能夠生存？

我同志們哟！

向前哟向前！

不要駭怕！

不要退卻！

不久就要達到我們所理想的所希望的一切了！

按：我這首詩是為我的桑梓——惠安——而作的

十一，六，五早

此詩原載《惠安旅廈學會月刊》1922年第二期。這篇短詩對於瞭解陳伯達的早期思想，無疑是一件有用的資料。

此外，陳伯達在1924年寫的《原意志》一文，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當時他剛二十歲。在近半個世紀後，此文曾被中共中央的文件加以評說，並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大加撻伐。現將此文的全文照錄如下：

原意志

尚友

有物焉，據于人群心間，聽之無聲，望之無形，金城湯池，無其固也，十萬甲兵，莫之敵也；斯為何物？曰，其惟意志乎！

意志者，吾人人格之表現，精神之所依寄也；正義所在，僅知堅持，不問力之強弱，見識所至，僅知必行，不計事之成敗，吾行吾素，於

人無與。有史以來，若伯夷甯餓死首陽，而不食周粟，孔孟寧被人目為迂闊，而終說仁義，陶淵明寧賦歸去來辭，而不為五斗米折腰，方孝孺寧夷十族，而終不草詔，——此其人之舉動，不啻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奪，山可移，而志不可變，錢塘江潮，不及其壯，昆侖山峰，不及其高；——嗚呼，斯真所謂稟天地之正氣，不愧為宇宙間之"偉人"也已！

"意志"非天有所私愛，而特賦予于何人也；吾人既生為人類中之一員，無有不可成為宇宙間之"偉人"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旨哉言乎！馮道之曆仕五代，洪承疇之供職清廷，豈天之意，欲其碩顏事仇，而置名節於不顧哉？夫彼輩固亦嘗讀聖賢書者，禮義廉恥，彼輩所知也，然為富貴所誘，為威所迫，竟不能持其意志，是其墜落，固自墜落之也，吾故曰，無有不可成為宇宙間之"偉人"者，惟在乎人之自為耳。

晚近以來，士風民德，愈趨愈下，極目國中，嶢嶢皎皎，能堅持其志者，有幾何人？有利可圖，權力所加，其負厥初衷，勿論已；而言行之間，每視人之可否，以為進止，全不敢自決是"自我"之精神，已自毀滅無餘，夫尚有何人格之足雲哉？

有清香妃之事，雖正史無傳，然固有可徵也；以萬乘之軍，聲威之顯赫，卒不能屈之伏首就辱，回部非我國士大夫所目為化外之邦者耶？而於今日國中，乃不得一二如所謂化外之弱女子；唐時韓愈，毫無依籍竟能於群眾迷惑之秋，排詆眾流，獨樹一幟，使天下靡然從之，而吾輩後人，乃均隨俗浮沉，與時苟合；——嗚乎！此不亦大可哀哉！吾親愛之國人乎！尚其自愛，而知所與奮也！企予望之。

（原載1924年5月1日《廈門通俗教育社半月刊》第一卷三期）

此文旁徵博引，文思縝密，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其筆力雄健，立意高遠，文短韻長，宕逸可誦。

3. 與郁達夫、朱湘的師生之誼

陳伯達回顧了他青年時期生活上的磨難和奔波，以及與幾位知名人物交往的經歷：

"我在廈門生過一場大病，是傷寒，當時沒什麼治療的辦法。傷寒傳染，大多數熟人都不敢來我處了，只有一個同事不顧這些，常來照顧我，使我慢慢恢復過來，我非常感謝他。

"1924年春，我和張余生等創辦了《廈門通俗教育半月刊》。在這前後我和郭沫若建立了通信聯繫，我曾寫過一首《秋風歌》，郭沫若幫助修改過，但此詩未曾發表。1924年秋我擔任了《廈聲報》駐滬記者，不久又進入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當時我們的國文教師是陳望道，英文教師是朱湘。那時剛巧郭沫若帶着他的日本妻子來上海，我曾去看望過他一次。郭沫若對我說：'郁達夫現在正在北京辦刊物，你有什麼文章可以寄給他。'我寫過一篇題目叫《寒天》的小說，就按郭沫若的建議寄給了在北京的郁達夫。郁達夫交給《現代評論》發表，並寫了封回信對我進行鼓勵。我還給《民國日報》寫過一些詩和短文，這些作品調子都比較低沉。"

陳伯達發表於1925年2月《現代評論》上的小說《寒天》中有一段話，寫得十分悲愴，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就是對陳伯達坎坷的生命旅途的預言性的寫照，使人頗詫異於歷史的巧合：

"我一生潦倒到底：我受人攻擊，受人排擠，我現在正如那每次都打敗了仗的久經戰陣的兵士，遍身負着傷痕，倒臥在暮色蒼涼的草野裏，

陳伯達還回憶了他當年與朱湘的友誼：

“在上海大學期間，我課餘常和同學到朱湘家和他談文藝，師生間相處得很融洽。多年以後，朱湘不幸投海自盡，我很悲痛，曾寫了一篇《關於朱湘及其他》，以‘梅莊’的筆名在《太白》上發表。”

1935年2月上海《太白》第十期上的《關於朱湘及其他》，真實地記述了陳伯達當年的生活情況和他對於亡友的思念之情，現摘錄部分段落如下：

"我認識朱湘，是在一九二五年春間。那時我是上海某大學掛名的學生，他也正在那大學代課幾點鐘英文。我們友誼的由來，那當然是由於文藝的愛好。當時我正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文藝熱狂者，有幾個同學，也和我患着一樣的熱狂病，我們這些人，大抵和朱湘都有相當的友誼。我們時常一塊兒到朱湘寄住的地方去，有時請他教點英文，有時隨便和他談論一些文藝上的事情。他那時的情況頗為寂寞和清苦。據我所知，他那時在上海並沒有什麼來往得很密切的友人；他生活的來路也很枯竭；他在那大學代課，每月大概只能拿到很可憐的幾塊錢。他愛穿西裝，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我看過他穿的西裝，只有一套，沒有看過他穿第二套。大概也是因為他是這樣的寂寞和清苦吧，所以他會那樣高興和我們來往，而且和我們幾個窮措大還很說得來話。

'五卅'的暴風雨把我們那樣的友誼，無情地拆散了。朱湘在五卅後，便到了當時的'北京'，而我則開始過着更巨大的流浪生活。當我由閩海再流浪回到上海的時候，那時我接到朱湘寄來的一封信，大意是說：他現在在北京和幾個朋友辦一個中學，如果我可以北上，就可以在那中學教幾點鐘課，同時可以到大學聽課去。他又說：他準備再進清華大學，在那裏畢業了，很有到美國去的希望。朱湘這封信，我是

否回復，我已記不清楚。我只記得：從此以後，我們的來往就中斷了。當然朱湘是無從知道我的音息，我也無從知道他的音息。

在兩年前，我流落北國，病體支離，渴望得些朋友的幫助和慰藉；那時，我忽然想起了朱湘，那時我又在北平某報上看到有朱湘的詩作發表，我想：或許朱湘是在北平吧？或許是在哪一個大學教書吧？於是，我托了人去訪問，結果是毫無所得，去年底，我回到上海的時候，無意中，在一個晚報上，發現了他投海死了。

朱湘畢竟是投海死了。只就過去的友誼，也夠得使我感到悵惘不已的。他投海死的原因，是為着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以他數年來的努力和文藝界上的相當聲望，竟至於無法再活下去，我想，是不值得驚異的。對於死者生前的淡漠，而於其死後，卻又像很'熱情'地來'追悼'他，這也正是偽善社會的本色。"

陳伯達還談到了1926年初，他到廣州中山大學學習期間，遇見了郁達夫的情況：

"1926年初，吳康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他給我寫信，說中山大學的文學系不錯，希望我去他那裏上學。吳康那時已是有名的學者，他過去在集美學校擔任圖書館主任時，很欣賞我的文章，經他的介紹，我就離開上海大學去廣州中山大學學習。但我到了中山大學以後，吳康已經到北方去了。不久，郁達夫離開北京，在武昌停留一段時間後，來到廣州，擔任中山大學的文學院院長。郁達夫遇見我，問我最近又寫了什麼？我拿出一首才寫好的詩向他請教。"

陳伯達一邊說着，一邊拿筆寫了出來。

那首詩是：

莫問有窮或無涯，

莫用歡樂或咨嗟，

盡向前途流浪去，

莫要回首望鄉家。

陳伯達寫完之後，接着說："郁達夫看完我的詩後，拿起筆來，每行圈去了一個字，變成了這個樣子——"

陳伯達按照他的回憶，將上面的詩每行圈去一個字，上面的七言詩就變成了下面的六言詩：

莫問有窮無涯，

莫用歎樂咨嗟，

盡向前途流浪，

莫要回首鄉家。

"這首詩並沒有發表過，但這件事我一直不忘。不過後來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卻不太好。有一回我陪郁達夫上街，發現他花錢很大方，大概他那時掙的稿費已很多。我問他：'你花錢這麼隨便，可在你的書裏面，你是很貧寒的，怎麼能這樣呢？'郁達夫說：'我在書裏寫的只是小說家言。'"

4. 社會的熔爐

1925年，上海的日本資本家槍殺了紗廠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激起民眾憤怒，五卅運動隨之爆發。陳伯達講述了他親身參加這一運動的情形：

"1925年我在上海參加了五卅運動，在遊行時我曾爬到一個高處撒傳單，英國巡捕沖過來，毆打羣眾並開槍。為這次事件，我寫過一篇《中國的言論界》在《洪水》雜誌上發表。五卅運動後上海大學組織了南下宣傳團，我和梁龍光一起都是回閩宣傳團的成員。梁龍光字披雲，

那時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當過國民黨福建省的宣傳部長，他的弟弟就是梁靈光。”

茲摘錄一段1925年10月1日出版的《洪水》雜誌一卷二期上《中國的言論界》中的文字，讀者可以從中窺見陳伯達當時真實的政治傾向：

“上海的言論界中，有幾家報館是真正能夠代表民意？有幾家報館是有真正的良心主張？……所謂上海言論界的首領的《申報》及《新聞報》的言論，更是搔不着癢，乏味無聊。令人肉麻。他們的本領，只是善於宣傳軍閥政客的意旨，善於取媚帝國主義，善於造謠，善於淆亂是非，善於顛倒黑白，所以他們的報上，滿是‘吳使’‘張帥’，滿是‘赤化’‘反共產’……顧正洪（引者注：即顧正紅）死案，意義何等重大，他們處之泰然。五卅的天流血，為人類空前未有之慘劇，他們的標題是‘昨日南京路演講之大風潮’。《誠言》是大家所認為英國人的毒舌，他們卻把它當作甜言蜜語，連忙刊載出來。他們每把真心代表民意的團體宣言不登，至於地痞惡紳的意見書，則惟恐缺少。他們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可是他們總標榜他們是無黨無偏，穩健和平，蚩蚩者亦從而和之，說他們是無黨無偏，穩健和平，我卻說這才是中國快要亡國滅族，陷於萬劫不復的表現……。”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看到的是陳伯達對於共產黨員顧正紅慘遭日本資本家殺害的深切同情，對於上海言論界秉承軍閥的旨意混淆是非，宣傳“反共產”的憤恨，哪裏能找到作者本人“反共”的影子呢？這樣一篇反映陳伯達青年時代真實思想的重要文章，中央專案組故意視而不見，有關部門在編輯陳伯達的材料時也故意不予收錄。

陳伯達繼續回憶道：

“1926年初，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學習，只學了一個學期，暑假回家後沒有足夠的路費回校，就在汕頭留下來，經張余生介紹，被張貞聘請

擔任了韶安軍官學校的教官。那時莊希泉的夫人余佩皋也在這所軍校任職。在這之前，我除和張余生接觸很多外，與黃振家、梁龍光也有來往。張余生很早就參加了共產黨，並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過，與周恩來同志很熟。而黃振家、梁龍光卻成了國民黨右派。"

我向陳伯達提到"文革"中定他為"國民黨反共分子"的事，當時中央下發的文件中說梁龍光、黃振家是他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

陳伯達說："梁龍光、黃振家曾提出想介紹我參加國民黨，我當時也沒有反對，但我很快和他們分別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我從未參加過國民黨。那時加入國民黨也是要有手續，要填表的，我沒有履行過這些手續，怎麼算是國民黨員呢？我那時還不是共產主義者，思想上一度很消沉，但對梁龍光、黃振家他們反對共產黨的作法是不贊成的。他們曾要我代起草一份《孫文主義學會宣言》，我不願他們寫進'反共'字句，就給代寫了，結果寫出來他們也沒有用。"

我談到，當年專案組的材料中並沒有他"加入國民黨"具體過程的材料，也沒有提《孫文主義學會宣言》的具體內容，只是列出過三十年代上海中共機關的一份法文檔案，專案組為這份檔案加寫的譯文中有陳尚友加入過國民黨的話。

陳伯達說："梁龍光、黃振家想介紹我加入國民黨和我起草《孫文主義學會宣言》的事，都是在延安整風中，組織上要求每個人都寫一份坦白時，我自己寫出的。這些事我如果不寫，並沒有其他人知道。沒想到，為了不向黨隱瞞任何情況而寫的自述被歪曲，變成了整我的根據了。想介紹我加入國民黨就變成已經加入了。上海的法文檔案我不知道，那時上海的黨中央被王明把持，王明在莫斯科時就打擊我，他們搞的東西就可信？我是否加入過國民黨，應當從國民黨的檔案中查，就好比要查一個人是否加入過共產黨，當然應從共產黨的檔案中查，不能從

其他黨的檔案中查。那時候就是參加過國民黨也不能算什麼事，問題是我並沒有參加過。"

我還談到，專案組的材料中有一份羅明寫的材料，其中說陳伯達曾在《洪水》雜誌上發表過反共文章，為此我查閱了新影印的《洪水》雜誌，找到了那篇專案組特別點出的題為《努力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的文章，可該文中並沒有反共的話。專案組稱該文中"走入迷途的糊塗蟲"一詞即指共產黨，但從文章看，這個詞是泛指反對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人。當時，反對三民主義的政治派別有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等等。說這個詞指共產黨，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在相隔僅半月後出版的同一刊物上，陳發表的《中國的言論界》一文恰恰是明顯同情共產黨的。

陳伯達聽了我談的情況，說道：

"《洪水》是創造社辦的刊物，在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屬於左翼，不知羅明是怎麼看這個刊物的。羅明後來受到過王明的打擊，在長征途中他脫離了革命隊伍，跑到上海找他的哥哥。他哥哥那時正在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裏當官。北方局得知這個情況後曾商量爭取他回到黨裏來，確定由我寫封信給他，勸他回黨工作。當時是白色恐怖，信裏的話當然要隱晦一些，但做過地下工作的人一看就明白的。信的落款是中法大學某某某。不久羅明回了封信，對我信裏談的事一句不提，卻問我能否幫助他到法國留學。解放後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他特地跑到主席臺上來找我，很有些不好意思。我倒了以後他給專案組寫了些什麼我不知道，這些材料從來沒有給我看。"

陳伯達接着說道：

"我那個時候很年輕，還不是共產主義者，思想一度很沉悶。但是，如果一個人一開始不是革命的，以後就不能參加革命，從一個人年輕時的思想狀況就確定他的一輩子，這總不合情理吧。德國的梅林原來

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並在一些問題上反對過馬克思，但他後來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寫的《馬克思傳》至今仍是一部很重要的書。列寧對梅林的評價很好。基督教的著名人物保羅，早年是反對基督教的，甚至參與過迫害基督教，但他後來皈依基督教，成為最重要的傳教者。基督教能傳播到歐洲，傳播到後來那麼大的範圍，與保羅有很大關係。難道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一生下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青年時也曾受過各種思想的影響，後來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5. 參加北伐與加入中共

從1926年參加北伐到1927年加入中共，可說是陳伯達一生的轉捩點。對這一段重要的歷史，陳伯達回憶道：

“我接受社會主義，除了因為讀過一些社會主義的書外，主要是因為參加北伐軍以後，隨軍行動，一路看到各地工農羣眾革命熱情高漲，我很受感動，實踐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北伐開始以後，張貞的部隊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第四師。我擔任師部的秘書。北洋軍閥實質上很虛弱，北伐軍在工農羣眾的熱烈支持下，戰鬥士氣旺盛，所以戰爭進展得很順利，北洋軍閥張毅的部隊節節敗退。

“獨立第四師進入福州以後，成為福州市的衛戍部隊，張貞兼任衛戍司令。那時，形勢變得日趨複雜，右派反共勢力逐漸囂張，提出所謂‘擁蔣護黨’的口號。我在共產黨員陳少微主辦的《福建評論》上寫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受到了黨中央特派員王荷波同志和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徐琛同志的接見，被王荷波、徐琛同志聘為工人糾察隊的顧問。福州是最早開始‘清共’的地區，在白色恐怖已經開始，形勢非常緊張的時候，我以師部軍官的身份掩護過一些黨員和左派人士，穿軍裝護送他們出境。

“國民黨大規模清黨後，福建的反革命頭目宋淵源從南京打電報給

師長張貞，說我'不是共產黨也是共產黨的工具'，要求張貞把我'就地處理'。張貞匆忙跑來告訴我，讓林學淵送我到馬尾上船去廈門，並送給了我一千元做路費。

"我到廈門找到表哥黃泰楠，他那時在廈門大學讀書，我在他們學生宿舍的天花板上住了一夜，躲過了特務們的搜查，第二天黃泰楠送我上船去上海。

"我到上海時，已經是'四．一二'之後，完全是一片白色恐怖，各大報每天都有共產黨組織被破壞和許多人聲明脱黨叛黨的消息。我對國民黨背叛革命的行為深為憤慨，認為在共產黨困難的時候，自己必須站在共產黨一邊。我在上海找到陳少微和張余生，請求加入共產黨。黨組織很快批准了我入黨，並考慮到這是一個非常時期，決定免了我的候補期，直接接受為正式黨員。"

陳伯達接着談了他入黨之初的情況：

"剛加入黨時，我的聯繫人是孟超，不久組織上派我去武漢擔任中央宣傳部出版科科長。當時部長是蔡和森。王明是鼓動科的科長，與我住隔壁，他好演講，性格與我不同，所以很少來往。記得後來有段時間我搬到楊殷家去住。

"我在武漢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大英帝國的沒落》，發表在武漢《民國日報》上。七月中下旬，形勢大變，汪精衛已清黨反共。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南昌起義，派我和陳文總前往贛東北，說服正駐紮在那裏的張貞部隊參加南昌起義，還交給了我們一筆經費，由陳文總帶着。不料到九江時陳文總突然失蹤，原來他害怕此行危險，擅自離九江去了上海，我只好一個人坐船渡過鄱陽湖到了贛東北。在到達一個關卡時，碰到一位張貞部隊的熟人，他告訴我張貞周圍的人現在都是國民黨右派，要說服他參加起義已根本不可能，他勸我立即離開，否則只能是白白送

死。我只得再過鄱陽湖，原路返回武漢，向中央報告了情況。

"不久，中央決定將一批黨員和左派青年送到蘇聯學習，其中也有我。我們一行人先到上海，從上海坐輪船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坐火車穿過西伯利亞，一路曲曲折折，到了莫斯科。"

關於他的兩個入黨介紹人後來的情況，陳伯達談道：

"張余生後來脱離了黨，背叛了革命，跑到張貞的部隊裏，找了個事情做。陳少微(又名陳明)則始終忠誠於黨，他後來到紅軍中工作，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長。在延安時，他與我相見多次，給我講述過很多紅軍中的事情，對毛主席很是欽佩。以後他到山東根據地工作，在一次與日軍作戰時，遭遇日軍的包圍，在彈盡糧絕時，他用最後一棵子彈自戕。朱瑞(曾留學蘇聯，抗日戰爭時期是山東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為人民解放軍炮兵創始人，1948年犧牲——筆者注）回延安時，曾給我講過陳少微犧牲的經過。"

6. 莫斯科中山大學

陳伯達回憶了他在莫斯科度過的歲月：

"火車到達莫斯科車站時，蘇聯方面接待我們的人很熱情，一邊和我們握手，一邊喊着'斯大林—布哈林！'那時布哈林是共產國際的主席。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和凱豐、陳昌浩是同班。張聞天是第一期的學生，這時擔任我們的俄文翻譯。開始學俄文時缺少工具書，那個時候還沒有俄漢詞典，我只有一本從國內帶來的俄日詞典，在上海大學時，我學過幾個月的日文，這時只能將就着用這本俄日詞典，好在環境迫使你不能不儘快學會俄語。

"蘇聯當時因剛剛經過國內戰爭，各方面的建設正處於開始階段，人民羣眾的生活還很困難，但蘇聯政府對我們這些中國學生卻給予了很

好的生活條件，每天的食品很豐富，牛奶、雞蛋、麵包、黃油、糖等都能充足供應，還可吃到中餐，住的條件也很好。我有時與學校的俄國人接觸，覺得他們中有些人對我們這批中國學生頗有懷疑。我有一回聽到一個俄國人說：'我們讓他們吃得這樣好，他們回國後究竟怎麼樣？誰能知道？'這些普通俄國人的猜測也並非沒有道理。在中山大學學習過的中國學生總有千數來人吧，但回國後堅持革命的，大概只有一、二百人，多數人離開了革命，還有一部分人站到國民黨一邊反對共產黨。"

大約在1983年，我找到一本已加入美國國籍的盛岳(即盛忠亮)寫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的中譯本，交給父親看。他看完之後說：

"我在蘇聯時聽說過盛忠亮，但與他不相識。他是王明一派的，回國後擔任了重要職務，後來成了黨的叛徒，看了這本書才知他最後跑到美國去了。他寫的這本書中有關中山大學學科教育和生活情況的敍述，大體上還是符合當時的情況，例如有關軍事學的教育和訓練，似乎沒有看到別人述及。"

在談話中，我提到"文革"中"批陳整風"運動的文件定他為"托派"的事，提到曾為專案組做證明的萬志淩。

陳伯說："專案組沒有問過我這些事。我在莫斯科時，不贊成蘇聯清黨的那種做法，但是我並沒有參加過托派組織。萬志淩曾經給我看過托派的文件，想拉我參加托派，我看後就把文件還給了他。我沒有同意參加托派，他就很不高興，在大飯堂吃飯時當着很多人中傷我：'你們不要看別里諾夫（陳當時的俄文名字）好像很老實，他肚子裏有主意！'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壞，所以解放初他回國後給我寫了一封信，想攀我，我沒有回信。"

陳伯達接着說道：

“蘇聯清黨，對中山大學是搞人人過關的。負責審查我的是曾幫助過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那時她是列寧學院的院長。她在審查會上聽取審查人員的報告，當聽說我正在寫有關係中山的文章時，就要了我的文章去看，然後連聲稱好！並且對我說：‘你的文章中引用的馬列著作，有很多是沒有中文譯本的，是你自己翻譯的？’我說：‘是的。’最後，審查結論定我為‘學院派’，給了‘黨內勸告’的處分。當時蘇聯‘清黨’搞得那樣厲害，那樣擴大化，都沒有定我為‘托派’，想不到過了四十年後卻在中國被定為‘托派’，這在世界上都是笑話。”

中山大學清除“托派”的鬥爭，是在以王明為首的所謂“多數派”控制的中山大學黨支部的掌握下進行的，這一鬥爭不可避免地和當時中山大學內部複雜的派系鬥爭交織在一起。陳伯達談到了當時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一些情況：

“那時王明把持了支部的領導權，跟隨他的人中，有一些比較能幹的同學，他們號稱多數派。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沈澤民(茅盾同志的弟弟)、秦邦憲（博古）、王稼祥、楊尚昆、陳昌浩、陳原道、張聞天(洛甫)、何克全（凱豐）、殷鑒、夏曦、孟慶樹（王明之妻）、張琴秋(沈澤民之妻)等。這幾位除了王明解放後長期居住在蘇聯外，都始終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工作，其中沈澤民、秦邦憲、陳原道、殷鑒、夏曦在解放前犧牲了。另外，還有幾個王明的追隨者回國後叛變了革命，如王雲程、盛忠亮等。王雲程曾出賣過很多革命同志，導致大批共產黨員被捕犧牲。大概是1968年，公安部向中央請示對他和另一個大叛徒盧福坦的處理，當時參加會的人在周總理主持下，一致同意將這兩個造成很多黨員犧牲的大叛徒判處死刑。

“我在蘇聯時，一直是受王明一派打擊的。回國以後，他們中間有

些人轉變了態度。1931至32年，陳原道和殷鑒同我一起被關在國民黨的監獄裏的時候，他們兩人對我很好，誠懇向我表示了歉意。1937年我到延安以後，張聞天也對我很好，對我很關照。但是，楊尚昆卻與我一直合不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剛解放時，我主持黨校的工作。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我向他要辦校的經費，他就不肯給，說沒有錢。等到我離開黨校，楊獻珍主持黨校，向他要錢時，就很容易要到了。還有，解放初毛主席要我搬到中南海住，當時中南海房子不好找，劉少奇同志說他就要搬到新蓋的房子去，他現在的房子可以讓給我住。我去跟楊尚昆說了少奇同志的意見，他卻說：'那個房子你不能住！'我只好另找別的地方。可後來，楊尚昆自己卻住進了劉少奇原來的房子。總之，別人不能住，他自己卻可以住。"

陳伯達曾平靜地談到他與諸有仁在莫斯科的第一次戀愛：

"我和諸有仁是在赴蘇的旅途中認識的。開始，兩個人都是誠摯的，但在我受了'黨內勸告'的處分後，她顯得猶豫了，當時是李伯釗(與諸是同鄉，楊尚昆之妻——筆者注)勸了她，說：'他很有寫作才能，你還是不要放棄'。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兩個人的位置又顛倒了過來，她的態度已明朗，我卻覺得彼此性格不太相合，有些猶豫了，結果拖到離蘇回國，也沒有結婚。後來諸有仁寫信給我母親，希望老人能助一臂之力。我不願母親為自己擔憂，況且年齡已近三十，也就不再猶豫，於1933年與諸有仁結婚。

"諸有仁的姐姐諸有能當年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曾是羅亦農的妻子，並與羅生下獨生子羅西北(羅亦農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革命烈士；羅西北後來成為水電專家，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筆者注)。羅亦農犧牲後，諸有能改嫁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邵力子1926至1927年任國民黨駐莫斯科代表，並是中山大學的名譽學生，曾與兒

子劭志剛同班上課，後來又與同校女生傅學文結婚，一時傳為佳話。諸有能後來在莫斯科河裏游泳時不幸溺水而死，劭志剛則在回國後轉赴義大利留學，不知何故，在義大利遭人暗殺。”

陳伯達繼續回憶道：

“正像一些人描寫過的，中山大學學生的假期生活是很豐富多采的，對學生的保健制度也很完善。有個時候我患胃病，學校讓我到克裏米亞半島南部氣候溫和、風景秀麗的黑海海濱休養，我在療養院的幾個月期間，與一位蘇聯工程師同住一室，經常聊天，成了很好的朋友。

“1930年夏秋，蘇聯方面準備停辦中山大學，組織上提出讓我到共產國際的刊物做編輯工作。正巧這時周恩來同志來到蘇聯，我就去找他。周恩來同志過去聽說過我，但這時是第一次見面，就問我：‘你就是陳尚友吧？’我提出希望回國工作，他答應考慮。不久，組織上批准了我回國的要求。1930年底，我經東北邊境回到了祖國。”

陳伯達在蘇聯時的情況，本無秘密可言。1970年陳伯達倒臺後，官方羅織罪名將陳定為“托派分子”，一些見風使舵之輩也對陳極盡醜化之能事。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近年還編造出陳伯達在蘇時僅靠閱讀中文書學馬列的怪談。其實，師哲在蘇聯從未與陳伯達謀面，對陳的情況一無所知。據統計，1927年以前，翻譯成中文的馬列著作一共只有十六、七種，大部分散見於中國各地的刊物上，其中，印成單行本的馬列著作僅有五種。蘇聯國內的中譯本馬列著作遠少於此數，如何能依靠讀中文書學馬列呢？

7. 回歸故土

談到回國之初的情況，陳伯達說：

“我從東北大連坐船到了上海，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分配我到福建去

辦黨的刊物《福建紅旗》。我先回到惠安家鄉，看望已分別了四年多的母親，並把從蘇聯帶回的一箱俄文書籍存放在表哥黃泰南家，然後去省委報到。當時福建省委設在廈門，省委書記是羅明，秘書長是陶鑄。二十年代初，我曾在廈門工作多年，可說人地兩熟，但這次回來做的是秘密工作，本當隱姓埋名，熟人多了反而很不方便。

"有一次，我在街上買小吃，忽然看見一個老熟人，是張貞的叔父張達卿。張貞的部隊這時已調回閩南，張達卿是張貞師裏的老會計，他為人倒是很厚道的。我看見他後，立刻背過身，趕緊離開，但沒走兩三步，就被這位老會計叫住了，我只得回過身來。他拉我進了一家小餐館，要了兩個菜，邊吃邊和我小聲聊起來：'好幾年不見你了。熟人們談起你們幾個加入共產黨的人，還是佩服你呀，在共產黨倒楣的時候沒有離開。像張余生，雖然入黨早，現在卻離開了，到張貞下面做事了——可大家反而瞧不起他！'臨別時，老會計塞給我五十元錢，我不肯要，他說是送給我母親的，並說：'將來如果遇到什麼困難，就給我寫封信，我一定幫你想辦法。'我不好回絕他，就先收下了。回到省委，我把情況告訴羅明，我問：'這五十元錢是否設法還回去？'羅明說：'不用了。現在黨很困難，我們做地下工作的，須要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張達卿本是好意，你就收下好了。'

"但我還是發現因熟人太多，而且他們又都知道我是共產黨，我很難在廈門隱蔽自己，於是就向羅明提出希望另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不久羅明答復我：'已請示過中央，同意給你另安排工作，你去上海接洽去吧。'

"我到上海後，中央剛剛開過六屆四中全會，王明掌了權。我閱讀了一些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覺得有許多不能同意的地方，就把自己的意見寫下來交給了中央的聯絡人。不久就接到中央通知，派我到河北省

去編輯《北方紅旗》。我想，當時王明把持的中央把我派到我完全生疏的北方，是出於對我所寫的意見很不滿意。”

8. 天津被捕

三十年代，中共河北省委設在天津市。1931年4月8日，陳伯達一到天津，當晚就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逮捕。此事始末，黨組織本來是很清楚的，而且陳本人過去也常對別人談起過。1970年陳伯達倒臺之後，此事卻被興了大案，弄得神乎其神。為了給陳定上“叛徒、特務”的罪名，專案組不僅編造了大量虛假材料，而且不惜株連許多無辜者，甚至包括一些已經為黨犧牲的烈士。而那些被當作定案根據的虛假材料，專案組卻從來也不敢拿出來與當事者陳伯達本人見見面，進行一點點起碼的、哪怕僅僅是做做樣子的對證；也就是說，當時作為被告的陳伯達，甚至不清楚自己究竟因為什麼被指控。對天津被捕的經過，陳伯達曾在一份申訴中做了詳述，現照錄如下：

> “1931年春天，福建省委鑒於廈門認得我的人很多，不便在當地久留，派我回上海另任工作。
>
> 到上海後一些天，看到中央一些文件，曾經提過一些不同意見。中央通知我到河北省委編《北方紅旗》。我隨黨的交通到天津，暫居旅館。因當天剛到，人地生疏，沒有出門。但就在當天，有位同志把我從旅館接出，說是住招待所。那是一個大樓，河北省委有些機關都在裏面。當晚見過準備參加編輯《北方紅旗》的一個女同志。不記得當時還見過誰。半夜有人叫醒，看是幾個彪形大漢，覺得是偵探。那些人問話：你是什麼地方人？叫什麼名字？我鄉音很重，只得說出福建。本來沒有準備要叫什麼名字（指做地下工作使用的化名——引者注），臨時湊合回答：叫王通。那些偵探已叫起睡夢中的許多人，知

道這裏住的人來自不同地方，都得意相視而笑。第二天清早，省委組織部長陳原道同志[1]（省委的實際負責人），省委書記許蘭芝[2]（名義上的省委書記，原來是鐵路工人）先後到這個大樓來，當然也落網了。

特務們把我們這一群人先送英國工部局，再全部移到天津市公安局。

到公安局約一兩月，才開始審判。所有的人，都單獨過堂。第一次，法庭對各個人簡單地問了一陣。實際上，這次過堂，除許蘭芝外，都不過是一個形式。許蘭芝回來，他說，他向公安局法官叩頭，說他是做生意的，那天走錯了路，串錯了門，請求釋放，法庭要他取保出去。許蘭芝是有點像做生意的，他這樣說，大家都信以為真，給他湊些錢，有什麼社會關係的，也給他介紹社會關係。總之，大家都太老實了。其實，他業已出賣了自己，出賣了他所知的組織。後來知道，因為敵人還需要他，他還繼續關在公安局裏面，並沒有放出去。

在審判之前，陳原道曾經有一個錯誤的佈置：凡是有人證明，法庭已知道的，都只好承認。

陳原道過第二堂回來告訴大家：他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和當時擔任的職務，寫了一個供狀，說明共產主義是中國的出路。（記大意）

各人陸續過第二堂。

由於在獄的人都已被許蘭芝出賣，過第二堂時，法庭對於陸續過堂的人，都能說出他當時的職務，因此，原先過堂的各人就都承認了。只

[1] 陳原道：1925年加入中共，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先後在江蘇、河南、河北擔任黨的領導職務，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後轉押北平，曾與殷鑒共同領導獄中黨組織，1932年出獄後任江蘇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1月再次被捕後於4月在南京犧牲。陳原道是著名開明紳士劉少白的女婿，他妻子劉亞雄曾在1931年同案被捕，1949年以後，劉亞雄成為新中國最早的女部長之一。

[2] 許蘭芝，亦常寫作徐蘭芝，曾任中共六屆中央委員、河北省委書記，1931年被捕叛變，出賣組織，1949年後被公安司法部門逮捕法辦。

是有一個同志回來後悄悄地給我說：'我的職務在被捕前一晚才定下來的，為什麼法庭也能知道呢？' 這段話對我有很大啟發。

其後，也輪到我過第二堂。

在第二堂審問過程中，法庭說我是從上海來天津做宣傳工作的。我懷疑法庭怎麼可能這樣快地知道這樣秘密的事。我是在被捕當天到津的，除了像陳原道這樣的省委負責人和接觸有關的人可能知道外，我並不認識其他人，別人肯定也不會知道。我拒絕承認法庭的提問，因此，我挨了酷打，兩手滿是血。

我從法庭回到拘留所後，告訴陳原道我在法庭的經過。我說，我要堅持不承認的事。陳原道表示同意。

後來，全案只有我一個人過第三堂。法庭說，你身體不好，你隨便承認一點就行，什麼左聯、社聯都可以。你承認，我們就放你。這些全是誘供的把戲。

我在蘇聯學過黨的建設一課，讀過：在法庭上不給敵人口供，可以迫使叛徒露面，暴露叛徒。這個教育給我印象很深，一直不忘。我還是不承認，我說，我什麼都不是。在這個過程中，果然把案中的大叛徒暴露出來，這個叛徒就是許蘭芝。

許蘭芝的叛變，是秘密的，大家並不知道，並完全相信他所做的怎樣能夠'獲釋'的欺騙。法庭要我承認是'左聯'或'社聯'，顯然是因為不想讓許蘭芝露面出證。但因為我繼續不承認，法庭就把許蘭芝叫來了。他站在我的後面旁邊。我心中想，真有人出來證明了，這樣，可達到暴露叛徒的目的。我心中想，或許是帶我來津的上海交通吧？有了叛徒，我終究心很難過，遲遲不回頭去看。法庭催回頭看看，我只得回頭看究竟是個什麼人，看到的，是許蘭芝。'呵，竟有這等事！' 我不承認我認得他。法庭大聲叫打。特務看了我的兩手都

淌着血，不好再打手。於是特務就向我的身上亂打一頓。最後，我想，已經使叛徒不得不暴露，有了這樣的结果，總算是一個勝利，就承認是由上海來做宣傳工作的。

我離開法庭，回到監獄，把我另關一間，跟一些販毒的人在一起，但還是有機會把許蘭芝叛變的事傳給陳原道和其他同志。當然，大家都原來沒有想到，大吃一驚。後來我的鼻孔出血，記得血流九碗，監獄把我送醫院，派兩個特務日夜監視。時間或許是一個月左右，那個醫生很年青，態度好，工作認真，總算終止了出血。回到監獄，過些時，就同大家一起，送北平，隨後進了草嵐子胡同的監獄。

到北平，風傳日本人佔領了東北（監獄裏沒有報看）。

待遇比天津好些。

過些時日，由東北軍軍法處審問，情況比天津寬多了。記得審問的，是一個軍官，還有一個記錄，像談話的樣子，不過，我們被審的人只能站着。有些同志乘機翻供，竟就翻了，放了。我跟陳原道同志說，我在天津過第三堂才給口供，顯然是被迫的，敵人強加的，我可以只承認第一次、第二次的口供，因而無罪可定，能夠獲釋。陳原道不同意，說，你有許蘭芝作證，全翻不可能。監獄內的鬥爭是嚴肅的鬥爭，問題要服從黨的領導。我同陳原道同志商議，可以承認加入過互濟會。過堂時候，記得那個問話的東北軍官也問過我是否認得許蘭芝，我說，我不認得。他說，但是，你已承認加入過互濟會，還是要判刑。最後，宣佈我是判刑兩年半或兩年。

我在獄中生長的淋巴腺结核病一天天腫大起來，監獄找天主教醫院修女們给我開刀，於是，淋巴腺结核不但不能收口，反而更加蔓延了，膿流得更多了，是個可怕的樣子。陳原道同志給我說，你外面有什麼關係沒有？可以想法找關係，設法出去。我給他說，我在廈門鼓浪嶼

遇到張貞[3]底下一個老會計，他給我說過：'如果遇到什麼意外，可以寫信來，當給你想辦法。' 陳原道同志即促我寫信，信的內容，寫：我現住在北平，得病，如有便，請找人來看我一下。收信人一看信的內容，便認為我被捕，找一個當時廈門泉州一帶的名人，也曾經是華僑的王雨亭[4]（後來是共產黨員），此人我過去見過面，但沒有來往，據說有些豪俠氣，跟張貞也認識，他們去找張貞，說我被捕事，要他拿錢幫助贖出。在北伐時，我曾經在張貞師部裏當過秘書，當蔣介石在南京反革命時，福建反革命大頭目宋淵源從南京打電報給張貞，要他就地處理我（意思是處決，即槍殺），張貞就匆匆忙忙，秘密把我送走。王雨亭找他，他就拿幾百元給他，並說，如不夠用，還可以來要。王雨亭北來，路過上海，找了陳文總[5]同行。（陳文總當時是共產黨員，後來叛變了。）王雨亭等來平後，經過陳文總在東京的一個同學，姓邰的（聽說是個共產黨員），請他的父親（張學良的副官處長）幫助，進行活動。王等到平，第一次來探監。據記憶，他們第二次來，就要我出獄。這些事情經過，陳原道，還有在獄的其他人，完全清楚明白。

出獄時，王雨亭要我同他們到一個地方辦理出獄手續。我當時並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我想，王雨亭等也不會知道。）到了那裏，管監

3 張貞（本書前面亦曾提到此人），字幹之，同盟會員，曾任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副官長、東路討賊軍第八軍前敵司令、北伐軍獨立第四師師長、福州衛戍司令、南京衛戍司令、陸軍第四九師師長等職，後為陸軍中將、陸軍上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49 年去臺灣，任"立法委員"，1963 年在臺北去世。

4 王雨亭，著名華僑，曾在馬尼拉創辦《前驅日報》，與莊希泉、餘佩皋等一起長期進行愛國進步活動，1949 年任中央人民政府華僑委員會委員，1966 年病逝。

5 陳文總，又名陳君文，陳伯達青年時的朋友，曾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三十年代在上海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後脫離中共，曾任國民黨第一軍參謀長，1949 年去香港。

獄的人拿出一張條子，記得大意是：'年幼無知，誤入歧途'等話(只記大意是這樣)。管監獄的要我蓋個指印。我看了單子，不肯蓋。管監獄的人說，這是手續，不蓋指印，就不能出去。就這樣相持了一陣。王雨亭同志說，你的病嚴重，出去才好治療，還是要蓋。我當時想過，我早已翻供否認了黨員身份，只承認是互濟會會員，辦互濟會員身份的出獄，不會有損於黨的榮譽，所以，最後我給蓋了。

當然，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互濟會，出獄後，也沒有加入過互濟會。蓋這個指印，不過是說，我'年幼無知'，所以'加入這個互濟會'，以後不再加入了。其實前者是編造的，沒有過的事，後者也沒有人曾經要我加入互濟會，所說的，都是騙監獄的無的放矢。

事情經過就是如此。我就這樣被因病保釋了。"

9. 一件可靠的歷史證據

陳伯達天津被捕一事過去近四十年之後，陳伯達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1970年9月9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康生牽頭、郭玉峯直接負責的陳伯達專案組，並通過內部文件向全國發出號召，要求人們積極揭發陳伯達。從當時文件的語氣可以清楚看出，權力部門在事前就已經確定了將陳伯達定為敵我矛盾的目標。果然，專案組不負所托，在1971年和1972年數次拿出了定陳為叛徒特務的審查報告。可是，稍微細心地閱讀一下專案組的審查報告，不難發現，專案組羅列的所謂證據材料，主要是一些精心編織的口供，這些口供大多數出自被專案組拘捕的當年國民黨監獄的特務之口，其內容不僅甚多自相矛盾之處，而且均是距事情發生四十年後僅憑神奇的"回憶"所寫出的，在前後發出的幾份不同的文件中，這些口供有明顯的反復修改的痕跡，其虛假性是瞞不過明眼人的。

不過，專案組審查報告所附的材料中也有一件可靠的歷史材料，這是專案組所舉出的唯一的一件物證。但正是這件唯一的物證，恰恰可以推翻專案組所編織的全部的特務們的口供。這件物證就是1932年9月6日遠鋭寫給河北省委的意見書。

遠鋭的意見書寫道：

在這裏附帶說到一個問題即在我們沒有證據時絕對的不承認，有證據而不能推掉時，應該就輕避重的承認一點而有計劃的開脫一些重要人。我們在公安局的口號一方面是"打死不承認"，另一個是"有人對堂才承認"，所以第一堂除徐（許）蘭芝外都能執行打死不承認（我們差不多到公安局一個月後才過堂），而當第二堂（又二十多天後），因為有人證明，就差不多全體的並完全的承認了。我想這也是值得我們記住的一個教訓，在沒有證據的人雖然有人對堂依然有可能堅持不承認或只承認很輕的一小部分，所以"有人對堂才承認"是一個錯誤的口號，所以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經過都（寫）上了，真可以當傳記讀的！

這裏引錄的遠鋭的意見書，只是專案組節錄的一部分，而並不是全文。據當年中共中央的文件所注明，此件現存中央檔案館，一般人當然無法看到。專案組為什麼不引用全文呢？原因只有一個：引用全文將會更加不利於專案組的定案。所以，在目前還無法看到全文的條件下，我們也只能就專案組節錄的這部分內容，做些分析：

第一、遠鋭的意見書是一件歷史的物證。它的寫出，距陳伯達出獄的時間僅有半年，這就表明了它的可靠性，絕非那些在四十年後專案組搞出的特務們的口供所能相比。

第二、遠鋭是一個地下黨員的化名。他的本名是誰？中共中央文件沒有說出，我們現在也無從考證。但從意見書的內容看，他是一個陳

伯達在天津被捕時的同案人，而且是整個案件的知情人，這是沒有問題的。這就表明了它的真實性，絕非那些平日捕人如麻、根本不可能記清四十年前每個具體被捕人的詳細情況的特務們的"回憶"所能相比。

第三、意見書寫道："第一堂除徐（許）蘭芝外都能執行打死不承認"，清楚地說明了第一堂只有作為省委書記的許蘭芝叛變投敵，其他同案被捕人都保持了黨員的氣節，執行了"打死不承認"的規定。這就證明了專案組搞出的特務們口供中所說的什麼陳伯達和所有其他被捕人都是一問就供，全都立刻供認了自己身份並互相指認了他人身份等等說法的虛假性。

第四、意見書清楚說明，"打死不承認"與"有人對堂才承認"，是當時黨組織確定的兩個應變的行動口號，而並非是某一個人的私人準則。因此，儘管"有人對堂才承認"這個口號有種種不妥（遠銳並專門為此在意見書中指出其經驗教訓），但這是黨組織的失誤、作為執行了組織決定的黨員個人，並沒有責任。

第五、專案組之所以舉出遠銳的意見書，其本意在於硬要把意見書中"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經過都寫上了，真可以當傳記讀的"這句話強安在陳伯達頭上，在他們下達的文件中說，"有些人"就是陳伯達。但事實上，這句話是安不到陳伯達頭上的。首先，陳伯達在獄中自始至終沒有暴露過真實姓名（許蘭芝只知道他是剛從上海派來做宣傳工作的，並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這是所有材料都證明了的，這正說明陳伯達除了因叛徒的出賣和對質，被迫承認了自己的黨員身份外，並沒有向敵人供出其他情況，更不可能供出全部經歷。從現存的各種材料看，當時在獄中把自己的全部經歷都寫出的，是陳原道。他之所以寫出全部經歷，是為了闡述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政治信仰，而並非是向敵人投降。陳原道出獄後不久，又在南京被捕，

1933年4月在南京雨花臺壯烈犧牲。

曾有一本由某個官方部門組織編寫的書這樣寫道：陳伯達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黨員身份和職務，因此他已自首變節。這本書顯然是為了繼續堅持不實之詞而在故意混淆視聽。瞭解黨的地下工作規則的人都清楚：當一個共產黨員被捕後，在由於叛徒的出賣和對質而暴露了黨員身份的情況下，被迫承認了自己個人的黨員身份，這是黨的紀律所允許的。

關於共產黨員被捕後出獄的，應下什麼結論，什麼情況屬於叛變？什麼情況屬於自首變節？中共中央在歷史上曾有過兩個正式的文件，即1937年7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和194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1978年11月12日，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上重申了這兩個文件，並強調指出："我認為，中央應該承認'七·七'決定和1940年的決定是黨的決定。"按照陳雲所說的這兩個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來衡量，陳伯達的被捕及其出獄，都是沒有問題的。

當代中國的政治要人薄一波在近年所寫的回憶錄中說，他在出獄到達延安之後，曾經向劉少奇揭發了陳伯達"叛變出獄"的問題，可劉少奇卻回答說："他（指陳伯達）當個秘書還可以吧。"

按照薄一波的回憶錄，劉少奇成了包庇陳伯達的包庇犯，因為劉少奇不僅不將陳伯達開除出黨，反而認為他可以擔當中央主席毛澤東的秘書。人所共知，中央主席的秘書是一個直接接觸黨的核心機密的重要職務。中共對於叛徒一向有極嚴格的紀律處置。毛澤東在1940年12月為中共中央寫的黨內指示《論政策》中明文規定：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黨。"（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762頁）劉少奇既然接到了薄一波的揭發，卻不按照黨的紀律規定開除陳伯達的黨籍，還要安排他當毛澤東的秘書，而薄一波作為中共七大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對於陳伯達當選七大候補中央委員（隨後遞補為

中央委員），也不採取組織措施加以阻攔。這豈不都是咄咄怪事？薄一波還説他在延安見到陳伯達以後，陳伯達很尷尬。可是據陳伯達本人生前所講，薄一波當年在延安中央黨校聽陳伯達講課，對陳表現得格外親熱。建國初期，他們兩人同往天津搞調查時，同住一所房子，彼此親密無間。而且還有不只一人親眼見過薄一波在1965年專程到陳伯達家中，與陳伯達親切交談。更何況薄一波曾與陳伯達同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朝為官”十餘年，經常同堂議事。對這些情況，薄一波又該如何解釋呢？

認真地、實事求是地瞭解分析陳伯達的被捕和出獄經過，結論很清楚：他沒有做違背黨的紀律的事。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十年中，中共中央組織部十分清楚陳伯達的被捕和出獄情況，從來沒有認為他有什麼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期，陳伯達倒了以後，專案組以極不正常的手段，編造虛假材料，羅織種種罪名，給陳伯達帶上了五頂帽子，但是，專案組編造的這些虛假材料卻從來也不敢拿出來與當事者陳伯達本人進行對證。這種作法本身就表明了專案組的定案依據是虛假的，是經不起質證的。尤其荒謬絕倫的是，專案組把陳伯達定為“特務”，卻又列不出哪怕是一條材料。所謂特務，總應該是有組織的。陳伯達是哪個特務組織的呢？是屬於“中統”呢？還是屬於“軍統”呢？他的上級是誰呢？他的下級又是誰呢？莫非他是直屬於蔣介石一個人的特務不成？他總不會是既無上級，又無下級的光杆特務吧？

陳伯達生前曾經十分氣憤地説：“説我是特務，特務總要有任務吧？難道給我這個特務的任務，就是寫《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其實，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處於困難時期所寫的一系列揭露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本質並激勵共產黨人堅強奮鬥的著作，最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陳伯達絕不是什麼“叛徒”、“特務”。歷史的真相終將會

大白於天下。

10.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在三十年代初的北方，一方面，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陰雲依然密佈；另一方面，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已經踏進關內，乘國民黨政府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之機，肆無忌憚地蠶食祖國的大好河山。在國民黨實力派與日本人聯手反共的惡劣條件下，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其困難程度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陳伯達每當回顧那一段艱辛的經歷，語音裏不免帶着些輕微的激動：

“王雨亭、陳文總來北平時帶的錢不少，但贖我出來，大約只需要一、二百元(大洋)。我因患病被保釋出獄後，他們先把我接到北京飯店住了兩天，然後轉送北海療養院治病。錢很快就用掉了大部分，他們返回南方時，給我剩下的錢已不多。因北海療養院收費較高，我又轉到收費低廉的西山療養院。這個療養院當時由著名癆病科專家盧永春大夫主持，他對我的病的治療很得法，我的淋巴腺結核一天天縮小了。後來可以出院了。但我付不起醫療費，院方只好説：‘付不起就算了，等你將來能做事時，設法給我們蓋些房子好了。’這其實是無可奈何的話。解放後我專門找過盧永春大夫，可惜他已經去世了。”

“離開西山療養院時，我身體並未完全恢復，開始只好依靠閩南在北平的學生幫助，勉強維持生活，後來身體穩定一些，就設法去找黨組織。1933年春，我得知馮玉祥與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便來到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在那裏找到了黨的北方局負責人柯慶施。黨組織恢復了我的組織關係，即安排我從事政治工作，編輯同盟軍的報紙《民眾日報》，後來報紙改名為《老百姓報》。這時，我還認識了秘密加入黨的吉鴻昌同志。

“吉鴻昌原是西北軍將領，為人很豪爽。他在抗日同盟軍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張家口期間，他和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因我的病原未痊癒，初到塞北，氣候不適應，一度病情轉重了，只好躺在床上為報紙寫社論。病情好一些時，就儘量下部隊去做政治工作。那時情況很複雜，部隊主要是原馮玉祥的西北軍舊部，成份雜亂，素質不一，要做好部隊的政治工作，常要克服許多意料不到的困難。

“同盟軍初期，抗日士氣很高，接連收復察東幾個縣，7月份又攻佔了多倫，全國抗日民氣為之一振，軍隊迅速擴大到十萬多人。但這時蔣介石以違反軍令政令為名，要求馮玉祥離開同盟軍。8月初馮玉祥離去。馮玉祥離軍，極大挫傷了同盟軍的士氣，使部隊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鑒於當時的形勢，我曾在黨的緊急會議上提出將能掌握的軍隊交由吉鴻昌指揮。10月，同盟軍在日偽軍與國民黨軍的夾擊下失敗。

“抗日同盟軍失敗後，組織解體，人員離散。我赴山西大同繞道回北平，因病情不好，再次到北平西山休養。這次不是住在西山療養院，而是在香山附近找了一處民居，租住下來。利用休養的時間，我寫了自己的第一本學術書《論譚嗣同》，因當時的參考書實在太少，在論述上就不夠完善，後來我又對此書做過一些修訂和補充。我在西山住了兩個月的時間，身體有所恢復，組織上安排我到天津與先期到達那裏的吉鴻昌、南漢宸等進行地下抗日宣傳工作。吉鴻昌出錢創辦了《民族戰旗》，這個刊物是由我主編。同時，我還主辦了河北省委機關報《實話報》。”

11. 吹響“武裝保衛華北”的號角

“那時，吉鴻昌同志在天津法租界的家曾是我們的一個工作站。那是一座三層小樓，名叫‘紅樓’，《民族戰旗》是在頂層編輯。柯慶

施、南漢宸、宣俠父等同志都常來此處研究工作。有時為了工作方便，我們就住在‘紅樓’。”

我問：“那你們吃飯怎麼辦呢？是不是雇了大師傅做飯？”

陳答：“那時是吃包飯，就是在附近的飯館定好飯，到了吃飯時間，飯館的夥計用大木盒將剛做好的飯菜送到住處來，很方便的。”

陳伯達接着談道：

“那時，吉鴻昌給了我很大幫助，《論譚嗣同》一書就是吉鴻昌出錢出版的，但此書的出版卻讓朱其文給辦糟了。我因忙於辦黨的刊物，沒有時間校對，就讓朱其文去校對，我曾再三叮囑他一定要認真校對，可是書印出來，我一看，印錯的字很多，根本就沒有校對，可書的最後卻有‘校正者朱其文’幾個字，我很生氣。解放後，開政治協商會議，朱其文也是委員，他這時在外交部工作，見到我，想和我攀談，我只和他點一下頭，沒有和他談，因為印書這件事實在讓人生氣。

“1934 年初冬，諸有仁快要生孩子了，急需住醫院，我一時沒有錢，就去找吉鴻昌借，見到吉鴻昌的原配夫人，她告訴我吉鴻昌已被捕，給了我一百元錢幫助安頓諸有仁住院，我隨後接到組織上讓我立即轉移去北平的通知。到北平後不久，得知吉鴻昌同志已被敵人殺害了。

“吉鴻昌犧牲得很英勇。聽說他在獄中做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我後來在《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中寫到了他因堅決抗日而被蔣介石、何應欽殺害的事。

“因諸有仁生孩子，我又回天津。孩子生下來後，給他起了個小名，叫‘小老虎’。在這期間，黨內發生了一件事。我在辦《實話報》時，提出了‘武裝保衛華北’的口號。我提出這個口號是因為華北正面臨着淪亡的危險，要團結各界民眾、各種力量，共同抗擊日寇蠶食和吞併華北的圖謀。‘武裝保衛華北’的口號一經提出，就有很強的號召

力。可當時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卻認為華北已經淪亡了，僅僅是還沒有更換旗子，認為我提出的口號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口號，而另提出'武裝收復華北'的口號。以朱理治同志為首的河北省委並做出了'關於以曲突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决議'，還把當時河北省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同志也算在我的'右傾路線'之內。'曲突'是我當時在黨內刊物上的化名。省委撤換了我主編《實話報》的工作，要求我到基層民族自衛隊去工作。我因自己的福建口音別人很難聽懂，身體又很差，去基層很難開展工作，就請求去北平做文化工作，幸得組織的同意。

"在此事之前，1934年春天，我因向北平的《文史》雜誌投稿，已與中國大學國學系主任吳承仕先生建立了通信聯繫。吳先生曾將我寫的《從名實問題論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分野》和《研究中國社會史方法論的幾個先決問題》、《論中國社會的停滯狀態》等文加以發表。因此，我到北平工作後，很快就與吳承仕等進步文化人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當時，北平的外省地方會館很多，我住在泉州會館，這個會館以及附近的漳州會館、龍溪會館等都住有一些在北平上學的福建籍大學生，我曾介紹過其中一些進步學生參加'社聯'或'左聯'，記得林海音的弟弟也在內。我是直屬北方局的黨員，與北平的市委書記雖有聯繫，但不是上下級關係，出於地下工作的紀律，就沒有讓他知道我的確切住址，總是另約他在其他地點會面。後來，這個市委書記(似姓吳、名字已記不起了)叛變時，敵人一時找不到我的具體住址。我在福建籍學生們的及時通知和幫助下，得以迅速轉移，躲開了特務們的追捕。

"我離開會館，按福建籍學生的介紹，先到清華大學兩個同鄉處暫住，但因彼此生疏，他們也似怕連累，兩天後我又進城找吳承仕先生。吳先生讓他的兩個學生——齊燕銘和張致祥幫助我。齊燕銘把我介紹到北京大學羅膺中教授家去住，諸有仁和孩子則住到張致祥家。齊燕銘是

蒙古族人，其家庭原是蒙古貴族，而羅膺中(羅庸，字膺中)也是蒙古族人，所以他們原很熟悉。我在羅先生家住的時間不短，當時正值報上刊登'何梅協定'的消息，我和羅先生經常議論時局，我有時推斷形勢將會如何如何發展，其後，果如我之所料，羅先生很稱讚我料事準確。抗日戰爭時期，羅先生在西南聯大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他不幸在重慶病逝。

"因'何梅協定'規定國民黨憲兵三團撤出河北並取消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國民黨一時手忙腳亂，顧不上繼續抓人，才給了我們脫身的機會。經過黨的秘密聯繫渠道小連的家，我與設在天津的北方局聯繫上了，於是回到天津，先見到柯慶施，他當時是北方局的組織部長，他給我說了這次北平黨組織被破壞的具體經過，就同我商量以後的工作。

"根據北方局的意見，柯慶施要我尋找過去和吉鴻昌同志有關係的人，弄些錢，重新辦一個刊物。我找到南漢宸同志，把辦刊物的事告訴他。他答應為刊物籌款，並負擔我在天津的生活費。不久他還給我找來一套半舊的西服，以便我需要時可替換長衫。後來他又介紹我到天津法商學院兼課講授世界經濟，生活費就完全自理了。

"刊物起初叫《華北烽火》，由我主稿、主編，主旨是宣傳抗日。李鐵夫同志負責聯繫印刷。李鐵夫同志是朝鮮族人，曾參加創建朝鮮共產黨，後來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代初在天津組織民族武裝自衛會，積極進行抗日活動(李鐵夫擔任過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天津市委書記——筆者注)，1937年他去延安開會時，不幸因病逝世。

"刊物的發行，由南漢宸同志承擔上層關係方面，他承擔的數量是相當大的，特別是西北軍方面的發行。南漢宸過去當過楊虎城的秘書長，與西北軍以及東北軍將領都有很多聯繫。李鐵夫同志和我則承擔向北平和天津的學界散發。但為時不久，向學界發行的工作逐漸困難，國

民黨特務已有人在郵局從事查禁。因此，刊物的名稱改了幾次，如《長城》、《國防》、《中國人》等，後來刊物移到北平，刊名又改為《人民之友》。

"那時候，李鐵夫愛人的一位親屬、大學生張潔清常從北平來天津，她利用她哥哥張壁是北平員警總監的關係，每次來天津，都用轎車帶回一批刊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民黨的查禁。張潔清後來與彭真結婚。

"這些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數是我寫的，部分是其他地下黨員寫的。林鐵、彭真、姚依林等都在刊物上寫過文章。1936年春劉少奇同志來天津後，也曾以'陶尚行'、'凱風'、'莫文華'等筆名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我在這些刊物上用的筆名主要有'史達'、'斯達'、'陳萬里'、'陳文殊'等。

"在這一民族危機的時期，我曾認真研究過對日作戰一旦展開後、戰略方面的一些問題，並在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討論抗日軍事問題的文章。1936年2月我將這些軍事論文結集出版，書名定為《國防概論》，用的筆名是'史達'。這本書我想毛主席是看過的。

"後來在延安，有一次劉少奇在與毛主席談話時，對我辦的這些刊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些刊物打破了當時蔣介石'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的禁令，激勵了平津等地羣眾尤其是青年們的愛國熱情，堅定了人們抗日的決心，對促進'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次劉少奇對我的誇獎，留給了毛主席很深的印象。"

12. 一二·九運動和新啟蒙運動

一二·九運動和新啟蒙運動都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生於中國的抗日愛國運動，前者是羣眾性的政治運動，後者則是文化界的思想運

動。由於種種原因，在近現代中國歷史書上，論述前者的很多，而述及後者的極少。陳伯達認為，這兩個運動是互相緊密地聯繫着的。他回憶了那時的情況：

"'何梅協定'之後，日本侵略者更加明目張膽地蠶食華北，進逼平津，國民黨節節退讓，撤走了黨政機關和中央軍，形勢日趨緊張。亡國的危險迫使廣大羣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開始思索，尋找救國的出路。當時，我們黨是唯一堅決主張團結一切力量抗日而又擁有武裝力量的政黨。越來越多的羣眾將希望寄託於我們黨，黨的地下抗日宣傳也鼓舞了羣眾的愛國熱情。

"十二月九日當天的羣眾遊行示威是在所謂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準備宣佈華北'自治'的緊急關頭，在一部分地下黨員的努力活動下，廣大愛國學生自發舉行的。其後，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又舉行了十二月十六日的大示威。一二·九時期最活躍的同志有黃敬、蔣南翔、姚依林、李昌等。當時黃敬同志出獄後尚未恢復組織關係，李昌也還不是黨員。蔣南翔和姚依林同志是黨員，他們兩人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姚依林一二·九後調到天津幫我辦《國防》雜誌。

"一二·九當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大公報》才知道發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當時白色恐怖非常嚴重，愛國學生們衝破了國民黨軍警的阻擋，舉行了如此英勇的示威遊行，我心情很激動，大哭了一通，立即買車票趕到北平。在北平我接見了一些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如蔣南翔等，起草了宣傳大綱，並參加組織第二步行動：一二·一六大示威。之後，上海的青年學生也舉行了愛國示威遊行。

"楊述寫的一本小冊子《一二九漫憶》，1981年再版時，在上海學生示威一節下面加了個注，說：'陳伯達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上海這次遊行，給國民黨政府下跪，是一種忍讓為國的正確路線。這種說法

當時就引起了一二九運動中許多北方學生的議論和不滿。'楊述把我歸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問題是當時確實是要‘忍讓為國’，不僅是當時，現在也還是要‘忍讓為國’。

“一二．九運動後，一九三六年春，劉少奇同志作為中央代表來到天津，不久，我主辦的刊物移到北平，在這之前，我已應吳承仕先生的邀請，在北平中國大學講授先秦諸子哲學，每週有兩天到北平講課，所以我並未見到少奇同志。北方局曾將少奇同志的一些文章交給我發表。這些文章文風與其他人不同，內容新鮮。後來彭真同志來北平告訴我：新來的中央代表很注意這個刊物，認為辦得好，希望我專心辦下去，以後也不必在大學兼課了，生活費可由組織上解決。我因覺得在大學兼課有些好處，並可減少組織上的經濟負擔，所以沒有接受不再兼課的建議。

“那時，同在中國大學授課的同事，記得有孫人和、李達、黃松齡、曹靖華、齊燕銘等。我在學校教課時用的名字是陳志梅，而在刊物上寫的有關先秦諸子哲學的文章，用的筆名是陳伯達，結果有一個時候有些學生就認為我講課的內容是抄陳伯達的，一些右翼學生就借此起哄，並說聽不懂我的話，要趕我走。吳承仕先生得知後，來到課堂上對學生們說：‘據我所知，他絕不是抄陳伯達的，請同學們相信我好了！’學生們才安靜下來。”

1988年秋，北京市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的幾位同志到陳伯達家中，向他瞭解一二．九運動之後的“新啟蒙運動”的情況，陳伯達對調查人員談到：

“1936年9月，我應《讀書生活》雜誌之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艾思奇他們發表時，把標題改為《哲學的國防動員》，把我原來的標題改為副標題。這篇文章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我後來又接連寫了《論新啟蒙運動》、《我們還需要‘德

賽二先生'》、《論中國的自我覺醒》等文，進一步論述我的主張。

"張申府先生在新啟蒙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在北平曾多次與他見面商談新啟蒙運動的事，他當時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洋哲學。他的家住在城裏一個很漂亮的四合院內。他有兩位夫人，一位就是劉清揚女士。張申府與劉清揚曾是周總理旅歐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介紹人，張申府還介紹了赴德國學習的朱德同志加入黨。這樣，張申府介紹了兩位傑出人物入黨。後來恩來同志回國到黃埔軍校任政治部副主任，也是經過張申府的推薦，因為原先是任命張申府擔任，他不肯擔任，推薦周恩來同志擔任。雖然後來張申府脱離了黨，但他曾對中國革命有過功勞，這一點是應當肯定的。

"美國學者微拉·施瓦支寫的《中國的啟蒙運動》一書，説我是與張申府見面商量後才發動新啟蒙運動的。這一説法有誤。實際上我是在寫了《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一文之後才與張申府見面的。施瓦支的書寫到我曾拜訪過顧頡剛，這是符實的。我在《中國古史上的神話傳説源流考》等文中肯定了顧頡剛'累層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觀點，顧頡剛很高興，請我吃過一頓飯，記得當時在座的還有朱蘊山。

"新啟蒙運動的主旨就是我在《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中所提出的：'反對異族奴役、反對復古、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禁止提'反對日本侵略'，禁止報刊上出現'抗日'這個詞，所以只能用'反對異族奴役'的提法來代替，這裏'異族'就是指日本。新啟蒙運動的建議提出後，上海《讀書生活》、《新世紀》、北平《現實月刊》、《時代文化》、《北平新報》，《華北呼聲》等報刊都發表文章回應，抗日和民主的思潮得到蓬勃發展。親日派鄭孝胥、守舊派楊立奎等對此很恐慌，通電宣稱要'剷除'新啟蒙運動，但進步思潮總是阻擋不住的。"

關於陳伯達在“一二．九運動”中所起的作用，現代中共黨史書籍大多一字不提，惟有1982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刊登的高文華（曾任中共北方局書記）寫的《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中有一段記述：

“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冀東二十二個縣偽化，形勢十分緊張。北平、天津的學生紛紛起來反對，還組織了‘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隊長是李昌（當時不是黨員，現在科學院）。學生運動一直發展到後來的‘一二．九運動’。我們北方局支持並領導了這一愛國運動，在黨內是趙升陽等同志，還有柯慶施、陳伯達領導的，而直接出面領導運動的是李昌、蔣南翔（清華大學支部書記）、林楓、姚依林、徐冰、許德珩等同志。‘一二．九運動’的主要力量是學生、教員、教授等知識份子。”

另外，於光遠在1998年6月出版的《讀書》雜誌上發表的《初識陳伯達》，也對陳伯達在“一二．九運動”中的作用說過幾句話：

“……還有在中國大學教書的教授陳伯達，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我從同黨的關係比較深的清華同學對我說的話中得出一個印象：陳伯達與學生運動似乎有比較深的關係，他似乎是黨員。聽說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發出的某個文告是在陳伯達指導下起草的。‘一二．九’那天，我們清華大學救國會發過一個《告全國人民書》，其中有一個傳誦一時的警句：‘安心讀書嗎？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有一個清華同學告訴我，這是陳伯達加上去的。”

于光遠在陳伯達倒後，一直標榜自己是陳伯達的對頭，所以他的話有些吞吞吐吐，但他畢竟透露了一些事實，比那些抹煞事實的人還是高明。另外，據原始資料，清華大學救國會的《告全國人民書》是12月10日發出的，其中的警句完全可能是陳伯達加上的。當時的清華同

學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說假話。

關於新啟蒙運動，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新、彭明等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曾有專節進行論述，但因陳伯達自1970年即已倒臺，該書在1981年再版時就把這一節完全抽掉了。因為一個人的倒臺，就把歷史的重要一頁撕去，這在學術史上是罕見的事。

1999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丁守和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一書重提了新啟蒙運動，在該書下卷的《本卷前言》中寫道：

"新啟蒙運動，是五四後中國啟蒙運動演化進程中的一個亮點。它的直接緣起，就是對五四啟蒙運動的反思。……

陳伯達在《哲學的國防動員》一文中，提出了發起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他指出，在民族危機的嚴重形勢下，應該將五四時代一批思想界人物團結起來，從哲學上進行救亡民主聯合運動，其基本綱領為：'繼續並擴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啟蒙運動，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對禮教，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此後，張申府、艾思奇、何干之、胡繩等人紛紛撰文響應。新啟蒙運動，既是民主主義思想運動，又是民族主義的思想運動，它的特點是將兩者結合起來。所謂民主主義思想運動，就是：'要把四萬萬同胞從獨斷、迷信、盲從的愚昧生活中喚醒起來，要使四萬萬同胞過着有文化的、有理性的、獨立的生活'；所謂民族主義思想運動，就是'要推動四萬萬同胞為中華民國生存而走上戰鬥；為自己的幸福而走上戰鬥'。'七七事變'後，這場思想啟蒙運動熔進了偉大的抗日民族戰爭的洪流中。"

在該書第155頁的《提要》中又寫道：

"1936年下半年，……在北平、上海等地發動了震動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新啟蒙運動，圍繞民主、科學和團結抗戰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

論和無畏的?喊。儘管由於不久爆發的'七七事變'打斷了它的發展進程，使這場思想啟蒙運動熔進了偉大的民族戰爭，但它在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史上卻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國外學者中論述新啟蒙運動的主要有美國的微拉．施瓦支。他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一書中《1936至1937年的新啟蒙運動》一節裏寫道：

"陳伯達在1937年寫的《思想無罪》一文中也主張知識份子解放觀念的現代化。他重申一切思想在本質上都是批判性的這一啟蒙觀點，因而成為專斷政權的掘墓人。他接着限定了批判思想的界限。……他指出五四理性主義者只能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陳以非常欽佩的心情回憶了胡適的五四名言：'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他接着論證了批判奴化思想必須經過耐心細緻的調查研究，而不能自以為是地否定傳統文化。為了實現這個計畫，他拜訪了顧頡剛等五四知識份子，把他們歷史相對主義的方法運用於新啟蒙運動。"

13. 陳伯達三十年代的主要著作

三十年代，是陳伯達的一個重要的寫作時期，他在這一時期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有關哲學和新啟蒙運動的文章，曾經產生過較大的影響，"陳伯達"這個筆名也因此為中國思想界所知曉。

1981年陳伯達保外就醫以後，有一段時間很想看一看自己過去的舊作。可是自從他被關押到秦城監獄之後，他家中的藏書已全被抄走，片紙未留。1988年春，曾有一位公安部的幹部非正式地對陳說過："你的書都在'毛選編委會'(即現在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呢！都在使用着呢！"直到陳伯達去世七年後的1996年，在我多次向中央寫信反映後，中央文獻研究室才發還了一千二百餘冊古舊書籍，而現代版書籍仍一冊未還。所以，在八十年代時，陳伯達想讀一讀自己的舊作，只

能向熟人和領導部門求助。當時，即使是公共圖書館和各單位的圖書館，也都自1970年起將他的著作全部封存，長期禁止借閱。我曾先後去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都未能借到他的著作。有位熟人曾幫助找到他四十年代寫的幾本書(解放後重印本)，但對他三十年代的作品，仍無處可尋。

陳伯達無奈，只好向中共中央領導部門提出請求，希望能借閱他在三十年代由新知書店和生活書店出版的文集《真理的追求》和《在文化陣線上》。有關負責人提出，可以從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圖書館裏找一找。然而該圖書館也沒有這兩部書。不過幸運的是，找到了一套"四人幫"的寫作班子為批判陳伯達而於1974年編輯的《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言論集》。這套書收集了陳伯達很多文章，只是印數極少，書記處研究室的這套是從江青的辦公室裏搬過來的。有關人員按照《言論集》中各篇文章後面的注，找出曾收集於《真理的追求》和《在文化陣線上》的文章。這些文章分載於《言論集》的七個分冊中，於是就借出了這些分冊，即《言論集》的第二、三、四、六、七、八、十二，共七冊。

陳伯達知悉有這樣一套自己的《言論集》後，很後悔沒有將《言論集》全數借出。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已經很費事地借出了七冊，作為一個受管制的囚犯，就不好再提新的請求、再次麻煩領導部門了。

陳伯達仔細翻閱了這七冊書中的舊作。

現就陳伯達所談的情況和筆者的見解，對這七冊書中所載的陳伯達舊作，做一個簡略的介紹。

一、發表於1933年底的《論譚嗣同》，是陳伯達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也是國內最早深入研究譚嗣同哲學思想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距譚嗣同就義僅只三十五年，曾有人說過，這本書的出版帶動了研究譚嗣

同的熱潮。復旦大學研究中國思想史的著名學者蔡尚思教授曾對這本書給予很高的重視，在其《中國文化史要義》一書中，對陳伯達在本書中所闡述的對佛教的評論進行了概括，將其觀點與章太炎先生的觀點相並列。

二、《從名實問題論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分野》(1934年北平《文史》第一卷第二、第三號連載)是國內第一篇以辯證唯物主義觀點論述中國哲學史上名實問題的專論，如中國大學國學系主任吳承仕先生所評論的："陳伯達君將古典中'名'與'實'的問題，作為哲學中最高出發點的'思維與存在'的問題去認識與批判，這是最值得刮目的一個思考方式。……我很珍重的介紹陳君的論點"

三、《中國社會停滯狀態的基礎》(1934年北平《文史》第一卷第四號刊載)也是一篇在學術界有長久影響的論文。1984年白鋼先生編著的《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論戰的由來與發展》一書的第一章中說："三十年代所謂'中國社會長期停滯論'的提出，還與當時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中，有些人把中國看成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重要典型有關。1934年陳伯達發表《中國社會停滯狀態的基礎》，副標題叫做《論〈封建生產方式在中國所展開的特殊亞細亞形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白鋼先生接着詳細評述了陳伯達的觀點，認為陳伯達是最早提出這一理論性問題的主要人物之一，其觀點有着獨特的代表性。

四、《中國古史上的神話傳說源流考》(1935年上海《太白》第二卷第一期刊載)是一篇較早考證神話源流的論文，其中所引用的材料，部分為齊燕銘協助搜集。陳伯達在此文中肯定了顧頡剛先生"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受到顧先生的好評。陳、顧二人因此而結識。

五、《殷周社會略考》(1935年上海《太白》第二卷第三期)，此文曾受到1971年和1972年中共中央文件的批判，原因是此文認為"無論是從地下的發現，或古代遺下最可靠的文書，我們還沒有發現

出中國曾由氏族社會轉化為奴隸社會之歷史的存在。"當年中共中央的文件判定這種觀點是托派觀點。

陳伯達在晚年重讀此文後說："郭沫若認為殷代是奴隸社會，其主要根據是殷代貴族的墓葬中有奴隸陪葬。但是，這些奴隸顯然是家庭奴隸，而不是生產奴隸。奴隸社會的標誌，是使用大量的生產奴隸，而不是僅有家庭奴隸。家庭奴隸一直到清代都存在。郭沫若並沒有找到殷代有大量生產奴隸的證據。所以，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還須要人們繼續研究。"

六、《春秋戰國社會略考》(1935年上海《太白》第二卷第十二期)，這篇文章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具有某些新的特點的封建社會的時期，與上篇文章一樣，此文的觀點也與當代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正統派的學術觀點有很大的不同。

七、《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問題的透視》(1935年12月1日上海《世界知識》第三卷第六期，署名"周金")，這篇寫於"一二．九"運動前夕的文章，尖銳地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圖謀：

"一方面，日本的經濟活動，必將旋轉於軍用的周圍，另一方面，日本軍國主義者必將繼續發展在華北甚至在全中國的軍事行動。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徵就是以戰爭來準備戰爭，在東北是如此，在華北也已如此地開始。……日本'開發華北經濟'和'中日經濟提攜'的進行，實助長着大戰的發展，而且使日本軍國主義者進一步樹立自己大戰的陣地。而大戰的爆發，將使華北和全國人民的經濟生活，進一步地化為帝國主義炮火下的灰燼。"

八、《〈關於命運〉》(1935年5月上海《芒種》第六期，署名"梅莊")，這篇文章是針對周作人《關於命運》一文而寫的。此文雖是發表在1935年，卻已通過對周作人思想的分析，預見到周作人將會蛻變

成一個漢奸。

陳伯達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不幸的，是知堂先生在把明末和現今比較的時候，卻不醜洪、吳(指洪承疇、吳三桂——筆者注)，而只醜東林，把黑暗看成光明，光明看成黑暗。甚至當時為人民抗清力量所支持下的「魯王監國」，曾被那沒有心肝的人斥為「蕞爾小朝廷」，也居然博到了知堂先生的附和。知堂先生走得真遠了，走得真遠了。這也算是知堂先生的命運吧。"

九、《論自由》(1935年12月北平《盍旦》第一卷第三期)，這篇以"梅莊"為筆名發表的文章，以犀利的筆鋒，深刻論述了人類爭自由的歷史。

陳伯達在這篇文章中說：

"人類的歷史　如果我們想籠統地說，也就是爭自由的歷史。人類一開始，就是向自然界做自由的奮鬥，就是想擺脫自然界所加給人類的桎梏。……在社會分裂之後，人類於自然界的桎梏之外又加上了不自然的社會桎梏，於是，人類的自由奮鬥，就發展到針對着兩方面：一方面繼續和自然界奮鬥，另一方面又和社會奮鬥。

"「向自然界爭自由」，和「向社會爭自由」，更進一步地來說，也就是表現為人類社會歷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爭鬥。……「自由」是人類的文明之母。在那裏失掉自由的地方，那裏的文明就要遇到不可免的災難。人類的力量，聰明，活潑，創造，事實上都要以自由的存在為前提。否認自由的存在，事實上也就是否認文明的存在。

"「不自由，毋寧死」——這種呼聲，如果不是身受的，是叫喊不出來的。我景仰着法蘭西大革命的先烈，我又景仰着站在爭自由前線的法蘭西人民。……偉大中國民族的蘇醒，必然是中國人民「自由」的蘇醒。"

十、《挽救華北目前的大危機》(1936年5月上海《永生》第一卷

第十期），這篇以"周金"為筆名的文章，在國家民族危機存亡之秋，向全國人民大聲疾呼：

"華北已臨到最後的危機了。敵人擴大駐軍和防共軍事協定的實現，必將把全華北人民沉淪於亡國的大血海，而演變為全國的淪亡。我們身當華北危局的同胞，要迫切地呼籲全國同胞立即與華北同胞共同起來，粉身碎首，以挽救這當頭的大難！"

這篇文章字字飽含着愛國激情，至今讀來，仍可感人泣下。

十一、《腐敗哲學的沒落》，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日本《唯物論研究》1935年秋季號，1936年5月上海《讀書生活》第四卷第一期、第二期轉載。該文對真理問題做了深入詳細的闡述，明確指出：

"怎樣知道真理是具體的呢？具體的真理怎樣會被我們所知道呢？人們經過自己的實踐去接近事物，而事物也經過人們的實踐而接近於人們，人們從這裏把握了具體的真理，而真理也正從這裏表現了自己的具體性。……，所以，人們從自己的實踐過程中，把握了真理，運用了真理，再現了真理，改變了真理。所以，「關於與實踐分離了的思維之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論爭，純然是一個煩瑣學派的問題」「實踐乃是真理的標準」。無數的實踐，證明存在（物質）在我們感覺和思維之外，而抽象的思維，同樣地是一切可感覺的個別具體物之一般屬性，經過感覺轉化的反映。"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實際上是在某種程度上重複陳伯達在1935年的論述。

十二、《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1936年9月上海《讀書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本文的情況前面已有介紹，這裏就不多說了。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1971年的"批陳整風"中，曾被作為一個重點的批判對象。

十三、《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再論新啟蒙運動》(1937年6月上海《認識月刊》創刊號) ，這篇文章提出：

"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機，唯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掃清數萬萬同胞數千年的愚昧，使他們能普遍走上救國的覺醒，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應有自由思想的權利，每人都應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應有批評的權利，每人都可以被批評。我們所提出的新啟蒙運動，其內容總括來說，就是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所謂思想的自由，就是說：應該廢止思想上外來的權威，思想應該從外來的權威獨立起來。一切關於思想的外來鐐銬（物質的鐐銬），都不應存在。"

這後兩句話，也曾在"批陳整風"中受到重點批判。

十四、《論五四新文化運動》(1937年6月上海《認識月刊》創刊號)，這是一篇一萬六千餘字的長文。文章詳細論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過程和歷史意義，具體分析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吳虞、丁文江、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當時的思想觀點及歷史作用。文章的結尾這樣寫道：

"蔡元培先生——這位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光榮地位的老人，在民國九年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洪水與猛獸》，認為'洪水好比新思潮'，'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認為當時中國新文化與腐敗勢力之爭，有如洪水對猛獸之爭。當時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不管其程度如何，後來志節如何，而在當時，總是一種對黑暗的抗爭，對猛獸的抗爭。當時一些主要的啟蒙人物，都曾表示了其對於自由的渴望，表示了其對於曙光的渴望。胡適沁園春詞及其序言，也正是表示了自己這樣的渴望。胡氏在該詞序言中說：'……讀報記：（俄京）革命後，政府大赦黨人，其自西伯利亞赦歸者，蓋十萬人云。夫放逐十萬男女

志士于西伯利亞，此俄之所以不振，而'沙'之所以終倒也。然愛自由謀革命者，乃至十萬人之多，囚拘流徙，挫折慘殺而無悔，此革命之所以終成，而新俄之未來，所以未可限量也。……'又詞中說：'……北國名都，有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於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胡氏當年的氣概，而殷鑒不遠，我們目擊今日的國難和追憶國難的由來，讀起胡氏當年這些沉痛的辭句，是更能贏得我們的慨歎的。

現在中國，是處在滅亡的危機。然而這偉大的民族是不可滅亡的，因為這偉大的民族已不止有十萬謀救亡的志士。五四之光明的爭鬥，現在正重新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而任務正壓在我們的雙肩。我們都是五四的兒子，都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的兒子。過去的先覺們已給我們開了多少的道路，我們現在就是要繼續他們開路的工作，並去完成這工作，使四萬萬悲苦的同胞睜眼起來，救民族，救自己，使這東亞睡獅變成真正的醒獅，使這醒獅吼震整個的地球。"

十五、《思想無罪》(1937年上海《讀書》第三號），這篇文章曾受到美國學者施瓦之的評介。陳伯達在這篇文章裏充分論述了"思想無罪"的道理，並說明：

"我們並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國舊文化的傳統。我們對於舊文化的各種傳統，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好的我們要繼承下來，並給以發揚；不好的，我們就絕不顧惜。……我們認為要提倡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道德，那就不應當束縛人們的思想，不應當用教條和獨斷來規定人們的信仰。人們應該有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因而使他們都能成為衛國殉國，為社會正義而犧牲之真正的自覺戰士。"

除了上述介紹的這些論著之外，陳伯達的其他許多文章，如《我

們還需要德賽二先生》、《論中國的自我覺醒》等等，在當時也都起了警醒世人、振奮民心的作用，成為那一時代的強音。

14. 介紹吳承仕等加入共產黨

陳伯達在三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吳承仕先生（1884—1939），字檢齋，安徽歙縣人，清末舉人，曾應舉貢會考，殿試錄取一等第一名，分發為大理院主事，辛亥革命後任司法部僉事。吳先生受業於章太炎，專治經學，尤長於三禮和文字音韻之學，著述甚多，為國內著名經學大師，曾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大學、東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授或系主任。

發展吳承仕等進步的文化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特別黨小組，是陳伯達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時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陳伯達晚年曾多次回顧他與吳承仕之間建立的深摯友誼，並提到他曾在1940年1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發表的《痛悼吳承仕先生》一文，在那篇文章中，他寫道：

"我知道吳先生，是在他創辦《文史》雜誌的時候。那是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那時國內文化界正受到恐怖的重大襲擊，而北平在塘沽協定之後，經過一度大摧殘，更為表現得沉寂，《文史》的出版，就好像空谷足音，給青年們以很大的興奮。我從青年們那裏打聽，知道他是一個老先生，但是這刊物所發表的東西，卻大都是很新鮮的，就是他自己的文章，也表現出一種新的生命力，表現出一種高貴的、同情於被壓迫人類的正氣。魯迅先生在那裏也有一篇文章，記得題目是《說儒效》，署名是'唐俟'，我當時想，這個刊物或許可以登我的東西，經過一些轉折，就投了一篇稿子，居然得到他把它登出來。隨後，我移居天津，曾和他通過一兩封信，並繼續投了稿，那年冬天，一位朋

友在天津被捕，為國殉難，我不得已離開天津，返回北平，因此得和他會面幾次。當還沒有見到他的時候，我已從青年們聽到這樣的消息：上方有命令來，文史將停版。見到他的時候，果然證明了這一消息。《文史》停版前的最後一號，是很大的特大號，他告訴我為什麼出這樣大的特大號：'既然出版的繼續是無望了，所以就索性來這最後一次。'

因為編輯《文史》的關係，因為對於新興社會科學的傾向，吳先生一方面受了"圍剿"，受了恥笑和辱?，並因此失掉了師大的教職（學校某當局說：'既然他講馬克思主義，就免了吧！'）。另一方面卻又有人在對他進行各種名利的誘惑，要誘惑他上鈎。但是，吳先生對於這些，都毫無所動，他繼續抱定他的立場，不怕人家的訕笑，也不受人家的誘惑，同時，他不斷地盡自己的可能去營救和關照那些遭難的青年。從這些事實，我開始認識了吳先生的人格，我開始認識了吳先生可以和青年一道，而我自己亦從此開始與吳先生成了'忘年'的患難之交。

在何梅協定後，吳先生渴望民族的光明，又和他幾個親近的學生創辦了一個刊物：《盍旦》。這個刊物雖則不及《文史》的惹人注目（有一個原因，是：寫作的人因避免奸徒們的追逐，不便署自己的真名字），但仍是當時北方空谷足音的刊物。那時我又回轉到天津去，因感到吳先生對於愛國和新文化的熱誠，仍是給《盍旦》投了幾篇稿子。不久，震驚一世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文化戰士的吳先生成了青年們的嚮導者，他和學生們在一起，他堅定了學生們的方向，他參加了各種救國的組織和各種救國的行動，他資助了愛國刊物。在北平文化界中，脚踏實地地和青年一道，而參加各種救國工作，並且始終不脫離戰線的，他是唯一的白髮蒼蒼的人物（記得當時南京中央大學和

安徽大學的文學院，因為章太炎先生的推薦，都要聘請吳先生，但吳先生不願意在那危急的時候舍去北平，不願意離開北平的青年和朋友，畢竟把那些聘書都辭謝了。）……。

北平失守的時候，我們都被困在北平城中，我時常會見吳先生。吳先生曾說：'現在北平是一個大監獄。'平津通車以後，吳先生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相繼來到天津，我及一些朋友也來到了天津。剛到天津，即知道了吳先生家被日寇漢奸搜檢的消息。然而在天津的時候，吳先生仍是毫不畏懼地繼續參加了救國的工作，我與吳先生曾朝夕過從。因為彼此的友誼，我們幾乎無所不談，在談話中，除了關於抗戰和團結的問題而外，吳先生時常極真摯地吐露對於人類新光明和民族新光明的仰慕，他談到了人類的真出路。他歎息過，他年紀太大了，不能和青年們盡同樣的力量，然而他願盡他所能盡的力量。"

陳伯達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他介紹吳承仕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事情，因為當時的歷史條件，還不可能將中共的組織情況完全公開。1984年，吳承仕先生百年誕辰的時侯，報刊上發表了許多紀念文章，均提到吳先生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對其入黨的經過，卻諱莫如深，無一人言及。

陳伯達晚年曾接待了來家中訪問的北京師範大學的幾位現代史研究者，應他們的要求，向他們講述了介紹吳先生入黨的經過：

"我在《文史》雜誌上發表了《從名實問題論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分野》後，吳承仕先生聘請我到中國大學國學系講授先秦諸子。我同吳先生的來往越來越多，彼此加深了瞭解。在來往中我發現吳先生以及與吳先生關係密切的幾位教員思想都很進步。吳先生有些業餘愛好，他愛下棋，又是京劇票友，比較好交往。有段時間他每星期都有一天在鴻賓樓請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吃飯。利用吃飯的時間，我常向他們講述時事和

政治，大家的觀點都很接近。後來我覺得條件比較成熟了，就向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請示，想把吳承仕先生和這幾位朋友發展入黨，李大章表示贊成。以後我分別徵求了這幾位同志的意見，並向李大章匯報了情況。在得到北方局的正式同意後，我在一次和這幾位同志聚餐時，將組織上批准他們入黨的消息通知了他們。

"這幾位同志分別是：吳承仕、曹靖華、張致祥、齊燕銘、孫席珍。當時，組織上考慮他們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樣過組織生活，就決定組成一個特別黨小組，由張致祥任組長，由我負責直接與北方局聯繫。"

發展吳承仕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的中共黨史上，是值得認真書寫一筆的。在此之前，還沒有一位在學術界有這樣高地位的著名學者加入中共黨組織，尤其是當時仍處於革命的低潮時期，在白色恐怖的摧殘迫害之下，中共的隊伍嚴重減員，而吳承仕先生恰於此時，在他的知己好友的幫助和介紹之下，毅然加入中共，這實在不是一件平凡的事，畢竟，中共黨內有專門學識並有重要影響的高級知識份子，在當時是太少了。

15. 與張貞再次晤面

在漫談中，陳伯達還述及他1937年春在南京與張貞的一次晤面。

在這次南京晤面之前，大約是1932年秋，張貞在一次赴北平時，曾託福建同鄉找到還在養病中的陳伯達，約陳在福建會館相見。那次會面很簡短，陳伯達回憶："張貞談到了他的部隊在紅軍攻打漳州的戰役中吃了敗仗，我對他說：'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沒有紅軍，中國會滅亡。'聽說張貞回去後對人說：'陳伯達這個人，即使骨頭燒成灰，都是共產黨。'"

而到了1937年，這兩位在北伐時期結下了私誼的故友間的再次相

見，則是由陳伯達先伸出手來的。

陳伯達回憶道：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以後，黨內下發了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件。1937年春天，我回福建探望母親，在返回北方，路過上海時，忽然遇到林林[1]。林林與張貞是詔安同鄉，同張貞很熟悉。我就想到或許可在經過南京時，請他找張貞來見一下，談一談抗日統一戰線在福建的事。我跟林林一說，林林同意，並約好，到南京時，我先找個客棧住下，他去找張貞來客棧談話，談完後我即搭火車北上。

"我在客棧等了不長時間，張貞乘一輛轎車來了，林林也同車。他們請我到張貞的住處去談話。我對張貞說：'你不害怕嗎？'他回答：'沒關係，對你的安全，我負責保險。'我想到過去他在國民黨清黨時，曾冒着風險幫我脫離險境，估計現在也不會有意害我，就隨他們到了張貞住處。

"在和張貞的談話中，我發現他並不瞭解西安事變的真相。他只知道蔣介石發表的那篇《對張、楊的訓話》，對蔣答應與我黨合作抗日的事卻一無所知。可見當時蔣介石還把情況瞞着下面的將領，尤其是對非嫡系的將領，更是不露實情。我將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講給張貞，他聽了頗感新鮮。我提出，抗日戰爭將很快全面爆發，到時，我黨如在福建開展抗日遊擊戰爭，請他們不要阻撓。張貞表示同意。

"談話結束後，張貞提出留我住一晚，我答應了。在南京停留期間，張貞陪我去參觀了中山陵、雨花臺和玄武湖。

"我和張貞的這次見面，以及談話的詳細情況，在我到達延安以後，都曾向毛主席詳細匯報過。"

---

[1] 著名詩人，曾留學日本，對中日文化交流多有貢獻。——筆者注

陳伯達還談到，1970年他倒臺後，他在監獄裏看報，知道自己已被定為叛徒、特務。他覺得很奇怪，把他說成是叛徒，顯然是指他曾被捕過，可說他是特務，是指的什麼事情呢？他百思不得其解，還誤以為是指他與張貞在南京見面這件事。其實，中共中央文件在給陳伯達戴上特務帽子一事上從來就沒有列出過任何根據。

16. 告別白區

陳伯達談了他在北平最後一段時期的情況：

“1936年底北平監獄中的一批同志出獄了。他們出獄的具體經過我不清楚，那時我不是北方局的領導成員。後來，有人說這批同志出獄後是由我接待的，這與事實也是有出入的。當時我確實接待了一位同志，這就是殷鑒同志。接待殷鑒同志是組織上通知我的。殷鑒同志在獄中已經患病，情況很不好，我接他出獄後，將他安排住進了一家德國醫院。住院的費用是我設法籌措的。

“那時，組織上經費很困難，我將自己的積蓄全部拿出來，也還不夠殷鑒同志住院的費用，只好去向熟人借錢。當我去向一位也曾在蘇聯留學過的姓沈的熟人借錢時，他很不情願。他當時已是名教授，收入頗豐，卻只拿出十元錢。後來我到他家還錢時，他以為我是又來借錢了，竟不肯露面，只讓他兒子出來，說是他不在。我對他兒子說，我是來還錢的，他聽到後就從裏屋出來了。真想不到他會變得這樣吝嗇。

“殷鑒同志在德國醫院經過一段時間治療，病情有所好轉，就出院了。但是他的病並沒有治癒，他堅持了一段時間的工作，又病倒了。我把他送回德國醫院，因經費困難，只能安排住進普通病房，是和很多病人同住一間。1937年6月，殷鑒同志不幸病逝，我料理完他的後事，寫了一篇哀悼的文章，刊登在《人民之友》上，文章的題目是《痛悼戰

士殷鑒同志》。

“1937年春天，黨中央決定在延安召開黨的白區工作代表大會，劉少奇、彭真等同志離開天津前往延安。北平失守時，北方局臨時負責人柯慶施宣佈由我和林鐵、黃敬同志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領導北平的地下工作，但沒有明確誰是書記。此後，柯慶施自己也前往延安去了。

“不久，黃敬同志建議我離開北平去根據地工作，林鐵也同意。平津通車後我和張致祥、吳承仕一起到了天津。

“在天津準備轉道去根據地時，李大章把我留下，讓我負責抗日宣傳工作。時間不長，李大章通知我，北方局已來電報要我去根據地，擔任北方局宣傳部長。於是我坐船到了青島。接着黃敬同志也來了。我們一同輾轉向西走，當時正值炮火連天，火車不能暢通，路上困難重重。我的大孩子那時只有兩歲多，一路上多虧黃敬同志幫助照顧，才平安到達了西安。

“到達西安以後，我因要送孩子去延安，而黃敬同志已決定去晉察冀根據地工作，所以我們就在西安分別了。我從西安到了延安以後，中央把我留了下來，沒有讓我再走。”

2 延安時代

1. 抗日戰爭初期黨的幹部教育

1937年8月底，陳伯達從青島經西安來到延安。我問他到延安初期時的工作情況，他說：

"我剛到延安時，中央組織部分配我到陝北公學教書。我到延安之前，丁玲、周揚、艾思奇等已從國民黨統治區到達延安，他們剛到時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特地為他們開過歡迎會。我到延安時，已經是來得很晚了，文化人來得多了，開歡迎會的形式已沒有了。另外，當時有些幹部對我們這些白區做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有些偏見，所以我們並不受重視。那時陝北公學缺少教員，成仿吾當校長，就把我要去當教員。大約過了幾個月，又把我調到中央黨校當教員。後來洛甫（張聞天）把我調到中央宣傳部，負責出版工作。洛甫在莫斯科就跟我很熟，我到延安後，他對我很關照，一次開大會，他向人們做介紹，說：'這位就是北平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陳伯達。'

"1938年5月，馬列學院成立後，洛甫（張聞天）當院長，我和王學文是副院長，同時兼任教員。王學文教經濟，我教中國革命問題，後來又兼管編譯部。在延安發行量很大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主要是由我負責編出的。王學文早年曾在日本留學，是河上肇的學生。河上肇對中國的影響比較大，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實際上是把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翻譯過來的。鄧力羣、馬洪他們可都算是王學文的學生。"

我問陳伯達，他的學生中，有哪些人後來比較出名？

陳伯達略有不悅地說：

“聽過我的課的人多了。但是他們現在哪里會承認是我的學生呢？我在黨校教課時，薄一波也是學生。在馬列學院教課時，李先念、宋平也是學生。能承認是我的學生的，大概也就是謝振華、張震寰、安平生他們了。謝振華在延安馬列學院時，曾和江青在一個班。江青就不承認我在馬列學院教過書，‘文革’中，一次在會上故意問我：‘你什麼時候在馬列學院教過書？’我在馬列學院工作，本來是人所共知的。謝振華是山西省軍區司令員，在北京開會時，江青想和謝振華攀同學，謝振華沒有理睬她。當然了，鄧力羣(曾任劉少奇秘書)、馬洪(曾任高崗秘書)，廖蓋隆(曾任朱德秘書)、周太和(曾任陳雲秘書)、田家英、蒲安修(彭德懷夫人)也都是馬列學院的學生。稱呼我為‘老夫子’，最早就是蒲安修叫起的。1941年以後，由我負責，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鄧力羣、張仲實、周太和、田家英都是我從馬列學院挑去的，馬洪是我漏下的。當時我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問題組組長，鄧力羣是經濟問題組組長，張仲實是國際問題組組長。張仲實前兩年在一篇文章中說什麼政治研究室主任是任弼時，他是在任弼時領導下工作。那完全不符合事實。人怎麼可以這樣呢？七大以後，政治研究室改由洛甫(張聞天)同志負責。”

我順便又問他，三十年代在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有哪些？

陳說：“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了，說不很清楚了，榮孟源算一個，張楠(張瑞芳的姐姐)也是，他們後來都是搞歷史研究的，沒有離開所學的專業。還有在晉察冀工作的史立德和後來在新四軍工作的黃誠(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皖南事變中犧牲)，也都曾是我的學生。”

2. 擔任毛澤東的助手

有一回，我在談話中提到我上小學時，班主任老師曾給全班同學講過毛主席的老警衛員翟作軍發表的一篇回憶錄，其中敘說到1938年日本飛機轟炸延安時，陳伯達負了傷，毛主席非常關心，曾專門派人送了一隻雞，以表示慰問。

陳伯達聽後笑了，說道："是有這麼一回事，那天我從馬列學院出來，到街上的書店買書，恰好碰到日本飛機轟炸掃射，我趕緊趴在路邊卧倒。飛機的一排子彈啪、啪、啪……打在我旁邊不遠處，一個彈片把我的眉毛擦去了一塊，流了一些血，算是受了一個小傷。後來我這個受傷地方的眉毛就長得特別長。"

陳伯達笑着指了指左側的眉毛，是有些格外的長。

我問他是怎麼跟毛主席認識的，他說：

"我跟毛主席第一次認識，是在一次討論孫中山思想的會上。那次會上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資產階級思想，一種意見認為應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我在會上發言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也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毛主席在做總結發言時表示，我的意見是對的。會散以後，毛主席請我到機關合作食堂吃飯。在席的，除毛主席外，只有一位英國記者和我，一共三個人，席間，毛主席問了我一些北平的情況，還問到張申府的情況。毛主席1919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與張申府有過交往。這次會餐使我和毛主席初次相識了。後來成立新哲學會，我講中國古代哲學，毛主席每次都來聽，會後，他常留下來隨便談點哲學方面的問題。這樣我們就逐漸熟悉起來。再以後，我寫了幾篇有關古代哲學的文章，如：《中國古代哲學的開端》、《墨子哲學思想》、《孔子的哲

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等，發表前都曾送毛主席請教。毛主席對《墨子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兩文提了一些意見，前後寫了三封信，關於墨子的一封是直接寫給我的，關於孔子的兩封是寫給張聞天轉我的。毛主席的意見，我大部分都採納了，但有的意見我也不是完全贊同，比如他不贊成我較多引用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馮友蘭的觀點，其實，對學術問題，不必這樣要求。總之，我們在學術方面做了比較深入的交流，彼此更熟悉了一些。"

毛澤東閱讀陳伯達的幾篇哲學史文章之後寫的三封信，曾收入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一書中，其中1939年2月1日的信，開頭是這樣寫的：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二月一日夜

毛澤東在信後附寫了六條具體的意見。

毛澤東1939年2月22日致張聞天的信中則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提出了三點意見，其中第三點寫道：

伯達此文及老墨哲學諸文引了章，梁，胡，馮（指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馮友蘭——引者注）諸人許多話，我不反對引他們的話，但應在適當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說明他們在中國學術上有其功績，但他們的思想和我們是有基本上區別的，……，若無這一簡單的申明，則有使讀者根本相信他們的危險。

陳伯達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在文後加寫了一條簡略的申明。

陳伯達談到了他奉命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經過：

“1939年春末的一天，張聞天找我談話，說中央準備決定調我到毛主席那裏去工作。我思想沒有準備，有些猶豫，張聞天說，還是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於是我就被調到了毛主席那裏，擔任軍委的副秘書長，秘書長是李六如。開始，我也處理過一些軍事方面的文電，但時間不很久，毛主席要我擺脫事務性的工作，着手編幾部資料書。毛主席還對我說，你的思想不要老停留在老古董上面，還是要着重研究現實的問題。我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找了幾個助手幫忙，先後編寫了《九一八以來的國內形勢》、《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經濟》、《抗戰中的文化》等幾部大型資料書，都經過毛主席閱後付印，解放後又重印過一次。

“整風運動以後，李六如離開了毛主席辦公室。李六如資格很老，參加過同盟會和辛亥革命，1921年就加入了共產黨，是黨的早期黨員，和毛主席很早就認識。他之所以被調離，是因為整風時每個人都要檢查自己的歷史，寫出書面材料；他寫的材料中有大革命失敗後，他被捕時曾向國民黨元老覃振寫信求情的情況。當時審查部門認為他寫給覃振的信的內容有嚴重的錯誤，就將他調離了。七大時，他也因此沒有當選為中央委員。整風時，我也詳盡地寫了自己的歷史，像我同梁龍光、黃振家的來往，他們硬要我代起草一份孫文主義學會宣言，以及他們兩人想介紹我參加國民黨等情況，都是我自己寫出來的。我不寫，別人並不知道這些事情。當時組織上認為這些事都發生在我入黨之前，不算什麼問題。想不到我倒了以後，這些事都被當成大問題，梁龍光、黃振家曾想介紹我參加國民黨，就變成我已經參加了國民黨。”

3. 毛澤東談紅軍時期情況

我問陳伯達，在和毛主席的談話中，是否談過打仗方面的事？陳伯達笑了笑說：

"談是談過，只是談的次數很少。我在1936年出的那本軍事文集《國防概論》，主張抗日戰爭應以遊擊戰為主，估計毛主席也看過。我曾兩次在軍隊中工作過，一次是北伐戰爭，一次在抗日同盟軍，在蘇聯時也學過正規的軍事課程，對軍事並非一無所知。抗戰前夕，我在北平，曾注意研究過抗日戰爭一旦開始以後戰略方面的問題，在《華北烽火》、《長城》、《國防》等刊物上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但是，毛主席認為我是一個書生，沒有實際的打仗經驗，所以不願意和我多談這方面的事。

"毛主席談的比較多的，是紅軍歷史上的事。因為我是在獄中病重，經張貞花錢贖買才保釋出獄的，所以多次和毛主席談到張貞。毛主席講到紅軍打漳州時與張貞部隊作戰的情況。張貞的49師共有9個團，漳州戰役被殲4個團。我說，張貞不大能打吧？毛主席說，張貞能打。毛主席對張貞印象較好，還在於漳州的書店裏允許賣馬列著作，這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是很少見的。紅軍打下漳州以後，運走了許多馬恩列的著作，充實了紅軍的圖書館。後來，毛主席還在一次會上說過，對國民黨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張貞就救過陳伯達一命。

"毛主席還曾談到富田事變的情況。毛主席說，1930年富田事變時，受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控制的嘩變軍隊的領導人，偽造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分別送給朱德、彭德懷、黄公略三人。嘩變軍隊提出的口號是'擁護朱、彭、黃，反對毛澤東'。彭德懷收到假信後，立即送了來，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並發表宣言，反對嘩變行為。當時朱德沒有

作聲。毛主席跟我說起這件事，看來他還是對此事不甚愉快。但是朱德同志後來在長征中，當張國燾另立中央時，能堅決維護紅軍的團結，堅定地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毛主席還是很肯定朱德同志在這場複雜鬥爭中的表現，曾稱讚他‘氣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鐵’。

“毛主席對四方面軍的主要負責人還是存有疑慮的。西路軍失敗以後，陳昌浩（四方面軍總政委）沒有立即回延安，而是回到老家養病，後來組織上找到了他，並把他送到蘇聯治病。解放初，我陪毛主席到蘇聯時，陳昌浩給我打電話，要求回國。我在電話中說‘可以嘛’，並沒有去想其中的關係。結果這件事也給我惹了麻煩。廬山會議批我的時候，說我擅自同意陳昌浩回國，懷疑陳昌浩與蘇聯有關係。毛主席甚至說：‘這件事我都沒有權力同意，你就有權力同意？’我心裏覺得奇怪，怎麼會連你都沒有權力同意呢？陳昌浩回國以後，我有一次遊頤和園，碰到他和徐向前在一起散步。看來他們作為老戰友，還是有一些來往。

“毛主席還談到了紅軍初期的一件事。有一回，上海的黨中央發來電報，要毛主席和朱德兩人離開紅軍，擔任其他工作。毛主席心裏很不願意，但是準備服從中央的決定。這時林彪找到毛主席，勸毛主席不要服從中央的決定。後來毛主席接受了林彪的這個意見，沒有離開紅軍。毛主席跟我談到這件事，說明他那時對林彪印象很好。

“抗戰中期，林彪從蘇聯回國後，有一回大家在一起聚會，有人說，將來中國會和蘇聯一樣好。林彪說，將來中國會比蘇聯更好。毛主席很驚奇，說，是這樣麼？林彪說，中國肯定會超過蘇聯的。其實，林彪這話是我跟他談論蘇聯情況時，我先說過的。記得林彪和葉羣結婚擺酒席時，毛主席也去了。毛主席一般是不參加別人的婚禮的。解放後，有一段時間，林彪住在蘇州。有一次毛主席到上海，曾要我陪他一起到

蘇州看林彪。總之，過去毛主席和林彪的關係是很好的。”

4. 延安的整風運動

1942年以後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是後來歷史書中必提的事件。陳伯達也回憶了一些當時的有關情況：

“1937年底，王明和陳雲、康生坐飛機從莫斯科來到延安。他們到達的那天，毛主席和許多人都去了機場，我也去了。毛主席對王明說：‘歡迎從天而降的人’。王明下飛機後，還認出了我，跟我握了下手，說：‘想不到你現在成了文化人了’。看來我在北平提倡新啟蒙運動的事，他在莫斯科也聽說了。王明剛來的時候，帶來了共產國際的一些新的精神，傳達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所以，大家當時對他的歡迎也是真誠的。王明的一生，也不是一件好事沒做。1935年，中國共產黨著名的《八一宣言》，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這個宣言是最早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件，這件事也就成了王明最大的政治資本。但是王明回國以後，憑藉他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在許多原則問題上，與毛主席相對立，尤其是他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要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軍令’。這些主張是毛主席所不能接受的。

“自從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以後，國民黨接受了國共合作的主張，全國出現了團結抗戰的新局面。但是蔣介石對於國共合作抗日，實際上是被迫的，並非是真心實意的，在他的心裏，從來沒有放棄過反共、滅共的念頭。因此，王明的主張是不利於抗日，不利於我們黨的。王明的右傾路線客觀上也助長了蔣介石的反共氣焰，國民黨的反共摩擦活動愈演愈烈，直至發生1940年的皖南事變，江南新四軍受到慘痛的損失。

“為着總結抗日戰爭初期以及黨的六大以來的歷史經驗，1941年

底，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開展整風運動，清算王明路線在黨內的影響。1941年，毛主席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1942年初，毛主席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這三個報告分別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宗派主義的主張。整風運動本來的目的是針對王明路線的，可是1942年春天以後，卻發生了一個插曲，即批判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央研究院在李維漢同志的領導下，開了幾天批判王實味的座談會，那時我早已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但座談會是各單位都去了人參加的，我也在其中一次會上做過發言，那天我和艾青同志的發言，受到了丁玲同志的稱讚。

"我和王實味過去並不認識，後來同在馬列學院工作了一段時間，覺得他脾氣很怪，常與別人爭吵。我寫過一篇討論文藝的民族形式的文章，他曾撰文批判，表示反對提倡文藝的民族形式。我不同意他對我的批判，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他索要我的稿子看後，提出先不要發表，我當時聽從了他的意見，就沒有發表。後來他因《野百花》受到批判，又因與託派的關係，被組織上定為敵我矛盾處理，大家對他的認識和批判，也都上升到敵我矛盾。我的那篇與他爭論文藝民族形式的文章，就交給《解放日報》發表了。

"延安整風運動後期，發生了'搶救運動'，錯誤地整了許多人，包括你(指筆者)母親，都受了冤枉。我和諸有仁因感情不合，經李六如勸説離婚後，1943年與你母親結了婚，時間不長，她就挨了整。你母親那時在中央黨校，因為她是從白區來到延安的，被硬説是有'特務嫌疑'，我不相信，黨校負責人郭述申特地找我談話批評我。你母親被關起來隔離審查，後來雖經復查平反，但她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從此精神逐漸失常。郭述申過去是鄂豫皖蘇區的負責人，在張國燾領導下，就犯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當然，'搶救運動'的錯誤主要應由康

生負責，但中央黨校也是搞得很厲害，當時校長是彭真同志。‘搶救運動’之後，黨校各部的人員都做了調整，你母親也調換了工作。”

5. 寫作《評〈中國之命運〉》

1943年，抗日戰爭進入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當時的延安受到日本人和蔣介石的雙重壓迫。5月，國民黨又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全力貫徹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鼓吹的反共政策，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的處境日益艱難。7月，陳伯達發表了《評〈中國之命運〉》，對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給予了有力的反擊。這篇文章曾在政治上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我們的談話自然也涉及到這件事。

陳伯達回憶道：

“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詆毀‘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攻擊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宣揚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隨後，國民黨又借共產國際解散之機，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蔣介石出版了實際由陶希聖代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後不久，延安也有了這本書。一次，毛主席在和我們幾個文化人談話時說：‘看來，蔣介石給你們出了題目了’。我體會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們寫反駁的文章。我看了蔣介石的這本書，就感到有許多話要說，‘如骨鯁在喉，非吐不快’。當時，國民黨下令將《中國之命運》作為大、中學校的必讀課本，企圖用這樣一本書來影響全國人民，尤其是欺騙毒害青少年，這是無法容忍的。我立即着手寫反駁的文章，大約寫了三天三夜，由於心情很激動，有時邊寫邊流眼淚，可謂‘筆淚俱下’。文章寫好以後，我立即給毛主席送去。當時毛主席正在休息，我沒有打擾他，把文章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毛主席起來以後，仔細看了我的文章，把原

標題《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中的'蔣介石先生的'幾個字勾掉，在文章中又添了好些尖銳、精彩的句子，並把文中提到'蔣介石先生'處的'先生'二字都勾掉了。毛主席在文章標題旁添上我的名字，並批了'送解放日報發'幾個字。

"文章送到《解放日報》以後，負責《解放日報》的博古同志提出了意見，說這樣連'先生'兩個字都去掉，是不是太厲害了些，現在統一戰線還是要的。於是毛主席決定開一個小型的中央會議，專門討論發表問題。恰好周恩來同志剛從重慶回來，就請恩來同志也參加會。這樣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恢復了'先生'的稱呼，確定7月21日在《解放日報》發表。周恩來同志用電報將文章秘密拍發重慶，在重慶印成小冊子散發。不久，我看到一條消息，國民黨下令嚴禁這本書，並稱我為'陳逆伯達'。但是，他們寫不出反駁我的文章，因為我在書裏說的都是事實。

"《評〈中國之命運〉》是我的一本主要著作，這本書不僅當時在延安和解放區曾廣為印發，而且在國民黨統治區也產生了影響，並被印成英文，傳到英美等國。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白勞德和一些西方評論家曾對這本書寫過評論文章。這本書對於打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李六如當時對我說："你的一本書頂了幾個師的力量，如《孫子兵法》所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中，收錄了毛澤東1943年7月21日致正在重慶的董必武的電報，全文如下：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於國際解散，二由於相信日將攻蘇，故蔣企圖以宣傳攻勢動搖我黨，以軍事壓迫逼我就範。乃事機不密，為我黨揭穿，通電全國，迎頭痛擊，於是不能不竭力否認（如胡、徐等複

電)，盡量敷衍(如對周、林)，並稍示和緩(邊境已有兩個師後撤)。但實際上目前軍事準備決不會放鬆，政治壓迫亦必會加緊(如七七封鎖新華，日前檢查渝辦)。我為徹底揭穿其陰謀並回答其自皖變以來的宣傳攻勢計，除已發之通電及解放社論外，並於本日公佈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為此目的，望注意執行下列數事：

一、收到此文廣播後，設法秘密印譯成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佈。

二、在渝辦、報館中，以此文作為課本，進行解釋討論。

三、搜集此文發表後的各方面影響，並將國民黨回駁此文的文章擇要電告，並全部寄來。

四、新華尤其群眾可用其他迂回辦法揭露中國法西斯的罪惡(思想、制度、特點和行為)。

五、其他技術問題由恩來電告。

毛澤東

馬

此信中的“蔣”，指蔣介石；“胡、徐”，指胡宗南、徐永昌；“周、林”，指周恩來、林彪；“新華”，指《新華日報》；“渝辦”，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皖變”，指皖南事變；“羣眾”，指《羣眾》雜誌。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也隨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發出通知：“各地收到此文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一切幹

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做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除了《評〈中國之命運〉》之外，陳伯達在延安時期還寫了《三民主義概論》、《紀念馬克思與孫中山》、《關於馬克思學說的若干辯證》、《墨子新論》、《由封建的中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中國工業與中國資產階級》、《人性、黨性、個性》、《關於十年內戰》、《閻錫山批判》、《竊國大盜袁世凱》、《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中國四大家族》等論著，是在延安發表理論作品最多的人之一。

1945年4月末至6月初，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為爭取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陳伯達在談話中談到了一些有關七大的情況，他說：

"七大時，朱德的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是由陳毅起草，經我修改的，後來交陸定一審閱，陸又修改了幾句話。毛主席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毛主席自己先起草了一少部分，後來就交給我了，大部分是由我起草的。1966年，陸定一的問題發生後，少奇同志在會上曾說，'對陸定一，還是要考慮一下，七大的《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是陸起草的。'陳毅同志馬上說：'《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是我起草的，陳伯達修改的。'少奇同志就沒有再說。所以，起草七大文件的具體經過，連少奇同志也不清楚，大概由於最後是由陸定一交上去的，就以為是陸定一起草的。那個時候，我們黨的風氣比較好。像起草文件這樣的事，具體的過程並沒有讓大家都知道。因為這是黨交給的工作，要經過會議討論，所以沒有記到哪個人的頭上。"

6. 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的和戰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在美蘇兩國的一再敦促下，做出姿態，電邀毛澤東赴渝談判。對這段歷史，陳伯達回憶說：

“毛主席決定親率代表團去重慶，在確定代表團的人選時，他對我說：‘本來應該讓你去，但是你寫了《評〈中國之命運〉》，點名批駁了蔣介石，這次與蔣談判，就不好讓你去了，還是讓胡喬木去吧。’毛主席走了以後，我搬到楊家嶺去住。劉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的工作。我有一次散步碰到少奇同志，我說，還是請毛主席早一些回來為好。少奇同志說，談判不那麼容易，得慢慢談。他對談判的期望比較大，對蘇聯軍隊在東北的作用也比較樂觀，這些跟我的想法是不大一樣的。

“毛主席去重慶期間，我寫了《竊國大盜袁世凱》，等毛主席從重慶回來才發表。此書並沒有點蔣介石的名字，但是國民黨也通令禁止。因為書的內容很明白，寫的雖然是袁世凱，實際指的卻是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一書則是毛主席回到延安以後才動筆的，在寫作過程中，經常和毛主席討論。毛主席的一些很好的意見，我都採納了。例如毛主席曾說，四大家族集中的龐大財產，正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做準備。實踐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曾為《中國四大家族》一書收集過材料以及提過一點兩點可採納的意見的同志，我都在書後加以注明。這本書是在1946年10月出版的，當時正是國民黨對解放區發動大舉進攻，佔領了張家口，大肆喧嚷要在三個月內消滅共產黨的時候。這本書和我以前寫的《評〈中國之命運〉》，以及以後在阜平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它們的作用就在於從理論上說明了中國革命必然會取得勝利的道理，解除了一些同志當時的模糊認識。”

陳伯達談到了當時黨中央內部對蔣介石力量的認識並不一致。

“抗戰勝利以後，黨內領導同志對形勢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些同志認為和平民主已成為主要趨勢，將來主要是搞議會鬥爭；一部分同志則認為蔣介石毫無和平的誠意，一直企圖以武力消滅我黨。毛主席曾為此找了一些同志談話，徵詢對形勢的看法，我當時對毛主席說：‘跟蔣介石是談不成和平的，不能退讓，要抓緊時機向原日偽軍佔領區發展，要搶地盤。’毛主席同意我的看法。國民黨發動大規模內戰以後，一些同志又認為國民黨軍事力量強大，我們難以打贏。少奇同志對形勢的發展也曾有過疑問。記得一次會後，毛主席曾對胡喬木說：‘你把《中國四大家族》一書找給少奇看一看。’毛主席與劉少奇同志的分歧主要是在解放後逐漸形成的，但是在抗戰結束後，他們就在有些問題上認識不大一致，這也是事實。後來他們之間矛盾激化，毛主席追根溯源，就追究到這段歷史上發生過的認識上的分歧。”

196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新、彭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一書第四卷，曾在第三章專列了一節（第七節），對陳伯達寫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等著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1981 年該書再版時，去掉了這一節，並在書前的《第四卷重印説明》中寫道：“這次重印……刪去了第三章第七節。這一節最主要的內容是評介陳伯達的三本小冊子（《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的那一段。這三本小冊子（主要是後兩本）中有一些好的觀點，但並不是陳伯達個人的觀點，而是我黨當時對國民黨統治區政治、經濟情況的分析，只不過由陳伯達用個人名義發表罷了。”《重印説明》中還説，對陳伯達其人“需要嚴正的批判。但在批判時應該認真研究，看哪些是正確的（其中又有哪些是黨的意見由他用個人的名義發表的）？哪些是錯誤的和反動的？只有經過這種認真的分析批判以後，才能對他

在理論和學術上的作用做出恰當的評價。這樣做，我們目前還辦不到。因此只好刪了它。"

陳伯達看了我找給他的這段《重印說明》後，鄭重對我說：

"說我寫的書不是個人的觀點，是黨的觀點。這就令人奇怪了。黨是一個組織，如果沒有具體的個人先提出觀點，黨怎麼能直接提出觀點呢？還說我書中的意見是黨的意見，只不過用我個人的名義發表，黨的意見為什麼要用我個人的名義發表呢？這些說法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我寫書，當然是寫自己的觀點，也聽取其他同志的意見，尤其是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的意見。但是，我在解放前寫的這幾本書，沒有一本是黨組織要求我寫的，都是我自己自動寫的，寫出來以後，有的徵求過其他同志的意見，有的沒有徵求其他同志的意見。只有解放後寫的文章，才有些是黨組織要求我寫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內地禁絕陳伯達的著作多年以後，1998年，台灣的一橋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敵蔣介石》兩本書。該出版社在新版的書前均加寫了導讀。導讀中說：

"陳伯達的《蔣宋孔陳——中國四大家族》於1947年出版，揭露四大家族斂財的魔術，比一顆原子彈的威力還大，炸得風雨飄搖的蔣氏政權搖搖欲墜。宣傳的力量比大炮還厲害，儘管他引用的資料必須有所考證，但作為宣傳品，這是一本絕佳的小冊子。我們可以從書中的脈絡看到四大家族如何違法斂財的一面；同時也警惕到，他們在貪污的同時，猶不忘用特務、暴力來羞辱人民的靈魂。"

"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把蔣介石的德行一一暴露，在1949年以前可算是一大著作。他歷數了蔣介石的發跡，對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對異己的殘暴，當然陳伯達也不忘反證中共的偉大。……這本書的正面價值是'不用人身攻擊，舉證清楚'，台灣人寫這類作品，除

了道聽塗說之外，就是人身攻擊。"

出版者加寫的導讀對陳伯達的著作給予了客觀的評價。這些著作在內地被長期禁錮，至今仍是研究的禁區。

陳伯達晚年在談到他的這幾本書時說道：

"我的這幾本書主要是揭露蔣介石的。蔣介石已經死了，但歷史的公案不會消失。在蔣介石的槍口下，無數共產黨人、工農大眾和先進知識份子的鮮血灑遍了祖國的山河大地，這個歷史事實是抹煞不掉的。蔣介石與袁世凱一樣，將永遠作為被人民大眾打倒的獨裁者載入史冊，如同孟子說過的：'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7. 在阜平遭遇飛機轟炸

陳伯達回憶了國民黨進攻陝北以後的情況：

"國民黨進攻陝北以後，毛主席決定和恩來、弼時等同志留在陝北，另成立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由劉少奇同志負責，到晉西北和晉察冀開展工作。中央決定我參加中央工委的工作[1]，先到晉西北進行土地改革，當時毛岸英、谷羽（胡喬木夫人）、田家英隨同我在一起。

"此後，我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受中央委託辦黨校[2]。《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也是在西柏坡寫成的，寫書的材料是從延安帶來的。那時候田家英在我那裏工作，一路上都是他背着材料。我辦黨校時，就讓他做黨校的秘書。那時他對我'執弟子禮甚恭'，有時候我工作忙不

[1]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工委，7月10日正式組成工委，劉少奇為書記，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陳伯達為常委。——筆者注

[2]即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劉少奇為院長，陳伯達為副院長。——筆者注

過來，他還幫着照看你（指筆者）。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後，毛主席要我兼做岸英的老師，教他些中國文化，我教了些日子，因工作太忙，而且我的福建口音毛岸英也不容易聽懂，就叫田家英替我去教岸英。後來毛主席那裏缺一個管理文件和雜務的秘書，讓我推薦。我就推薦了田家英。

"《人民公敵蔣介石》寫好以後，我請少奇同志審查，他說：'你陳伯達罵蔣介石，還用得着審查嗎？拿去印好了。'為印刷的事，我到過阜平印刷廠。1948年2月，這本書出版了，當時軍事形勢已經轉變，但是三大戰役還沒有開始，我在這本書裏論述了蔣介石和國民黨必然失敗的道理。記得這本書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曾由新華廣播電台廣播過。

"1948年4月，毛主席和恩來同志等轉戰陝北後，經山西到達河北省阜平縣。恩來同志與毛主席分別時，毛主席讓他到西柏坡後告訴我，要我盡快到阜平，做跟隨毛主席到蘇聯與斯大林會談的準備。我接到恩來同志的通知，即到了阜平。那時，蘇聯認為我們難以在軍事上完全取勝，毛主席準備親自到蘇聯與斯大林會談。

"在阜平時，我沒有與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是分開住的。5月中旬的一天，國民黨飛機突然飛臨阜平上空。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聲響，覺得情況不對，趕緊往主席住的地方跑。半路遇見江青，她正慌慌張張地找地方躲避飛機。我問她：'主席在哪里？'她說：'還在屋裏，我勸不動他。'我趕快跑到毛主席的屋裏，見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和警衛員一起走出了屋子。我站在院中未動，看着他們走。主席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我：'你怎麼還不走哇？'我為了轉移飛機的注意力，沒有動，只是喊：'主席快走！主席快走！'看到他們走到安全的地方，我

趕緊跑出院外，飛機已經向下俯衝了。我馬上在一個低窪些的地方卧倒，炸彈劈劈啪啪落了下來，正好落在院子當中爆炸了，屋子的玻璃全被彈片擊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險的。

"這件事本來從來沒有對人説起過，1971年逮捕我，在監獄門口，我不願進去，曾大聲喊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連床都沒有。我在鋪蓋的掩護下，咬破了自己的手腕，想放血自殺，結果沒有自殺成。幾天後，大概我説的那句話傳上去了，把我轉移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救毛主席的事，我是在毛主席在的時候講的，因為毛主席心裏是清楚的。毛主席不在了，我就不講了。後來是公安部門一再問，才講的。

"當時準備跟毛主席到蘇聯與斯大林會談的事，後來因蘇聯方面決定派米高揚來西柏坡而取消了。毛主席和我先後離開阜平到了西柏坡。"

關於陳伯達在阜平救護毛主席一事，1983年10月，陳伯達在解放軍262醫院住院治療期間，北京市公安局曾奉上級指示派蕭健、楊世傑二人向陳伯達本人做過詳細瞭解。1988年秋，陳伯達病情突然轉重，在公安局與醫院接洽之際，筆者勸他寫下一份關於此事的文字材料，他剛寫了幾行，就接到馬上住院的通知。10月17日，公安部門在朝陽醫院的病房裏舉行了陳伯達的刑滿釋放儀式，參加這個儀式的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和朝陽醫院的有關領導共十余人。陳伯達在釋放儀式上再次述及他在阜平救護毛主席的經過情形。整個儀式曾由公安部門進行了錄影。

8. 《聶榮臻回憶錄》失實處之考證

寫至1948年5月國民黨軍用飛機在河北省阜平縣進行轟炸的事件，就不能不對近年一些流行的説法進行澄清。目前，對於1948年發

生的這一非常事件的說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聶榮臻回憶錄》中的說法，這種說法最具代表性，其內容最早曾刊載於《光明日報》1983年12月15日第一版。文章的標題是《在城南莊和毛澤東同志相處的日子裏》，其中主要段落如下：

"那天早晨，收聽完廣播，我正在吃早飯，聽到有機群的轟鳴聲，這時我思想上特別警惕，因為毛澤東同志住在這裏，必須對他的安全絕對負責。

我急忙走到院裏，敵機的隆隆聲，越來越大了。

我循着聲音望去，有一架敵機已經飛來了，在城南莊上空盤旋偵察。接着，後面傳來一陣轟鳴，聲音很深重，不多時又飛來了兩架敵機，這時已經看清楚是B－25轟炸機。於是，我快步向毛澤東同志的房間走去。

由於毛澤東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內的時候，見他身穿藍條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輕而又急切的聲音說：'主席，敵人飛機要來轟炸，請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澤東同志坐起來，若無其事，非常鎮靜，很風趣地對我說：'不要緊，沒什麼了不起！無非是投下一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

不知什麼時候，參謀長趙爾陸同志也來了，他站在我的身後。我看毛澤東同志不想進防空洞，心裏急了，一連幾聲地說：'主席，敵人的飛機來了，你必須立刻離開這裏，我要對你的安全負責。'

可是，毛澤東同志坐在床上，還是不願意走。

我想不能再遲延了，就當機立斷，讓警衛人員去取擔架。取來擔架以後，我向趙爾陸同志遞了個眼色，便把毛澤東同志扶上了擔架。我們倆人抬起擔架就走，在場的秘書和警衛人員，七手八腳地接過了擔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後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聽到飛機聲，早就跑了，等我們抬着毛澤東同志走進防空洞時，她已經在防空洞裏了。

我和毛澤東同志剛走進防空洞，敵人的飛機就投下了炸彈，只聽轟轟幾聲巨響，我們駐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團團濃煙。"

二、王居英在1983年《河北學刊》第2期撰文說：

"1948年黨中央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居住。5月中旬一天早晨，一架敵機竄入駐地上空盤旋偵察，隨後又來了兩架。毛澤東同志因整夜辦公，天快亮時才睡覺。聶榮臻同志（當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聽到飛機聲，馬上叫醒主席，說：'敵機要轟炸，快進防空洞！'毛主席風趣地說：'怕什麼，無非是扔下一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這時，敵機越飛越低，聶榮臻同志說：'不行，全黨全軍服從你，這會兒你得聽我的。'說完就命令警衛員，並與趙爾陸同志一起，把毛澤東同志迅速攙扶到房後防空洞裏。剛進防空洞，就聽到幾聲巨響，其中兩顆炸彈在毛主席住房附近十幾米處爆炸，門窗全被炸掉，房內用具被震壞。"

三、1999年6、7月間，《北京晚報》連載蔣榮增的紀實文章《毛澤東城南莊遇險記》，其中主要有關段落如下：

"1948年5月18日，這是值得人們永遠記住的日子。

……

聶榮臻邊望着敵高空偵察機漸漸遠去的影子，邊向毛澤東住的屋子快跑，……他跑到毛澤東的住屋門口，跟衛士李銀橋說了幾句，急促地敲了幾下門，便推門進去，拉了拉毛澤東蓋的被子，急急地說：'主席、主席，毛主席，快，敵人飛機！'

……聶榮臻急得火燒眉毛，果斷地命令秘書和警衛員：'快去拿擔架來！'

……飛機一個俯衝，投下了三枚炸彈。另一架飛機盤旋過來，也是一個俯衝，投下了兩枚重磅炸彈。

5枚重磅炸彈除一枚插在地裏沒有爆炸外，其餘4枚炸彈發出了震天動地的爆炸聲。濃煙、烈火頓時籠罩了毛澤東的住屋……

猛烈爆炸的彈片，沒有碰着毛澤東的一根寒毛。

原來，當聶榮臻命令警衛員去拿擔架後，他見毛澤東仍坐在床上，便不顧一切地與趙爾陸、李銀橋、閻長林、石國瑞，孫振國等一起，將毛澤東扶下床，不由分說，架着毛澤東向東邊的一個側門跑去。跑出小門，往左拐，後邊還有一個院牆門，他們扶着毛澤東出門。此時，警衛員們已拿來擔架，聶榮臻等同志將毛澤東扶上擔架，他跟趙爾陸及警衛人員一起，抬着擔架，飛快地向山上的防空洞奔去。當他們把毛澤東抬進防空洞時，裏邊已有一些人在，其中，就有江青。……"

以上三種說法，除去一些細節差別外（第二種說法中沒有抬擔架的情節），其大概內容是基本一致的，即認為是聶榮臻救護了毛澤東。請讀者注意以下第四、第五種說法。

四、紀實作家權延赤採訪毛澤東當年的衛士長李銀橋，於1989年寫出了一本名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出版），其中關於阜平遭轟炸的事件是這樣寫的：

"城南莊北邊的山頂上，防空警報突然響起來。……

情況萬分緊急！我粗魯地將手一下插入毛澤東腋窩下，閻長林順手往毛澤東身上披了一件棉衣。石國瑞和孫振國便攙扶住毛澤東另一隻胳膊。

'快快快！'我喊着，四個人連架帶攙，拖起毛澤東便往門外跑。

剛出門，頭上一陣尖嘯，我們本能地一縮脖，朝後倒步。還沒弄清怎麼回事？腳下的黃土猛烈一顫，耳畔響起磕破臭雞蛋一般的鈍響。於是，我們一如吃了定身符，全都僵住了。

'啊！'這處傳來江青絕望的尖叫。我猛醒過來，定睛看時，刷地冒出一身冷汗。天哪，三顆炸彈擺成一束，就落在毛澤東的房前，伸手可及！我想喊，想跑，卻凝固了一般做不出任何反應。接着，叫人無法想像的事情發生了：'它怎麼了？'毛澤東盯着那三顆炸彈，像哲學家在思考什麼重大問題，滿腹狐疑地想彎下身去。他對那炸彈尾部呼呼飛旋的陀螺發生了興趣，伸出一根指頭，似乎要撥弄那個陀螺……'炸彈！那是炸彈！'江青尖叫着，頓着腳。頭上又響起飛機俯衝的尖嘯，她立刻像充氣過量的皮球一般跳起來，向防空洞跑去。同時間，我們四名警衛人員也像被火夠子捅了一下似的，叫起來，'快跑、快跑！'架起毛澤東，腳不沾地地朝防空洞猛衝。

'快呀！快呀！飛機要丟炸彈了"！飛機要丟炸彈了！'聶榮臻在防空洞前拚命揮手喊。

我用出全身力氣架着毛澤東跑。毛澤東的那件棉襖差點顛落，我們不敢停步，也不容毛澤東停步，我一隻手架起毛澤東的胳膊，另一隻手扶住他背上的棉衣，繼續猛跑。毛澤東顯然極不適應這種'形象'，連連命令：'放開，放開我，我不要跑！'

這時，我們剛跑出軍區大院後門。身後轟轟隆隆幾聲巨響，敵機丟下的炸彈在院子裏爆炸。我本能地回頭望一眼，只見黑煙滾滾直沖天空。"

五、毛澤東當年的衛士閻長林寫的《在大決戰的日子裏——毛澤東生活實錄》(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出版），其中有關阜平事件的部分則是這樣記述的：

"八點多鐘，北山上的防空警報器又拉響了。這時，我們就採取了果斷的措施，按照在撤離延安時彭德懷副總司令對我們說的那麼辦了。在撤離延安時，彭老總曾經對我們說：'在關鍵的時刻，在危險的情況下，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你們把他架起來就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

講道理，主席也會原諒的。'我們把門推開，急忙走到了毛主席的床前，大聲把他喊醒後，就扶他坐了起來。

我說：'主席，敵機要來轟炸了，剛才已經來過三架偵察機，現在防空警報又響了，肯定來的是轟炸機，請主席趕快到防空洞裏去防空。'

毛主席問：'敵機丟了炸彈沒有？'

我說：'剛才是偵察機，沒有丟炸彈。轟炸機可能馬上就來了。轟炸機一來，就會丟炸彈的。'

毛主席說：'給我點支煙吸。'

這時，我們就聽見外邊有人喊：'快！快！飛機下來了！飛機下來了！'

那時的情況萬分緊急，顧不上叫毛主席吸煙了。我們也來不及和毛主席商量了，我和石國瑞、孫振國和李銀橋，一邊說着'快！快！'順手往毛主席身上披了一件棉衣，攙扶着毛主席就往屋門外跑。

剛跑出屋門，聶榮臻司令員就來了。

他大聲喊着：'快呀！快呀！飛機要丟炸彈了！飛機要丟炸彈了！'

本來，我們是想叫毛主席躺在擔架上。因為出了屋已經聽見飛機的吼叫聲了，也就來不及叫毛主席躺在擔架上面抬着跑了。於是，我們幾個人攙扶着毛主席，便一直往防空洞的方向跑去。在路上，毛主席披的那件棉襖也披不住，跟在我們後邊的同志只好拿着毛主席棉襖在後邊跟着跑。當剛剛跑出軍區大院後門不遠的時候，轟轟的幾聲巨響，敵機丟下的炸彈在大院裏爆炸了。我們回頭一看，院裏升起了滾滾的濃煙。"

以上筆者較為詳盡地摘錄了五種正式出版物中的五種不同的說法。由於事件的發生距今已遠，當事人的回憶在某些細節上有少許不同，是正常的，但是在關鍵情節上不應該有大的出入。上述五種說法

中，前三種屬於同一類型，其中第二、第三種說法均出自局外人，實際上只是抄襲了第一種說法。第四、第五兩種說法則出自毛澤東當年的兩位衞士，他們都是無可爭議的事件當事人和見證人。按照多年的慣例，中共領導下的出版部門出版的書籍中，是不可能對已經倒台的原中共人物說一句好話的。因此，毛澤東的衞士在回憶裏沒有，也不敢提及陳伯達，是不足為怪的，但是，他們決不會抹煞仍在台上的領導人的勞績，決不會掩蓋老一輩革命家在歷史上做過的每一件好事。然而，他們在回憶中卻根本沒有提到聶榮臻跑到毛澤東屋內勸毛離開一事，更沒有聶榮臻、趙爾陸抬擔架的情節，而僅僅是提到毛澤東已離開住屋之後，曾在防空洞前(閻長林的說法是在剛出屋門後)遇到聶榮臻。這足以說明聶榮臻的回憶錄嚴重失實。

陳伯達講出1948年他在阜平救護過毛主席，是在1971年9月他被押進秦城監獄時，處於萬般無奈的境況，不得已而大聲喊出的，以希冀主席能念舊情。此事原委，毛澤東本人即是最知情者，陳伯達實來不得半點虛言。聶榮臻的說法則出於毛澤東去世之後。因此，李銀橋、閻長林兩位當事人在回憶錄中對聶榮臻說法的否定，實已反證陳伯達的陳述屬實。

9. 解放區的經濟

在解放戰爭時期，陳伯達除了在理論宣傳戰線做了大量工作以配合解放戰爭的進行外，還對新解放區的經濟恢復和生產發展，做了調查和指導的工作。

陳伯達回憶道：

“1948 年以後，軍事形勢發生了轉變，經濟工作越來越重要了。1947 年底，石家莊等城市得到解放，為了盡快恢復經濟，發展生產，

我到石家莊市的一些工廠進行調查研究，記得到過德國人辦的一所焦化廠，還到過鐵路大廠。1948年春，我寫了《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強調要貫徹毛主席'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業政策，提出：'在土地改革中，共產黨堅定地保護工商業，在職工運動中，共產黨解除殘留在工人身上的封建性的壓迫和束縛以後，堅定地反對過份提高工資及破壞生產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實行按件、按等、按節約(減少成本)的累進的工資制度，以及按勞分紅的累進的獎勵制度。反對將技術人員的薪水壓得過底。強調要通過提高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提高工人和職員的技術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給工人羣眾帶來利益。1948年秋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介紹列寧論學習經濟工作》，進一步闡述學習經濟工作的重要性。1949年初發表了《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強調：'當着我們去接管官僚資本企業時，一般地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就是說，不要打亂它原來的技術組織與生產系統，而要保持其完整。''應該鼓勵工人盡力保護、並責令原來在企業中服務的一切職員——工程師、技師、會計、監工等保護企業所有的財產（機器、房屋及一切資產）、文書、圖表、不得有所損害。'

"為什麼當時着重強調這些問題呢？因為有些新解放的地區出現了一些亂子。例如在東北，有些地方出現脱離社會生產一般水平，不顧工廠實際狀況，過份提高工人工資的情況，有些地方不注意保護工人、尤其是技術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造成生產成本過高，生產能力受到損害。當時在遼東的一個大工業城市，吳亮平在那裏當市長，就出現了很多政策性的錯誤。尤其糟糕的是，他當時以參加了國民黨的政治活動為理由，錯誤地處死了一位比較有名的工程師，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國民黨當時就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使我們黨很被動。全國解放後，吳亮平沒

有再受到重用，這件事是一個主要原因。這一點，吳亮平自己卻沒有完全認識到。解放後，他到北京找到毛主席，覺得過去在延安時他當過中宣部部長，現在職務太底，提出想到黨校當校長。毛主席說，黨校已經有人了，沒有答應他的要求。”

陳伯達寫的《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曾被收進1948年解放社編的重要文件彙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書中，大量印行；他寫的《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也曾被印成單行本，廣為散發。

陳伯達還談到了他寫作的《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一書的一些情況：

“《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一書原本是擬寫作的《近代中國農業與中國農村各階級》的一部分草稿，因為抗戰結束後工作太忙，難以寫就全書，就於1945年冬和1946年春將這一部分稿子先發表了。後來于光遠看了發表的稿子，找我提了些意見，主要是兩點：一是文章中統計數字的量很大，有些統計數位有錯誤；二是‘地租率’的概念在使用上與《資本論》中的‘地租率’概念不一致。關於第一點，我讓你（指筆者）母親文菲將所有統計數字重算一遍，因為她中學時曾在湖北全省會考中得過數學第三名，所以我對她的計算能力很相信。結果稿子第二次發表時，于光遠又來了，說怎麼數位錯誤都沒有改呀？看來你母親在延安整風受冤枉時，腦子受了刺激，已不大好用了。我那時沒有時間再料理這本書，後來還是蘇聯人在翻譯時，將書中的數字重新核對了一遍，糾正了一些錯誤。關於第二點，我後來在書里加了幾句解釋，說明這本書不使用《資本論》中的‘地租率’的計算方法，而只延用中國農村中傳統的‘地租率’的計算方法。因為當時中國封建的和半封建的農村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業經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照用《資本論》中計算地租率的方法，就無法對當時中國農村的地租率進行計算和研究。不過于光遠提出這個問題是好的，我曾經讀過多種政治經濟學書，就是沒有

對《資本論》進行認真的研讀，因為《資本論》卷帙很厚，我過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學的，就沒有能細讀。認真讀《資本論》還是在解放以後。"

陳伯達去世以後，于光遠曾撰文述及他向陳伯達提意見的事，譴責陳伯達沒有採納他的意見。筆者為此翻閱了《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一書，發現在該書第32頁和第38頁，著者曾兩次做了說明：

"按照中國農村經濟一般地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的情況，而是處在封建的半封建的關係的情況，因此，這裏的地租率的計算方法，一般地不便於用那種完全處在資本主義關係的情況下的計算方法。關於實物地租，這裏是用中國農村中原來習慣的計算方法，即用地租量佔土地生產物的比例，來說明地租率的。"

"在我們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中，有資本主義的若干發展，因此在若干個別地區農業上的地租，也就有封建的性質、半封建的性質與資本主義的性質之交錯。但是又如前所說，中國農村經濟既然一般地是處在封建的半封建的關係的情況，所以就還不能用那種處在資本主義關係下由地租量和在土地上投下資本的比例來計算貨幣地租率。實際上，我們這裏用地租量佔地價的百分比來計算貨幣地租率，其結果恰恰說明了這並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地租。我們這裏應用這種計算方法所得的結果，其主要所說明的剝削性質，同樣地是野蠻的、殘酷的封建性或半封建性的。"

看來，于光遠的回憶文章並沒有把事情說完全，而且，陳伯達在這本書的《再版前記》中也曾明確地申明："這本小冊子……缺點很多，而且對於當時革命根據地內土地問題的龐大資料，也沒有來得及加以整理和利用……但很抱憾的是沒有工夫做更多的修改。"並沒有認為他的書是十全十美，不需要再修改的。實際上，這本書之所以倉促出

版，是為了配合當時正在廣泛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提高人們對封建土地制度剝削本質的認識。建國初期，陳翰伯等學者曾對此書給予好評。

10. 從西柏坡到北京

從1948年春到1949年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及其附近的村莊工作了將近一年，隨後，中共中央遷移到北京。陳伯達回顧了這一時期的一些情況：

"毛主席到西柏坡以後，我仍常去他那裏商量工作，當時我住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溝村。中央決定辦新的黨校、即馬列學院以後，因劉少奇同志還有其他許多工作，所以具體的辦校工作是由我承擔的。我首先請楊獻珍同志擔任教務長，又請艾思奇主講哲學，王學文主講經濟學，何其芳主講文學。學校搬進北京以後，我又聘請郭大力講授《資本論》，請呂叔湘講授語言文字。

"開始辦黨校，瑣碎事很多，我讓田家英當秘書，幫助做些須要跑腿張羅的工作。毛主席到西柏坡後，每天要看的文件報刊增多，他自己看不過來，讓我薦一個人幫看，從中選出重要的再交他看。我開始讓史敬棠去。一次我去主席那裏，他正忙，江青說史敬棠做事太拘謹，不合適，主席讓我另薦個人。我說：田家英教岸英中文時，已和主席認識了，就讓田家英來吧，和史敬棠對換一下。我回去把此事告訴田家英，他聽說要到毛主席那裏工作，像是身價突然高了，也不談談該注意的事，不久，毛主席要他去東北學習，他才又謙虛些，托我這樣那樣。直到後來要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我因為一個人顧不過來，需要有個人幫搞校對等事，我跟主席說，還是讓他回來，才又把他從東北調回來。

"1949年進北京後，一段時間，我仍主管黨校（馬列學院）。新的校址是我選定的。那時我隨毛主席住在北京香山，所以我把校址選在

頤和園斜對過，來去都比較方便。北京市的同志告訴我那裏是農業大學的地方，我說農業大學不必挨着頤和園，可以搬得遠一些。後來農業大學就搬走了。毛主席搬進城裏中南海以後，我就搬到黨校裏面住了。後來，毛主席覺得我住在黨校，找我很不方便，坐汽車從西郊到中南海，至少要半個多小時，就要我搬到中南海住，但是學校的工作還是離不開。1953年中央決定劉少奇不再兼任馬列學院院長，我不再兼任副院長，改由楊獻珍同志任院長，侯維煜同志任副院長。我就不再管黨校的事了。

"新的馬列學院，與當年延安的馬列學院有一些不同。延安的馬列學院開始主要是培養理論幹部，學生經過考試錄取。新的馬列學院也培養了理論幹部，但更多的是對做領導工作的幹部進行理論教育，提高他們的理論修養，學生都是各單位各地區選送來的。馬列學院為黨培養了一些人，提高了許多幹部的工作能力，它改名為黨校是合適的。"

陳伯達晚年在回憶中，幾次談到他推薦田家英到毛澤東處當秘書的經過。陳伯達去世以後，胡喬木、逄先知等發表了紀念田的回憶錄，稱田當毛澤東的秘書是由於胡喬木的推薦，與陳伯達的說法大相徑庭。但是分析起來，胡、逄的說法值得質疑。一、田在延安馬列學院時曾是陳的學生，後又長期在陳的手下工作，胡即使要推薦田，也不可能繞過陳，何況胡本人也是經陳推薦才成為毛澤東的秘書(這一點從胡喬木夫人谷羽的談話中已得到證實，可參看葉永烈著《胡喬木》一書)。二、胡、逄的回憶錄沒有說明毛澤東增加秘書的原因。三、胡、逄的回憶錄都提到1948年田到毛澤東處不久，毛即要田到東北，胡的回憶錄還明確講田是在東北局的領導下工作，但他們又都沒有講田是怎麼調回北京的，是否他們並不清楚其中的詳細過程呢？顯然，他們對田到毛澤東處當秘書的具體經過所知甚少。

胡喬木的回憶文章《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已收進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該書發行量達幾十萬冊)，有些部分非常實事求是，有些部分卻並不實事求是，須有所分析。

胡喬木在文章中明確指出："1956年，陳伯達在八大決議中塞進了一句'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事後大受指責"。這件重要的事就寫得非常明白，非常實事求是。胡喬木在文中還強調，這件事是使他和田家英認清陳的'假馬克思主義者的真面目'的主要理由，可見他對陳的這一觀點是多麼的反對。八大決議這件事關係到中共建國後幾十年的歷史走向。中共後來的種種失誤，實際上都是從否定陳伯達關於生產力的這一觀點發源而來。在1993年胡喬木去世之後，有人似乎意識到此事在歷史上的重要性，竟然別出心裁地想把胡喬木親自撰文斥責的陳伯達的觀點，轉而說成是胡的觀點。

陳伯達在談話中，還言及建國前夕一些民主人士訪問延安或西柏坡的情況。

有一次，我談到："有本紀念黃炎培的書，寫了解放前黃炎培與毛主席的一段對話。黃炎培說他六十年來，親眼看到，'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事，不可勝數，問共產黨有何辦法跳出這種週期率的支配？毛主席說已經找到了一個辦法，就是實行民主監督。"

陳伯達說："黃炎培引用的'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這句話，出自《左傳》莊公十一年：'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罪己就是自我批評。罪人就是將做錯了的事歸罪於別人。遇事能做自我批評，才能使事業興盛。一味歸罪於他人，就會導致衰亡。所以，自我批評這一條很重要。

"黃炎培、傅斯年等人1945年夏天到延安訪問。他們和毛主席談

話，我有時也在場。他們那時對毛主席的態度都還不錯。在西柏坡時，毛主席也接見過一些來訪的民主人士，如顏惠慶、江庸等。記得吳晗當時送給毛主席一本《朱元璋傳》，我略微翻過一下。進城後，吳晗跟我說，那是仿我的《人民公敵蔣介石》而寫的。我說這兩個人不能相比。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又是民族英雄。以後再見到他時，他說那本書已經改寫了。"

11. 美國學者懷利對陳伯達的評價

1980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了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懷利（Raymond F. Wylie）的著作《毛主義的興起：毛澤東、陳伯達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1935-1945*）。陳伯達從1982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後面所附的進口書刊目錄中，得知此書，但他生前沒有能夠借閱到。此書至今沒有中文譯本，筆者也僅只是從1990年8月《福建黨史月刊》所載劉雪明的節譯文章中窺見此書的部分內容。懷利以客觀求實的態度對陳伯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所起的歷史作用，做出了概括性的評價：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深造，為陳伯達的馬列主義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奠定了思想的基礎。在莫斯科學習期間，陳伯達經常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國際派'的歧視、壓制和打擊，這是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澤東同親蘇分子的激烈的權力鬥爭中，陳伯達支持毛澤東的一個重要原因。三十年代初，陳伯達學就回國，在北京的一所大學從事先秦歷史和先秦哲學的教學工作，同時也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並經常撰寫文章反駁國民黨的攻擊。'伯達'就是他這時用的筆名。在這項鬥爭

中，陳伯達擴大了自己的影響，贏得了自己的聲望。

1935年陳伯達發表了一篇文章，清晰地表明瞭他的哲學觀點。由於國民黨的壓制，他雖然在文章中沒有直接使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名詞，但還是掩蓋不住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贊同。他認為哲學最基本的問題是意識和存在的關係問題，並斷言真理是相對的，具體的，沒有什麼不變的絕對真理。……同時，他通過對中國歷史、哲學的研究，發現中國古代思想具有豐富的辯證法、唯物主義因素，因而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存在着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應該同中國自己的東西結合起來，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應該採取'靈活的'方式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陳伯達對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非常一致的。毛澤東認為，如果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不同中國社會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那麼馬列主義就成了'沒有生命的教條'，陳伯達認為，如果這樣的話，馬列主義就是'空洞的說教'。這是陳伯達後來和毛澤東結成親密友誼，長期政治合作的思想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這一年是陳伯達一生的轉捩點，'一二．九'運動使他成為國統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關於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問題的辯論中，陳伯達詳細闡述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日益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的年輕理論家的地位。

1937年夏，陳伯達離開北京，秘密來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聖地——延安。當時毛澤東正忙於同王明一夥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這位身材矮小、不善言談、學究式的大學教師，開始並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不過，毛澤東很快就發現，陳伯達具有天賦的寫作能力，扎實的理論功底，而且對馬列主義的認識存在着和自己一樣的觀點，因此，陳伯達成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和理論顧問，兩人開始了漫長的合作生涯。

延安時期，陳伯達主要從事理論研究，政治宣傳和毛澤東報告的擬訂工作，他和毛澤東一起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並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他撰寫了大量的理論文章，宣傳馬列主義、宣傳毛澤東的思想，歌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無論是在毛澤東同中國共產黨黨內親蘇分子的權力鬥爭中，還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理論鬥爭中，陳伯達始終是一位關鍵人物。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把毛澤東思想提升為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理論指導的過程中，陳伯達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最終表達) 正式寫進黨章，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理論和行動指南。就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陳伯達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而且名列第三，七屆二中全會升為正式中央委員。陳伯達升遷如此之快，可見他的貢獻是相當大的。他是一位為毛澤東服務的黨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

3 建國初期

1. 建國前後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情，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國家由衰敗、戰亂和分裂逐步走向強盛、和平和統一的轉捩點，是中國擺脱外國列強的奴役和控制，走向獨立自主地進行建設和發展的轉捩點。儘管建國後的道路仍是曲折的，而不是平坦的，但這是一個中國人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時代，仰外國人鼻息過日子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不管世界各國的人們對新中國有何種認識，中國開始真正步入世界強國之林。

回顧建國前後所做的大量工作，陳伯達的心情是感到欣慰的：

"1945年夏天，傅斯年等人訪問延安，毛主席接見他們時，我也參加了談話。臨別，傅斯年曾請我留言。我寫了兩句古話給他：

西伯拘而演周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

前一句出自司馬遷，後一句出自《周易．系辭下傳》。西伯原指周文王，西伯與西北諧音，我以西伯寓西北；以'易之興'寓新的民族精神之興起；以殷和周寓國共兩黨。意思就是：雖然位處西北的延安長期受到圍困，卻由此孕育演化出新的民族精神——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思想，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即在於此；這當是國民黨走向衰敗，共產黨走向興盛，並將承擔民族復興重任的歷史新時代。我的題詞的寓意，傅斯年是應當看得懂的。而事情的發展也果不其然。

“黨的七大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這對於黨領導人民奪取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革命政黨，總要有一個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對於當時東方的革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越南共產黨也曾在黨章中將毛澤東思想確定為指導思想。

“在離開西柏坡前，我曾向毛主席建議：應編選一套以中共中央名義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當時，已有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有晉察冀的、東北的、山東的，等等，但都不是按年代編選的，對讀者很不方便，而且文字上也有很多錯訛。因此，編選一套由毛主席自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很有必要。毛主席同意了我的意見，決定讓我具體負責這項工作。那時，戰爭還沒有結束，還要進北京準備建國事宜，各方面的工作很多，所以就沒有馬上開展這項工作，直到毛主席訪蘇回來，才開始這項工作。”

我問到確定首都和國名的經過情況，陳伯達說：

“在西柏坡時，中央討論過將首都定在何處的問題。開始有同志提出西安，因為西安處於中國地圖的正中央，曾是漢、唐等朝代的都城，又離陝北根據地很近，有牢固的羣眾基礎，如果定西安為首都，對西北的發展也很有利。還有同志提出以南京為首都，認為南京已經被國民黨政府作為首都經營多年，有較好的物質基礎，各國使館也在那裏，如定都南京，對掃清國民黨殘餘勢力，鞏固新生的政權有利。但是多數同志認為還是定都北京好，因為北京是當時我們已解放的最大城市，它在明、清兩代都是首都，尤其是它離東北很近，如定為首都，對鞏固東北地區、密切東北和關內的聯繫很有利。自從日本人佔領東北以後，東北問題成為中國的重大問題，我們解放東北，鞏固東北，對統一全中國十分重要。我當時贊成在北京和西安兩個城市中選擇首都，最後毛主席確定還是以北京為首都。

“至於國名，是到北京後毛主席自己起的。開始有人提出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但多數人都不贊成，毛主席提出，可以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經斟酌又覺得這個名稱長了些，於是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宋慶齡到北京，知國名已改了，也很難過。”

“那為什麼呢？”我不理解地問。

“那是當然的啦！”陳伯達對我的不理解感到有些奇怪，接着解釋道：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一手創立的，現在僅僅過了三十八年就滅亡了，她怎麼能不難過呢？後來向她做了些解釋，說明‘中華民國’幾個字，都已包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了，實際上還是對‘中華民國’的繼承，她才感覺好一些。有一天毛主席請她和幾位新到京的民主人士吃飯，她和毛主席一桌，我在旁邊的一桌。席間，我邀幾位同桌的人一起站起來，到宋慶齡座位旁邊，向她敬酒，她很高興。我過去在《三民主義概論》中曾經稱讚她是‘中國最偉大的女性’，她當然是知道的。她後來一直對我很好。”

陳伯達還談到了他進北京後負責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若干情況：

“共同綱領是毛主席讓我和李維漢、李立三共同起草的，最早的草稿主要是我起草的，李維漢、李立三也參加了一些起草工作。”

“為什麼會讓李立三參加起草呢？”我不禁問道，因為在我的印象裏，李立三歷史上犯過左傾錯誤，毛主席對他似乎很疏遠。

“毛主席找我談話時，他們兩位剛好都在主席那裏，李維漢是負責統一戰線工作的，原來就準備參加起草，李立三是碰巧在那裏。毛主席就說，你們三個人一塊起草吧。毛主席過去對李立三還是比較好的。1945 年開七大時，李立三正在蘇聯，被蘇聯人當作托派流放到西伯利

亞勞動。但是毛主席提名李立三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李立三當選後，蘇聯人不得不釋放了他。因為蘇聯人沒有理由流放一名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從這件事也可看出毛主席過去是很能團結人的，而且他從來不屈從於外國人的指揮棒。”

陳伯達回答了我的問題，繼續往下談到：

“綱領草案起草後，又經過多位同志的修改，然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草案，提交給政治協商會議，做進一步的討論。對後面的討論修改，我就不參加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偶然在秘書那裏看到我最初起草的綱領草稿，我就吩咐他把草稿撕掉了。後來我起草的很多文件，在定稿付印之後，我也是讓秘書把我的初稿撕掉。這些文件的起草本來都是黨交給我的工作，沒有必要自己保留這些底稿。”

陳伯達作為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社會科學界首席代表，擔負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起草任務，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惜的是他沒有保留下來綱領草案最早的草稿。

2. 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

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開始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大舉措——中蘇聯盟。關於這次持續了兩個多月的訪問，目前雖然已有幾種回憶錄記述了訪問的經過，但因種種原因，對一些重要的情節卻採取了迴避的態度，陳伯達晚年在談話中講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

“毛主席第一次出訪蘇聯，是由我陪同的，其他隨行人員還有翻譯師哲、負責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和機要秘書葉子龍。正式參加與蘇聯人會談的，除了毛主席和我外，還有駐蘇大使王稼祥。可以說，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只有我們三個人。過了一個多月，周恩來同志率領李富春、葉季

壯等政府人員到莫斯科，參加了後半部分的會談。

“毛主席坐火車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只有莫洛托夫等人到車站迎接，斯大林沒有來。蘇聯人迎接的規格比預想的要低，氣氛比較冷淡。”

我插問道：

“是不是按常規，斯大林應該到場呢？”

“那當然。”

陳伯達稍微停頓了一下，接着説道：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外相松岡訪蘇，斯大林都曾親自到車站迎接，為什麼毛主席到莫斯科，就不能迎接呢？”

“也許那時斯大林年紀大了，不方便親自到車站迎接？”我又問了一句。

陳伯達擺了擺手，繼續説道：

“不是那麼個問題。蘇聯人是比較冷淡。因為中國革命不是按照蘇聯人的意志取得勝利的。”

在蘇聯訪問期間，陳伯達遇到幾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例如“斯大林敬酒事件”、“暫住大使館問題”、“紅罌粟事件”、“竊聽器事件”等等。

關於前兩件事，陳伯達回憶道：

“和斯大林的會談開始進行的很緩慢，經常出現僵局。斯大林習慣一邊吃喝點東西，一邊談，我們也只能入鄉隨俗。有時為了緩和氣氛，斯大林故意講一點笑話。有一次會談出現冷場，斯大林為了轉移人們的緊張情緒，突然談起了我，他望着我説：‘我讀過陳伯達同志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那裏面引了一段小羅斯福寫的對開羅會議的回憶：宋美齡在與小羅斯福私下交談時，故意把手放在小羅斯福的膝蓋上，向他眉目傳情，令小羅斯福大吃一驚。這段故事很有趣。’説完斯大林自己

笑了，其他人也都笑了。可是毛主席聽不懂俄語，師哲也來不及翻譯，毛主席表情很困惑，不曉得人們在笑什麼。我趕緊向毛主席解釋說，是講《人民公敵蔣介石》書中寫的事。接着斯大林就拿着酒杯站起來，走到我跟前，向我敬酒，微笑着說道：'祝中國傑出的哲學家、歷史學家陳伯達同志身體健康！'我也趕緊回敬斯大林一杯酒，說：'祝世界上最傑出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斯大林身體健康！'我當時感覺到毛主席對這一突然出現的場面很不高興，因為斯大林作為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不是向他敬酒，而是向他的下屬敬酒，而且我和斯大林互相敬酒時又是用俄語致詞，他無法立刻弄清我們在說什麼。以毛主席的性格，顯然他懷疑我與蘇聯人之間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我對當時出現的場面毫無思想準備，也不知道如何消除毛主席的疑慮。

"果然，第二天晚上的會談，毛主席沒有讓我參加。後來知道，那天的會談也進行得不好。蘇聯人提出要在東北和新疆設立領事館，設領事館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但蘇聯人提出在蘇聯領事館設立之前，其他國家不得在東北和新疆設立領事館。也就是說，蘇聯人有優先設立權，這實際上是想劃分勢力範圍，是不應該答應的，但當時為了盡快獲得蘇聯的經濟援助，毛主席採取了暫時不和蘇聯人計較的策略。總之，和蘇聯人的會談進行得很艱難，因此會談的時間拖延得很長，時斷時續。

"由於會談是斷斷續續進行的，當中又有兩天沒有讓我參加，我就想利用這兩天的空閒和正在蘇聯讀書、已有十多年沒見的小老虎[1]團聚一下。我當然不能把小老虎接到毛主席住的地方，就把他接到我國駐蘇大使館，我陪他在使館住兩天。那天毛主席由師哲當翻譯，單獨和斯大林談話，我就托汪東興向毛主席請假，並讓汪東興有事隨時到大使館找

[1] 陳伯達的長子陳小達的昵稱，陳小達1960年去世。——筆者注

我。那時參加中蘇會談的王稼祥同志也是住在大使館，我沒有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妥。

“沒想到我在大使館陪兒子住兩天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不快。我得知後馬上搬了回來。毛主席也沒有多說什麼。我離開大使館以後，小老虎繼續在大使館住了幾天。那時孫維世也住在大使館，她是烈士孫炳文的女兒，恩來同志的乾女兒，1939年恩來同志到蘇聯治病時，將她和小老虎一同帶到蘇聯，她比小老虎大十來歲，這時像大姐姐一樣照顧小老虎。

“我倒了以後，我在大使館住了兩天這件事也被算成我的罪狀，懷疑我裏通外國。其實，大使館是我們國家駐蘇聯的大使館，並沒有大使館以外的人來往，怎麼會裏通外國呢？”

至於“紅罌粟事件”，此事在陳伯達倒後曾被中共中央文件大肆宣染，說是陳伯達擅自觀看反華舞劇，並鼓掌叫好云云。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在這裏不妨先看一看蘇聯方面的說法。

蘇聯外交家、漢學家費德林在他的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寫道：

“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我們文化部門想讓中國朋友瞭解一下首都莫斯科的文化生活。他們覺得最好從大劇院上演的芭蕾舞劇《紅罌粟》開始。舞劇的劇情同中國有點關係。至少，它的作者和編導是這麼認為的。他們是過份地以想像代替現實了。為了加深印象，《紅罌粟》的作曲者格里埃爾也應邀出席。

由於某種原因（恐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沒有來觀劇，儘管大家都希望他能到場。幾位中國朋友由著名的黨的思想理論家陳伯達教授率領，坐在貴賓席上。中國同志看得很認真，不斷向我提出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奧妙。

當劇中一個上海的老鴇出場時，陳伯達突然問：'唉，這個傢伙是幹嗎的？' 我作了解釋，但是他並不甘休：

'這個醜八怪是中國人嗎？其他那些也是中國人？你們以為中國人就是像臺上扮演的那個樣子？你們覺得好玩，是嗎？' 我不知怎麼回答是好，這可不是一般性的問題。

我不得不對他說，我們大家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從自己的想像出發的。外國人很難演出中國人的樣子，必須加以化裝……'恐怕不是化裝問題吧？你看他那樣子、他的動作，簡直讓人噁心！……' 陳伯達激動地說。

我不安地注視着教授的情緒。隨着劇情的發展，他的問題越來越多，戲到半途，陳伯達不想看了，提出退席。我費了好大口舌才勉強把中國客人挽留下來，否則大家下不了臺。我拿出的最後一招是藉口著名的作曲家格里埃爾也出席了，他年老體衰，出來一趟不容易……

'你說，《紅罌粟》是著名作曲家的作品？' 陳伯達打斷我的話。

當時我覺得這人太刻薄了，太不講情面。於是不得不想出各種口實來挽留他，我說，我們的功勳音樂家已經高齡，他今天是專程為歡迎中國貴賓而來的……最後陳伯達才打着官腔說，'那好吧，為了禮貌，留個情面，我們看下去。居然這樣來醜化中國人的形象，簡直像一群土匪，醜八怪。對於進步的藝術家來說，簡直是不能容忍。對不起，這太不像話了……'

演出结束後，我們應邀來到大劇院經理室，那裏擺好了酒菜，招待中國貴賓。

後來的事態加深了本來就很尷尬的局面。這時候，無論是富麗堂皇的傢俱擺設，如描金的桌子和絲絨軟椅，殷勤周到的服務，還是主人的熱情好客，都引不起陳伯達及其隨行人員的興趣。氣氛很沉悶，沒有

通常觀劇後談笑風生的局面。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國客人講幾句捧場和表揚的話，因為《紅罌粟》是專門為他們排演的。但是中國人莫名其妙地沉默着。於是，我以陪同人員的身份請陳伯達談談觀感。'談出來讓人掃興，還是不談為好。如果可以的話，請你別把我的話翻譯過去。'陳伯達板着臉，顯然不願發表評論。但是不翻譯是不行的。因為大家都在聽我們談話，並且期待着想知道中國人講了什麼，按主人的話說，隨便說點什麼都行。要知道，我們已習慣於聽表揚，根本想不到他們會說別的話。我只好來點外交辭令，請陳伯達不要客氣，因為他的意見對劇院今後的工作十分寶貴。

陳伯達開口了：'請原諒，我們對這個舞劇的名字《紅罌粟》就持有異議。我們中國人把罌粟看成是鴉片的同義字。也許你們不知道，鴉片是我們的死敵，曾經毒害過我們好幾代人……不過，我並不是責怪你們……'說畢，他裝出一種歉意的笑容。

不愉快的冷場。談話陷於僵局。大家無話可說。於是陳伯達又補充說，這個劇的情節和幾個中國人的形象都是不可取的。談話進行不下去，草草收場。……

我不想在這裏講大道理。《紅罌粟》的故事確是很荒誕的。它說明我們一些藝術大師的無知，這是他們不瞭解其他民族和我們近鄰的生活實際所造成的。他們追求異國情調，結果呢，不僅破壞了人們的情緒，而且破壞了友誼和睦鄰關係。特瓦爾多夫斯基有過這麼一句話：'一句不實之詞帶來的是損失，只有真情受人歡迎。'在我們同外國的文化聯繫方面，這種現象造成的損失無法用數字來衡量。"

其實，費德林的回憶已經把事情的經過講得很清楚了，陳伯達的回憶與費德林的回憶是相互一致的，陳伯達晚年曾在一份手稿中寫道：

"有一晚，蘇聯聯絡人費德林找我，請我去看一看芭蕾舞劇。雖然我過

去在蘇聯讀過書，可是沒有看過這樣劇種。既然主人好意，我向毛主席說了，就去了。事情已過幾十年，我人又老朽，不復甚記憶，不過依稀記得：劇本是關於中國革命的事，劇情卻不像中國革命中所發生過的。因此，在劇場中，我一直納悶，沒有鼓掌。費德林幾次勸我鼓，我還是沒有鼓。

直到劇已終了，在觀眾的熱烈鼓掌聲中，特別是觀眾表示對中國來客的熱情，為中蘇的友誼，為感謝觀眾的盛意，我也對着觀眾鼓了。劇場指揮者在劇終後找我談話，詢問意見，我坦率地說，根據我是一個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我覺得劇情不像。

這次看戲，就這樣不歡而散。回到住所，見毛主席，說了經過和自己的意見。

看《紅罌粟》的全部過程，就是這樣。當我知道廬山會議（指1970年的廬山會議）談這件事，認為我看這戲有罪，這真令我無話可說了。實際上，那回要我去看這個劇，不過先試一試中國人的態度，作為請毛主席去看先做的一種準備。隨後蘇聯人還是要請毛主席看，但毛主席已從我這裏知道劇情，就沒有去。

這件小事，在廬山會議上成了我有罪的大事。”

從中蘇雙方主要當事人的陳述中可以清楚看出，在觀看芭蕾舞劇《紅罌粟》的過程中，陳伯達嚴肅批評了蘇聯人的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做法，維護了民族的尊嚴，並沒有做任何損害國家利益的事。

關於“竊聽器事件”，則是鮮為人知的，至今筆者還沒有看到有人在回憶錄裏提到過。唯有陳伯達在回憶訪蘇情況的談話中講述過此事：

“我陪毛主席住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的別墅時，出現了一個意外的情況。有一天，王稼祥同志來了。他的耳朵不好，帶着助聽器。他進門後見到我，連連用手指着助聽器，表情緊張。我領會到是有意外情況，

便與他走出屋子，在院子裏交談。王稼祥同志說他的助聽器有異常的反應，可以肯定屋子裏裝有竊聽裝置。我也感到很意外。我們商量此事是否要報告主席，商量的結果，我們決定暫時不能報告主席。因為毛主席是個脾氣急躁的人，現在告訴他，他很可能會為這件事跟蘇聯人鬧翻，那樣會給中蘇兩國關係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當時我們國家剛剛成立，各方面困難很多，爭取蘇聯的支持和經濟援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從國家的大局利益考慮，從中蘇兩大國的關係考慮，我們兩個人決定暫時不報告主席，待將來適當時機再報告主席。當然，為這件事，我們兩人擔了風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黨中央開會研究國際局勢，我在會上向毛主席報告了此事，毛主席當即說：‘為什麼當時不告訴我？’王稼祥同志起來做了解釋；並說：‘這件事是我們兩個人商量的，我們兩個人負責。’毛主席就沒有再說什麼。但是，在訪問蘇聯時發生的這一系列事情，使毛主席對我和蘇聯人的關係產生了懷疑。毛主席曾經說過他是比較多疑的。後來廬山會議我倒後，毛主席說我是個可疑份子，實際上是懷疑我和蘇聯人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懷疑我是蘇聯特務，但是這種懷疑又提不出任何根據，不可能得到國際上的認同，於是就把我往國民黨方面推，把我說成是國民黨特務。我在廬山會議上接受盤問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另外，陳伯達還談到了毛澤東觀看電影《彼得大帝》的事：

“毛主席訪蘇期間，蘇聯人曾請毛主席看了電影《彼得大帝》。這部電影藝術上不錯，但是從思想上講，卻給了毛主席不好的影響。馬克思說過，彼得大帝是以殘酷的方法實行俄國的現代化的。毛主席接觸外國文藝作品不多，這部電影藝術上的成功使彼得大帝的形象很有感染力，容易讓他覺得，彼得大帝能那樣做，他也可以那樣做。”

客觀地說，毛澤東首次訪蘇是成功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中共唯有與蘇聯結盟，才能鞏固新生的政權。訪蘇時爭取到的經濟援助，對於五十年代中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迅猛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訪問期間所出現的一些不愉快的情況，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可說是微不足道的。毛澤東是一個智商很高的人，他雖然性格上有多疑的缺陷，但在七十歲以前，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很強的，他明白自己的缺點，並沒有過多地表現出來。他對訪蘇期間陳伯達的助手作用基本是滿意的，所以他第二次訪蘇時，仍讓陳伯達作為助手隨行。

3. 重新組成家庭

陳伯達從蘇聯回國以後，家庭生活發生了新的變化。

陳伯達與我母親文菲（原名余維發）於1948年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離婚以後，雙方都過着單身生活。文菲1948年調到東北，在東北局婦女委員會工作，1950年調到北京貝滿女中任政治教員，不久，她向組織上提出想回湖北工作。她原籍湖北黃安(解放後改名紅安，是鄂豫皖根據地的中心)，家中有數人參加革命，叔祖父余楚臣是該縣中共早期黨員，1927年犧牲；舅父詹才芳是黃安暴動參加者，紅四方面軍將領（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文菲的父親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董必武的秘書，他不是中共黨員，解放後在武漢做一般工作。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意了文菲的要求，調她到設在武漢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後來中南局南遷廣州，她不願離開武漢，遂調到武漢醫學院工作。

陳伯達從西柏坡進入北京後，先隨毛澤東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澤東住雙清別墅，陳伯達住在碧雲寺裏哼哈二將門後左側的一處院落。不久，毛澤東搬進中南海，陳伯達則搬進頤和園正門斜對面的一處大院，即現今中共中央黨校校址，住在大院入口內北側的一個小院。他

陪毛澤東訪蘇回來後的一段時間，在這裏主持馬列學院的工作。

在1950年這段相對比較安靜的時期，黨組織也很關心陳伯達的個人生活，想為他組織一個新的家庭。一些著名人物也曾對此事加以過問。

陳伯達談到：

“那段時候，有一些同志給我介紹對象。少奇同志是馬列學院的院長，日常工作上和我接觸很多，他曾給我介紹過一次，但我經過考慮，沒有同意。馬列學院的同志給我介紹劉肅宴，開始我也有些猶豫，覺得性格不是很合得來。……”陳伯達談到，這時出現了一件沒有想到的事，這件事促使他決定與劉肅宴結婚。

劉肅宴，後來改寫為劉叔宴，1922年生於四川灌縣一個地主家庭。在她年幼時，其父受另一戶與官府有密切關係的地主的誣陷，經受了牢獄之災。為了贖父出獄，劉家被逼得傾家蕩產。家庭的變故使劉叔宴從小認識到社會的黑暗。1938年她在重慶上高中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開始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她組織過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並曾化名進入復旦大學文學系聽課，在學生中發展地下黨員。她在著名社會學家鄧初民那裏做過統一戰線的工作，被鄧初民認作乾女兒。後來，她與重慶地下黨的一位負責人劉光結婚。

劉光生於1917年，長期從事中共的青年工作，1932年去蘇聯參與少年共產國際的工作，1938年到重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委員會書記。劉叔宴與劉光是在周恩來、鄧穎超的關懷幫助下結為伉儷的。抗戰結束後，他們夫婦共同參加了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團的工作。1946年5月，劉叔宴生下一女，不久，劉光病逝於上海。當時，國共兩黨的關係已經破裂，內戰已經開始，劉叔宴帶女兒隨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到達延安。組織上安排劉叔宴到馬列學院學習，從此她成為陳伯達眾多學生中的一員。1949年馬列學院遷進北京以後，經朋友牽線，她與陳伯

達有了來往。

1950年，陳伯達與劉叔宴結婚。起初，雙方關係不算很融洽。劉叔宴性格開朗潑辣，完全沒有舊社會婦女三從四德的傳統觀念。在生活習慣上，劉叔宴也屬於現代新女性，她會騎車、游泳、滑冰、彈鋼琴，而陳伯達這些都不會，他在性格上屬於舊時代循規蹈矩的書生類型，早在延安時期就被蒲安修等稱呼為'老夫子'。在文化知識上，劉則遠不及陳。陳在舊的傳統國學和新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方面，是中共黨內主要的學者；而劉只是陳的學生。總之，在他們的婚姻初期，兩個人之間的磕磕碰碰是免不了的。但是過了一兩年後，他們彼此之間就互相習慣了，直到'文革'開始以前，他們之間大體上是平靜和諧的。

1951年初，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陳伯達搬進中南海居住。開始，他臨時住在勤政殿的兩間屋內，後來被安排到迎春門內北邊的一處院子。那裏的房子歷盡滄桑，已很破舊，房頂上長滿了青草。陳住的是兩間殿堂式的大屋，每間又分隔成三間小一些的屋子。房子雖舊，還算寬敞，環境也較幽靜。當時，胡繩等人住在陳的北側，胡繩等搬到沙灘以後，他們住的一間大屋(也隔為三小間)也劃歸陳家居住。陳伯達一家在這裏住了15年。

劉叔宴從馬列學院畢業後，先被分配到北京東郊雙橋農場當副場長，不久調到共青團中央工作。那時，她在馬列學院的同學、團中央書記馮文彬的夫人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和馮文彬一家的友誼即使在馮被下放到天津當拖拉機廠廠長時也沒有中斷。她在團中央工作時還認識了胡耀邦等人。大約1956年，劉叔宴被組織上安排為陳伯達的秘書。陳伯達晚年說："劉叔宴還是幫了我不少忙。我為中央起草的文件，很多是劉叔宴謄抄後送上去的。現在要查底稿，自然是她的字跡。或許有人以為這些文件是劉叔宴起草的。"

4. 幾件逸事

陳伯達談到建國初遇到的幾件小事情：

"進北京不久，大概是因為我寫了《竊國大盜袁世凱》吧，有人告訴我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現住在北京。有一個星期天，我想到街上隨便走一走。我坐車到袁克定的住處附近，下車後向路邊的人打聽到袁的家門，就進去了。進了一間房子，有個人正躺在床上。我問他是不是袁克定。他回答說是。我跟他隨便寒暄了幾句話。那時他病得比較厲害，大概袁世凱倒了以後，他只靠些過去的積蓄過日子，這時候積蓄已花費得差不多了，生活比較困難。我說了些注意養病的話，就走了。他以及附近的人當然都不知道我是誰。他們不會想到寫《竊國大盜袁世凱》的人會去看袁世凱的兒子。記得我和彭真提起過這件事。聽說後來北京市對袁克定有了安置，每個月給他發些生活費。

"我在黨校（馬列學院）住的時候，有一天，唐生智領着楊虎坐一部轎車從城裏跑來找我。我感到很奇怪。唐生智1927年時是有名的北伐軍將領，大革命失敗後他跟隨蔣介石、汪精衛反共，不久又被蔣介石搞下了台，失去了軍權，以後基本上默默無聞了，1949年解放軍過長江時，他隨程潛在湖南起義，後來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楊虎在1927年時曾是反共最積極的國民黨將領，那時候他與陳羣的軍隊對上海實行恐怖管制，被革命羣眾稱為'虎羣世界'。我在《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中曾寫到這一事實。現在國民黨已經從根本上失敗了，這時候他們來找我幹什麼呢？我當時非常奇怪。我見了他們以後才知道，原來是因為楊虎在上海解放前夕曾倒戈反蔣，幫助上海地下黨做了一些解救民主人士的事，所以剛解放時沒有追究他的過去，他讓唐生智領他來見我，是想讓我修改《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中有關他的提法。我當時不

好說什麼，只說等將來再版時再說吧，他們就走了。結果楊虎這個人終究還是不可救藥。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又認為共產黨不行了，暗地幫助美國人收集我們的情報，最後還是被公安部門抓起來了。

"還有一件事，可以看出當時有些幹部多麼在意人們的地位變化。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時，議定政協常委名單。這個名單先經過我看，我看到有自己的名字，就把它圈掉了，送交會議討論的名單就沒有了我的名字，最後確定的常委中就沒有了我。這本來是我自己造成的。但有位過去和我關係很好的人，就是齊燕銘，卻認為名單沒有我，是表明我在中央已經不行了。他那時是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上天安門的請帖都是由他確定發出的。結果，國慶日白天上天安門城樓的請帖雖然還有我的，但是晚上看焰火的請帖發給我的卻是去觀禮台的。後來，周恩來同志在天安門上有事情找我，找不到，就問齊燕銘，才知道我是在下面的觀禮台，馬上派人把我找了上來。

"齊燕銘過去在北平中國大學時與我相熟，他與張致祥都是吳承仕先生的學生，畢業後也在中國大學教課。1936年秋我介紹他們幾位一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一個特別黨小組，張致祥同志任組長。後來在延安，齊燕銘與我仍來往很多，他的兩個女兒的名字都是我起的，還認我為乾爸爸。可以說，我與齊燕銘算是很要好的朋友。解放後由於工作的關係，我與許多朋友的來往都減少了，但是我沒有想到齊燕銘會變得那樣。他六十年代因生活上出了點問題被調離國務院，到山東濟南市當市長。'文革'結束後，他出任全國政協的秘書長，這時候我已經倒了，被關在監獄裏。前幾年他去世了，我看到報上登了他的簡歷，說他是1938年在山東加入中國共產黨。看來我介紹他在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段歷史他就不認了，免得和我有關係。齊燕銘的父親是一位蒙古族貴族，我在中國大學講中國古代哲學時寫的一份講義，是他設法

保存下來的，解放後交給了我，我很感謝他。我倒了以後這份放在家裏的講義當然也被抄走了，現在也不知道有沒有存下來。”

陳伯達還談到了在毛主席住處見到幾位黨外人士的情況：

“剛解放時，毛主席時常會見一些民主人士。我在毛主席那裏曾見到幾次章士釗。有一次，毛主席當着章士釗的面對我說，章老的《邏輯學指要》一書，你應幫助出版，可以編入《邏輯學叢書》裏面。那時我正在編輯一套《邏輯學叢書》，向羣眾普及邏輯學知識。我原來不想把章士釗的這本書編進去，因為他的這本書並不太好，而且在解放前曾是作為給蔣介石講邏輯學的教材，由國民黨的出版部門出版過。可是毛主席當着章的面，要求我出版，我就不好不答應。毛主席曾講過他和章士釗的關係，他年輕時為湖南的學生運動籌款，到上海向章士釗借過錢，章一次拿出了一千塊大洋，那時侯是個很大的數目。解放以後，每年過春節，毛主席都要派人給章送些錢，說是還過去的帳。雖然章士釗因為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鎮壓北京的愛國學生運動，名聲不好。但是毛主席對他卻一直很好。毛主席說過：‘那時沒有他們（指章士釗等），也就沒有我們。’但是毛主席對章士釗好，並不意味着黨內其他人也可以像他一樣。當時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幹部，過去曾是章士釗的學生，他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信中對章推崇備致，章士釗看了很高興，就拿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對這位黨內幹部寫的這封信卻很不高興，後來就把這位幹部調出了中南海。

“我還在毛主席那裏見到過李達。有一次談話中間，毛主席去了衞生間，李達單獨和我談了十多分鐘。他回想起和我同在北平中國大學教書的情況，說：‘我們是老同事了。那段時侯我離開了革命，只埋頭於學術。你卻能一面從事革命，一面仍還搞學問，真是不容易呀。’李達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大革命失敗後，他脫離了黨，不再參與政治活動。

但他一直從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研究和傳播。毛主席在延安時，曾寫信給他，很希望他能來延安，但是他沒有來。解放後，毛主席和他時有來往，他也當面向毛主席提過些意見。毛主席早年從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中學到不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基本上是翻譯日本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河上肇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是很大的。

"毛主席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也很好，他年輕時曾是黎錦熙的學生。五四運動時期，黎錦熙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毛主席也到北大圖書館做事，在這期間，毛主席曾給黎錦熙寫過不少信。解放後黎將這些信件找了出來，交給毛主席，以敍舊情。我有一次到毛主席處，看到他讓人把這些舊信件攤開涼曬，他和我談起這些舊信，顯得十分高興。我看了看信的內容，覺得完全是學生請教先生的語氣，並沒有什麼特別珍貴之處，況且黎錦熙也算不上大學問家，主席的信寫得也太謙恭了些。"

陳伯達還談到了另外兩件事：

"剛解放時，有段時間報紙上國際方面的事情總按蘇聯的提法作報導，我也盡量糾正過。有一回報紙報導海參崴的消息，不用'海參崴'，而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馬上打電話給新華社，要求改過來，仍用'海參崴'。因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文的譯音，意思是'征服遠東'，這是歷史上沙俄強佔我國領土後造出來的名稱，我們不能使用。後來新華社按我的意見改了過來。

"還有一件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後，陳嘉庚先生到東北轉了一圈，回來後表示，別的事情他都滿意，只有一件事情他不滿意，就是東北很多地方都把毛主席的像和斯大林的像並排掛着。他說：'這樣不好，外國人的像怎麼能和中國的領袖像並排掛呢？'毛主席認為他的意見提的很對，當時高崗也在場，他馬上打電話給東北，讓各地立刻把斯大林的像拿下來，結果第二天東北各地都把斯大林的像拿下來了。毛主

席知道後笑了笑說，拿下來是應該的，但可以逐步拿，第二天就一律拿下來，也太快了些。

“陳嘉庚先生還在一次政協會議上發言，反對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認為外蒙古原來是中國的地方，現在我們不能承認，將來還是要收復回來。我當時在會上做了幾句解釋，我說，這件事現在不大好辦了，外蒙古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獨立的，過去舊政府已經承認了，按照國際慣例，我們現在不好不承認。陳嘉庚聽了很不高興，對人說，怎麼連陳伯達也這麼說？陳嘉庚自從訪問延安時認識我以後，與我的關係一直很好。只有這一次，他對我很有意見。”

5. 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

陳伯達陪毛澤東從蘇聯回國途中，毛澤東讓陳在東北稍事停留，瞭解東北的情況，幫助高崗處理一些事情。之後，陳返回北京，開始着手《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工作。

陳伯達回憶了當時的有關情況：

“為了編輯毛選，需要有個人幫助搞校對和聯繫印刷事宜，我一個人當然顧不過來這些具體事。我向毛主席建議，還是把在東北工作的田家英調回來幫忙，毛主席同意，就把田調回來了。在這之前，毛主席曾讓田家英到東北去鍛煉，在東北局領導下工作，並沒有說什麼時候讓他回來。

“毛選的編輯，是由我先選擇篇目，交毛主席審閱修訂，或按毛主席的意見，由我做些必要的修訂，再由毛主席最後審定。胡喬木參加了部分文字語法的修訂。田家英負責校對和聯繫印刷。寫題解和做注釋的工作也是主要由我負責。有些重要的題解和詞條注釋是毛主席親自寫的，歷史詞條的注釋有些是范文瀾寫的。後來注釋工作量逐漸增多，就

找了一個地方，讓田家英組織一些年輕人搞，經我審閱修改後，由毛主席最後審定。

"整個編輯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那時候毛主席的身體很健康，他親自處理編輯事宜沒有困難。

"毛主席訪問蘇聯時，曾和斯大林談到過準備出版選集的事。毛主席提出請蘇聯方面派位專家協助這項工作。隨後斯大林派尤金來華。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彭真同志提出由我負責與尤金接洽。於是會議決定由我全權負責這件事，由師哲和林伯渠的女兒擔任我方的翻譯。蘇聯決定費德林擔任蘇方的翻譯。我與尤金來往時，都有我方的翻譯在場。我很少直接用俄語同尤金談話，只有翻譯表達不準確的個別詞，我才偶爾用俄語。

"尤金來華後，通過翻譯讀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他很欣賞毛主席在江西蘇區時寫的《農村調查》，認為此書材料豐富，記述了一些普通人、普通農民所談的人們易疏忽的知識。他建議將此書收進選集，但毛主席沒有同意。毛主席是想另外單獨出版。尤金還談過其他一些意見，但都不甚重要。實際上，尤金對毛選的編輯出版並沒有起什麼作用。"

費德林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詳細寫到尤金來華的情況：

"尤金到北京後就着手審閱我和中國同行一起搞的毛澤東著作俄譯本。正如俗話所說，中國的大米飯不是白吃的。不久便同毛澤東約定了日子，以便審查書中的注釋和院士寫的導言。這次約會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辦公室。談話開始前，毛澤東對這項工作給大家帶來的麻煩和困難表示歉意。毛澤東請尤金提提意見，……'毛澤東同志，我們仔細拜讀了您的大作'，尤金說，'它有着深刻的科學性，在理論上也很成熟。由於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以及對中國具體實際的透徹瞭解，才能對局勢作出客觀地評價，指導黨進行無往不勝的鬥

爭……''尤金同志，謝謝你，你太客氣了……我這些粗淺的東西實在不敢當。這些都是在長征途中和戰鬥第一線倉促寫成的，手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著，錯誤在所難免……希望大家加工修改。'毛澤東輕輕地說。'您太謙虛了，毛澤東同志，你對自己的作品過於自謙，我沒有發現什麼嚴重錯誤，只是個別地方做了一點記號，寫上我個人的想法……'說着，尤金翻開筆記本，提出幾個意見，並指出具體哪篇文章，哪一段，第幾頁。擔任翻譯的師哲立刻告訴陳伯達教授，陳是中共中央負責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領導人。陳伯達拿出中文本來查對。'陳伯達，你對院士的這兩個意見是怎麼看的？'毛澤東問。'我仔細聽了院士的意見，我覺得他提得很對。不過我們已經對以前發表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在尤金同志來到北京之前就更正了。'陳伯達安然回答。他顯然知道如何用墨筆來填寫空白。'請你繼續提出寶貴意見，尤金同志。'毛澤東接着說。'這裏的意見，也是這個精神。'尤金繼續引用有關作品，某一段，某一頁。他講完之後，毛澤東用同樣的方式問陳伯達。'毛澤東同志，這個想法很好，不過，我們已經作了必要的訂正。中文本修訂過了。這是一個疏忽錯。當時印刷條件不好……'陳伯達報告說。毛澤東的理論作品就是這樣進行審定的。它表明中共中央編輯委員會及其領導人的組織工作做得很好，他們的工作無懈可擊。蘇聯哲學家想到的問題他們早已想到了，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只是履行一個手續而已。"

費德林的回憶從蘇聯人的角度談了對尤金所起的作用的看法。

陳伯達還談到，毛選中有兩篇文章主要是由他修訂的：

"《選集》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我費了很多功夫修訂的。王明就特別攻擊這篇文章，說是跟原文有不同，如何如何。其實，這篇文章不重新修訂不行。因為這篇文章二十年代曾在好幾

個刊物發表過，每個刊物刊登的文字都有很多不同，如果不加以修訂，該以哪一篇的文字為準呢？我進行的修訂，只是將幾個不同版本的文章綜合起來，在內容上理順文字次序。文章的觀點是毛主席當時的觀點，不存在篡改的問題。王明不過是在找茬攻擊毛主席，故意在毛選修訂的事上做文章。

"另一篇費力修改的文章是《矛盾論》。這是一篇學術性的理論文章，作者當然有權進行修改。不論是中國歷史上的著作者，還是外國的學術著作的作者，在生前對自己的理論著作進行修訂和補充，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毛選中的《矛盾論》在題解上已做了說明：'在收入本書第一版時，作者作了部分的補充、刪節和修改。'那個時候毛主席工作很忙，所以《矛盾論》的修改主要是由我幫助他做的。我改後都交毛主席自己審定，記得他當時曾給我寫過一封信，說：'想不到你修改得這樣快，這樣好。'

"毛選前三卷是由我負責編輯的，但第四卷我基本上沒有參加。第四卷是胡喬木負責的，有些重要的注釋是鄧小平口授，田家英記錄的。鄧小平對第四卷的工作起了較大的作用。第四卷1960年出版時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我和鄧小平同志在北戴河商議後擬定的。"

6. 起草《合作化決議》、《憲法草案》和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

在回顧建國初期編輯毛選的經過後，陳伯達還簡要談到了他負責起草農業合作化的決議和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情況：

"《毛澤東選集》前三卷是1951年至1953年陸續出版的。第三卷出版以後，因為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在農村逐步實行農業合作化，需要制

定有關文件，還要準備在195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需要起草憲法，所以毛選的編輯工作就停頓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三個決議，都是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召集一部分地方的領導同志，經過調查研究和認真討論後擬定的。從決議實施後各地方反映的情況看，是比較好的，農業生產有明顯的增長。

"1953年下半年，我負責起草了《憲法草案》的初稿。以後又隨毛主席到杭州，對草案進行修改，其他同志也參加了討論修改。"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主辦的《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刊登的文章披露，195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以陳伯達、胡喬木、董必武、彭真、鄧小平、李維漢、張際春、田家英等八同志組成憲法小組，負責對憲法草案初稿的條文作最後修改後，提交中央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名單不是按職務高低，而是按責任程度排列的。

1954年3月24日的《人民日報》報導了陳伯達向憲法起草委員會做憲法草案説明的消息，表明陳伯達確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實際負責人。陳伯達從杭州返回北京後，繼續對憲法草案進行了大量修改，為了趕在全國人大召開前完稿，他一度因用腦過度而嚴重失眠，這一情況為筆者所親見，當時並曾在無意中和來我家玩的同班同學劉丁丁（劉允真）談起過。劉丁丁回家後立即將情況告訴了他父親劉少奇，劉少奇為此專門打電話勸陳休息。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收錄有兩件與《憲法草案報告》有關的資料，現轉錄如下：

一、毛澤東1954年9月9日給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的便信：

高智用電話通知：請周、朱、陳、小平四位同志，今日下午五時以前及下午七時以後，看少奇同志憲法報告的頭兩章，以便晚上十一時左

右，和少奇、伯達一起，到我處談一下這兩章中的有些問題。

毛澤東

九月九日上午二時

二、毛澤東1954年9月13日對《憲法草案報告的批語》：

此件送陳伯達同志閱後，送交劉少奇同志：

又作了一些修改，請閱酌。擬於晚上談一下。

毛澤東

九月十三日上午四時

陳伯達還談到了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情況：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是從1952年就開始做準備了的，到1955年才完全搞定。其間，經過很多同志準備資料，對經濟情況進行統計，並參加討論計劃的細節。但主要的文件，即《五年計劃綱要》，是我一手寫下來的，然後經過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討論修改。"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收錄了毛澤東1955年2月20日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致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的信，全文如下：

劉、周、陳、鄧、彭真同志：

五年計劃綱要第二稿，我已看過一遍，有些意見，已告陳伯達同志。請你們即於日內分別找伯達談一次，將你們看過後的意見告訴他，或將你們修改的本子交給他，連同其他同志的意見，由他彙集起來，加以修改，加上地方計劃一章，於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那時我們可以看第三遍，可於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為基本定論。明後天我開始看高饒問題文件，看完再集談一下。

毛澤東

二月二十日

這件原始文獻印證了陳伯達所談的情況屬實。

7. 高崗、饒漱石事件

高崗、饒漱石事件是建國初期中共黨內的一件大事，從五十年代至今，中共對這一事件的說法基本沒有變化。對此事件，陳伯達有自己的看法。

在歷史上，陳伯達與高崗曾經有過幾次接觸。在延安時期，兩人都曾是陝甘寧邊區國民參政會的常務參政員；1950年3月毛澤東訪蘇回國途中，讓陳在東北稍事停留，在此期間，高崗曾讓陳幫助修改他的一篇文章《榮譽屬於誰》，此事在陳倒後被說成是陳參與高崗的反黨活動的罪行。陳迫達說："讓我在東北停留，幫助高崗處理一些問題，修改一些文件，本來是毛主席的意思，我又怎麼能拒絕幫助高崗修改文章呢？"

還有一次接觸，是1952年2月，受毛澤東的派遣，陳伯達曾去東北瞭解五反情況。為此，毛澤東給高崗專門寫了一封信[1]：

高崗同志：

為瞭解東北五反鬥爭情況，派陳伯達同志到瀋陽看一看，有時間的話去長春哈爾濱兩處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來再去上海一帶。陳到後請你給他以指示。

毛澤東

二月十七日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陳伯達與高崗的來往，都是在毛澤東指示下進行的工作性質的來往。

陳伯達這樣述及高崗饒漱石事件：

---

[1] 此信已收錄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227頁。

"高饒事件是解放以後第一次黨中央內部的鬥爭，這件事處理得並不好。因為高崗只是反對劉少奇同志個人，並不反對毛主席。這件事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不應該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不應當把反對某一個領導同志當成反黨。實際上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從此以後動不動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

"高崗反對少奇同志，在中央內部實際上是公開的，他跟很多同志都談過他對少奇同志的意見，特別是對少奇的天津講話有意見。他隨身帶着那份油印的天津講話，也曾拿給我看過，都已經皺皺巴巴不成樣子了，他卻當成寶貝一樣存着。

"高崗這個蠢傢伙，他在一次中央的會議上反對少奇同志，一看他的意見行不通，大家都不贊成，他回家後就拔出手槍要自殺。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就派人把他看管起來了，不許他出來。他看自己已經被關起來，不久就服安眠藥自殺了。

"高崗歷史上就有過一次自殺的企圖。他在延安時曾跟我談到過，1935年中央代表朱理治打擊他時，他很沮喪，一次他跑到蘇區邊界，四顧茫茫，感到自己處境狼狽而又無力擺脫，曾想自殺。

"高崗和劉志丹是陝北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對革命是有功勞的。高崗過去打過仗，但他文化不高，實際上只是個草包，不值得把他的問題搞得那樣嚴重。高崗倒了以後，西北的一些同志是有意見的。如何團結西北的同志是一個問題。我在一次和毛主席談話時談到：'我曾看到鄧小平同志講羣眾路線的一篇文章，寫得不錯。講功勞麼，大家都有一點。高崗有，鄧小平也有。鄧小平過去也在西北工作過，可以團結西北的同志。'大革命時期，鄧小平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做過政治工作，西北有些幹部是從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出來的。我和毛主席談話以後不久，中央就發表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實際就是總書記，只是那時還沒有用

這個名稱。鄧小平同志代替高崗過去的地位，與我和毛主席的談話，是有些關係的。但是小平同志到中央以後，經過一段接觸，我又有些後悔，覺得他架子大，很不容易商量問題。

"高崗、饒漱石的事情出來以後。一些過去和他們關係比較好的同志，對他們的家屬給予了照顧。高崗的孩子得到習仲勳的照顧。饒漱石的一個孩子由張鼎丞同志接到家裏一起住。

"高饒事件也錯誤地牽連了一些幹部。潘漢年同志的案子就是揭發饒漱石時，把事情擴大化搞出來的。潘漢年同志歷史上曾受饒漱石的領導，他任華中局情報部長時，饒漱石是華中局的書記，有些秘密工作方面的事，他向饒漱石報告過，但沒有向陳毅同志報告過。陳毅同志和饒漱石歷史上就不和。饒漱石倒了以後，潘漢年在華東局的會議上檢討了過去秘密工作中的一件事，陳毅同志聽後馬上說：'你的問題很嚴重，要立刻報告中央'。中央接到陳毅同志的報告後，很重視，決定立案調查，就把潘漢年同志關起來了。

"把高饒的問題作為敵我問題來處理，其歷史的效果是不好的。總之，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頭。當時如果把高饒的問題作為黨內問題來處理，就會比較妥當一些。"

8. 在玉泉山與毛澤東長談

在北京頤和園的西面不遠處，有一座林木稀疏的山，山頂上矗立着一座古塔，山腳下有一股清澈的泉水。在湧出泉水的池塘旁邊，立着一座古碑，上面刻着"天下第一泉"五個大字。據說，頤和園昆明湖裏的水，就是這股泉水流淌過來的。這一片幽靜秀麗的山泉，就是有名的玉泉山。它被一道矮矮的舊圍牆圍着，一般人難得一進。那麼，這處園林是做什麼用的呢？在清代，它也是皇家園林的一部分，康熙時名澄心

園，後改名為靜明園，清末被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毀壞。解放以後，對該園進行了部分修繕，又在園內西面山坡修建了一些以二層樓為主的灰色磚瓦房。筆者小時侯聽說，這些新的房子，最初是作為援華蘇聯專家休假療養的招待所而蓋起的。後來，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也來這裏辦公和休息，一些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也曾來此居住過。在蘇聯專家離華以後，這處園林就完全由中共中央使用，不過，一些特別友好的外國人，如胡志明等，在來訪時仍多次住在這裏。

陳伯達回憶了他與毛澤東在玉泉山進行長談的情況：

"解放初期，毛主席有一段時間住在玉泉山休養，我陪他住在那裏，就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方針，進行了內容廣泛的漫談。

"關於國家的經濟基礎問題，我認為當時是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時期。那時，楊獻珍同志寫了一篇《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的文章，提出當時是'綜合經濟基礎'，這篇文章是經我看過的。楊獻珍同志到黨校做領導工作，是我推薦的。他那時在理論上的觀點，都是和我商量，經我同意才發表的。我們的這一觀點，當時毛主席不大贊成，但也沒有明確批評。後來，楊獻珍同志受批評，我也沒有發言權，因為這些事情中央很清楚。到我倒了以後，就把我和楊獻珍同志，還有劉少奇同志掛在一起批判，說我們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當時在文化問題上，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有些同志主張將漢字拼音化，取消方塊字，吳玉章同志就堅持這種觀點。毛主席和斯大林會談時，斯大林也說到這個問題，說：'你們的漢字太難學了，所以文盲多，還是應該改成拼音文字。'毛主席面對國內外的這種主張，有些猶豫，也曾講過要走世界各國的拼音化道路的話。我對毛主席說：'不能搞完全拼音化，那樣中國的文化就斷了。為了方便普及文化，可以實行簡體字，中國歷史上就有過一些簡體字。'毛主席考慮後，表示同意

我的意見，決定成立一個文字改革委員會。當時對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例如歷史分期問題等等，文化界也有一些爭論，所以同時決定成立一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毛主席的意思，想讓我兼任這兩個委員會的工作。我跟主席說：'我現在事情太多，顧不過來兩個委員會的事，文字改革委員會還是讓胡喬木管吧，他做這方面的事比我細緻。'毛主席同意了。

"那時侯，毛主席用人是考慮得比較周到的。例如北京大學的校長人選。開始有人提出吳玉章。吳玉章在黨內資格很老，他年輕時曾留學日本，對文化問題也寫過一些文章，解放前夕擔任華北大學的校長。但是毛主席認為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大多數是留學英美的，在學術上都造詣很深。吳玉章雖然資格老，但在學問上不行，他去當校長，不容易服眾。毛主席提出讓馬寅初當北京大學的校長，吳玉章當中國人民大學的校長。

"在玉泉山漫談時，毛主席還問我，他是在前臺直接主持國事好呢？還是退到後面坐而論道好呢？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我在心裏覺得毛主席還是超脫一些，坐而論道好，但是我沒有說出來。因為按毛主席的性格，有時候意見提的直了，反而起反作用。當時我就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和毛主席還談到了對文化學術問題的方針。記得那時我就談過對文化學術問題應當允許各種不同的觀點互相爭鳴。我年輕時思想上很羨慕春秋戰國時代那種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的景象。在延安時，我在1939年1月出版的《解放》週刊上發表過一篇《中國古代哲學的開端》，其中就講過'我們先人偉大的智慧，在春秋戰國時代，有如萬花怒放，百鳥爭鳴……'我在那篇文章裏提的'萬花怒放，百鳥爭鳴'和現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是相差個別字。當然，我那時的提法還不是

很明確的，但從那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我的主張。後來毛主席說，是我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他這樣講並不是偶然的。”

陳伯達將“百家爭鳴”作為一項政策主張正式提出，現已查明是在1953年。他當時提出這一主張，完全是為了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則，促進文化學術的繁榮。他提出這一主張的初衷與1957年以後對“百家爭鳴”另外作出的解釋是不相干的。早在三十年代，陳伯達在發起“新啟蒙運動”時就反復論述過“思想自由”的原則，他的一篇著名文章的題目就是《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

9. 關於雙百方針的提出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1986年時，報刊上曾有過一些討論，存在過一些不同的說法。

劉大年在1986年第4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歷史研究〉的創刊與‘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一文，他在文中這樣寫道：

> “據我從側面所知，‘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得比較早，而且很明確，與創辦《歷史研究》有直接聯繫。
>
>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一九五三年十月間，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伯達，在（北京）文津街科學院召開會議，討論科學院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出版歷史刊物和其他與加強歷史研究有關的事項。參加會議的有吳玉章、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杜國庠、尹達、劉大年和黎澍。郭沫若沒有參加會議（現已查明，郭沫若參加了會議——筆者注）。陳伯達講話說，最近中央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一個是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由他負責；一個是語言問題研究委員會，由胡喬木同志負責。歷史研究委員會的工作，就從增設歷史研究所，辦刊物、出一批資料書做起。資料書裏面，可以先標點重印《綱鑒易

知錄》。這書份量比較小，通俗易懂，讀者便於從那上面得到歷史知識。對於辦刊物，經過討論，決定出版《歷史研究》雜誌，組織一個編委會，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體工作指定我和尹達負責。陳伯達這時對我和尹達說：辦刊物必須'百家爭鳴'。以前有軍閥、財閥、學閥，你們辦刊物不要當'雜誌閥'。什麼叫'雜誌閥'？就是只發表與自己觀點相同的文章，不發表觀點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爭鳴'，這是一個方針問題。刊物要照這個方針去辦。但有兩點，陳伯達沒有明白地講：一、這次開的會是否就是歷史研究委員會的集會？二、'百家爭鳴'方針是黨中央的意見，還是他個人的意見？會上誰也沒有對這兩點提出詢問。《歷史研究》發刊詞是郭老（郭沫若）親自寫的。我和尹達在郭老家裏就寫些什麼內容作過討論，沒有提起陳伯達的講話，發刊詞裏自然也沒有'百家爭鳴'的話。知道這個方針是毛澤東同志為創辦《歷史研究》提出的，我記得那是在兩年多以後的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康生在懷仁堂舉行的大會上發言，回顧那幾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其中舉的一個事實，是說陳伯達提出了'百家爭鳴'問題。坐在附近的陳伯達很快遞上一個條子，康生照念了。內容是：'百家爭鳴'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國科學院辦歷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請示時，毛主席提出的。……"

劉大年最早談到這個問題，是在1984年春《歷史研究》雜誌慶祝創刊三十周年的茶話會上談的。當時參加茶話會的還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些負責人，他們聽了劉大年的發言，覺得很重要，回去後就查閱了過去的檔案材料，經過查閱檔案，查到了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的記錄，內中有這麼一段：

"陳伯達同志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群眾中

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座中有人說：是周揚提出來的）。人們要我寫字，我就寫了兩句話：'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多年以前的事實，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你的人勢必就會越多。"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毛澤東本人的講話明明是說"陳伯達同志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劉大年的文章卻根據陳伯達在一次會議上遞的條子，說"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毛澤東在1953年就已提出了的。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於1984年6月通過北京市公安局轉交給陳伯達一份調查提綱，向他瞭解事情的原委。為了幫助陳伯達回憶，提綱附有毛澤東1956年4月28日的講話和劉大年的回憶等相關材料。

對此，陳伯達本人曾寫過如下自述：

"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講話，我認為，這個記載是屬實的。毛主席說：'……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你的人勢必就會越多。'毛主席講了歷史，而且用簡練的語言概括了問題的實質。毛主席是黨的領導人，他第一次在黨的重大會議上提出了這個方針。

康生在懷仁堂的一次包括許多黨外人士的會議上說到這個問題，時間是在上述黨中央會議之後。毛主席既正式宣佈和解釋了這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黨中央的方針。康生要說這個問題，就應當用毛主席的語言，闡明問題的實質；但他不然，卻說什麼陳伯達提出'百家爭鳴'之類的話，我當時也在會上，認為他那樣說法不對，徒亂視聽，就寫了一條子給他。

在此之前，根據當時學術界的情況，我有時也用過'百家爭鳴'這個老成語，但只此而已。毛主席不同，他說明了問題的實質，隨後陸續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理論來探索它，解釋它，給予嶄新的內容，嶄新的意義。

其實，事情本來是很清楚的，"百家爭鳴"最初是陳伯達提出的，但當毛澤東接受了這一主張，並經過中共中央的會議作出決定，確定為黨的方針之後，陳伯達認為對外就不應再提是他個人的主張，而應當提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主張，於是就有了在會上遞條子的事。換句話說，是他將自己的正確主張的提出權，謙讓給毛澤東。毛澤東在4月28日會議上講的只不過是真實的情況。

雖然文獻研究室經過調查已經搞清了情況，但該室決定將調查結果秘而不宣，在編輯毛澤東1956年4月28日講話時，毅然把講話中"陳伯達同志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這句話中的"陳伯達同志提出"七個字刪掉（可參看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其實，刪改史料也並非易事，劉少奇1956年5月13日在北京大學的一篇講話，已經講得很明白：

"百家爭鳴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它作為口號是首先由陳伯達提出的。後來毛主席改進了它，並把它作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還有許多事情並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僅僅加工改造了它們。"

劉少奇的這篇講話，被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做了記錄，並被傳出。它後來曾被多位西方學者引用過（可參看[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譯本第一卷74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03年12月新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第490-491頁摘錄了陳伯達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在我們中國容

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一於一尊。我覺得在文化、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這是在中央會議上明確提出雙百方針的第一聲。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的總結講話，就是繼陳伯達發言之後講的。

10.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論十大關係》

1956年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即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於2月24日夜間作了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全盤否定。赫魯曉夫的這一突然舉動，各國共產黨事先都毫無思想準備。由於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在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影響，赫魯曉夫的報告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引起了風波。中共中央也為此舉行了多次會議進行討論。陳伯達在談話中曾簡要談過一些有關的情況：

"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中國代表團是朱德、鄧小平同志率領的，代表團回國後，鄧小平向毛主席做了匯報，對赫魯曉夫的報告表示反對。毛主席在中央的會議上多次講話，對赫魯曉夫的報告進行了分析和批評。當時，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由我執筆，寫一篇理論文章，對無產階級當權以後的歷史經驗進行分析，闡明我們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文章的題目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分析斯大林的錯誤及其歷史原因，指出在無產階級當權以後，因缺乏經驗，黨在工作中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錯誤，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密切聯繫羣眾，遇事和羣眾商量，勇於進行自我批評，不斷糾正自身的錯誤；要防止執政黨脫離羣眾，防止出現官僚主義等錯誤傾向。這些論述都是我寫的。文章後面講斯大林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功大於過。這些對斯大林評價的文字，

是毛主席親自加上去的。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以後，過了幾個月，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是胡喬木寫的。那篇文章和我寫的這一篇在內容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陳伯達的文章的初稿於1956年4月1日寫完後，立即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連夜閱讀了陳伯達的初稿，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淩晨四時，給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寫了一便函：

少奇、小平同志：

社論已由陳伯達同志寫好，請小平於本日（二日）夜間即印成清樣約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給各政治局委員，各副秘書長，王稼祥、陳伯達、張際春、鄧拓、胡繩等同志，請他(們)於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請你們召集一次政治局會議(有看過清樣各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於四日上午修改完畢。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樣，由書記處再斟酌一下，即可發稿，爭取五日見報。目前有了這篇社論就夠了。

毛澤東

四月二日上午四時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59頁）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起初準備作為《人民日報》的社論，但後來是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於1956年4月5日發表時，毛澤東在標題下加寫了一句話："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這篇文章確實經過了政治局的討論和毛澤東的修改，然而它的主要作者是陳伯達。與這篇文章合稱為姊妹篇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同樣經過政治局的討論和毛澤東的修改，但這並不妨礙該文的主要作者胡喬木將其收入《胡喬木文集》中，不妨礙研究者將其

作為胡喬木的著作加以評論；同此道理，被人們簡稱為"一論"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亦屬陳伯達的主要著作之一。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寫道：

"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群眾的時候，他對於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這樣，即使像斯大林這樣傑出的人物，對於某些重大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

這些話出自陳伯達之筆。

陳伯達還談到了他整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的經過：

"《論十大關係》一文是我主動整理的。這篇文字原是毛主席1956年4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幾次講話。我當時覺得講話內容重要，但因為不是一天講的，次序上比較散亂，應當加以整理，使其成為一篇完整的文章。田家英作為主席日常的秘書有一份記錄。但那時田家英已擺起架子，不那麼好說話了。我就找彭真同志幫我借了一份辦公廳的記錄。我把主席的講話整理為十個內容，定名為《論十大關係》，對主席講話中的一些疏漏的地方，我做了一些補充，對他講到是我提出了'百家爭鳴'的地方，我沒有整理進去。文章整理好以後，我直接交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審閱以後，中央曾印發給黨內的高級幹部閱讀。這篇《論十大關係》是毛主席解放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1. 起草中共八大會議文件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這次大會通過了四個主要文件，即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新黨章。為了草擬

這四個文件，在大會籌備期間，成立了兩個起草委員會，即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和黨章起草委員會，分別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牽頭。如同其他中共中央文件一樣，這四個文件都經過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以及參加起草的所有人員的反復修改。但是，政治報告及其決議的起草工作，主要由陳伯達負責；修改黨章的報告及新黨章，主要由胡喬木負責，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在論及建國後黨史中的反面人物時，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的名字，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體現了當時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對待歷史問題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陳伯達在談論這個決議時曾十分明確地説過：

“沒有點我的名，有很多理由。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現在重新肯定了黨的八大。八大文件主要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發展生產力是主要任務的也是我。”

然而可惜的是，歷史問題決議通過之後的中共黨史工作似乎並沒有沿着決議的實事求是方向繼續向前邁進，而是逐步有所倒退。近幾年中共官方出版的一些黨史著作，在涉及八大的文件起草工作上，千方百計地避免提到陳伯達，而把四個文件的起草都歸功於胡喬木，這是對歷史事實的有意歪曲。

現今官方出版物所公開的有關八大的檔案材料是很不完全的，尤其是對直接反映陳伯達起草八大文件實際情況的檔案，官方盡可能加以隱瞞。儘管如此，中共官方的出版部門為了反駁《李志綏回憶錄》中説毛澤東對八大報告的起草情況一無所知的杜撰説法，仍披露了毛澤東對八大文件起草工作的若干具體指示。從目前已公開的這部分材料中，我們仍可以看出陳伯達與八大文件的不可分割的關係。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一書為了行文的需要，曾不得不承認，八大政治報告"最早的稿子是1955年12月寫出的，由起草委員會的成員陳伯達起草。"但該書沒有披露任何檔案（包括劉少奇12月15日對陳伯達初稿的批示在內），只是披露了1956年7月第一個修改稿寫出後與修改工作有關的檔案。這裏轉引部分材料如下：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閱後，即送少奇同志：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請伯達即行着手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樣於九月五日晚上送閱為盼！

毛澤東

三十一日三時

九月六日，毛澤東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

周總理及洛甫同志今日開始修改政治報告，請你與總理聯繫，或即與總理處合併舉行。

毛澤東

九月六日七時

九月七日，毛澤東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

"改造"、"建設"兩部分喬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須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務請你們在今日加班加點，請於今日晚上十二時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過，再送少奇看過打樣，於明日上午交付翻譯。我們請總理同時修改，請你與他聯繫，於晚上九時以前索取他的改樣，由你酌

量採取。頭三部分，今日也要爭取改好，我已（告）總理注意，改好後交你。

毛澤東

九月七日七時

九月八日，毛澤東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

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

請你將我準備講的那段話，加以修改，並請飭你的秘書給我抄正一張，於下午交我為盼！

毛澤東

九月八日八時

九月十日，毛澤東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

國家政治生活部分，請改時，請邀彭真、羅瑞卿、董老三同志參加，今日改畢，照前抄三份，分送劉、周及我。

毛澤東

九月十日五時

九月十一日，毛澤東致函劉少奇：

少奇同志：

你和周總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請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這些修改，請令人將這三個本子的修改處抄在一個本子上，並立即打清樣，付翻譯。總理改本，用後請送伯達。因為裏面有批語處，需請伯達再修改的。

毛澤東

九月十一日四時半

九月十四日毛澤東致函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

伯達、喬木、家英同志：

(一)"黨的領導"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計不會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還會有一些修改。我們都要睡覺。你們在上午十二時以前改好後，直接交尚昆付翻譯和付印。我們起床後再看改樣好了，(二)開幕詞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樣送你們，請再加斟酌，於下午交我為盼！

毛澤東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時

從上述已公開的材料可以看出，八大政治報告的修改工作是集體進行的，前後經過多位同志之手，但陳伯達仍對修改工作負總的責任，由他將各位同志的修改意見匯總後"酌量採取"，最後交由毛澤東審定。

從《中共八大史》一書附錄的《八大的籌備和大會日誌》中所記錄的情況中可以看出，胡喬木對政治報告並不承擔主要責任。現例舉該書若干條日誌如下：

一、1956年7月15日22時至零時4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八大政治報告第一次稿，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彭德懷、鄧小平、陳毅、陸定一、陳伯達、薄一波等出席會議。

二、7月27日15時40分，毛澤東在北戴河東浴場召開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劉少奇、彭真、鄧小平、王稼祥、陳伯達、陸定一、胡繩到會。

三、7月28日17時，劉少奇召集彭真、陳伯達、胡繩開會，談八大政治報告修改問題。

四、9月8日14時10分至45分，19時40分至20時20分，毛澤

東約陳伯達談八大政治報告修改問題。

陳伯達與胡喬木共同參加過多次討論政治報告修改問題的會議，陳伯達是每會必到，但上述四次與政治報告有關的會議，胡喬木沒有參加。

《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簡稱《八大決議》) 在所有八大文件中可以說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正是在這個決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從而把發展生產力的問題擺在了全黨工作的中心地位。決議中關於生產力的這句話乃是整個八大會議的精髓之所在。中共此後所犯的種種錯誤，正在於拋棄了這句話。目前官方故意把這一觀點的提出歸到與此觀點毫無關係、甚至並不贊成這一觀點的胡喬木的頭上。這是篡改歷史事實的。現舉出如下事實為證：

第一件事實：

1973年8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寫有如下部分：

> “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

這是明確指出陳伯達對八大決議負主要責任的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報告雖然把劉少奇的名字放在陳伯達的前面，但是劉少奇只承擔名義上的責任，而並不承擔起草的責任，這是人們都清楚的。王光美曾經講過，劉少奇當時只是匆忙地看過決議（參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譯本159頁）。同樣道理，林彪對九大報告稿

也只有名義責任，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稿林彪沒有看過(此點本書後文再作論述)。

周恩來所作的政治報告被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致通過。該次大會雖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召開的，但是作為正式代表出席大會的，有包括周恩來、鄧小平、朱德、陳雲、李先念、董必武等在內的眾多中共八大的領導人，他們對八大決議的情況都是很清楚的。鄧小平是中共八大的秘書長。陳雲是討論通過八大決議時的大會主持人。他們都沒有對周恩來政治報告中有關八大決議責任人問題的表述提出過異議。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們也沒有對八大決議的責任人問題提出不同的説法。

第二件事實，也是最重要的事實：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的董邊等編輯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收集了楊尚昆、胡喬木、逄先知等人紀念田家英的文章，這些文章一反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的有關精神，對陳伯達極盡辱罵之能事。其中，胡喬木的文章《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有如下一段極其重要的文字，不可不加以特別的注意：

"家英和我還從日常接觸中察覺，陳(伯達)在毛主席面前從不敢説任何不同意見，有什麼問題他都盡量讓我們説。這裏也有兩個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決議中塞進了一句'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事後大受指責；第二，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主張，當時就被毛澤東加以痛斥，並被樹立為對立面。這樣，我們就徹底認清了他的偽君子和假馬克思主義者的真面目。"(引文見該書123頁)

胡喬木在這裏例舉的兩件事中，第一件是真實的，因為胡喬木是八大文件的共同起草人之一，是文件起草過程的最知情者。他明確無誤地指出，八大決議中最關鍵的關於生產力的那段話出自於陳伯達一人。而且，胡喬木認為，此事是陳伯達獨自向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的特別重大的事情。尤其應當注意的是，胡喬木的這篇文章寫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而其發表則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十一年後的1989年12月，無論是文章的寫作時間還是發表時間，中共中央都已對八大重新作了肯定的評價。但是，胡喬木在文章中仍認為陳伯達寫進八大決議的論述是錯誤的,甚至還稱此事是使他和田家英認清陳的"假馬克思主義者的真面目"的主要理由。這清楚地表明，胡喬木本人從來沒有、也決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論述。即使該決議稿中真有胡喬木的字跡，他也僅僅只是筆錄了陳伯達的意見。

胡喬木在該文中清晰地寫道：陳伯達在決議中寫進有關生產力的論述，"事後大受指責"。表明他對陳伯達在決議通過的當年就受到了嚴厲的指責，此後更長期受到責難，始終是一個知情者和旁觀者。在從1956年起直到1992年胡喬木去世的三十六年中，胡喬木熟視陳伯達因此事"大受指責"，從來沒有認為這種指責有什麼不正確或不符實之處，只能說明胡喬木確實與這一觀點毫無瓜葛。胡喬木例舉的第二件事（即有關鄭州會議的事）卻是完全不真實的。這件事原是毛澤東出於轉移當時風向的策略而杜撰出來的，此事胡喬木並不在場，他只是出於相信毛澤東而相信了此事，所以他對這種荒唐的說法不負有責任。關於此事的真相，筆者將在後文澄清。

以上事實已經說明了八大決議的起草真相。那麼，當事者陳伯達本人又是怎麼說的呢？毛澤東究竟是否同意過八大決議中關於生產力問題的論述呢？毛澤東如果不同意，大會又是怎麼通過決議的呢？

陳伯達曾在1981年12月與筆者談了如下的話：

"我倒了以後，上面派人審問我時，問過我八大決議中關於生產力問題的那句話是怎麼寫出來的。我跟他們說，政治報告是在會議前起草的，經過了多次的修改；但是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則是在會議進行中起草的，所以搞得比較倉促。我在決議草案上寫上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但是我又覺得僅只是這樣的提法，有些太籠統，應該有一個概括性的提法。當時會議議程很緊，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決決議，我早晨還在考慮主要矛盾怎麼寫才好，我想起列寧有過一個提法，這個提法啟發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我向審問人員說明的這些情況，審問人員都做了記錄的。

"我修改好決議以後，已經來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間辦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經看過，這時已不好再去打擾他。這樣，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會上宣讀了，表決時大家都舉了手，就通過了。那天的會上，葉飛在主席臺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後面，我坐的位置是靠側面。會後葉飛告訴我，宣讀決議的時候，當念到'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句話時，毛主席說了一句：'這句話不好。'不過毛主席當時也沒有說應該怎樣才好，可能是來不及想，也就舉了手。葉飛講的情況應當是可信的，他當時坐的位置離毛主席很近。"

陳伯達講述的情況已經清楚地告訴人們：一、毛澤東在大會舉手表決《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之前沒有看到該決議最後的修改稿；二、

毛澤東在聽到宣讀決議時，對陳伯達寫進決議中關於生產力的那句話，確實曾當場表示不贊成，但是他沒有來得及表示應該怎樣，並且同其他人一樣舉了手，使決議得以一致通過；三、在決議中寫進關於生產力的那句話，以及造成毛澤東沒有來得及看到決議最後的修改稿，其責任全在陳伯達一人，與其他人沒有關係。

另據王光美寫的一篇回憶文章，八大閉幕後的第三天，在十月一日國慶日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八大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錯誤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劉少奇回答：但是決議已經通過了。

王光美的回憶同陳伯達所述的毛澤東在決議通過的當時就曾表示不贊成決議關於主要矛盾的論述的情況，是比較一致的。所以，近年來一些書刊中說毛澤東是在八大閉幕兩個星期後才表示不贊成決議中的提法，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1957年9至10月，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正式表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觀點，他在向大會所作的工作報告中說："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

從此，陳伯達寫進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論述，被正式否定了。

對於中共八大決議中這個被否定的論述，無論是當年會議文件的主要起草人陳伯達和胡喬木，還是八大文件的主持人兼十大政治報告的審定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一致認定陳伯達是唯一責任人。此事本來十

分清楚。可是胡繩等人偏偏要在知情人均去世之後無事生非，說什麼八大決議是“懸案”，叫嚷“決議是誰作的？誰的主意？”都“不得而知”(參見《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載《“八大懸案”釋疑》一文)。

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選舉中，陳伯達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八屆中央委員的名單是按得票多少為序排列的，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筆劃排列，這種排列方式在中共執政後的歷次代表大會中是唯一的一次(以後歷屆中央委員的名單均按姓氏筆劃排列，只有中央候補委員的名單按得票多少排列)。在九十七名中央委員中，前十五名依次是：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鄧小平、朱德、周恩來、董必武、陳雲、林彪、吳玉章、陳伯達、蔡暢、李富春、羅榮桓、徐特立。陳伯達排在第十一位，高於他當時在中央的實際地位。所以，現今有些中共八大成員的回憶錄往往稱自己如何如何很早就反對陳伯達，恐怕多數是靠不住的。[1]

12. 1956年底的故鄉之行

中共八大結束以後，1956年10月，陳伯達開始了他解放後的第一次故鄉之行。陳伯達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瞭解實行合作化以後農村各方面的情況。他選擇福建作為深入瞭解農村情況的重點地區，跟他熟悉閩南話，可以和當地農民直接交談，容易瞭解到真實情況有關。在福建期間，他還順便回故鄉惠安縣梅嶺村探望了家鄉的父老鄉親。

關於這次故鄉之行，陳伯達回憶說：

[1] 在本章已完稿數月之後，筆者看到了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其中第535頁寫道：八大結束前，“有一項重要議程，就是通過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第537頁又指出，決議對主要矛盾的概括寫法，“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這總算是給了歷史一個比較清楚的交代。

"解放後我第一次回福建，主要是根據福建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到福建調查瞭解農村的實際情況，我重點調查了南安縣的幾個合作社。1957年初，我曾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反映農業合作社的一些情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這封信中央曾批轉給各地領導作參考。"

陳伯達去世十年之後，《福建黨史月刊》曾刊登過一篇文章，記述了陳伯達此次回閩之行。現將該文有關陳伯達到蓮塘鄉蹲點的部分段落摘錄如下：

> 蓮塘鄉共有蓮塘、崎峰、貴峰、鎮山等幾個高級社，蓮塘社共1276户，其他各社也都有三四百户，規模都很大。在蓮塘，陳伯達與農民"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吃的是地瓜稀飯，住的是石頭房，至於勞動，因為陳伯達是個讀書人，從小就沒有參加過農業勞動，他說："我別的沒本事，參加積肥吧。"
>
> 於是，在蓮塘的鄉間小道上，就出現了一位身穿棉襖，手拿竹夾、肩挎畚箕的老農。
>
> 陳伯達一邊撿豬、牛、狗屎，一邊走村串户瞭解情況。當時的閩南人普通話講不準，意思表達也不很清楚，與外地幹部交流不甚順暢。陳伯達是閩南人，佔了語言的便宜，所以老百姓都願意找他們談。
>
> 有一次在路上，陳伯達遇見一個老頭子，詢問之下，知道他是崎峰合作社的，老人告訴他："那裏的幹部變得不好。"
>
> 陳伯達問："為什麼不好？"
>
> "這幾年權在他們手裏，要錢隨便去拿，要向銀行、信貸社拿多少，就拿多少，你們查查看，拿兩三百、三四百的，不少。"老人越說越激動。
>
> "拿"陳伯達一時弄懵了，天底下哪有這等好事，可以隨便向銀行拿錢？
>
> "說是借，實際上不準備還，也很難還。他們不還，其他農民當然看

樣。"

"他們借了錢做什麼用？" 陳伯達又問。

"吃煙灑，早上吃好點心，做好衣服。他們認為社會發展了，財產有無不重要，因此，就胡亂花。"

聽到老農反映的這個情況，陳伯達不禁聯想起在惠安老家見到的幹部情況，他決定要摸個水落石出，他馬上向南安縣委的同志瞭解情況，縣委同志說，幹部欠信貸社、欠國家貸款、預購款的很多。

他還瞭解到社員對合作社幹部的補貼問題意見很大。當時在晉江地區，社幹部的工分補貼普遍偏高，佔到全社工分總數的5－6%，甚至達8%，遠遠超過合作社示範章程規定的限度。……在田間，陳伯達同兩個勞動力都強的社員談話，他們說，我們拼死拼活，一年也得不到3000工分，陳伯達問："給社長3000工分是否適宜？" 他們低頭不答。因為蓮塘合作社社長作風好，工作能力也強，是得人心的，就因為工分補貼達3000分，社員對他有意見。

1956年夏，閩南鬧水災，蓮塘鄉是重災區，政府撥了幾次救濟款，大多數村沒有公佈救濟款數目，不在群眾中評議，而只由幾個幹部決定，或者只在黨團員中商議，結果是幹部拿的多，社員拿的少，有個幹部三代化名（父親、本人、兒子）分批拿到救濟款。……水災後有些幹部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他們除了得到救濟款外，還可以貸款，因此買好東西吃、做新衣服穿、蓋房子，有的準備娶老婆，群眾說他們是"遭了災，發洋財"。幹部們如此濫用救濟款，加深了社員對合作社賬目的懷疑，社員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陳伯達他們到長埔、旗山、貴峰時，都因此被群眾包圍起來，大家的情緒是激憤的。

在調查中，陳伯達還瞭解到有些幹部貪污公款，如長埔有個會計原先生活與大家差不多，當了會計後，做花被，戴手錶，還有派克筆，留

碧機，查其賬目，才知道在1956年初級社時，貪污270元，蓮北一個老合作社社長也貪污公款130多元。除了貪污款項以外，還有一些社和隊的幹部沒有向群眾公佈具體的誤工事項，而隨便記下自己的誤工數。也有的記工員偷記工分。

所有這些問題，儘管很具體瑣碎，但卻實實在在損害到社員的直接經濟利益，也就成為合作社是否鞏固的大問題。有些社員鬧退社，並不都是因為收入減少，而是因為幹部的問題。因此，陳伯達認為："調整幹部和群眾的關係，正確地處理這種人民內部的問題，在鞏固合作社制度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上，具有第一位的意義。"

陳伯達抓住工分補貼標準和救濟款問題，沿用過去發動群眾大辯論的辦法，開展了一場"民主運動"。各合作社先後召開群眾大會，群眾踴躍發言，揭發幹部中存在的工作和作風問題，大部分幹部作了自我檢討，表示願意降低工分標準，退出未經群眾評議而私自接受的救濟款。

陳伯達在1957年1月7日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了一些符合實際的建議：1、在現有手工耕種的條件下，十幾戶的小隊組織，一般地是比較合理的。2、社的組織一般地也不適宜太大。3、不論社的大小如何，把副業過多地歸社集中經營，也是不適當的，應該有大公經營、小公經營、個人家庭經營的互相配合。

除在蓮塘蹲點外，陳伯達還到過惠安、晉江、廈門等地，實地瞭解十幾個合作社，他發現某些國家專業機關把某些任務規定得太死，甚至有時佈置的任務就是根本錯誤的，結果影響了農作物的產量。

對此，陳伯達向中央建議：給合作社適當的自治權利。他認為這樣做"可以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可以使我們的許多工作更加符合實際，因而也就可以使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更加融合起來"。

另外，根據朱地著《1957：大轉彎之謎——整風反右實錄》一書記

載，陳伯達給黨中央的報告還這樣寫道：

> 農村幹部不但握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經濟權力，諸如產品分配權，財政、貸款、預購款的管理、支配權等等。一些幹部不能正確運用這些權力，嚴重脫離群眾，為了自私自利的企圖而濫用權力，違反黨的政策，生活、思想蛻化，引起群眾的反感。……群眾還反映，鄉社幹部是"官官相衛"，有的幹部明說："我們幾個幹部屁股相向，就不怕群眾"，"什麼人浮上來，就把他打下去"。

陳伯達寫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信，清楚地反映了他對部分幹部嚴重脫離羣眾、享受種種特權的現象所持的反感態度，反映了他對這種不良現象的發展趨勢給黨造成的危害十分擔憂，從而提出了"調整幹部和羣眾的關係，正確地處理這種人民內部的問題"的意見。同時，陳伯達在信中也對農村經濟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這封寫於1957年1月的報告信，對於瞭解陳伯達本人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陳伯達每當幹部與羣眾發生衝突時，總是對羣眾一方持同情的態度，而對幹部一方持批評的態度，其根源就在於他曾多次到農村和工廠搞過蹲點調查，對幹羣關係有比較直接的瞭解。但是，也正是他這種遇事總是同情羣眾一方的態度，使他和一些黨內高級幹部的關係出現了某些不融洽的情況。

陳伯達1956年秋回鄉以後，經劉叔宴的安排，我和兩個妹妹一起隨她於年底啟程，第一次回福建老家。沿途我們在杭州、鷹潭停留數天。當時鷹廈鐵路還沒有完全建成，福州更是不通鐵路。我們在鷹潭換乘汽車時，恰巧碰到福州部隊的韓先楚同志在此換火車北上，他指示部隊派出兩輛吉普車送我們到南平。在南平我們改乘小客輪順閩江南下到福州。

當時的閩江，江面寬闊。水勢浩大，江上魚帆點點，間有小輪船

穿梭往來。夜間航標燈閃閃爍爍，與天上的繁星相輝映。白天則看到兩岸山林蔥郁，橘樹繁茂。我們三個小孩子一邊賞景，一邊不時聽到叔宴媽媽讚歎："真不愧是'閩江兩岸橘子紅'啊！"

那時江上的美景確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1991年我送父親的骨灰回家鄉，也即是我第二次回福建時，在火車上觀看到的閩江景象卻是：江水乾涸如小溪，魚船輪船皆不見。雖然兩岸簡陋的茅屋減少了，但是環境的破壞卻也是嚴重的。看了真使人有今昔滄桑之感。

在福州停留幾天後，我們即到泉州與陳伯達會合。在泉州住了半個多月，陳伯達帶我們回到福州，居住在葉飛家旁邊的一座小樓內。在福州期間，陳、葉兩家人時有來往。

這次我隨家人一起回福建，雖然還不滿十一歲，但也目睹了陳伯達與普通百姓接觸的情景。陳伯達有時領着我在街上隨處走走，記得一次在一個工藝品小店駐足良久，一個師傅聚精會神地雕刻圖章上的小獅子，工作臺上還擺放着幾件其他作品。師傅刻畢，陳伯達詳細詢問了他的收入情況。

1956年陳伯達在回鄉期間，還動員自己的親人把祖上遺留的大批古籍文物捐獻給福建省圖書館等文化單位。1957年1月15日《福建日報》第2版曾報導過有關消息。另外，2002年12月出版的《惠安文史資料》第16輯刊登鄭洪金的文章，其中說道："我在文教科工作時，1951-1952年初，科裏連續接到兩批圖書，是陳伯達寄來要轉給他的家鄉梅嶺小學的，每批一大包約200冊左右……當時《福建日報》、《廈門日報》都有陳伯達關心家鄉教育贈送圖書的報導。"

13. 對“反右運動”持保留看法

1957年2月初，陳伯達帶領全家離開福建，先從福州乘汽車到鷹潭，再換乘火車，在杭州、上海稍事停留後，於春暖花開之時返回北京。

1957年是一個多事之年。這一年發生了眾所周知的“整風反右運動”。也許是因為陳伯達在福建耽擱了一些時間，其後又忙於整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並準備11月莫斯科世界各國共產黨會議的有關文件，沒有參與最初的幾次中央會議；也許陳伯達本來就是一個黨內多少有些同情“右派”的人士；連他本人年初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信後來都曾被一些人視為有“右派”的味道；陳伯達這一年的相關資料是很有限的。雖然現今有些人習慣於給陳伯達戴上“極左”的帽子，毛澤東本人卻認為陳伯達實際上屬於“極右”，“文革”中期的“批陳整風”又稱“批修整風”，陳伯達的名字最終與修正主義成為同義詞。而且，至今人們沒有看到陳伯達專為“反右鬥爭”寫過什麼文字，不像黨內另一位理論家胡喬木，曾為《人民日報》寫下了《是不是立場問題》、《不平常的春天》、《鬥爭正在開始深入》、《在朋友問題上駁斥右派》、《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等一系列反右社論。當然，陳伯達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做出的反右決策提出異議，他沒有超越時空的見解，他僅只是一個消極份子而已。

陳伯達回憶1957年的情況時，這樣談道：

“這一年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我覺得毛主席的提法與我一月份寫給他的信中提出的‘調整幹部和羣眾的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的提法是有聯繫的。毛主席在‘人民內部’後面加了‘矛盾’兩個字，比我的提法更明確、更理論化。毛主席的這個講話也主要是由我整理的。”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358至359頁的注文，毛主席於5月10日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第一次修改稿上批示："印小型12份，大型三份，連原稿送來。版留。""請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見，交陳伯達同志匯總修改。毛澤東五月十日"。這段注文印證了陳伯達的回憶是準確的。

在該書第499頁還有一篇毛澤東親筆寫的有關文件，全文(包括注釋)如下：

在陳正人[1]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三稿的意見信上的批語(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陳伯達[2]同志:

此件[3]請參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時交我也可以。

毛澤東六月八日

根據手稿刊印。

中央文獻研究室在毛澤東批示後面加寫的注釋[3]說明，由陳伯達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的原始文字強調了"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換句話說，"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這句話原出於陳伯達的手筆，反映了陳伯達本人的思想認識。後來定稿中的"但

---

[1] 陳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2]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

[3] 指陳正人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寫給毛澤東的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三稿的意見信。信中建議在稿中'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這一句前面加上'革命時期'四個字。並說，'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兩個革命——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勝利，革命（社會改革）已基本結束，我們已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但階級鬥爭仍然存在。這種鬥爭，不但表現為長期的思想上的鬥爭，也表現為政治的及其他形式的鬥爭(如經濟的)'。後來公開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採納了這一建議"。

階級鬥爭仍然存在，這種鬥爭不但表現為長期的思想上的鬥爭，也表現為政治的及其他形式的鬥爭"等論斷則出自於陳正人提出的修改意見，並為毛澤東所肯定和採納。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陳伯達與毛澤東和陳正人在對階級鬥爭問題的認識上是有些差別的。

毛澤東在1957年3月10日的一次座談會上提到了陳伯達回福建的事。毛澤東說：

"……你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自己檢查出來，把它改了，以後就不追究。不久以前，陳伯達同志回到他的家鄉福建搞基層選舉，就是這樣的。有些幹部貪污了，叫他把錢吐出來，向群眾認錯，结果群眾批评了他之後，幹部仍舊當選。這個經驗很好。"

毛澤東講的這個事例說明陳伯達主張整風應當是和風細雨地進行的。

陳伯達談到整風開始以後的一些情況：

"我的印象，整風開始以後，李維漢代表統戰部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民主黨派中一些人的發言，認為這些發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錯誤的。統戰部的報告對毛主席有較大的影響。後來民主黨派互相之間也出現矛盾。黃炎培給我打了個電話，要求約我談話。我過去沒有單獨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談過話，這件事我自己不能做主，就去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說：'你可以和他談，但時間不要太長了'。黃炎培主要和我談了章乃器的一些情況，對章乃器很有意見。談話以後我向毛主席做了匯報。"

"當時，北京大學也出現了許多大字報，新華社和北京大學黨委向中央反映，認為情況嚴重，說是北大已成了海德公園了。毛主席叫我去看一看，我就去看了。其實，學生的大字報就是給學校黨委和領導提了一些意見，沒有什麼不得了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回來以後我向毛主席談了我的看法。"

關於陳伯達去北大看大字報這件事，毛澤東在1959年2月2日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曾這樣談到過：

"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報導北京大學問題，說是右派猖狂進攻，鬧得很厲害。陳伯達去看了，不是那麼了不起。"

英國學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譯本第348頁也述及這件事：

"擔心又一次五四運動的爆發使政治局的多數人確信有必要進行反擊，毛可能一直認為這樣的擔憂是毫無根據的。陳伯達參觀了北大校園，斷言新華社關於那裏的騷亂的秘密報導是言過其實。"

上述情況表明，陳伯達當時確實對中央以及新華社一些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持不同看法，認為並沒有出現什麼嚴重的情況。

陳伯達談了整風轉變為反右以後的情況以及他個人的一些看法：

"當時，陳嘉庚先生對一些人提出輪流坐莊也是反感的。應當說，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總的來說，當時一些領導同志對情況的估計超出了實際。在反右開始以後，僅憑在整風中有一些言論，有些還只是一時看來是錯誤的言論，而不看一個人的一貫表現，就都定為右派份子，這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後果。

"中央當時做出反右的決定，與那個時期的國際形勢也是有關係的。1956年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給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印象是深刻的，擔心中國有可能發生同類事件。同時，由於在各地的整風中還出現了一些反對蘇聯的言論，蘇聯方面提出質問。這些情況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策都是有影響的。所以，黨的決策發生錯誤，也是有歷史背景的。

"我參加過鄧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他在那次會上

對各地的領導人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當時很驚訝，怎麼會'時間比金子還寶貴'呢？人總是會說錯話的，這樣抓緊時間去專門收集言論，牽涉的人就多了。所以，反右後來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是有很大責任的。"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報告對整風和反右做了全面的論述，並首次將知識份子"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說"，提出"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知識份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他們還有政治地位、政治資本和政治影響，而無產階級也需要他們的知識。但是如果他們不堅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同無產階級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該報告全文發表在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的第一、二、三版上，隨後印成單行本發行，供中共黨員和廣大羣眾學習。這篇鄧小平五十年代公開發表的著作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中。

出於對反右運動持有保留看法，1957年陳伯達沒有在反右問題上專門寫過文章（在公開場合他仍和中央保持一致）。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也主要是由田家英整理的。毛澤東的這篇講話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了"牛鬼蛇神"一詞。

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氾濫。"

"牛鬼蛇神"一詞出自唐朝杜牧《李賀集序》。用以專指壞人壞事，大概始自清代。毛澤東使用此詞，不僅沿用舊義，還指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和事。當然，不只毛澤東個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

人也使用這個詞。鄧小平1966年5月6日在上海歡迎謝胡的大會上譴責美帝蘇修"正在聯合一切牛鬼蛇神，拼湊一個反革命'神聖同盟'"。劉少奇同年6月13日在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報告時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周恩來6月27日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在地拉那大會上鄭重講道："目前，我國的億萬工農兵羣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中共領袖的領導、薰陶下，風氣所及，陳伯達、郭沫若等文人也用了這類詞語。陳伯達在6月1日社論中搬用了5月中旬各報刊用過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郭沫若也曾填詞《水調歌頭》："創造上層建築，掃蕩牛鬼蛇神，除去害人蟲。"不過，別人使用此詞都沒事，唯陳伯達使用卻是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足見特別法庭是如何的"特別"。

1957年11月，陳伯達隨同毛澤東，與鄧小平、宋慶齡、彭德懷、烏蘭夫、郭沫若、楊尚昆、胡喬木等一起到達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和六十四個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陳伯達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莫斯科宣言》的起草工作，並為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會上的發言做了參謀工作。陳伯達認為這次莫斯科會議基本上是開得比較順利的，會議緩解和消除了各國黨之間的一些分歧，使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得到了增強。

14. "厚今薄古"問題

1958年又是一個多事之年。

這一年3月10日，陳伯達應郭沫若的邀請，在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講了一次話，題目是《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這個講話當

時引起過討論，但不久就平息了。再度引起一些人做文章，則已過了約四十年。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的呢？

陳伯達本人是這樣回憶的：

“1958年3月我在科學規劃委員會的會議上講了厚今薄古的問題。話是我去講的，無論對錯，都應由我負責。至於當時為什麼那樣講，當然也不是我自己擅自決定的。我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向社會科學界傳達毛主席的觀點。我講話時沒有做什麼準備，講得很倉促，所以講得很不全面，引起一些人的誤會，這是我的責任。我本來是講在社會科學研究力量的安排上，要以研究近現代的問題為主，要‘厚今薄古’，結果下面到處都提‘厚今薄古’。後來我有一次下鄉，在一位老鄉家門口看到一幅對聯，豎聯的文字已忘記了，橫批是‘厚今薄古’。我感到荒唐，一個農村人家，搞什麼‘厚今薄古’，簡直莫名其妙。所以我後來寫了一篇《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在《紅旗》雜誌1959年第13期上發表，強調對傳統文化還是要繼承，實際上就是對我那次講話做一些糾正。

“我覺得‘厚今薄古’還是有道理的。過去研究古代史的人很多，研究近現代史的人不多，好像研究的問題越古，就越有學問。這個風氣不好，對社會科學的發展不利，對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利。中國很落後，幾千年來文化人中的大多數都是看重古代，好古成風。我過去就是研究古代問題的，三十年代我在北平中國大學就是講授先秦諸子。但是，大家都看重古代的問題，不去研究近代和當代的問題，這或許也是中國長期落後的一個原因。譚嗣同就看出了這個問題，在《仁學》中說：‘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動輒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棲心於榛狉未化之世，若於今熟視無睹也者。’1933

年冬，我在北平西郊養病時，讀《仁學》，就曾對譚嗣同的這段論述有所感觸。所以，1958年的時候，我覺得毛主席關於應當厚今薄古的觀點還是符合中國的情況的。”

陳伯達與筆者談話時沒有談論毛澤東提出這一觀點的具體時間和背景。筆者近年看到一本毛澤東的文集，裏面有毛澤東1958年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其中說道：

“有一個朋友說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幾句話恰說到好處，‘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麼大，喜什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裏只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個人突出，是否搞主觀主義，還是合乎實際，可以達到平均先進定額。過去不輕視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國的好東西要學，應該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北京拆除城牆時，陳伯達、康生是持反對意見的——引者附注)。‘迷信將來’，人人都是如此，希望總是寄託在將來。這四句話提得很好。”

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提出：“過去不輕視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已經寓含了“厚今薄古”的觀點。一個多月後，陳伯達在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發表了《厚今薄古，邊幹邊學》的講話。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肯定了陳伯達的講話，以後又在5月份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稱讚了范文瀾寫的《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該文原載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報》)。范文瀾的文章實際上有許多話說得比陳伯達的更重些。

儘管受歷史的局限，陳伯達、范文瀾當年的言論在今天看來有其時代鑄就的片面和錯誤的一面，但平心而論，厚今薄古不只是譚嗣同等清末維新派人士和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觀點，五四運動以來凡是希望中國盡快富強的人士，大多數都是主張厚今薄古的。

正因為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中，厚今薄古是眾多期盼中國早日富強的知識份子的共識，所以當陳伯達提出這個觀點以後，歷史學家郭沫若、范文瀾、陳垣、侯外廬、呂振羽、劉大年、蔡尚思等都曾表示贊同(參看1958年第5期《歷史研究》）。即使在‘文革’結束之後，復旦大學的蔡尚思教授仍在文章中表示他堅持認為厚今薄古的觀點是正確的。

當然，厚今薄古提出後，確實曾引起過一些誤解，出現了一些錯誤的傾向。為此，陳伯達坦率地做了自我糾正。他在1959年《紅旗》第13期上發表的《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裏強調地說：

> “有人曾經認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對歷史遺產、文化遺產採取粗暴的態度，這就完全不符合我們原來的意思了。……在無產階級當權以後，接受文化遺產，依然是無產階級的重要任務，那種否定人類過去一切有價值成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很有害的。”

15. 人民公社產生的經過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後，中國大陸開始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指引下的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談及這一時期的有關情況，陳伯達曾這樣說過：

“‘人民公社’這件事是與我有些關係的。那時，許多地方出現了羣眾積極踴躍參加經濟建設的情況。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辦起了工業。例如湖北就有這方面的事例。當時，這些工廠純粹是自發辦起來的，他們自認只是‘小小工廠’。

"又搞農業，又搞工業，這件事啟發我想起恩格斯的一個著名的論點。例如，恩格斯說：

'……用整個社會的力量來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一種全新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新人來。'

'教育可使年輕人很快就能夠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據社會的需要和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

'……從事農業和工業勞動的，將是同樣的一些人，而再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12頁）

"我想，既然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夠同時又搞農業，又搞工業，做到'亦農亦工'，或'亦工亦農'，而僅署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似乎不能完全反映實在發生的情況。於是我冒昧在一篇《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短文中說這'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我原來的設想就是這樣。

"毛主席實地考察了河南七里營，據報導，當時他在那裏回答問題的時候表示：'人民公社好'。於是，'人民公社好'這句話就這樣傳開了。"

陳伯達提到的《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發表在1958年7月1日《紅旗》第三期上。

認真查閱史料，可知陳伯達的上述談話只反映了事情的一個側面，而並不是事情的全貌。他這樣說的時候，正值中共中央已經取消了農村所有的人民公社（事實上取消，依照法律，1982年修改的新憲法仍有人民公社的條文，直到1993年修改憲法時才取消），而他對當時不論各地區各公社的具體情況都一刀切地加以取消的做法並不完全贊同。陳伯達認為，當年的人民公社主要錯在大辦公共食堂、追求糧食產

量高指標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農村既搞農業也搞工業，辦起了社隊企業，卻並沒有什麼錯。現時稱道的鄉鎮企業，其前身正是人民公社中的社隊企業。

陳伯達是一個有謙沖自抑性格的人，對於他所忠誠服務過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錯了的事情，寧願主動攬到自己頭上。作為自幼飽受儒家倫理道德薰陶的人，他的這種做法是不足為怪的；何況是對現時的中央認定為全錯，而自己的心裏還有所保留的事情呢？

關於人民公社的產生經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參與撰寫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有較為詳盡的記載，現將該書下卷第731－733頁有關內容轉錄如下（引文括弧裏的"作者注"均為原書作者注）：

"少奇同志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的一段回憶和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介紹了中央領導同志最早關於這個問題的醞釀情況。

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

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裏（鄭州火車站），跟吳芝圃（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同志談過。在廣州開會（少奇等同志去廣州向毛主席匯報八大二次會議準備情況，時間估計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一階段為後一個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学校，學

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大概有十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採取的辦法也很快（吳芝圃插話：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社合併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了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後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為當時天津市屬河北省，是河北的省會——作者注）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裏邊講了這個東西。

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的日期，是5月19日，題目叫《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18日晚，他在推敲經大會秘書處已經鉛印好的發言稿時，在結尾的部分，新加了這樣一段話：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超過。我們的教育方針和其他教育事業，也將朝這個目標發展。

雖然陸定一同志這段話也包括着少奇同志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34－735頁又有如下記載：

"6月14日，少奇同志同全國婦聯黨組談話，提出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意見，要求在農村大辦公共食堂、托兒所和敬老院。30日，同《北京日

報》編輯談話，提出三四十年即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就要開始試驗。

6月間，一些地方出現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浙江省諸暨縣城南鄉6月中旬成立一個大社，叫"紅旗共產主義公社"。成立過程大體是這樣：6月13日，城南鄉黨委書記丁祖銘，參加全省三級幹部會議，聽到省委書記處書記林乎加在報告中講到每個縣可以搞個把共產主義雛形的鄉、社。回來後，經鄉黨委討論，同意試辦公社，立即動員全鄉4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寫申請書，接着就制定規劃，宣佈公社正式成立。6月底，在遼寧省安東縣的前陽地區出現了一個"前陽公社"。這個公社由原前陽、新安等5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而成，共有13000多户，72000多人。安東地委和安東縣委在這裏進行"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試點。

……

以上情況都是在陳伯達7月1日發表《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之前發生的。薄一波的書第736-737頁又寫道：

"前已提到，陸定一同志在1958年4月底在去廣州的火車上，接受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的任務後，回到北京即組織中央宣傳部的同志全力突擊，6月間初稿編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條語錄，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概況的幾段話。這條語錄就有兩個地方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這部書的編出，對毛主席最後決定把新合併起來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看來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因此，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向與會同志一再推薦這本書。

7月1日，《紅旗》第3期出版。上面有陳伯達的短文：《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讚揚湖北省鄂城縣旭光農業社'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

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他借題發揮，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稱。

後來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談到人民公社的起源問題時，陳伯達也有一段回憶。他說：人民公社，我沒有感性知識，主席要我們到天津(當時河北的省會)去，到天津後，跟安國、徐水、定縣、正定幾個縣委的同志談了一下。安國的同志說過這個問題：他們有5萬畝窪地要搞成稻田。他們說，既然調了很多勞動力，大家協作，把窪地變成稻田，就不如搞一個大社。

6月底7月初，晉、冀、魯、豫、陝五省和北京市在鄭州召開農業協作會議。譚震林同志在結論中講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變革問題，第一次把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衛星農業社稱為'共產主義公社'。他說：'農業大豐收，在農村已開始了新的變革，在合作社組織上和合作社的經營管理上，規模上開始了變革，它已經不能按照原來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那一套形式來發展了，需要有所改變了。''像遂平縣嵖岈山衛星社已經不是農業合作社，而是共產主義公社'。'華東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合作社需要過渡，由現在的狀況過渡到更高級。辦法是直接到國營農場，……有些地方搞公社，……大概是一萬戶左右。'會後，他把嵖岈山衛星農業社的幹部找去鄭州匯報，並向他們講了一番辦公社的道理。1961年3月19日，譚震林同志在廣州中央會議上作自我批評，談到在鄭州的言行時說：當時'這些話，雖然講是建議性的，實際上否定了高級社的一整套經營管理制度。萬戶大社的思想已經產生了'。"

上述從薄一波著作中引錄的文字基本講清了有關"人民公社"的概念產生的具體過程，即早在1958年4月底，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等就在火車上醞釀了公社，並在鄭州火車站與吳芝圃談話，讓他在

河南搞試驗。5月19日，陸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根據此前毛澤東和劉少奇所談的意見，正式提出了要將"共產主義公社"作為我國農村發展的目標。6月份浙江、遼寧已經出現公社。隨後譚震林於6月底開始在河南具體指導辦公社。而陳伯達7月1日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是"借題發揮，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稱"。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在全國興起大辦公社之風，是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其後，全國各地貫徹執行北戴河會議的決議，開始大辦公社。

北戴河會議是大躍進時期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會議。當筆者向陳伯達詢問此次會議的情況時，陳伯達回答道：

"我當時雖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並沒有接到出席會議的通知，因此我沒有出席北戴河會議，更沒有參加起草《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我當時正在北戴河，可是中央沒有讓我參加會，對此我也覺得很奇怪。"

北戴河會議的決議是由譚震林同志主持起草的。人民公社在其興起的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謬誤，應當說都和這個決議的一些具體規定和提法有着不解之緣。

這就是人民公社產生的實際經過。

如果要說陳伯達在這一過程中有什麼自己的作用的話，那麼只有一點，即他第一個在公社這個名詞前面加上了"人民"二字，稱之為"人民公社"。此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等人早已提出"公社"的概念，浙江、遼寧、河南等地也已出現了"公社"的組織，但他們使用的名稱都是"公社"或"共產主義公社"。陳伯達則在《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裏使用了"人民公社"這個名稱，用以稱呼那些羣眾自發創辦的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生產組織。這一名稱被中共中

央和毛澤東所看中，認為它比"共產主義公社"等名稱更適合於中國。中共中央對這個名稱做了新的解釋，給它加上了陳伯達文章所沒有的"一大二公"等新內容。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建議之權。"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人民公社是人民羣眾發明的，他只是做了建議推廣的事。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沒有要將發明權歸給某一個人的意思。現在有一些書誤解了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

這裏還應澄清一個問題，即有些書照抄一些所謂紀實作品，說什麼陳伯達在7月1日文章發表前，曾在河南提出並大社，改名叫人民公社。這是違背事實的。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決定創辦《紅旗》雜誌半月刊。6月1日《紅旗》發表創刊號，作為總編輯的陳伯達忙於這個誕生期的半月刊的編輯、組稿等工作，在6月和7月他都沒有離開過北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收錄的毛澤東致陳伯達的信件和批示說明了這一點。1958年5月24日、6月4日、7月3日、7月7日、7月30日毛澤東致陳伯達的信都是談《紅旗》刊物的事項。6月12日毛澤東批示陳伯達，要求他為研究馬克思主義"而去跑圖書館"。這也是指北京的圖書館。6月23日毛澤東致函陳伯達："請約定一、康生、喬木、胡繩、鄧力羣、田家英幾位同志，將此期第一篇(指新華社《內部參考》第2510期刊載的《各地對少奇同志報告學習和討論的情況》一文)所列問題，主要是八、九、十節的問題，當場看一遍，當場逐個問題進行分析，有四、五小時也就可以了，然後和我談一次為盼！"此事也只能在北京進行。顯然，陳伯達在6月和7月沒有分身去河南的條件。

陳伯達後來去過河南，但那是10月19日毛澤東寫信要求他去的，時間已在8月北戴河會議通過人民公社決議之後一個多月。毛澤東在信

中還特地加寫了一句"到鄭州時，最好能請史向生同志和你們一道去衛星社。史對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過衛星社。他是省委書記。"毛澤東如此詳細介紹史向生，說明陳伯達不認識這位省委書記。陳伯達如果在7月以前就去過河南，他能不認識這位對人民公社有研究的省委書記嗎？

毛澤東在1960年6月16日寫的著名的《十年總結》一文中這樣寫道：

"一九五八年五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善的總路線，並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年八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掛在河南新鄉縣七里營的牆上的是這樣幾個字："七里營人民公社"。我到襄城縣、長葛縣看了大規模的生產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紅旗》編輯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縣委、瑯岈山鄉黨委，會同在一起，起草了一個瑯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這個章程是基本正確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並舉，亂子就更多了。"

這一段話是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運動興起過程的概括。文中提到的李友九，因與陳伯達意見不合，後調農業部工作，任副部長。

16. 鄭州會議

陳伯達談到了1958年的鄭州會議及其前後的一些情況：

"1958年10月，毛主席寫信給我，要我與張春橋一起到河南省瑯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去看一看。我跟張春橋並不熟，但既然毛主席要他和我同行。我只好按照毛主席的安排，與張等一起到了河南。

"到瑯岈山后，才知道去那裏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一塊麥地，據說特別高產，麥子早已收光了，有些熱心的參觀者在那塊地裏挖一把土，帶回去做紀念，或是作為研究的對象。我們剛到時也弄不清其中奧

妙。過了幾天，有一個老頭子悄悄告訴說，那塊麥地是有人在夜裏把其他田地的麥子搬來堆成的。麥子已經收割光了，事情涉及的人又多，我們初來乍到，要把情況搞清楚還需要些時間。當地幹部看出我不高興，問我有什麼意見，我一時還說不出什麼，先批評了他們在伙食上對我們的特別招待。不久，毛主席來電話說不要呆太久，要我們去鄭州開會。我們一行人幾天後就匆匆離開了。

"我們離開公社先到了遂平縣城，當晚一些縣幹部和我們聊天，有一個會計說：'我們這裏出沙子，現在我們用沙子到武漢去換機器，大家說這是產品交換。' 他的說法我以前沒有聽說過。

"到鄭州後，我們幾個人一起去見毛主席。在正式匯報前，作為閒聊，我說了遂平縣那個會計把沙子交換機器叫做'產品交換'一事。毛主席一聽，馬上插上我的話說：'你主張產品交換，不要商品交換了？'

"其實，我從來沒有主張過什麼'用產品交換代替商品交換'。我沒有說過一句這樣意思的話，更沒有寫過一句這樣意思的話。我只是閑說了那個會計的說法，並沒有表示我主張什麼。可是不知怎的，毛主席當時對我說的話卻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我感到大家都怕和我接近。為了糾正一種錯誤傾向，就找出一個人做靶子，這種做法不好。我個人渺小得很，怎麼可能有能力造成那種普遍性的錯誤傾向呢？

"我當時確實很生氣。沒有根據，就給扣上了帽子，我還不得不做檢查，真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退一步講，即使我真有什麼錯誤意見，如果只是個人間的交談，也不應該到處傳嘛。個人之間談的話，就到處傳，也不正常嘛。

"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繼續在中央工作了，就提出想去地方上工作。過了兩天，李井泉和柯慶施一起來看我，說了些安慰的話，

要我安心在中央工作。顯然，他們兩位來看我，是毛主席的意思。既然毛主席想留住我，我也不好再說什麼。

“這段時期，劉叔宴是很同情我的，她後來陪我到廣東、福建等地搞調查，一路上對我很照顧。

“我如果真的講過‘實行產品調撥，取消商品生產’，那毛主席就不會再用我了。因為那要擔多大的責任呀！

“實際上，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實行產品交換的，是馬克思本人。當然，馬克思只是在理論上有過這種主張，而並沒有、也不可能實踐過。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紀，不可能預料到二十世紀出現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情況。人們不能苛求馬克思。毛主席是馬克思的學生，他在大躍進中的一些想法、做法，也有機械照搬馬克思的地方。他察覺了一些問題的時候，他無法責備馬克思，就找了我做靶子，想扭轉一下錯誤的風向。我後來也想通了，既然是不好批馬克思，拿我來當替罪羊，為了大局，我也不必計較。”

現將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選刊的毛澤東在鄭州會議前後致陳伯達的幾封信件轉錄如下，讀者可以從中瞭解一些當時的具體情形，一方面可看到毛澤東為國事的操勞，一方面可從毛澤東行事的匆忙中看到他步入老年後的一種急躁性格：

伯達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張春橋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衛星公社進行調查工作為適宜，不必聽廿一日劉子厚同志的報告。集中精力在衛星公社調查七天至十天，為杭州會議準備意見，很有必要。可帶李友九去幫忙。如同意，請告葉子龍同志，為你們調一架專機即飛鄭州。

毛澤東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時

到鄭州時，最好能請史向生同志和你們一道去衛星社。史對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過衛星社。他是省委書記。

毛澤東寫出上信後僅半個小時，又寫一信：

伯達同志：

去河南時，請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1]一書帶幾本去，你們調查團幾個人，每人一本，邊調查，邊讀書，白天調查，晚上閱讀，有十幾天，也就可以讀完了。建議將胡繩、李友九都帶去，練習去向勞動人民做調查工作的方法和態度，善於看問題和提問題。

我過了下星期就去鄭州，一到，即可聽你們關於衛星社觀察所得的報告，在四省第一書記會議上予以討論。

毛澤東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時半

四天後，毛澤東又致函陳伯達：

陳伯達同志：

你們調查研究衛星社大約要一個星期，包括調查團（社）營（大隊）連（隊）的各項問題。然後，請找遂平縣級同志們座談幾次，研究全縣各項問題。以上請酌量處理。

毛澤東

十月廿三日下午五時

又過五天，毛澤東第四次致函陳伯達：

陳伯達同志：

回信收到。我還須幾天才能出發。如果遂平調查已畢，你們可去附近某一個縣再作幾天調查，以資比較。於十一月二號或三號回到鄭州即

[1] 即上文提及的陸定一編選的那本書。——筆者注

可。已令吳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車出發，分赴修武七里營兩處調查幾天再去鄭州。

毛澤東

十月廿十八日上午四時

在10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發出調查指示後僅僅不到半個月，中共中央即於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召開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人的會議。會上發生了前述陳伯達回憶中的事情。

在鄭州會議尚未結束時，毛澤東於11月6日再次要求陳伯達與張春橋一起"會後出征"，前往山東範縣。如此匆忙的指令，反映出毛澤東本人並沒有把他在鄭州會議上對陳伯達的指責當一回事。因為那種指責本來就不符事實，毛澤東隨後也就置之腦後，繼續如常使用陳伯達。

毛澤東此次指令的起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在1958年11月4日編印的《宣教動態》第134期上刊載的《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〇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此文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山東範縣人民公社黨委（縣委）第一書記謝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縣共產主義建設積極份子萬人大會上，作了關於範縣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報告。《宣教動態》第一三四期刊登了這一報告的摘要，內中如此寫道：

"農業生產萬斤化。規劃提出六〇年糧食作物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二萬斤，爭取三萬斤，共產三十九億斤；棉花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籽棉一萬五千斤，爭取二萬五千斤，總產二十二億五千萬斤；花生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五萬斤，爭取八萬斤，總產七十五億斤；甜菜種植五萬畝，保證畝產三萬斤，爭取五萬斤，總產十五億斤。今年的水利要實現河網化。五九年全部土地田園化，灌溉自流化、標準化，六〇年達到灌溉電氣化、自流化。到那時：田間耕作用機器，灌

溉自流用電力；糧食畝產好幾萬，堆大敢與泰山比；棉絮開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豐收一年頂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這一報告還說：

“豐衣足食。到一九六〇年基本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制度。到那時：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這樣一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典型的空想加吹牛的報告，毛澤東當年看後雖也覺得有某些誇張之處，但仍頗為欣賞，於1958年11月6日寫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還，會後出征，以為如何？

毛澤東

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時

從毛澤東的這個批示以及將這個批示和山東範縣的規劃報告印發給同年12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可以看出，鄭州會議糾‘左’的步子很有限。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之初對陳伯達加以無根據的指責，本來就是屬於‘插科打諢’的性質，不具有嚴肅性；這件事之所以在十幾年後一再被人提起，不過是在陳伯達倒臺之後，官方因批陳的需要而竭力渲染的結果。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鄭州會議結束時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即《鄭州會議紀要》) 明文提出：“人民公社的生產資料和產品，應當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份，即逐步增加生產資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產品能由國家調撥的部分，根據國家計劃生產，根據國家計劃調撥。”“逐步提高國家對產品的調撥比例。爭取在

十年內達到公社的純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歸個人，三分之一左右歸公社積累，三分之一左右歸國家調撥。"這些會議文件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對所謂"主張實行產品調撥，取消商品生產"的批判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鄭州會議前，確有一位中央領導人"主張實行產品調撥，取消商品生產"。此人地位比陳伯達高，當時與毛澤東的緊密關係也非同一般人。中共中央的權威部門至今不肯透漏他的姓名。《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753頁有這樣一段：

> "非現金结算"觀點的提出和流傳。9月中旬，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在江蘇、浙江兩省召開了人民公社幹部座談會，起草了一份以分配問題為中心的題為《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次修改稿）》的文件。文件規定：公社社員除吃飯不要錢外，所得的工資報酬，一律存在公社，發給存摺，不計利息；社員消費需要，由公社統一購買，統一分發，或由社員憑存摺到公社門市部選購。"無論統一分發或自行選購，均採取轉帳辦法，實行非現金结算，以便減少貨幣流通範圍和杜絕資本主義。"在將文件送毛主席審查時，這位負責同志還建議毛主席於國慶前後宣佈全國吃飯不要錢。文件草案雖然沒有被毛主席和黨中央採納，但已用安徽省委辦公廳的名義發給省內外一些單位，以致流傳很廣，影響已成。在一些地方，"非現金结算"成為打白條、無償調撥農民財產的藉口之一。

筆者查閱了1958年9月份的《人民日報》，沒有查到薄一波書中所說的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召開人民公社幹部座談會的消息。不過，筆者無意中看到這個月的報上有另外三篇很引人注意的文字，是關於劉少奇同志在河北、河南和江蘇視察的報導。這三篇報導是對當時情況的真實記錄，反映了中央領導人在鄭州會議前夕的思想和實踐，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現分別摘錄如下：

《人民日報》9月18日第2版的《劉少奇同志在徐水》一文說：

"看過許多豐產衛星田和試驗田，少奇同志還向商莊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詹登科和陪同的人提議，要大家具體地算一筆帳，比如說種高梁，是種一畝畝產兩萬斤的合算，還是種十畝畝產兩千斤的合算。少奇同志說，大概是少種、多產的合算一些，不過這就要把上面的一畝和十畝所花的工、肥、種等等細緻地算算並加以比較，然後得出個結論，才能說服大家。……劉少奇同志的全部指示已經快如閃電般地深入人心，社社村村都舉行了狂歡慶祝和向着更高峰躍進的誓師大會。"

《人民日報》9月24日第1版刊登了題為《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的消息。文中說：

"當吳芝圃同志談到許多公社實行供給制的時候，少奇同志說，這要由低到高。應當注意，現在實行供給制同抗日戰爭時候不一樣，那時是在物資缺乏的時候實行的，現在是在物資逐漸豐富的時候實行的，有很大的不同。一半供給，一半工資的做法是好的，個人應當有點機動。"

《人民日報》9月30日第2版的長篇報導，標題為《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副標題為《對工業、農業、教育和勞動制度提出重要意見》。文中說：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參觀了豐產圩的四畝試驗田，他親自彎下腰去數了一下稻棵，並且問鄉黨委書記：'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一萬斤'，少奇同志笑着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少奇同志非常關心人民公社實行糧食供給制的問題，江蘇省不少人民公社在今年秋收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少奇同志在訪問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時，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鄉

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起來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同志在匯報時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志對群眾的這兩句話，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高了，生產更積極了。這就是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列寧曾說過：共產主義的勞動是自願的勞動，是無定額的勞動，是不指望報酬、沒有報酬條件的勞動。人們不管報酬多少，不管有沒有定額，他們總是做得更多更好。全體人民都養成了這樣的勞動習慣和勞動態度，個別的懶人就會完全孤立，會被大家看成很沒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勢必會改造過來，參加集體的勞動。只有徹底地實行共產主義，才能徹底地消滅懶漢。"

這裏引用的劉少奇同志當時講的幾段話，除了有兩段是關於要求糧食高產的外，其餘講的主要是關於實行供給制的問題。所謂供給制，實際上就是實行產品調撥，減少或取消商品生產。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劉少奇同志、譚震林同志都有過這類言論。根據薄一波的書，毛澤東也曾對吃飯不要錢的做法表示過稱讚。但是，毛澤東故意不去批評發表過這類主張的中共主要領導人，卻去批評並無這類主張的陳伯達，這當然是他的一種策略，但這同時也說明在中共領導層內部，文人不被當回事兒，高興時是個工具，不高興就成了出氣筒，國家出了點問題，就往文人身上找原因，將文人揶揄一番，便皆大歡喜。

鄭州會議於11月10日結束後，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了八屆六中全會。全會通過了《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現將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收錄的毛澤東當時對該決議草案的批語及注釋照錄如下：

即送小平、喬木[1]同志：

此件[2]寫得很好，比起《人民公社決議》來，好得很多。可即印發付討論。

毛澤東

十二月五日上午八時

根據手稿刊印。

這個決議中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各項指標，是在對1958年的經濟完成情況作出了遠遠高出實際的統計數字的基礎上，按照鋼在一千一百萬噸的基礎上再翻一番，糧食在畝產接近四百斤的基礎上再翻一番的目標制定的。當時譚震林等中央農業部門的領導人對1958年的農業產量作了過高統計，並擬將1959年的糧食播種面積縮減四億畝，實行"少種高產多收"。全會在將1958年的產量數位做了壓縮後，仍按農業部門減少播種面積的計劃，糧食總產量確定為一萬零五百億斤。

[1] 小平，即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喬木，即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2] 指胡喬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向毛澤東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稿。決議稿提出，動員全國人民為一九五九年的二千二百萬噸鋼，一千四百萬噸鋼材，一萬零五百億斤糧食和其他一系列偉大的目標而奮鬥，為一九五九年鋼，鐵，銅，鉛，機床、發電設備等產品的產量超過英國而奮鬥。決議稿還說，一九五九年計劃的決定，是一個既反對太冷又反對太熱的過程。它是一個躍進計劃，是一個苦戰計劃。非躍進，非苦戰，我們的國家不能較快地過關。它又是一個比較有根據的計劃，它的指標比一九五八年擬議的一般要低得多，因為不作這種調整，就缺少實現的客觀可能性。這個決議後來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通過。

1958年底，陳伯達前往廣東、福建考察人民公社生產情況。1959年1月18日，陳伯達請中共福建省委轉交毛澤東和黨中央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在考察廣東、福建兩省部分地區農業生產情況時提出的一些看法。中央文獻出版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17至18頁的注釋[3]中摘錄的陳信內容如下：

陳伯達在致毛澤東並中央的信中提出：

(一)現在除了應推廣密植的方法到那些還是稀植的地區外，還應注意密植的適當程度，根據不同的土質、氣候等條件，密植程度應有不同。

(二)深耕程度應照顧地方的不同條件，在不同地區、氣候和季節，應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

(三)應將糧食底子向群眾公開，節約用糧。力爭豐年吃好，歉年吃飽。

(四)不論生產或生活問題，都應反復和群眾商量，不宜只由幹部單方面獨斷。不要勉強群眾去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五)去年大躍進，有些地方提出要壓這個、跨那個的口號，這樣做並不一定會使自己成為先進，並且往往會使自己陷於落後。

(六)今年這裏的農業生產指標，可以考慮提翻一番，或稍低些，力爭超過，不要提的過高。報紙公佈去年完成的數字，也應該是嚴肅的。

(七)公社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關於勞動組織、定額和報酬的生產管理制度。

1959年1月25日，毛澤東批准印發陳伯達的這封來信：

小平同志：

此件請印發到會各同志。同時，發給各省、市、區黨委，作參考。

毛澤東

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將陳伯達的信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陳伯達的信寫在八屆六中全會做出決議剛剛一個月後，他沒有能力改變中央確定的糧食產量翻一番的決定，但他在信中已明確提出“應將糧食底子向羣眾公開，節約用糧。力爭豐年吃好，歉年吃飽。”這實際上已明白指出有出現“歉年”的可能。在當時那種舉國都在只慶“豐年”的熱潮中，提出有可能出現“歉年”問題的人是很少的。在當時那種歷史氛圍下，陳伯達的這封信不可能起到什麼作用。

1958年，陳伯達還決定停止領取自己的稿費，將自己此後應得的所有稿費都捐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用於該館購買科學書籍。他指示自己的秘書具體辦理此事。1962至1964年，他的五本著作大量再版發行，除了原有的豎排本，還增加了橫排本。其中，《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前後增印了三十多萬冊，陳伯達沒有領取過一分錢稿費。

4 困難與轉折

1. 廬山風雲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中共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論述這次會議的出版物，數量之多，至今已難以計數，但其內容卻往往大同小異。其中有一部分著述屬於這樣的狀態，一方面透露了會議的某些內幕；另一方面又隱瞞了某些情況；因而這些著述總是帶有某種片面性，須有別一種著作從別一角度作出補充，方可能使後人對廬山會議的全貌有比較清楚的瞭解。

陳伯達作為廬山會議的重要參加者及有關事件的見證人，在晚年曾扼要地回憶過當時的情況：

"廬山會議初期，主要是討論大躍進中的經濟工作。開始幾天，氣氛還好。

"當時經濟工作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農業的高指標、弄虛作假和大辦食堂造成的糧食浪費；還有工業上的大煉鋼鐵，搞土法煉鋼，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很多地方集中大批人去煉鋼，使農業和輕工業勞動力不足，糧食該收割了也不能及時收割，日用工業品也出現緊張。

"會議開了不久，就出現了一些爭論。有些同志只談成績，對存在的問題掉以輕心。我在分組會上批評了那種不同羣眾商量就作決定，搞高指標，搞強迫命令的錯誤做法；例舉了河南、山東、福建等地我親眼看到的一些事例，講了我在基層調查時受欺騙、吃苦頭的情況，批評河南遂平縣、山東範縣搞了很多假東西。

“我提出現在糧食情況緊張，農村工作部應作檢討，對福建的工作也提了批評意見，結果和一些同志發生爭論[1]。

“會議當中毛主席要喬木和我，還有幾個同志，搞一個文件(應即是《盧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筆者注）。這個文件主要是談經濟方面存在的問題，不是談成績的。大躍進時期經濟工作中的成績也不應都抹煞，當時興辦的許多工廠，填補了一些工業領域的空白，後來在國民經濟中也長期發揮了作用。但是，1958年後幾個月，隨着浮誇風的滋長，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

“7月14日，我在毛主席那裏看到了彭德懷同志寫給他的一封信。我看後對主席說：‘信寫得不錯嘛，是他自己寫的嗎？’主席說：‘是他自己寫的，他能寫。’當時我覺得信的文字寫得不錯，問題也講得清楚，所以就當主席的面誇獎了彭德懷的這封信。主席當時也沒有說什麼。

“過了幾天，會議轉向批評彭德懷同志的信，我也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我做了檢討，隨後，會議不讓我出席了。所以後來會上的一些情況，我是不清楚的。據說張聞天同志在會上發言時，還引用了我的話。他還不知道我挨批判，已被停止出席會了，結果下面聽的人聽到他引我的話做論據，都哄堂大笑。

“會議快結束時，毛主席表示還是要用我，所以會議臨結束時又讓我出席會了。會上通過的兩個文件，本來我都沒有參加。聽說是喬木提議：‘起草人的名單上還是加上陳伯達好些。’記得關於增產節約的一個決議添了我的名字。”

筆者聽到這裏時，曾問過陳伯達：“既然你在會上一直是作為彭

[1] 陳伯達未提爭論者的名字，據李銳和王力的回憶錄，與陳伯達發生爭論的主要是陳正人，葉飛等。——筆者注

德懷的同夥被批判，為什麼你後來又寫了一篇《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的文章，批判了彭德懷呢？現在有些人就抓住這篇文章，說你是搞投機。可是毛主席直到1970年的廬山會議，還明確說你在第一次廬山會議時‘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按理說毛主席最清楚當時的實情。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的呢？”

陳伯達回答說：

“那篇文章是中央要我寫的。廬山會議結束以後，劉少奇同志找我談話，對我進行了很嚴厲的批評。他例舉了一些事例，說彭德懷同志歷史上就是反對毛主席的，說毛主席剛上井岡山的時候，彭德懷率領的國民黨軍隊就曾和紅軍作過戰(實際上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前已秘密加入中共，他任團長的湖南獨立五師一團奉命對付紅軍時，他已讓地下黨員將軍隊行動密報地方黨組織，其所部未與紅軍交火。1928年7月彭德懷在平江率部起義，加入紅軍。同陳伯達被打倒時的情形一樣，彭德懷參加革命前的早年經歷也曾被捕風捉影地加以歪曲和追究——筆者注)。少奇同志批評我思想糊塗，認不清是非，與彭德懷站到了一起，沒有與黨站到一起。他教育我要立刻糾正自己的嚴重錯誤，站到黨中央一邊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與彭德懷劃清界線。他的話說得很重，把我都說哭了。我當時怎麼可能懷疑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呢？怎麼可能懷疑黨中央的正確性呢？

“劉少奇同志和我談話以後，中央又通知我到彭真同志那裏去寫檢討，我去了彭真家裹。我寫檢討時，碰到胡喬木和吳冷西也在那裏寫檢討。不久，彭真同志告訴我，中央要求我寫一篇批判彭德懷同志的文章，在黨內發表。於是我遵照中央的決定，按照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有關講話，寫了那篇文章。那篇文章裏沒有我自己的話，都是抄錄毛主席的講話和別人寫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中的

話。我在文章裏自始至終仍是稱彭德懷為同志的。"

筆者查閱了一些有關資料，認為陳伯達的上述談話是屬實的。當時，所有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都作了沉痛的檢討，都轉變了原來的立場，連彭德懷同志本人都沒能例外。《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第865頁中寫道："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銳批評面前，在小組會和大會的嚴厲批判、鬥爭面前，再加上一些戰友好心規勸彭德懷同志'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於是他們便採取'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一次又一次地檢討。"這種扭曲的狀態是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使然，不是哪一個個人所能擺脫得了的。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曾是被重點批判的人物，後來雖被格外開恩未列入"反黨集團"名單，但他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崇高威望和尖銳批評面前，同樣不可能逃脫"要什麼給什麼"的命運。而且，出於中央常委的決定，別人的檢討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文字沒有被公開發表，而陳伯達的文字卻被公開發表了，這更不是陳伯達本人所能自主的。陳伯達的文字之所以被公開發表，是因為要利用他作為理論家在黨內的影響。顯然，這是當時毛主席和中央常委的一個策略。

從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收錄的毛澤東當時的批示來看，陳伯達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一文確實是在中共中央嚴格指導下寫的。1959年10月11日，毛澤東對該文批示：

伯達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好一點。

毛澤東

十月十一日

10月16日，毛澤東又批示：

伯達同志閱後，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閱，然後交尚昆同志辦理。

毛澤東

十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對毛澤東批示中的"周、朱、林三同志"加的注釋指明："周，指周恩來。朱，指朱德。林，指林彪。"這就清楚地說明《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一文，是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康生、胡喬木幫助修改，並經周恩來，朱德、林彪審閱的。該文傳達的是當時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觀點。

這裏順便插說一件事。1959年春天，具體時間已記不清了，彭德懷曾到過陳伯達家中與陳談話。筆者當時是個十二歲的小學六年級學生，正在家中過週末。記得一天傍晚，彭德懷夫婦進到院子，遇到我，很和藹地和我握了手。陳伯達從屋內走出來迎接，一邊對我說："這是彭德懷伯伯，你知道嗎？"我當時雖然年幼，但也熟知彭德懷元帥的大名，讀過杜鵬程寫有彭德懷事蹟的小說《保衛延安》，我連忙說："知道，知道。彭伯伯好！"他們隨後就進屋談話去了。幾年前，原在陳伯達處工作過的李景如來看我，談及彭德懷與陳伯達的來往時，說到1958年他離開中南海之前，見到彭德懷來過陳家兩次。他覺得，彭和陳都不是喜歡串門聊閑天的人，而是為國事操勞的人。現在想來，廬山會議前，彭與陳可能交談過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有一本流行很廣、影響很大的記述廬山會議情況的書，即李銳寫的《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中確實記錄了不少重要的史料，披露了一些重要的情況。但是也應看到，這本書中也有個別歪曲事實和隱瞞事實之處。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第95頁《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一

節中說，7月10日左右，毛主席指定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和他，七個人組成起草小組，起草這個文件。但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關於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給楊尚昆的信》及信後的注釋，起草小組最初為五個人：胡喬木、楊尚昆、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澤東建議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聖、周小舟六個人，成為十一人的小組。李銳在書中有意漏寫了起草小組最初的成員陳伯達和楊尚昆，而把半路進入小組的他自己的作用突出出來，這是與史實不相符合的。

7月23日毛主席講話後，每個原來贊成彭德懷信的人都在討論會上做了檢討，並迫於形勢在發言中講了些批判彭德懷的話。這是每個在會上受到批判的人都無法避免的。李銳在談論陳伯達的情況時，有意多引陳伯達檢討發言中今天看來是錯誤的，但當時實際上是在巨大壓力下被迫講的一些違心的話，而不引其他人講的同樣情形的話。這是在無形中誤導讀者。他還在書中寫道：“田家英告訴我，在八月初最緊張、尖銳的鬥爭開始後，‘這位老夫子就躺倒裝病，不參加會議了。’……”這更是違背事實的。

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會議期間，尤其是作為被會議批判的主要人員之一，除非有醫生的特別證明，是不可以中途稱病退席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收錄有廬山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於8月7日對增產節約決議稿的批語。批語抬頭寫着“伯達、稼祥、喬木同志”。這恰好證明陳伯達所說的廬山會議結束前又重新讓他出席會議的情況是真實的，他怎麼可能有隨便“躺倒裝病，不參加會議”，而後又突然出席會議的特權呢？他一段時間不參加會議，是中央不讓他參加會議，這是很顯然的事，而李銳為了故意貶損已被“牆倒眾人推”、不可能再有申

訴機會的陳伯達，就編造出了"田家英告訴我，在八月初最緊張、尖銳的鬥爭開始後，'這位老夫子就躺倒裝病，不參加會議了'"的故事。這種做法對於嚴肅的歷史學家來說，是不可取的。

至於李銳書中隱瞞事實的地方，筆者在這裏只舉一個例子。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曾詳細記錄了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內容。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說道：

"大躍進的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鋼鐵指標柯老講600萬噸，我六月講1070萬噸。北戴河會議發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

這段話中，柯老指柯慶施。"北戴河會議發公報"則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時發表的公報，該公報公佈了1958和1959年的鋼鐵等工業生產指標以及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的決定。北戴河會議是1958年大躍進中的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這些情況都是人們熟知的，也是書中反復述及了的。但"薄一波建議"指的是什麼呢？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清楚的。對此，李銳本應在書中加以說明，可他偏偏沒有一個字的說明。然而，既然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薄一波建議"是導致他"闖下大禍"的三個因素之一，細心的讀者又豈可不加以探究呢？

關於這個不肯加以說明的"薄一波建議"，筆者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中發現了蹤跡。首先，筆者發現薄一波在1958年曾有過不只一次的建議，其中比較重要的大約有三次。

突出的一次，是薄一波代表國家經委向政治局的報告。

現將《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278頁中記載的有關文獻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加寫的注釋全文照錄如下：

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此件[註]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

毛澤東

六月二十二日

根據手稿刊印

[註] 指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報告就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形勢和一九五九年的經濟發展作了匯報，其中說，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毛澤東批發這個報告時，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向政治局的報告）"。

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1958年6月17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是一個重要的建議書。這個報告提出中國在1959年就可以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這比中共中央原先提出的爭取在十五年內在主要工業品方面超過英國的目標更大大提前了，由十五年一下子縮短為兩年！這個由中共黨內經濟專家薄一波提出的建議，是促成中共中央決定在1958年餘下的幾個月實行鋼鐵等工業產品產量翻番的重要原因。它使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中國1958年的鋼產量可以並應該由1957年的535萬噸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這樣才可能在1959年時再翻一番，實現薄一波提出的兩年超過英國的目標。這樣一種思路導致了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全民大煉鋼鐵。

此外，1958年6月18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常委和彭真、薄一波等談話。按薄一波自己的說法："談話時，毛主席曾對

我說：現在農業已經有了辦法了，叫做'以糧為綱，全面發展'，你工業怎麼辦？我沒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說：工業就'以鋼為綱，帶動一切'吧！毛主席說：對，就按這麼辦。"（參見《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698至699頁）

提出這個"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的方針，是又一個重大的建議。

第三次建議，是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按照薄一波自己的說法："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寫上1958年力爭生產1070萬噸鋼，是我的主意。""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裏，看到大家都說能夠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議，把'一〇七〇'寫到公報上。毛主席表示贊成。我馬上拿起電話，通知起草公報的胡喬木同志"。（參見《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706至707頁）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所說的"薄一波建議"，可能泛指這三次建議，因為它們都是圍繞鋼鐵問題提出的。也可能是特指第三次建議，因為毛澤東是在提到北戴河會議發公報的事後，接着講到"薄一波建議"的。總而言之，出不了這三次建議的範圍，讀者或許可自己做出更明確的判斷。

薄一波還在《回顧》一書中講到他與當時在華蘇聯專家總顧問阿爾希波夫的爭論：

> "我記得那天在走向宴會廳時，阿爾希波夫跟我走在一起，他講：'你們的計劃太高了，恐怕實現不了。'我說：我們有群眾路線，把土法煉鐵煉鋼加上去，計劃一定能實現。他苦笑了一下，說土法煉鋼再多也沒有用。"

無論如何，上述史料已經揭示，薄一波在1958年大躍進中的大煉鋼鐵問題上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大煉鋼鐵，尤其是土法煉鋼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消極作用，在今天已是毋庸爭辯的。

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還記錄有一件與廬山會議有一定關係的薄一波寫給毛澤東的信件，寫信的時間是1959年10月7日——距離廬山會議結束僅僅一個多月，毛澤東於10月8日為這封信件寫了批語，否則我們今天也不會知道有這封信

現將《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542頁的有關文獻及原注釋全文照錄如下：

在薄一波反映家鄉人民公社情況來信[1] 上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十月八日）

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

毛澤東

十月八日

尚昆[2]辦。

根據手稿刊印。

[1] 薄一波，山西省定襄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我的家鄉——和平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韓生智同志給我寫來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興奮：一、公社化後糧食大增產，工業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麥子（保證了國家徵購任務後），我的家鄉主糧是雜糧；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來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眾情緒高漲；等等。特將這封令人興奮的信列印送您一閱。"

[2] 尚昆，即楊尚昆，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

薄一波給毛澤東寫這封信的目的很清楚，因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寫給毛澤東的信中例舉了農業和工業生產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毛澤東雖然在會上對彭德懷進行了批判，但面對現實的經濟形勢，毛澤東缺乏

反駁彭德懷的有力證據。薄一波的信就是從一個方面，向毛澤東提供這類證據。他對當時許多農村廣泛存在的嚴峻的經濟問題視而不見，仍對毛澤東報喜不報憂。

2. 錯綜複雜的1960年

回顧風雲變幻的1960年，無論是家事還是國事，對陳伯達來說，都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

"1960年初，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的時候發表幾篇文章，闡明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中央要我寫一篇文章，以《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題目是《列寧主義萬歲》。中央還決定在北京開一個紀念大會，由陸定一做報告，同時要胡喬木另寫一篇文章，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陸定一的報告也由我幫助起草。列寧的生日是4月22日，起草工作要按時完成，我連續幾個星期都沒有休息。

"在我工作正忙碌的時候，有一天，小老虎(陳伯達長子陳小達的小名和昵稱——筆者注)來找我，說有事情要和我談。我說，我現在忙得很，過幾天再談吧。我當時一點也沒有想到可能是什麼事。他離開我以後去找了劉叔宴，劉叔宴大概也不耐心，也不知道劉叔宴怎樣和他談的。後來才知道，他離開中南海後就跑到郊外鐵路上自殺了。

"小老虎自殺的事，組織上瞞了我很久。大概過了半年多以後，有一天我問劉叔宴，怎麼小老虎很長時間沒有消息？劉叔宴沒有回答，就流下淚來。我問，怎麼了，出什麼事了？她仍沒有回答。我突然覺得事情嚴重起來，說：是不是死了？她點了點頭，就大哭起來。我也哭了。後來組織上讓周揚和我談話，安慰我。我才知道是組織上怕我太難過才瞞着我的。我對周揚說，請組織上放心，有小孩子，我跟着黨革命；沒

有小孩子，我仍然是跟着黨革命的。"

陳伯達說到這裏，我插了幾句：

"哥哥小達的死，劉叔宴媽媽跟我說：主要是因為他和李敏(毛澤東的長女，賀子珍所生)從小青梅竹馬，一起在蘇聯長大，後來兩人又談戀愛，感情已深，沒想到李敏突然提出要中斷關係，只保留一般朋友關係；他受此打擊，情緒長久鬱悶，工作時也精神恍惚，結果在主持一次實驗時發生了重大事故，受到單位領導的嚴厲批評。這雙重的打擊使他無法承受，導致了他的輕生。"

陳伯達沉思片刻後說道：

"是啊！年輕人的婚姻本來不應該受大人的干涉。小達死後，我還不知道的時候，一次出差，鄧小平和我同坐一架飛機，他在飛機上講了一個故事，是關於古時候有一個人突然失去了兒子的事。我當時很覺得奇怪。其實，這是毛主席要他提前給我做點思想工作，防止我有什麼意外。後來我知道情況後，對鄧小平那次安慰我，還是很感謝的。看來，中央對這件事，是很謹慎的，怕我有什麼想不通。"

寫到這裏，筆者應將陳小達的情況向讀者做一介紹。

陳小達，1934年冬出生于天津，是陳伯達與諸有仁的兒子，1937年隨陳伯達到延安。1939年夏天，小達與孫維世（革命烈士孫炳文之女、周恩來養女）、陳祖濤（陳昌浩之子）、高毅（高崗之子）三個小夥伴一起，由周恩來帶領，同乘一架飛機到蘇聯。他們與先後到達蘇聯的一批中共幹部子女及烈士子女一起，在莫斯科東北300公里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成長。1950年陳小達回國，進入哈爾濱的留蘇預備中學，1953年考入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學習高能物理專業，1958年秋畢業回國，被分配到第二機械工業部（即核工業部）工作。

小達回國工作後，每個星期天都回到中南海的陳伯達家中。這

時，他與兒時的好朋友李敏又相遇了。

李敏小名嬌嬌，生於1936年，比小達小兩歲，她在1941年初與朱敏（朱德之女）、羅西北（烈士羅亦農之子、小達的表哥）、王繼飛（烈士王一飛之子）同乘一架飛機到蘇聯，進入伊萬諾沃的國際兒童院。當時在兒童院學習的還有蔡博、毛岸英、毛岸青、劉允斌、劉愛琴、趙施格等。1948年冬，李敏隨其母親賀子珍回國。以後她沒有再去蘇聯，而是按照她父親的意見在中國重新上了小學和中學。1958年她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由於她在蘇聯和中國重複接受初等教育，因此她考上大學時的年齡比一般同年級的學生要大三四歲。

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哥哥小達回國後曾遍訪了住在中南海的昔日的留蘇同學。他除了與李敏過從甚密外，還與朱敏、劉允斌（劉少奇之子）　任遠芳（任弼時之女）等時有往來。

小達從五歲離開祖國，除了十六歲曾在國內哈爾濱的留蘇預備學校學習過兩年外，其生命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蘇聯度過的，即使在哈爾濱的兩年；學校的教學用語也是俄語，所以他1958年剛回國時，幾乎已經完全不會說漢語了。他在家中與陳伯達交談，也是使用俄語。他當時交往的朋友，不可能是留蘇學生以外的人。因此，他的生活圈子很狹窄，他與李敏建立了特殊的友情，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在中南海的歸國留蘇學生中，朱敏、劉允斌比他要大七、八歲，任遠芳則比他小六歲，惟有李敏與他年齡最相近。

友情並不等於愛情。也曾有人對小達與李敏是否建立了愛情關係持懷疑態度。對此我並不想進行爭辯，只想講幾件至今仍記憶猶新的小事。

哥哥小達每逢週末和假日回到中南海的家中，是和我同住一間屋子的。那時雖然我們家的住房比一般人家要寬敞，但也沒有寬敞到每個男孩子都能各住一室的程度。李敏每次來家找哥哥，我都要躲到客廳裏

去看畫報，以免妨礙他們談心。他們經常談得很晚，以致常常影響了我的休息。當時還沒有電視，人們一般都睡得比較早。有一天傍晚，李敏來到我家，和哥哥一直談到夜裏12點了還不散。劉叔宴只好照顧我先在客廳睡下了。

有時哥哥和李敏白天一起出去玩，也喜歡帶上我，為的是讓我給他們拍照片。寒冬的時節，他們還常一起去北海滑冰。雖說那時人們早已破除了封建思想，但男女倆在一起結伴遊玩並合影照相還是不同尋常的，即使是今天，男女之間一般也不會隨便合影的。

還有一次，哥哥要去看望他的親生母親諸有仁，整理了一箱子物品。李敏特地來我家，幫哥哥提箱子，陪哥哥一起去。是司機老倪叔叔開車送他們去的。

李敏有時也請哥哥去她家。有一晚，哥哥拿出幾張從蘇聯帶回來的唱片，要我陪他去李敏家一起聽唱片。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去毛主席家，所以很高興。過了甲區的哨卡，來到主席家紅院牆的側門，哨兵似已知道哥哥要來，就放我們進去了。記得李敏當時是單獨住在一處裏外連間的房子裏。外間是個過廳，只有十平方米，空蕩蕩的，中間放着一架鋼琴，據說是伏羅希洛夫送給毛主席的禮物。里間稍大些，約有十四平方米，只有一張床、一個寫字台和一個書架。房子四面的白牆很乾淨，沒有掛畫或其他裝飾品，顯得十分簡樸。寫字台上，一個小碟子裏有些包着金色紙的小圓餅巧克力。李敏很和藹地招呼我吃巧克力。她和哥哥一起用留聲機欣賞蘇聯唱片。玩了大約兩個小時，我們就回家了。

那時候，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領導人，都是深居簡出，各自在家中辦公。他們之間，除了因公事相互有所往來外，其家屬之間是極少串門的。尤其是毛主席的家，非經特別邀請，別人家的小孩子是很難進入的。這次，我能有機會進入毛主席的家裏，雖然沒有見到毛主席本人，

但已是難以忘懷的了。

總之，不管別人怎麼看，當時哥哥小達和李敏的關係，至少在我的眼裏，絕不僅僅是一般的朋友關係。

哥哥去世後，劉叔宴媽媽曾對我說："不知什麼原因，李敏有一天約小達在中南海的湖邊談話，說她決定和小達脫離戀愛關係，只保留一般朋友關係。當時小達一聽，腦袋都炸了，跑來告訴我。我對他說，你不要這樣子，要想開些，戀愛都是要自願的。"

事情過去很多年以後，對小達的死因，也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說法，而且往往與政治相聯繫。有人認為，小達在核工業部先是給蘇聯專家當助手，後來中蘇關係突然發生了逆轉，蘇聯專家可能對小達提出過出格的要求，小達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他即不願意得罪曾養育了他的蘇聯，也不可能做出不利於祖國的事，思想極度苦惱，因而尋了短見。1990年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先驅者的後代》一書中羅西北撰《不幸的陳小達》一文則認為，小達對當時國內開展的"反右傾"、"反白專道路"等政治鬥爭不能理解，對大字報中指名道姓的人身攻擊十分氣憤，對生活中的許多現象感到苦悶，這是導致小達去世的主要原因。

筆者個人認為，羅西北作為與陳小達聯繫密切的親戚，他的見解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但是，小達與李敏愛情關係的突然中斷，對小達的打擊之大，同樣也是不可忽視的。應當說，是多種無法調和的矛盾所產生的沉重的壓力，導致了小達的不幸。我們還可從毛澤東的各種傳記看出，毛澤東本人待人處事總是首先從政治的角度着眼，他對政治的重視程度是壓倒一切的，他不會同意一個幾乎已經俄國化的青年來做他未來的女婿，這也是情理中的事。可以說，小達的死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家事絮叨，告一段落，話題再回到國事方面。

1960年4月，中共中央組織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發表

後，引起了各國共產黨的高度注意，蘇共中央的反應則極為反常。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有12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團參加的會議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對當時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發動了突然襲擊，進行圍攻謾罵。中共代表團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於6月25日發表書面聲明，嚴肅批評了蘇共的做法。7月，蘇聯單方面決定在短短的一個月內撤退全部在華的專家，撕毀所有的專家合同，廢除所有的合作專案，並帶走全部設計圖紙和有關資料，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陳伯達曾簡要回顧當時的情形：

"蘇聯單方面撤退專家，撕毀合同，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在國際關係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赫魯曉夫這樣做，嚴重破壞了中蘇兩大國的友好關係，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這件事給毛主席的影響是很大的。那年夏天，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會議，討論如何面對這種形勢。中央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問題上，在事關國家的獨立自主的問題上，是不能讓步的，中國黨不會拿原則去做交易，同時決定在經濟方面組織力量盡可能地減少蘇聯給我們造成的損失。

"那年，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曾秘密來到中國休息，跟中國領導人進行了交談。胡志明不願意看到中蘇兩黨出現分歧，但他對中國的立場也表示理解。"

談話中，我隨便插問了一句：

"胡志明的一生是否一直沒有結婚呢？"

"那也不是。"

陳伯達回答道：

"胡志明年輕的時候是結過婚的。他的愛人是一個廈門人，但是很

早就去世了。後來他很長時間是單身。越南革命勝利以後，他想再找一個福建籍的女人為妻，但是越南的黨中央不同意，他不能不服從越南黨中央的決定，所以他就一直沒有再結婚。”

“哦，原來是這樣。一個領袖人物還要受到這樣的約束。”

“那時候是這樣的。”

陳伯達的回答改變了我心目中原有的胡志明主席的單身漢形象。同時，我也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60夏天在北戴河遇見胡志明主席的情景。此事可謂筆者個人的一次偶然的奇遇。

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領導人經常在夏季到北戴河休假或召開工作會議。自二十世紀初葉始，風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濱陸續修建了許多風格各異的別墅。這些別墅原來的主人，或為外國人，或為國內的官僚巨富。解放後，這些人大部分跑到國外去了，他們的別墅也就被沒收為國有。其中，一部分別墅被安排為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的休養所，一部分則劃歸中共中央辦公廳管理，安排給在北戴河開會或休假的中共中央委員使用。1956年中共八大以後，中央委員的人數從四十餘人增至九十餘人，原有的別墅已不敷使用，於是在1958年又蓋了一些新的別墅，並蓋了一所設備比較齊全的會議廳。

1960年夏天，我們家被安排住在離海邊約一裏的一棟舊的二層樓別墅。別墅正面朝海，一層有門廊圍繞，二層則只有一間卧室。東側不遠有一棟更大的別墅，為民國初年所造，朝海的正門上方刻有“福祿壽”三個大字，頗為醒目。已聽說這棟別墅是剛剛秘密來華休假的胡志明主席的住所。西側稍遠的一棟則是劉伯承元帥的住所。在別墅之間平坦的砂土路上，有時可看到劉伯承元帥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拄着拐杖在散步。

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樣，起床後於7點左右和兩個妹妹一起到餐

廳吃早餐。剛剛坐下不久，就看到門口進來一個身着灰布中山裝、腳蹬布涼鞋、留着山羊鬍子的小個子老人，我一眼就認出是胡志明，心裏不免有些驚訝。老人笑呵呵地徑直走過來和我們小孩子一一握手。我趕緊說了一句"胡伯伯好！"胡志明微笑着問："你們爸爸在哪裏？"我妹妹嶺梅立刻上樓去叫父親。父親剛起床不久，聽說胡主席造訪，趕緊下樓迎接。他們互相寒暄了幾句，就一起出去了。

後來聽陳伯達回來說，他陪胡志明去了鄧小平那裏。胡志明有早起的習慣。本來，胡志明一早起來是要去找鄧小平的，因聽說鄧小平還沒有起床，就先到鄰居陳伯達這裏來了。

胡志明作風簡樸，與人交往很隨便，在他的舉止中沒有絲毫的官場氣派。這種平等待人的風度正是許多中國領導人身上所缺乏的。

在北戴河度夏的人們，此時尚未感覺到生活有什麼異常，但是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經濟形勢就開始緊張了。一來，蘇共對中共採取了經濟壓迫的措施，中蘇經濟合作全部中斷。蘇聯逼迫中國提前還債，中國只能用農產品償還債務。二來，這年春夏中原地區旱情嚴重，如山東12條主要河流中有8條乾涸，7、8月份河北等省又發生了澇災。據年底新華社的報導，全國耕地受災面積達9億畝以上，有的省份農田受災面積達百分之六十以上。三來，大躍進中出現的"浮誇風"、"共產風"等錯誤傾向並沒有得到認真解決。在過高估算1958年糧食產量的前提下，譚震林負責的國務院農林口制定的1959年夏糧播種計劃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的糧食播種面積，致使1959年?已出現部分地區糧食緊張，在此基礎上加上自然災害，1960年糧食減產更為嚴重。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主持的國務院工業口制定的1960年工業計劃仍在繼續大辦鋼鐵，2月份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匯報提綱提出"為全年爭取完成二千萬噸鋼或者更多一點的目標而奮鬥"，使

工業戰線擠佔了大量的農業勞動力，並增大了糧食徵購量，給農業生產造成了更多的困難。所有這些問題在秋天都匯集在一起了，致使1960年下半年明顯出現了以糧食短缺為主的各種生活和生產物資緊張的局面。

在談到中央開始認識到問題嚴重性的經過時，陳伯達說：

"最早提出鋼鐵指標過高問題的，是陳雲同志。陳雲59年就提出鋼鐵指標不可能實現，當時還是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視，對鋼鐵指標作了修改，將當年的鋼指標由1800萬噸降低為1300萬噸。但是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1960年工業部門負責人制定的計劃又將鋼指標定為2000萬噸以上。第一個向中央報告已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的，是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在湖北視察時，發現了有餓死人的情況，立即向中央打了報告。1960年冬，周恩來同志主持了中央對人民公社當前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各地堅決反對"共產風"，立即糾正"一平二調"等錯誤做法。我和廖魯言同志參加了這個文件的擬定。"

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所載的幾篇毛澤東的有關批示，可以看出在糾正當時"左"的錯誤的艱難工作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採取的措施以及所依靠的幹部。

一、1960年10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央報告參加田間勞動的農村勞動力已減少到只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擬採取措施堅決從各方面擠出勞動力，充實農業生產戰線。毛澤東閱後於17日批示李富春："此件很好。請你閱後送陳伯達同志一閱，並請他找幾個人看一下，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個電報，將此件介紹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予以研究，大力推行，迅速辦理。"

二：1960年11月3日毛澤東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批示周恩來："作了一些修改，有幾點是重要的。請你

召集富春、震林、魯言、正人、伯達談一下，最後酌定。用電報發出，越快越好。"

三、1960年11月11日毛澤東對陳伯達主持起草的着重論述農業在經濟問題中的首要地位、強調要保證足夠的農業勞動力的《紅旗》雜誌社論《工農業並舉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規律》批示："退陳伯達同志：此文看過，可用。"

四、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就他擬定的中央關於徹底糾正"共產風"等"五風"問題的指示信批示："即送周、朱、富春、震林、先念、伯達同志閱後，請富春辦。"

五、毛澤東於1960年11月20日、23日、28日分別對甘肅、四川、浙江省委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報告批示陳伯達或批示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陳伯達閱辦。

從毛澤東的這些批示可以看出，他當時為扭轉局面而依靠的幹部中，包括有陳伯達。

在錯綜複雜的1960年中，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這艘大船在急劇變化的風浪中顛簸航行，而1961年的工作則更為艱難，更為關鍵。

3. 起草《農業六十條》等文件

凡是熟悉中共黨史和新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簡稱《農業六十條》，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文件，它對六十年代初處於危機狀態的中國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可以說起到了轉危為安的重大作用。《農業六十條》是在毛澤東等中央常委主持下，由陳伯達具體領導的起草班子起草的，這在中共領導層內本來是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可是，當代中共官方黨史機構為了達到全面抹煞陳伯達的目的，編造了種種離奇的說法，企圖扯斷《六十條》與陳伯達之間不

可分割的關係。他們在述及該文件的起草情況時，要麼根本不提主要起草人陳伯達，要麼把陳伯達的名字放在起草名單的末尾，而把次要起草人胡喬木、田家英提升為主要起草人。

陳伯達晚年能夠閱讀到的中共黨史出版物極為稀少，對於在他去世後出現的圍繞六十條的黨史篡改現象，更無預見的可能，他在生前曾多次談到過《農業六十條》的起草情況：

"1961年，在廣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是徵得毛主席的同意，由我負責起草的。到廣州開會前，毛主席先要我和胡喬木、田家英分別帶領調查小組去農村調查情況，我去廣東，喬木和田家英去湖南、浙江，時間為半個月，然後到廣東碰頭，將調查的情況匯在一起討論。我到廣東農村時，廣東省委常委安平生同志跟我說，他接觸過一個復員軍人，這個復員軍人很有些見解，認為現在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公共食堂，如果食堂可以不辦，那一切問題都比較好辦。我們在寶安縣找到了這個復員軍人，和他談話，覺得他的意見很好，可惜的是我現在已記不起這位復員軍人的名字。我當時讓秘書王文耀做了紀錄，並立即將紀錄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後，批為會議的第一號文件。但是在開會討論時，陶鑄同志和趙紫陽同志卻不同意，說這僅是那個復員軍人個人的意見，多數食堂辦得還是不壞的。我當時和陶鑄同志、趙紫陽同志吵了起來。討論的結果，折中了一下，確定文件規定：食堂可以辦，可以不辦，可以只辦農忙食堂。文件草案通過後，我到一些鄉村詢問羣眾關於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家熱烈地贊成完全取消。後來喬木等同志也向中央報送了贊成取消公共食堂的材料。於是在修改六十條時，?根據各地的經驗，對食堂問題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這個修改過的六十條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議後寫的。

"六十條的草案在廣州會議上通過以後，沒有幾天，田家英跑來找

我，本來他也參加了文件的討論，可是這時卻忽然對我說，六十條搞得不好，應該重新另起草一個文件。我一聽就批評他：你這個人才糟糕呢，中央剛剛討論通過了文件，你怎麼就這樣說話？我的批評很嚴厲，他聽了很窘促。這就是他跟我發生矛盾的原因。他當時想轉移話題，說廣州離香港很近，我們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聽了覺得奇怪，問他為什麼想去香港。他說他有個哥哥大概現在在香港。我於是問他是怎麼回事，他才說他有個哥哥過去曾在中央社工作過。我沒有再說話，因為田家英是我推薦給毛主席的，我應對他的政治情況負責，他有這麼重要的社會關係，過去卻沒有告訴我，我當然有意見。這次談話雖然不愉快，但我覺得事情既然已經過去了，就算了，後來也沒有跟毛主席談起過。回北京後，我有時候去琉璃廠舊書店買書，還是約上他一起去。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很不高興地對我說，你知道田家英說你什麼嗎？我楞住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來，對江青說：你把田家英說陳伯達的話跟陳伯達說說。他有意見不跟我當面講，要去跟江青講，想通過江青影響毛主席，這就使關係難恢復了。但不管怎樣，田家英畢竟是我推薦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薦，所以我沒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面前議論他。他後來受審查，我事前並不知道，是中央在會上宣佈後才知道的。”

現在暫且撇開陳伯達與田家英的個人恩怨不談，他們之間的矛盾從今日所能看到的所有資料來分析，大體仍屬於文人相輕類型的矛盾，性格衝突居多，政治是非實少；何況有最高領袖毛澤東從中轉遞閒話，更無可避免地加劇了矛盾的程度。我們還是回到《農業六十條》的起草過程的話題，探討與該文件有關的情況。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召開了有中南、西南、華東三個地區的大區和省市負責人參加的會議，隨後又召開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即

廣州會議。《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的草案就是在這個會議上討論通過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443頁，有一篇毛澤東《對關於農村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一次座談會紀錄的批語》。原文（包括原注釋，注釋中的座談會紀錄文字稍有省略）如下：

對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一次座談會紀錄的批語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

一個重要文件[注1]，印發各同志[注2]討論。

毛澤東

三月十六日上午一時

根據手稿刊印。

（錄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443至444頁）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報送的一個座談會記錄。記錄中說，三月十四、十五日，廣東省委和北京來的調查組，同新興縣里洞公社蒙坑大隊總支書記梁紀南、公社宣教委員蘇品芳就有關人民公社的幾個重要問題交換了意見。一、社隊規模問題。蒙坑大隊原來是兩個高級社，一個收入高，一個收入低，公社化後合成一個基本核算單位，拉平了，原來收入高的很有意見。最近他們按原來高級社的規模，分為兩個大隊，解決了窮村同富村的矛盾，兩邊對生產、積肥都積極了，對耕牛、農具也都愛惜了。座談中，對於其他大隊內各小隊之間的貧富差別，他們認為可以採取如下解決辦法：(1) 對富村的包產指標可以低些，使它能夠多得超產獎勵；(2) 幫助窮村多搞些副業，增加收入；(3) 中等村發展了生產，也能增加收入。……。二、分配問題。過去搞三七開，事實上不勞動者也可以得食，因此可以考慮打破這個框框，全部實行按勞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糧補貼困難户，這樣就可以調動全體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三、食堂問題。他們主張糧食分到户，農忙辦食堂，這樣生產隊菜地就有可能給市場提供更多的菜，社員也能養豬，積肥。四、定徵定購問題。徵購糧要定下來，使農民心裏有底，至少三年不變，能五年不變就更好。定徵定購後，生產隊的超產部分，可以留出一定的比例作為儲備糧，要逐步使隊隊、社社、縣縣都有儲備糧，同時也要逐步使家家户户都有糧食儲備。

[2] 指當時正在廣州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

這份陳伯達3月15日報送的座談會紀錄（值得注意的是，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03頁提到，2月19日中央廣東調查組就向毛澤東報送了內容類似的反對農村中的平均主義錯誤的《調查紀要》，但薄一波故意不提中央廣東調查組是由陳伯達直接領導的），今天的人們恐怕已不容易領會到它所含有的極其重要的意義。當年在廣大農村，之所以有不少社員缺乏勞動積極性，之所以有不少公社的經濟效益不如高級社，甚至陷入困境之中，其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公社抹煞了窮村和富村的差別，實行了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辦起了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再加上弄虛作假，虛報糧食產量，造成上級糧食部門對其實行高徵購。這份座談會紀錄是最早對這一系列問題提出系統解決辦法的一份重要意見書。尤其是對已成為全國性難題的公共食堂問題，它明確提出"糧食分到戶，農忙辦食堂"，實際上就是主張取消已成為社員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公共食堂，只保留在農忙時辦臨時性的食堂。這是全國最早的取消公共食堂的呼聲，給大辦食堂的熱潮潑了一大盆冷水，促使毛澤東和中央最高層領導人的頭腦清醒過來。

在陳伯達報送這份意見書之前，1960年中共中央發出過一系列文件，認為公共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要求各級黨委把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在陳伯達于1961年3月15日報送了這份反對平均主義，建議"全部實行按勞分配"、"糧食分到戶"的意見書之後，4月14日，胡喬木報送了主張羣眾要求散的食堂應該散的材料。5月7日周恩來，5月9日朱德等提出了相似的取消食堂的意見。但是5月13日，鄧小平和彭真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關於食堂問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能像供給制一樣一刀兩斷地下決心。……食堂不要大了，應辦小型的或自願結合的。"（此處所敘史實分別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兩書中所錄史實在時間上不一致的，以前者為準。）

由於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央最高層對食堂問題沒有能取得一致，所以六十條的初稿沒有對公共食堂作出完全取消的規定，而是作出了可以辦，可以不辦，可以辦農忙食堂的靈活規定。直到陳伯達1962年對六十條進行了較大的修訂後，才作出了完全取消公共食堂的規定。

關於《農業六十條》的具體起草過程，中共官方黨史書籍的記載十分混亂，或諱莫如深，或語焉不詳，但既然要紀錄這段歷史，也就難以做到不露出一點真情實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書收錄的毛澤東的批示、批語中，多次提到《農業六十條》的"起草委員會"。文獻研究室在對該書做注釋時，對有些並不重要的臨時性小組都作了注釋，列出其組成名單，但是對這個《農業六十條》的"起草委員會"的組成情況卻未曾作過一個字的注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15頁說："毛主席直接領導的3個調查組於1961年2月23日在廣州會合。25日，毛主席在廣州邀集陶鑄、陳伯達、胡喬木、廖魯言、趙紫陽、田家英開會，宣佈條例起草工作班子由陶鑄掛帥、陳伯達為副，3月10日起草好。起草工作分兩段；前7天拿出初稿，後7天找些同志來討論。會後，開始起草。初稿由廖魯言、田家英、趙紫陽、王錄分頭執筆，胡喬木修改。"文中看不出陳伯達做了哪些具體工作，不過總算把陳列上了起草名單，說是"為副"。但"某某掛帥，某某為副"這種句式似乎既不符合中央文件的用語習慣，也不符合毛澤東講話的語氣。會是在陶鑄任第一書記的廣東開的，他自然要盡地主之誼，然而從薄一波書的內容中，也看不出陶鑄怎樣起了掛帥的作用。

薄一波的書中在談到《農業六十條》1961年的"六月修正草案"時，

還有這樣一段話："起草工作班子於5月上旬着手研究修改（此次修改，初期還是胡喬木同志主要執筆，中途喬木同志病休，由別人接替），5月22日拿出草案第一次修改稿。"然而，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收錄的毛澤東1961年5月9日致湖南省委轉胡喬木的信中，我們得知，毛澤東要求胡喬木推遲返回北京，繼續進行調查。毛澤東指示："胡喬木則宜於五月二十日到京，因為他提出了幾個新問題，須做較詳的調查。"毫無疑問，胡喬木的調查與《農業六十條》的修改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必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5月20日前繼續在湘鄂兩省進行調查，沒有可能在5月上旬到北京直接參加修改工作，又如何承擔"主要執筆"的任務呢？而且，就算是胡喬木擔任主要執筆，那麼，"中途喬木同志病休，由別人接替"，這個"別人"又是誰呢？

這個《農業六十條》的"起草委員會"，究竟是誰在真正負責，人們還要從毛澤東本人的文字中，才可看出端倪。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123頁收錄有毛澤東1962年7月31日《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改稿的批語》：

"印發各同志討論，提出修改意見，交陳伯達同志領導的起草委員會斟酌修改。

毛澤東

七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本人的批語再明白不過地表明《農業六十條》的"起草委員會"的實際領導人是陳伯達。

除了《農業六十條》的起草工作以外，陳伯達曾談到他在1961年至1962年間，還負責過其他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我在起草和修改《農業六十條》的那個時期，還起草了《商業工

作四十條》。另外，1962年初劉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我幫助起草和修改的。前幾年我剛被判刑以後，有人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說什麼我曾反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這簡直是胡說八道！那個講話主要是我幫助少奇同志起草的，我怎麼反對？莫名其妙麼。這些編瞎話的人，一點起碼的事實都不顧及。"

關於《商業四十條》的有關情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第896頁僅有一句提到：在1961年5至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過《商業四十條（試行草案)》。另外，筆者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161頁查到了一條有關材料。該書在毛澤東1962年8月27日《對中央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的批語》後面加的注釋〔1〕中這樣寫道：

> 注釋〔1〕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報送毛澤東的這一試行草案共四十條，對以下八個問題作出了規定：（一）商業工作的方針；（二）堅持等價交換原則，推廣農產品收購合同制度；（三）改進國營商業工作；（四）恢復供銷合作社；（五）恢復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六）開放農村集市貿易，活躍城鄉物資交流；（七）恢復同農村商業有關的農產品加工作坊；（八）改善商業企業的經營管理。陳伯達為報送這個草案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此件在北戴河重發給商業文件起草委員會各同志。聽說，有的同志認為，這個草案對商業工作問題，提出了許多解決辦法。在這次會議上，可以根據一年來的經驗和最近大家提的意見，作些新的補充和修改。"中央準備根據調查研究的情況，再擬定一個比較全面的商業工作條例，後因故沒有形成正式文件。

這段注釋文字扼要述及陳伯達主持起草的《商業四十條》的要點，以及陳伯達提出可根據試行一年來的經驗作些新的補充和修改的建議。

但是注釋中的最後一句話說，該文件草案“後因故沒有形成正式文件”，卻與事實不符。

1987年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詞典》第354頁，列有《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的詞目，該詞目的釋文寫道：

“《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又稱《商業四十條》，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頒佈。共8章40條。是在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商業工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的。文件規定了商業工作的基本方針和改進商業工作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商業四十條》規定的方針政策，在當時是行之有效的，至今仍有重要借鑒作用。”

由此可見，《商業四十條》在1961年就是作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頒佈的，怎麼能說“沒有形成正式文件”呢？至於在試行一段時期後又進行補充、修改，那也是自然的，不可借此而否定它是正式文件。事實正如《中國現代史詞典》所說，《商業四十條》是一個經過中共中央頒佈的，“在當時是行之有效的，至今仍有重要借鑒作用”的文件。

關於劉少奇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5頁和第56頁有兩篇毛澤東對劉少奇講話稿的批語，可以印證陳伯達所說的他曾幫助起草和修改該講話稿的情況是屬實的。

毛澤東在1962年1月10日對劉少奇講話稿的批語中寫道：“告少奇、小平、伯達同志：此兩部分已經看過一遍，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

毛澤東在此批語中，將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的名字與中央常委劉少奇、鄧小平兩人並列，其原因只能是陳伯達對該講話稿負重要責任。

毛澤東在1962年4月7日對劉少奇講話整理稿的批語中則寫道：“少奇、小平同志：此件已請陳伯達等幾位同志讀了一篇〈遍〉，有些修改，我看過了，認為修改得好。現送上請審閱。”

4. 中南海的日常生活

在敍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共高層的一些政治情況後，筆者想在此插進一節文字，敍述一下那一時期中南海的日常生活。這一節與陳伯達的談話雖然沒有多少直接的關係，而主要是根據筆者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所見所聞寫出的，但筆者認為加進這一節可以使讀者對當時中共高層的生活狀態有一個瞭解。

迄今為止，涉及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南海日常生活的文字著作並不多，有許多冠以“紅墻內外”、“中南海紀實”等等題目的著作，其實都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性著作，其內容無一例外是在為官方的說法做詮釋，以濃墨重彩將歷史人物進一步臉譜化。有的作者在進行這種詮釋和描繪時，為了使他們的書對讀者更具吸引力，不惜胡編亂造出一些故事，或者在議論上故作聳人之語，而對於中南海真實的生活情況，他們卻並未瞭解過。

中南海在明清時期是北京皇城的一部分，位於故宮紫禁城西面，屬於皇家園林西苑三海中的南部兩海。西苑三海又名太液池，為一長條狀的湖泊，湖上有兩座橋，將湖隔為三部分，按這三部分的位置，分別稱為北海、中海、南海。偏北的長橋將西苑三海整體又分成兩大部分：北側的北海，現今已辟為北海公園；南側的中海和南海，中海為大，南海為小，二者在狹窄的連接處為一小橋隔開，合稱為中南海，即今日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

中南海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幾經變遷。辛亥革命後不久，中南海即

脫離了清朝皇室的管轄，成為袁世凱的辦公處所。袁世凱稱帝的地點即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袁世凱死後，中南海曾繼續作為北洋政府的總統府。北洋政府消亡後，中南海一度改為公園。四十年代國共兩黨戰爭時期，傅作義曾在中南海辦公。北平和平解放以後，中共中央起初暫駐西郊香山，對於進京後選擇何處為辦公地點，一時猶豫不決，據說周恩來經過考察，建議以中南海為辦公地點，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議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園林的舊貌，作為公園為好，中共中央可另擇辦公地點。最後，毛澤東還是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確定中南海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辦公地點。

筆者1951年隨父親陳伯達進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陳家搬出中南海，前後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五年之久。初入中南海時，陳伯達臨時住在勤政殿裏的兩間房子裏。勤政殿離毛澤東住的豐澤園很近，是一所帶西式風格的建築，中華民國初期，袁世凱曾在這裏辦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裏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會議場所。在筆者的印象裏，勤政殿的名稱雖然很雅，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建築，外牆是灰色的，內牆是普通白灰粉刷的，地面上鋪着栗子色的寬木地板，室內沒有任何裝飾，反映出蓋這所建築時，中國的財力非常薄弱。

位於勤政殿和豐澤園的南面不遠處，是著名的瀛台。瀛台原是一個小島，四面臨水，北側有橋通岸。島上有幾間黃色琉璃瓦頂、紅漆門柱的殿堂建築。由於瀛台的存在，使得南海的湖面呈現出彎月的形狀。

瀛台因在清末關押過光緒皇帝而成為諸多文藝作品描寫的對象。筆者小時，曾被大人帶着在瀛台玩耍過幾次，並由當時專給毛澤東拍照的攝影師侯波拍過幾張照片。現今留下的印象就是：那裏極為安靜，靜到鴉雀無聲。

陳伯達在勤政殿住了不長的時間，就搬到中海岸邊一組連體四合

院內最北面的一套院落中去了。連體四合院由三個並排的四合院組成，它整個座西朝東，臨湖一側，有一條長廊連通整體，長廊向外的一面被花格木板牆封閉住了，廊上從南至北開有三個門，分別為三個四合院的出口，正中的門上掛着一個匾額，上有"迎春門"三個字，所以有的人就稱這裏為"迎春堂"，但我從沒有看見過"迎春堂"的匾額。據說，這裏在清代是宮中太監們的住所。陳伯達住進這裏時，該處院落仍保持着破舊的外貌，門柱的漆皮都已脱落，房頂的瓦上長着青草，只是房間裏已安裝了暖氣和衛生間。迎春堂的另兩個四合院是中南海普通工作人員的住所。

隨着年齡長大，逐漸懂事，我才知道我們住的地方屬於中南海的乙區。不知從何時起，中南海從南至北劃分為甲、乙、丙三個區。每個區都在分界處的路口上設立了崗哨，乙區的人可以隨便到丙區，但是不能隨便到甲區。從此我再也不可能隨便到南海的瀛台等處去玩了。

最初，中南海內的各區是這樣劃分的：甲區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所在地，乙區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在地，丙區為國務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內進行了大的調整，中央宣傳部陸續遷出中南海，搬到景山東面的沙灘去了。乙區劃歸中央辦公廳管轄，但甲乙區的劃分仍維持不變。中宣部搬走以後，原來屬於中宣部的一批院落進行了大的翻修，成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領導人的住宅。這些新搬來的領導人有鄧小平、陳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們與此地的老住戶李富春、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等，都屬於乙區的居民。

住在甲區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此外，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衛士長李銀橋也住在甲區。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住在中南海東岸西苑門內劃歸乙區的飛地"東八所"。住在丙區的有周恩來、李先

念、林伯渠等。還有一些領導人，五、六十年代並未住在中南海，他們當中有陳雲、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帥中除朱德、彭德懷、陳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七位，包括林彪、劉伯承在內，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兩區統歸中央辦公廳管轄後，仍維持甲乙區的劃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了照顧毛澤東夜間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習慣，確保毛澤東、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人的安全，所採取的一種安全措施。

中南海內主要有一條沿着湖泊西岸，貫穿南北的柏油馬路。這條路在南段伸往毛澤東住處的路口處設置的崗哨，是甲區和乙區間的主要崗哨。白天，崗亭的欄杆經常攔住路口，禁止所有車輛通行，以避免車輛行駛聲打擾毛澤東睡眠。到了夜間，這裏敞開路口，放行車輛。

乙區和丙區間的主要崗哨，設置在同一馬路北段的游泳池門口。崗哨以北屬於國務院的範圍。在南北兩個主要崗哨之間，迎春堂和游泳池以東，直到中海岸邊，是一片開闊的場地。場地東北角臨水處，幾株高大古樹扶疏枝葉的掩映中，有一座形態奇巧的假山，與國務院那邊臨水處的紫光閣相對映，形成了湖邊最好的景致。然而，每逢懷仁堂召開重要會議，懷仁堂門口的場地不敷停車使用，這片湖邊的場地就變成了主要的停車場。

懷仁堂位於中南海西大門（中南海有兩個西門，靠北的較小，屬於國務院，人們常說的西門或西大門，屬於中央辦公廳）內廣場的北側。五十年代，懷仁堂經過多次翻修，已非原貌，但其建築規模依舊，只能容納1000餘人。建國初期，北京沒有什麼大型會議場館，懷仁堂即被當作國家主要的會議禮堂使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在這裏舉行的。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後，懷仁堂裏就不再舉行大型會議了。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區，這對住在乙區的人們不免是件憾事。不過，每逢週末晚飯後7點多鐘，位於甲區的兩個娛樂場所允許乙區的人們光顧。這兩個場所，一個是春藕齋，一個是西樓餐廳。

春藕齋位於頤年堂旁邊，也是古老的建築，殿堂前後有種蓮藕的水池。頤年堂是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開小型會議的地方，普通人是進不去的。春藕齋則是週末舞會的場地，偶爾也放電影。這個地方我記得自己只去過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們跳舞，一次是看三十年代的老電影《桃李劫》，還有幾次是看當時亞洲電影節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兩畝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這一次，劉少奇也去了。記得當時觀眾不少，到了放映的時間，卻遲遲不開映，說是要等領導人，等到劉少奇來了，電影才開映。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中央下文禁止舉行舞會，春藕齋也就不再舉辦娛樂活動了。

西樓位於中南海西大門內南側。這裏有幾棟灰色磚瓦的新建築，被一道不高的灰磚牆圍着，組成一個單獨的院子，因為屬於甲區，圍牆東西兩側的門，有崗哨守衛。西樓是對圍牆內建築的統稱。這些建築主要包括：位於院子南面的兩棟外觀相同的五層小樓（下大上小，頂層只有一間房），偏東邊的樓為劉少奇的住宅，偏西邊的樓為朱德的住宅；北面靠近圍牆處有一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三層辦公樓；在這三個樓的東邊，南北走向的一個較大的建築，是西樓餐廳。

西樓餐廳原本是為領導人就餐而蓋起來的一個特灶食堂。它的東半部分是廚房，西半部分是餐廳，北邊有一過廳連通二者。廚房很寬大，可容四、五個大師傅同時做菜。餐廳寬敞豁亮，室內約有兩層樓高，地面大約比一個籃球場稍大些，鋪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西樓餐廳在中南海的實際生活中並不只是餐廳。它有時被用來召開小型會議，成為會議廳。現代史中有名的西樓會議就是在這裏開的。五、六

十年代，每逢週末或節假日的晚上，西樓餐廳經常放映電影，又成了兼職的電影廳。

西樓餐廳放電影是賣票的，一般的電影兩角錢一張票，上下集的電影三角錢一張票，與當時外面電影院的票價差不多，或者還稍貴些。放映的電影以國產片為主，也有蘇聯和友好國家的，偶爾也有香港片。這些影片大多數都早於外面的電影院在這裏上映。六十年代以後，不再放映香港片了。

每逢放電影時，餐廳靠南邊的位置都樹立起一個大螢幕，把靠北邊的不多幾個餐桌收拾好後，即在螢幕前擺上普通的坐椅，作為觀眾席使用，坐椅第一排放幾個沙發，作為首長席。放映機則安置在緊北邊靠近過廳處。一個很簡單的電影廳就這樣佈置好了。

中南海裏的人以警衛戰士為多，作為居民的人並不多，警衛戰士不能參加居民的娛樂活動，所以到西樓餐廳觀看電影的觀眾也並不很多。經常去看電影的，大人小孩加在一起，大概不過一百多人。領導人中常看電影的，只有李富春、蔡暢夫婦，楊尚昆、李伯釗夫婦。劉少奇、朱德、陸定一、胡喬木偶爾也去看，他們去看的多半是國產新片，屬於"審查片"。其他領導人則極少去看電影。

中南海裏的另一公眾娛樂場所，同時也是健身場所的地方，是游泳池。游泳池位於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兩個部分，北面是露天游泳池，南面是室內游泳池，均設計得很典雅，在裝飾上，並不華麗，但也是不同部位鋪設不同的瓷磚，非當時的普通游泳池可比。對中南海的居民開放的，只有露天游泳池。室內游泳池一般只供毛澤東、劉少奇等少數領導人使用，池水可加溫，冬天也可以游泳。

露天游泳池只在夏季每天下午1點至3點開放，與西樓餐廳一樣，它也對居民公開賣票，票價是每張1角錢，這與當時外面對市民開放的

游泳池的票價相似。

每年學校放暑假期間，中南海的小孩子們都在中午蜂擁而至地進入游泳池游泳，加上許多工作人員也可買票進入，常使游泳池人滿為患。我的繼母劉叔宴想讓我和兩個妹妹避開擁擠，就設法與游泳池管理人員聯繫，請他們通融一下，允許我們兄妹在上午10點到12點之間去游泳。因我們家與游泳池可算是鄰居，比較好說話，很容易就得到了允許。

1961年以後，我沒有再去過北戴河了，從61年至64年，游泳池成了我暑假活動的主要場所。每天上午，除我們兄妹外，少有其他游泳者。環境幽靜、溫馨而愜意，任由我們在池水中暢遊，這使我輕鬆地學會了各種姿勢的游泳。

當然，偶爾也會有意外的游泳者光臨。有一次，羅瑞卿和楊尚昆一起來了。他們兩位是游泳老手，只在深水區遊，一邊還互相交談，沒有和我們小孩子接觸。羅瑞卿手上還帶着一塊錶，當時國內帶防水錶游泳的人極少，所以很是顯眼。還有一次，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在兩個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來了，給我的印象是她很特殊，她比我大幾歲，還要大人陪着。過了一會兒，羅榮桓的兒子也來了，他與林豆豆都不住在中南海，是事先經過聯繫才進來的，他們兩人互相很熟。

六十年代中後期，游泳池的狀況有了很大變化。它的室內部分逐漸成為毛澤東的專用游泳池，一般的領導人已很少進去了。在室內游泳池的南端，原有一個不大的小花園，也被佔用了部分土地，加蓋了房子，加蓋的部分與室內游泳池聯成一體，外　塗成一樣的乳黃色。這裏後來成為毛澤東在中南海的第二個住所。1965年夏天，我到內蒙古臨河縣下鄉，中南海游泳池的室外部分是否還對一般人開放過，就不清楚了。

在五十年代，每逢冬季結冰期，中南海還有另一處季節性的健身場地，那就是中海西岸邊的滑冰場。滑冰場很小，也很簡陋，只是一塊用長木棍圍起來的冰凍湖面而已。似乎沒有人專門管理，只是偶爾有人在夜裏掃去冰碴，給冰上的裂紋澆水補縫。滑冰的人隨時可以去，也沒有人收錢。那時，中南海裏會滑冰的人極少，滑冰場上往往只有五、六個人的身影。劉叔宴是少數幾個會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們兄妹都是靠她教會的。我學會滑冰以後，有別的小孩請我教，記得我教過楊尚昆的女兒妞妞，她學得很吃力，究竟學會沒有，已無印象了。

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因人們的食品受到嚴格的定量供應，中南海裏的居民們也需要節約自己的體力，冬季的滑冰場也就不知不覺地被取消了。與滑冰場同樣命運的，還有一個夏季的划船碼頭，它原來設在中海西岸乙區一側，大約共有十來條木船，有一個專人管理。住在中南海的人家，夏季可隨時來此處划船兜風。有次劉少奇帶全家人分乘兩條船在湖上遊玩，因他家人多，嬉笑之聲在湖面上飄蕩，很是惹人注目。後來這個碼頭不知何故被取消了，直到今天也沒有再恢復。過去，途經北海大橋以及在北海白塔跟前登高遊覽的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瞭望到大橋南側中海湖面上星星點點的划船者。如今，人們再也看不到這一景致了，抬眼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寧靜的湖水。

在整個經濟困難時期，中南海裏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數居民一樣，都經歷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飯要糧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但在副食品供應方面，他們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東　外北長街的一個院落內，有個被稱為供應站的單位，專門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供應。那時，這裏的設備並不先進，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塊進行冷凍儲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貨

架，儲存着從生產部門和市場上選購來的各類食品，包括糧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贈送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也都由這裏管理分配。中南海裏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單獨起灶做飯的一些領導人的廚師，都是來這裏購買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場去購買。有一些在市面上難以買到的名牌煙、酒，也可以在這裏買到，但購買的數量受到限制，這類東西是憑特供證定量供應的。我們家是極少使用特供證的，陳伯達從來都是煙酒不沾。在困難時期，陳伯達的糧食定量也定得極低。

有一次我和劉叔宴談到，有個同學說他父親參加中央的會議或到外地開會時，吃飯不用交糧票，所以他們家的糧票很寬裕，我說我們家糧票可是很緊，他都不相信。

劉叔宴皺着眉頭說：“會有這種事？不應該的！你爸爸開什麼會都要交糧票的。”

“去外地開會也要交糧票嗎？是不是也可以不交，你們自己非要交的？”

“前些時候你爸爸去廬山開中央的會，會議通知上還寫着叫帶糧票呢。每次開會我們都是按規定交糧票的，沒有過例外。你爸爸糧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咱們家糧票一直很緊啊！”

“爸爸糧食定量怎麼那麼低呀？”

“機關裏讓自己先提出定量的數字，你爸爸報的是21斤，就給定了21斤。我比你爸爸多報了3斤，就定了24斤。”

還有一件事，我至今難以忘卻。

我在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的第一個學期，一次週末回家，我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飯時，談了從同學處聽來的情況：

“有個同學，初中是在八一學校（北京軍區管轄的軍隊幹部子弟學

校)上的學。他說，最困難的那段時候，八一學校的糧食也不夠吃，學校就想辦法買了一批不要糧票的高級點心，分給同學們吃。有的同學不願意吃點心，都給扔了。"

"不要再說下去了！" 父親突然憤怒地大喝一聲，嚇了我一跳。

"別這樣，聽一聽他們小孩子講的，可以瞭解些情況。"劉叔宴冷靜地說了一句。

父親把空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飯也不再吃了，起身到書房去了。

"爸爸怎麼了？"我很不理解爸爸的舉動，他很少這樣發脾氣的。

"哎，這兩年國家遇到經濟困難，糧食緊張，有的地方還餓死了人。可是竟然還有人這樣浪費糧食！你爸爸聽不下去這種事。我們有些幹部子女也是太不像話了。你爸爸現在連規定供應他的雞蛋都不肯吃，因為他知道國家正在出口雞蛋，用雞蛋來換取急需的農業機械。前幾天辦公廳管伙食的人還來勸過你爸爸呢。"

聽了劉叔宴的解釋，我默默地吃完碗裏的飯，沒有再說一句話。

從這件事，我開始理解為什麼陳伯達對有些高級幹部及其子女脫離羣眾講享受的行為有那麼大的反感情緒。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裏的領導人的伙食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

管理領導人伙食的部門是西樓餐廳，又稱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樓餐廳就餐的人有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在這裏打飯回家吃的有陳伯達一家。表面上看西樓餐廳直接服務的人家並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裏單獨起灶做飯的領導人的廚師，也大多是從西樓餐廳派出的，所以這裏的廚師最瞭解各個領導人的伙食情況。

有一次，我隨李景如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坐着等候時，因為到餐廳吃飯的人都還沒來，一個廚師就過來和我們閒聊："你們家的菜好做，一會兒就得。你們家五、六口人吧？一個月八、九

十元的伙食，最多時也不過一百零幾塊(餐廳每月底結賬，收取各家的伙食費)，在這兒是低的啦。林伯渠老倆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塊。不過他們老倆掙的多，年紀大了，又沒子女在身邊，吃好些也是應該的。在這兒吃飯的幾家，數楊尚昆家的飯不好做，他們老愛吃西餐大菜！”

陳伯達吃飯一般是三菜一湯。菜是一葷兩素。葷菜多半是溜肝尖、獅子頭一類常見菜。遇到家人團聚，他常加點個紅燒黃魚、魷魚等，逢年過節，有時點個對蝦或海參，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邊長大的人，有吃水產的習慣。

楊尚昆愛吃的西餐大菜，我們家從未吃過。楊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釗年輕時在蘇聯居住多年。他們愛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釗的衣着也保持着蘇聯人的習慣樣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襪子而不穿褲子，在中南海裏顯得很特殊。

其他人的伙食情況，我未曾耳聞，但我知道劉少奇一家的經濟狀況是不太寬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會太高。

劉少奇家裏人口多，除三個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飯外，其餘五個孩子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為劉的前妻王前所生；後三人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瀟瀟)都隨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樓餐廳吃飯。當時劉少奇雖然工資高，但王光美參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級幹部，月工資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錢太多的事，他們家是難以承受的。這裏只講一下我所熟悉的劉少奇之子劉丁丁(後改名劉允真)的情況，人們即可管中窺豹了。

劉丁丁和我是同歲，1951年我上北海幼稚園，他即和我同班。後來我們又一起於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學上學，仍是同班。育英小學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屬幹部子弟小學，它的校舍和設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卻比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萬壽路附近。孩子們都

是住校，可這裏卻不通公共汽車，每週六、日由各機關派出的班車接送孩子們往返。個別高幹擺排場，用公家的轎車接送孩子。劉少奇從來沒有用轎車接送過孩子，劉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過中南海北門的中央宣傳部的班車。

1957年夏，育英小學發生了一個大變化。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取消幹部子弟學校的建制，所有這類學校都對社會開放，學生費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學實行的是供給制，學生們從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學校包攬，費用由公家撥付。取消幹部子弟學校的建制後，這些費用都由已實行薪金制的家長們支付了。

育英小學改制後，規定每個學生除了學雜費外，每月的食宿費為三十多元。這對我家是沒有問題的。但劉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負擔不起了。為了節省開支，劉家就讓丁丁轉學到離中南海較近的師大附小，每日走讀，至少不用花住宿費。

1959年我小學畢業，考入位於圓明園遺址的一〇一中學上初中。劉丁丁也到了該校，但和我不是一個班。一〇一中名氣雖大，但當時設施落後，生活條件艱苦，學生宿舍連暖氣都沒有，食堂伙食也極差，因而各項收費都很低廉。學生中，幹部子弟、普通百姓子弟、周圍幾所大學的教師子弟，大概各佔三分之一，幹部子弟中，因嫌該校生活艱苦而中途轉學者，不乏其人。

每逢週末回家和返校，我和丁丁仍結伴同行。我們倆除了在動物園轉車時，偶爾在貨攤上買包兩角錢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棗(當時國家從中東進口了許多這種蜜棗)，填補一下未吃飽的肚子外，從來沒有往學校帶過食品，可見丁丁家和我家一樣，沒有多餘的食品，不像蔣南翔的兒子蔣延東等個別同學，經常往學校裏帶糖果等食品。

1962年我和丁丁初中畢業，我考入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丁丁因

成績差，沒有考上高中。一〇一中曾提出可破例留他再讀一年，但是劉少奇沒有同意。後來丁丁被分配到良鄉農業機械學校(該校屬於中專，錄取部分中考落榜生)。那所學校位於房山區，離市里很遠。從此我和丁丁就未再接觸了。

除了劉少奇家經濟不寬裕外，困難時期，李富春、蔡暢夫婦一家的糧票也比較緊缺。那時，他們老倆有個外孫，小名叫安德列，和他們住在一起。安德列比我小五、六歲，平時與我沒有說過話，他的父親是蘇聯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羅斯人，而且起了個俄式的小名。

有段時間，不知為何，安德列常單獨一人去西樓餐廳吃飯。一次我和李玉元(1958年李景如調到清河製呢廠工作，李玉元接替了他)去打飯，正遇見一位廚師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訓斥安德列。我們見狀只好退坐到擺在東牆根的椅子上。廚房裏叮叮噹噹的炒菜聲淹沒了廚師的說話聲。過了一會兒，安德列走了。李玉元問廚師："什麼事呀？"廚師說："他吃飯有好幾天沒給糧票，那哪行啊？我在給他上政治課，催他趕緊交糧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裏的生活氛圍基本是祥和、清靜的，但有時清靜到了過於肅穆的程度，使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裏居住的少年兒童本來就很少，可大人還常常告誡孩子們："不要隨便串門！"因為每個領導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家即是辦公室，小孩子串門即有妨礙大人辦公之嫌。中南海裏雖說不上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但是崗哨也是夠多的。除了甲乙丙區分界路口有崗哨外，重要領導人的家門口還增設了崗哨。這些都使小孩子們望而卻步，自動地縮小了自己的活動範圍。

在我的少年時期，除因與劉丁丁曾是同班同學，時有來往外，與

其他小朋友的接觸極少。偶爾，丁丁帶他姐姐劉濤和幾個弟弟妹妹來我家，目的是翻閱小人書(連環畫)。那時，我家的各種圖書都很多，除陳伯達自己常跑書店購買學術類書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將新出版的部分書贈閱於他。這些贈閱的書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書。劉少奇家藏書不太多，更沒有這些小人書。可能是劉家的孩子有時來我家看書的緣故，有一次，王光美專門送了一大瓶葡萄乾給我妹妹嶺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們之間來往少，還源於大人們之間來往少，串門少。大人們除了中央召集會議時聚在一起外，私下裏的來往稀少到幾乎屈指可數。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們難以想像的。

首先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範圍內串門，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走訪過中南海裏的其他住戶。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們偶爾造訪過。例如，建國初期毛澤東曾登門拜訪過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劉少奇曾去過宋慶齡和賀龍的家。

凡是來我家串過門的領導人，只要是我在家裏遇見或聽家裏人說起過的，我都留有印象。記得朱德來過一次，是陳伯達剛搬家到迎春堂時來的。彭德懷夫婦來過三次，前文已提到過。陳毅剛搬家到中南海時來過一次，後與周總理共同來過一次。周總理1965年獨自來過一次，正巧我住在學校不在家。胡喬木、陸定一來過兩次，我也都沒在家。彭真來的次數較多，陳伯達也去過位於台基廠的彭家，並帶我去過一次。康生來過三次，陳伯達也去過康家。陶鑄來北京開會時來過三幾次。李雪峯夫婦來過一次。周揚來過兩三次。王震來過一次。葉飛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帶領十幾位福建省的幹部一起來過一次。薄一波來訪的一次，則是1965年陳伯達已將家中書籍等物搬出中南海，在新建胡同原顧維鈞舊居進行安頓的時候（1966年底陳家全部搬至此處），陳伯達的公務員李景如目睹了薄一波到新建胡同拜訪陳的情形。另外，陳伯達

與張鼎丞也有來往，曾帶我去過一次張鼎丞的家。

還有一些當時不屬於領導人的知名幹部，如艾思奇、鄧力羣、田家英、王力、楊波等，也曾多次到過陳伯達的家。

田家英在五十年代初期與陳伯達來往頻繁，後來就逐漸減少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53年3月5日晚上。雖然當時我年幼，離7周歲還差一個多月，但因事情很特別，所以至今無法忘記。

那天晚上天黑不久，我正在陳伯達辦公的房間看畫報，田家英來了。他一臉的愁容，坐下後耷拉着腦袋對陳伯達說："斯大林逝世了，剛才電台已經廣播了。"話音剛落，他就嗚嗚咽咽地哭起來。陳伯達皺着眉頭，表情嚴肅，一言不發。我對眼前的景象感到驚奇。

"哎！那麼大的人還哭鼻子啊！沒出息。"我的話脫口而出。

陳伯達立刻訓斥我："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亂說話！"

"我怎麼了？"

"斯大林，你聽說過嗎？"

"你是說斯大林老公公吧？當然知道了。"

那時斯大林的名字早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電台廣播的歌曲裏，幼稚園阿姨的說話裏，到處都能聽見"斯大林大元帥"、"斯大林老公公"這類稱呼。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斯大林老公公逝世了。"陳伯達仍表情木然地說道。田家英則還在一旁啜泣着。

"逝世了是什麼意思呀？"

我第一次聽說"逝世"這個詞，自然不能理解。

"逝世就是死了。"

"噢，斯大林老公公死了呀，幹嘛要說逝世呢？"

我嘟囔着。陳伯達沒有再理會我，歪過頭問田家英："主席知道

了沒有？”

田家英搖搖頭：“還不知道，還沒有告訴他。”

陳伯達對田家英說：“那我們現在一起去他那裏吧。”說着就起身與田一起走出了家門。

這件事情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鏡頭，它反映了當時中國黨政機關裏的人們對斯大林的情感和態度，反映了中蘇兩國關係在歷史上曾經達到的密切程度。所以，事情雖小，我認為還是值得寫出來。

隨着田家英地位的提高，陳伯達與田家英在六十年代逐漸疏遠了，但他們在較長的時期內仍保持着書客之誼。陳伯達去琉璃廠逛舊書店，仍常約上田家英、陳秉忱一起去。直到毛澤東親口告訴陳伯達，田家英在背後講他的壞話，兩人的關係才出現了無可挽回的破裂。

與陳伯達在古籍書畫上有過交往的，還有幾位住在中南海以外，甚至是北京以外的文人墨客。他們當中有：郭沫若、李一氓、王襄、阿英、黃胄等。王襄是中國第一代甲骨文學者、書法家、曾任天津市文史館館長，阿英和黃胄分別是著名的文人和畫家。他們與陳伯達之間時有交往，並且互相贈送過古籍書畫等。陳伯達倒台後，他自己購置的書籍連同過去朋友們贈送的書籍全被抄沒，直到他去世，都再也沒能看到這些物品。1996年，經筆者再三向中共中央提出請求，收存陳伯達物品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才發還了很少一部分書籍（前文已提到過）。其中除了有康生和陳秉忱贈送的碑帖各兩本外，其他人贈送陳伯達的書籍均下落不明。

那個時候，大人們之間的來往，小孩子們是並不在意的。小孩子們在意的是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這裏就順便說一說中南海裏的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從中也可以看到大人們不同的個性。

大人中，最喜歡小孩的是朱德。小時候，他來我家作客時的印象

是模糊的，但是我漸漸長大後，每次隨公務員李景如或李玉元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等候時，遇到他來吃飯，他從餐廳看見我，總要慢慢走過來，一邊笑呵呵地，一邊伸出一雙手，我就趕緊伸過手去和他握握手，並且說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說什麼，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這樣，像做功課一樣。朱德很喜歡小孩子。他與康克清沒有孩子。在與康克清結婚前，他有過一兒一女。兒子很早就參了軍，解放後年紀已很大了。女兒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孫，小名沃沃。因嫌家裏小孩太少，朱德還把老家的幾個侄孫接來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樓吃飯。

陳毅也比較喜歡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動說什麼，只是帶着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擠擠眼。有時他擠完眼也戲稱一句："小鬼！"

劉少奇對自家的孩子可能不錯，對別人的小孩卻比較冷漠。我有兩次遇見他和家人在中海岸邊散步，他對別人家的孩子目不旁顧、表情嚴肅，從不多說一句話，總是旁若無人地照直向前走去。

楊尚昆見到小孩喜歡說兩句，但他總擺大人架子，大搖大擺地邊說邊走，並不停下步來聽小孩回答什麼。

毛澤東是那個時代少年兒童們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陳伯達在懷仁堂看戲時，遠遠地看見過他兩次。但真正面對面地相見，則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時候。

那年，陳伯達正在天津市搞工業調查，五一節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過。恰逢那幾天毛澤東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劉叔宴帶我和兩個妹妹到了天津。當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幹部俱樂部參加娛樂活動。

天津市幹部俱樂部是一座宏麗的建築，解放前是外國人和有錢人聚會娛樂的場所，解放後改為幹部俱樂部。我在北京還沒有見過這樣豪華的綜合性娛樂場所，至少中南海裏沒有這樣的俱樂部。

我們先去參觀了俱樂部的室內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寬敞，比中南海裏的室內游泳池空間更大，裝飾更考究。當時，偌大的游泳池裏只見楊尚昆一個人在池水中游泳，顯得優哉遊哉的樣子。我們正觀望時，有人告訴說，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幹部俱樂部，楊尚昆就是陪毛主席來的。

接着我們來到地球室，玩了一會兒滾地球（現在稱為保齡球）。劉叔宴心情很高興，對我們三個小孩說："今天讓你們幾個土包子開眼界了。"說實話，我平生只玩過一次這種遊戲，以後再沒有玩過。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們即來到一個小型的演出廳。毛澤東正坐在此廳中間的一張長沙發裏觀看折子戲。一個不到十歲的小演員在飾演孫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澤東看得聚精會神、喜笑顏開。一齣戲演罷，毛澤東笑呵呵地向小演員詢問年齡、身世等情況。這時，陳伯達轉身問我和兩個妹妹："我領你們見見毛主席，好不好？"我們連連點頭。小演員剛退場，陳伯達大步走到毛澤東身後側面，說："主席，他們小孩子想見見你。"話音剛落，毛澤東立刻站了起來。我和兩個妹妹趕緊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時，我們都是用雙手和毛主席的雙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間沒有說一句話，氣氛顯得十分嚴肅。

事後，劉叔宴對我們說道："你們見毛主席時也太緊張了，連一句'毛主席好！'都沒問。"

前兩年，看了權延赤寫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書中記述了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所談毛澤東接見來客的一些情況：

"對於黨內同志，毛澤東不搞迎客送客之類禮節。他有躺在床上辦公的習慣。我曾觀察過，有時國家、政府和軍隊的主要領導同志來請示匯報工作，他也並不起身，繼續批閱文件。有時聽了幾句匯報才作個手勢：'坐麼，坐下說。'如果毛澤東是坐在沙發上，黨內同志來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個手勢讓同志們也坐，坐下後有什麼事就說什麼事，

開話不多。"

照李銀橋所說的情況，毛澤東接見我們兄妹時，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是破例的舉動。因為，雖然當時毛澤東是處在公眾場合，但那是一個娛樂的場合，仍然不必拘泥任何禮節，何況我們僅只是他的下屬的子女而已。我想，毛澤東之所以很鄭重地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接見我們三個小孩子，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知道我哥哥陳小達之死的內情。而此時，陳伯達本人卻還不知道陳小達之死的事。

毛澤東在天津，是住在馬場道5號的一棟花園洋房裏，那裏解放前是美國駐天津領事館，解放後改作招待所。陳伯達則是住在一位資本家的舊宅。該資本家有多處住宅，解放後他把其中不常住的房子捐給了國家，也被改作招待所。後來幾年，陳伯達去天津搞工業調查時，也曾住過馬場道5號毛澤東住過的房子。有一回節假日，我們家屬也同去那裏住過。那所房子結構靈巧，但畢竟年代久了，內部並不顯得豪華。天津在1958年還曾專為毛澤東蓋過一處平房，但毛澤東從來沒有在那裏住過。

1958年大躍進期間，各地大興土木，中南海在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的管轄下，也曾準備大拆大蓋。當時，陳伯達聞訊後很生氣，曾在家裏和劉叔宴商議，如果中南海大興土木，就搬出中南海，並告訴我們兄妹準備搬家。不久，楊尚昆趁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時候，擅自決定把居仁堂(解放後曾作為中央軍委的辦公處)拆掉了。毛澤東回北京後，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發現居仁堂不見了，很是生氣，嚴厲批評了楊尚昆，終於制止了楊尚昆在中南海大興土木的計劃。

陳伯達在中南海居住期間，還遇到過兩件不愉快的小事。

1955年實行軍銜制以後，軍隊強調正規化。中央警衛局規定中南海的門衛實行一項新制度：對進出大門的領導人須行軍禮，以示軍風莊重。究竟屬於什麼級別的幹部才得享受敬禮待遇，我不甚清楚，但陳伯

達是被列為敬禮的對象之一的。這樣，陳伯達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轎車出入中南海時，大門口的值勤軍官一看來車，就大喊一聲："敬禮！"門柱兩邊的衛兵立即立正行軍禮。陳伯達對這項制度很不習慣，但既然出於中央警衛局的規定，他也無可奈何。

不久，有一個情況為難了中南海西門的警衛。陳伯達閒暇時，常徒步出西門，搭14路公共汽車去琉璃廠舊書店買書。領導幹部乘坐轎車出入，衛兵行個禮無妨，若徒步出入也行軍禮，卻十分彆扭。因為那樣會引起門外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觀看。我曾有兩次陪陳伯達步行出西門。站在門口內側的值勤軍官早已認得陳伯達，見他走近時，便突如其來地高喊一聲："敬禮！"衛兵們立即舉手敬禮。陳伯達也忙不迭地邊走邊舉右手還禮。這種過份嚴肅的儀式，令我這個少年人感到渾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門。幸好當時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沒有引得人們過來看稀罕。

據聞，後來警衛部門向上級反映過這一情況，認為萬一有國民黨潛伏特務發現了其中的規律，根據是否行禮來判斷出入者的身份，跟蹤步行出門的領導人，則極易發生安全問題。於是對步行者敬禮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澤東對過份強調正規化提出意見，要求領導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羣眾中。中央警衛局為貫徹毛澤東的意見，就完全取消了對領導人敬禮的制度。

雖然陳伯達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門時曾遇到衛兵敬禮的麻煩，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門卻遇到過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陳伯達步行出北門到北海大橋東面的團城看工藝美術展覽。兩個多小時後，仍步行回來入北門。此時，太陽已西落，門衛剛換了崗。陳伯達平時未曾徒步出入此門，衛兵自然不認識他，便按規定仔細查驗他的出入證。出入證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簽發的，沒

有任何問題，但是證上的"陳伯達"這個名字顯然衛兵很生疏。證上還有兩欄：單位一欄寫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職務一欄卻是空着的。當時，居住在中南海內的高級幹部極少有步行出門的，衛兵們沒有直接查驗過高級幹部的出入證，更未見過這種職務欄空缺的出入證。

"職務這一欄為什麼沒有填？"衛兵懷疑地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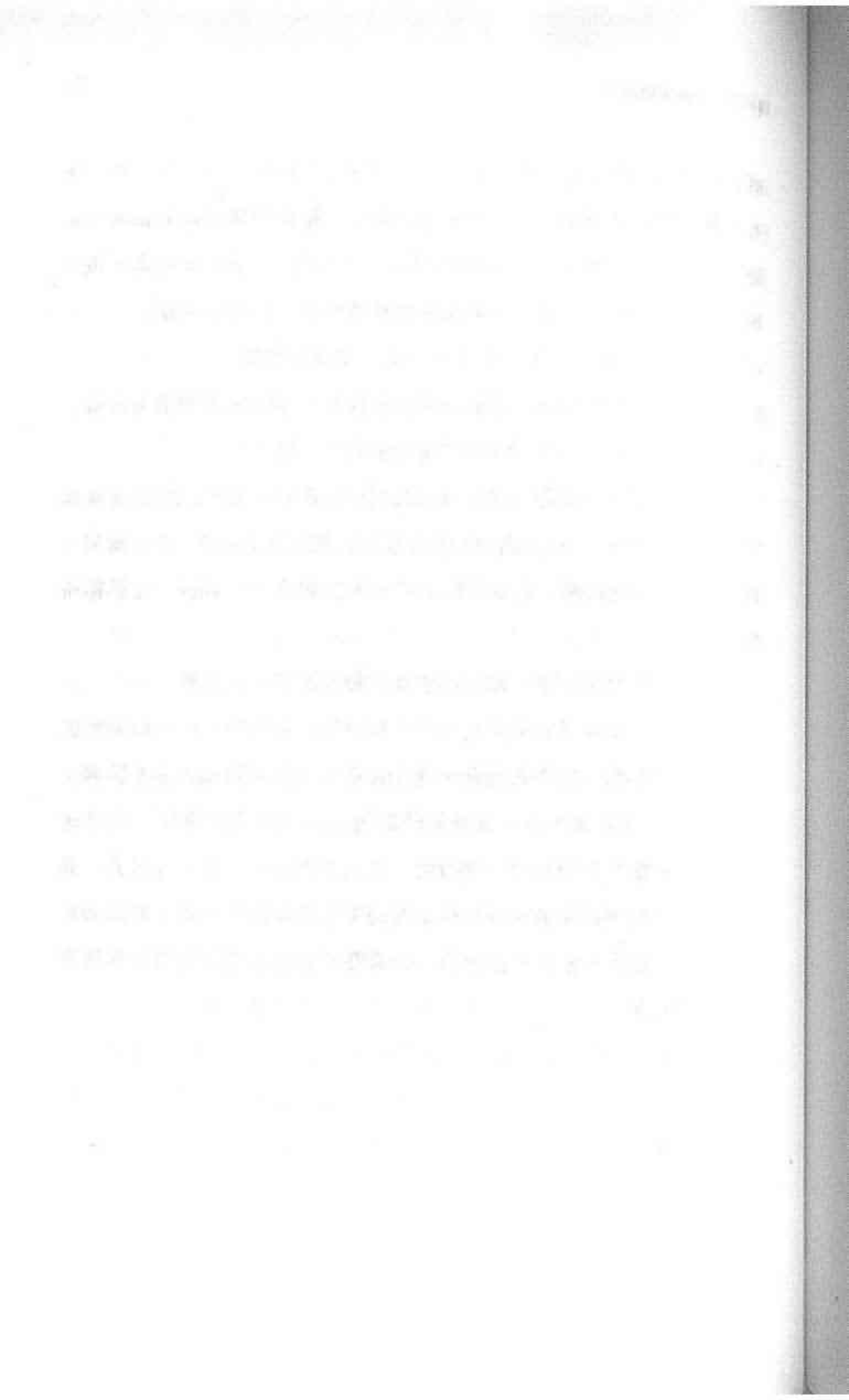
"發給我就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陳伯達慢騰騰地回答。

衛兵皺了皺眉頭："那你到警衛室去一下吧！"

陳伯達與我一起進入門內東側的警衛室。一個軍官態度還算和氣，讓我們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間屋去打電話請示領導。不一會兒，軍官放下電話走出來，連聲道對不起。陳伯達說："沒關係，你們做得很對。"

這件事本來是小事一樁，沒想到事後卻傳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張蘭華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工作。該所辦公室副主任鄒本浩，當年在胡喬木處工作過。一次，他與我妻在閒聊中提及此事，便笑個不止，說是當時聽說陳伯達因不修邊幅，布衣舊衫，被衛兵當作是盲流市內的野老，擋在大門之外盤查許久云云。其實事情並沒有那樣複雜。陳伯達畢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證，該證屬於絕密證件，並非一般人所能擁有。須知當年社會上還沒有時下那種高超的作偽技術。



5 黨內矛盾逐漸激化

1. 周恩來與陸定一爭論知試份子問題

隨着《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在全國農村的貫徹落實，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整個國民經濟的形勢開始好轉。但是在政治方面，中共黨內卻出現了新的複雜的矛盾。由於領導體制本身存在的缺陷，這些矛盾未能尋找到妥善的解決方式，反而逐漸走上了愈益激化的道路。

關於六十年代初期的黨內矛盾，已有不少著作有所描述，但是這些著作往往只述及了矛盾的某些部分，卻忽略了另外一些部分。

筆者曾着重就官方不願披露和官方學者們有意忽略的中共中央內部爭論的一些情況，向陳伯達作過詢問。

我問道："有不少文章都提到，在1962年的廣州會議上，周總理和陳毅都曾講話，說要給知識份子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這件事為什麼後來就沒有下文了？為什麼當時沒有形成一個決議？如果當時能有一個正式的決議，那政治方面的形勢肯定會好得多。"

陳伯達回答說；

"那時周恩來同志提出這個問題，認為知識份子中的絕大多數都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不應該再戴'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他提的很好。開始毛主席也沒有表示不贊成，但是中央有一些人不贊成，主要是陸定一明確表示反對。陸定一說知識份子沒有什麼變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他和周總理爭論的很厲害，僵持不下。陸定一當時是中宣部長，主管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

意見，就把這件事放到一邊去了。"

關於陸定一反對為知識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這件事，絕大多數中共黨史著作都採取了回避的態度。但是也有個別學者在著作中有所涉及。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陳晉，在他以個人的身份寫作的《文人毛澤東》一書中曾這樣寫道：

毛澤東在會後當然知道了"勞動人民知識份子"這個新說法，沒有聽說他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周恩來在這個月底的全國人代會二屆三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明確肯定我國知識份子的大多數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按慣例，《政府工作報告》是中央通過的，也就是說其中關於知識份子的新提法是毛澤東和中央同意和審閱過的。

可是，這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對統統為知識份子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表示了懷疑，於是這次會議對知識份子既不說是勞動人民的，也不說是資產階級的。11月間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知識份子的定性還是發生了一場爭論。主管意識形態的副總理陸定一明確表示不同意周恩來的提法，相持不下的時候，總書記鄧小平出面敲定："一切按總理在人大報告中所說，那是中央批准的"。顯然是想結束這場爭論。但此後的實際做法，還是把知識份子當作資產階級範圍的人來看待的。

周恩來的講話，文藝界的動作，不同的意見，不會不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裏。胡喬木回憶：

"黨中央對思想政治上的'左'傾觀點沒有做出徹底清理。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在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示態度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這個情形是後來黨對知識份子、知識、文化、教育

的政策再次出現大反復的預兆。"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500-501 頁）

陳晉的書十分清楚地講到"主管意識形態的副總理陸定一不同意周恩來的提法。"但是書中引用的胡喬木的回憶卻含糊其詞，只是說對周恩來、陳毅在廣州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如果反對者是政治上已經倒台的人，那胡喬木早就明點其名了，然而反對者是被中共中央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理論家的陸定一，胡喬木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不敢直呼其名了。其實，不只是胡喬木，中共的許多理論工作者都遵守這種不成文的規矩，讀這類書，這一點曲筆不可不知。

陸定一與周恩來爭論的事件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就表述的更加隱晦了：

關於知識份子階級屬性問題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到了 1962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央召開的宣傳文教會議上，特別是中南組，在討論中分歧很大。11 月 26 日陸定一同志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匯報了會議上的不同意見，周恩來聽後明確表示："對知識份子，說我們提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准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勞動人民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份子有什麼錯誤。"（見該書 1007 頁）

薄一波的這段敘述完全沒有引用陸定一本人的話，僅只婉轉地說陸定一"匯報了會議上的不同意見"，但細心的讀者還是不難從周恩來的反駁言辭中看出當時爭論之激烈的程度，不難看出周恩來對陸定一指責的氣憤。周恩來在反駁陸定一時所提到的劉少奇的憲法報告，即是由陳伯達起草，經過毛澤東、劉少奇修改的 1954 年的憲法報告（本書前

文已有敍述）。那篇報告所表達的，同時也即是陳伯達的觀點。

胡喬木說過："歷史是不能刪改的"。陸定一率先反對周恩來、陳毅為知識份子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是一件事關中共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歷史事實。其後，毛澤東從猶豫不決轉變為完全接受了陸定一的觀點，並對陸定一的觀點加以發展，形成了中共中央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知識份子的"左"的政策。而陸定一本人，也因在促成這一政策中的作用，於1964年為加強無產階級在文化領域的領導權而兼任文化部長，取代被認定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茅盾同志。這種狀況為期不長，1965年，發生了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罵林彪全家的事件，陸定一受此事株連，被中共中央決定立案調查，隨後被撤銷了所有的職務。

從學理的角度來說，陸定一1962年的階級鬥爭理論與毛澤東1965年以後的階級鬥爭理論還是有一些不同之處，即按陸定一的理論，社會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主要是指知識份子，而按毛澤東的理論，資產階級主要是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兩個人在理論上的鋒芒所向是不一樣的。[1]

2. 閻紅彥與習仲勳因小說《劉志丹》而發生的衝突

一次，我問陳伯達：

"六十年代初，小說《劉志丹》被批判是怎麼回事？那年《工人日報》連載《劉志丹》，我也看過好幾期，當時正是放暑假的時候，時間

---

[1] 筆者在寫完本節之後，看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373頁記載，在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會議上，"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聯合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據此，陸定一是第一個把整個文化部看成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部門的人。他的這一觀點對毛澤東晚年決心開展"文化革命"有重要的影響。

不長就不連載了。後來就聽說小說有問題。”

陳伯達說：

“小說《劉志丹》的事，是閻紅彥同志提出的，他說這部小說是寫高崗的，還責備習仲勳同志支持了這部小說。這件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當作了一件大事，牽連了好幾個同志。從這件事開始，黨內一些人對文藝作品開始敏感。”

關於小說《劉志丹》事件的始末，陳晉的《文人毛澤東》中有過敘述，現摘錄如下：

> 《劉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是劉志丹的弟媳。她從1956年就開始着手寫作此書，於1962年寫出小說的第五稿後，工人出版社印出樣書，送請有關領導和中宣部審查，與此同時，《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開始連載該書的部分章節。
>
> 黨的歷史上向來有一個“西北問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前，西北革命根據地黨的內部劉志丹、高崗、謝子長、習仲勳等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也是陝北革命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看了《劉志丹》送審樣書後，認為小說涉及西北革命歷史問題，“很多原則性問題與歷史不符”，不贊成出版。他一面向全總和團中央建議停止刊載，一面向中央負責文教工作的康生反映。康生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停止發表《劉志丹》，並於8月24日寫信給中辦主任楊尚昆，要中央書記處處理這件事。康生當時並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卻在信中斷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的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小說的性質就這樣起了變化。
>
> 這個時候，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在北戴河開會，也正是毛澤東在會上講階級，講矛盾，批評各種翻案風的時候。與會的康生自是有備而來，他的皮包裏夾着一疊精心準備的有關《劉志丹》的材料。當9月24日

>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他給毛澤東遞了一個條子，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的小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
>
> 八屆十中全會後，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清查習仲勳等同志反黨活動委員會"，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均被指為小說《劉志丹》的幕後主持人和策劃者，受牽連的人就更多了，由此成為一樁文字冤案。

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對閻紅彥同志在此事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記述得更為具體。該書寫道：

> 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同志所謂"翻案風"的過程中，又發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說《劉志丹》(上冊)。小說初稿寫出來以後，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的戰友習仲勳同志審閱。習仲勳同志認為小說沒有寫好，於1960年春天，兩次約作者談了自己對書稿的意見，指出：要把劉志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要體現毛主席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小說中有一處說到高崗當時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習仲勳同志指出不要寫高崗。1962年夏天，作者根據廣泛徵集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出版社印出送審稿。
>
>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同志不同意出版這部書。北戴河會議期間，他看到有些報刊已開始連載部分章節，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准發表。8月24日，康生給楊尚昆同志寫信，說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
> 1962年9月8日，預備會議上各組已開始批彭兩三天，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首先提出小說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閙"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勳同志"主持"寫的（後來又說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着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

們的發言在全會"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於是，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

9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彭的過程中對小說《劉志丹》也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同志打成"反黨集團"，而且還升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說小說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接着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後來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現的。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勳等同志的專案審查委員會。

（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95-1096頁）

閻紅彥同志與康生將小說《劉志丹》與高崗聯繫在一起，在中央全會上向習仲勳同志發難，導致的後果是嚴重的。這件事牽連廣泛，不僅牽連了中共中央委員習仲勳、賈拓夫等領導同志，還牽連了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弟媳李建彤，可以說株連了劉志丹烈士的一家。這件事為後來動不動就將文藝作品上政治綱的做法開了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這件事直到今天還沒有完。2003年，閻紅彥同志生前的秘書組組長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發表《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仍堅持閻紅彥同志當年的觀點，並稱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說《劉志丹》。李原在文中還說，小說"把本來是土豪劣紳，反對劉志丹革命的他的父親硬寫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劉志丹親屬的憤慨。劉志丹的親屬劉景星、劉榮、劉玉蘭、劉海燕、劉德潤聯

名給《百年潮》寫信，對李原的文章進行批駁。這五位烈士親屬以大量確鑿的事實說明，劉志丹的父親劉培基為清末秀才，回家務農後只與他人合開過雜貨店、草料店，1947年土改時被定為富裕中農。他始終支持劉志丹的革命事業，幫助掩護過謝子長、習仲勳、馬錫五等共產黨人，並幫助過閻紅彥同志。為了支援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劉老先生不僅毀家紓難，而且一家人有八位親人為革命犧牲。抗日戰爭時期，劉培基擔任過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會常駐議員，解放後當選為陝西省人民代表，1954年病逝後葬於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百年潮》雜誌為此向劉志丹的親屬表示了歉意，並將他們的信件的內容刊登於《百年潮》2003年第8期。

本來，一部歷史小說中含有某些與事實有出入的內容，是常有的事，這完全可以通過文藝批評或學術批評來解決。像小說《劉志丹》這樣在政治上株連了許多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劉志丹的戰友，甚至連劉志丹烈士的父親都要受到無端的攻擊，是令人費解的。

3. 徐冰批判李維漢

有一次，《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李維漢在晚年曾對訪問他的人說，很感謝黨組織對他的關心，他自己雖然入黨時間長，但是過去也曾犯過很多錯誤，並非一貫正確。陳伯達看了這條消息後對我說："李維漢能有這樣的認識，還是很不錯的。" 我接過報紙看了一下，說："李維漢這裏所說的錯誤，恐怕不是別的，而是指他歷史上曾反對過鄧小平。《六大以來》那本書裏有這方面的材料。現在鄧小平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他當然要這樣說了。"

陳伯達想了一下，說："噢，那也是可能的。鄧小平在蘇區挨整時，整他的人主要是李維漢。那時候鄧小平在江西省工作，被當作右傾

機會主義。鄧小平原來的夫人就是那時候和鄧小平離了婚，和李維漢結了婚。"

我接着問道："李維漢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幾年就受了批判，被免去了統戰部長的職務，是怎麼一回事？"

陳伯達説：

"那件事的起因我不大清楚，只記得徐冰給毛主席和中央寫過一個報告，説李維漢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主席寫過批示。"

李維漢同志被批判免職一事是六十年代初中共黨內鬥爭的一件大事。1996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刊登了部分這方面的材料。現將該書第十一冊17-19頁的主要內容（包括原注釋）轉錄如下：

在徐冰《關於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1]上加寫的一段話[2]

（一九六四年一月）

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

[1]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1963年5月27日作的這個檢查總結，主要是不點名地批判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自1956年以來在政策理論方面提出的若干意見。總結共分七個部分：（一）關於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發生過的原則性錯誤，主要是對於階級鬥爭的長期性、曲折性和複雜性認識不足，想過早地消滅資產階級。這種主觀上想比較快、比較早地消滅資產階級，客觀上卻起了保留它的作用，發展下去，必然會導致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二）關於人的

從徐冰的這份報告可以看出，他已經提出了一套系統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完整理論。這套理論經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少許修改，成為此後中共中央在政治領域上的指導性理論。

4. 陳伯達提出“電子中心論”

1962年以後，陳伯達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工業調查之中，並獨闢蹊徑地提出了一個新主張：“以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這個主張後來被概括地稱為“電子中心論”。不幸的是，這個主張在1965年的一次中央常委的會議上被否定了。陳伯達晚年以沉重的

改造問題。應當肯定十幾年來對資產階級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改造的成績，另一方面還必須看到這種改造的長期性，即使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改造成為勞動者或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我們同他們在思想上有時甚至是政治上的兩條道路的階級鬥爭，也還要繼續一個很長的時期。另外，由於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長期存在，小生產者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還沒有消滅，必然會恢復和再生長出新的資產階級份子，對於新生的資產階級份子，我們必須堅決予以打擊。（三）關於資產階級“左派”的問題。過去説資產階級左派在政治立場上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已經從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來，這是錯誤的。（四）關於民主黨派的性質問題。過去我們曾提出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內，把民主黨派由資產階級性的政黨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的政黨，在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基層各級組織，基本上建立起鞏固的社會主義領導核心，這種提法是錯誤的。各民主黨派怎麼也不能成為科學共產主義的政黨。1962年全國統戰會議期間提出的，對民主黨派今後一般不再叫它為資產階級性的政黨，模糊了民主黨派的階級性質，應當加以糾正。……

[2] 毛澤東這段話加寫在徐冰作的檢查總結中關於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部分以下一段話之後：“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只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存在，這些陰風總會不時地吹到我們國內來，不只會影響原來的資產階級人們，甚至也會使一些共產黨員變質，對於資產階級和它的思想就不能完全徹底乾淨消滅之。階級社會在我們國家存在了幾千年，資產階級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消滅階級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的差別來完成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對世界也會發生偉大的影響。這並不是什麼遙遙無期，還是把時間放長一點好，我們從來就有欲速則不達的諺語”這段話中的“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是毛澤東加寫的，“甚至幾百年”，是毛澤東改寫的，原稿為“甚至上百年”。

心情回顧了這一段重要的經歷：

"完成了《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等文件以後，我開始搞工業方面的調查。從1962年下半年開始，我先後到過北京、天津的許多科研單位和工廠，後來又去過東北的大慶油田和西南的攀枝花等地。我找科學院的負責人、有關部門的領導人和研究人員座談，探討工業生產和科研中帶普遍性的一些問題。

"在調查中聽取了一些科研人員的意見，有位從日本回來的技術員提出的意見很重要，他的名字我現在記不起來了。

"解放後，我國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許多工廠設備陳舊，技術落後，在管理上，很多東西是抄蘇聯的，脫離中國實際。尤其是六十年代後，一些比較發達的國家在大力發展電子技術，我們對此卻比較遲鈍，沒有認識到電子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所以，我提出了'以發展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新的工業革命'的意見。我幾次和科學院負責人談這個問題，有幾篇講話稿還送毛主席看過，毛主席有過批語。

"那時侯，錢學森、吳有訓、葉渚沛等科學家都贊成我的意見，但是科學院也有個別人，如于光遠同志，就不大贊成，說單提電子技術不全面，還應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其實，提以電子技術為中心，並沒有排斥其他技術的意思。問題是當時沒有一種其他技術能像電子技術這樣快速地大規模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廣泛地影響科學技術和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電子技術上不去，所謂工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國防現代化都將是一句空話。

"從1963年開始，我主持起草了一個題目為《工業問題》的文件，因為事關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走向，為了慎重，四易其稿，到1965年夏天才定稿。當時，還考慮到於光遠等人有不同意見，文件在強調發展電

子技術的同時，也分別講了其他新技術，而且沒有使用‘電子中心’這個詞，但是突出電子技術的意思還是很清楚的。

“我認為，於光遠反對突出電子技術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站不住的。當年於光遠認為新能源、新材料應和電子技術並列。其實，他所說的新能源，主要是指核能；所說的新材料，當時主要是指塑膠。核能的利用也是需要的，但是核能在技術上仍存在很多問題，例如，核廢料的處理至今還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至於塑膠工業，塑膠的確代替了一些木材和金屬材料，但是塑膠這種新材料也有環境污染比較嚴重的問題。總之，這類技術對工業的影響只是局部的，而電子技術的影響卻是全面的深遠的。所以，只有重點抓電子技術，才是抓到了問題的主要方面。當然，隨着歷史的發展，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其他的技術也可能會超過電子技術。我不認為科學技術會總停留在一種狀態上。但是在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電子技術確實在工業領域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工業問題》的文件搞好後，我送交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後很高興，特地請我一起吃飯。這是他解放後唯一的一次單獨請我吃飯。席間，毛主席說：‘搞了這麼多年，總算找到了一條發展工業的路子。’

“過了幾天，中央召開了一次常委會，討論這個文件。參加會的有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為是討論我的文件，我也參加。討論的時候，鄧小平說：‘這個文件沒有提以鋼為綱的方針，搞電子等新技術，大家都沒有經驗，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術恐怕不合適，還是一切照舊，穩當一些好。’毛主席聽了以後沒有說話，因為‘以鋼為綱’的方針是他採納別人的意見，正式講過的，現在也不好自己來否定。劉少奇、周恩來都沒有發言。我一看這種場面，心裏很難過，就一句話也沒說。會議就這樣散了。

"這個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則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轉到經濟問題上來。毛主席這個人總要找件事做，他的性格是這樣，耐不住寂寞，這件事沒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做。如果他當時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問題上來，就不會去搞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否定了我擬的這個文件，可能與1963年的一件事有些關係，那時我對他主持擬定的給蘇共中央的信提出過意見，我說那篇稿子在毛主席那裏恐怕通不過，他不相信。他把稿子送毛主席後，果然毛主席說不行，又叫我重新搞。這次他就說我搞的文件不行。我和鄧小平之間的不和主要就是這兩個文件的事引起的。我的文件被否定後，鄧小平又另搞了一個關於工業問題的文件，把我用過的楊波也調去了，還交代說，新搞出的文件一定要征得陳伯達的同意。我很不高興，對他們搞的文件沒有看，就說：同意，同意。

"我想，對這件事，鄧小平現在也會後悔的。他現在提出改革開放，也是想對經濟上耽誤的時間做些彌補。"

我插了一句："可是他並沒有提出以電子技術為中心啊？"

陳伯達說：

"他當然不會重複我提出過的意見，但是實際上包含有這方面的意思。二十年來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發展到今天這樣先進的程度，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整整耽誤了二十年呀！他當初要是能預料到世界今天的技術發展狀況，也不會反對我提出的主張的。"

陳伯達起草的那份題目為《工業問題》的文件，已經全文收錄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陳伯達遺稿》一書中（該書1998年初版，2000年再版）。可惜的是，陳伯達與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等部門負責人談電子技術的講話，現在能找到的已不多。1982年，曾在《人民

日報》擔任過理論部主任的何燕凌同志交給我幾份“批陳整風”時期《人民日報》編輯部作為批判材料內部印發的陳伯達談電子技術的講話，現在摘錄幾篇如下

1964 年 10 月 7 日在科學院黨組會上的講話要點

中國科學院的機構十分龐大，有許多方面是照抄蘇聯的。現在，應當總结經驗，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事。

我們應當好好研究一下，中國培養科學家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我建議把全世界各國的科學研究機構是怎樣組織的，起什麼作用，整理一份材料，並且收集一些科学家的傳記，看看人家是怎樣搞起來的。

科學研究機構的設置和工作，應當適合我國迅速發展生產力的需要，適合發展科學技術的需要，適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不適合的，就要革命。

1964 年 12 月 21 日的談話

實現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我們要搞一個工業革命。有些外國書刊說電子技術正在實現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個看法同我們在摸索中的看法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一些看法可以供我們參考。

1965 年 3 月 5 日的談話

科學院要根據毛主席提出的“趕上”和“超過”的指示，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提出個展望性的方案來。這個方案必須適應國民經濟“趕上”和“超過”的目的。要研究在科學技術上，集中力量搞些什麼？要搞那些能影響全局、帶動全局，在促進國家經濟的全面發展上，屬於關鍵性、要害性的東西。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發展電子技術作為國家方案”，東德提出，

電子元件工業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心"，要將電子工業"作為主導工業部門之一來發展"。日本人的企圖是什麼？東德的提法對不對？對自然科學和技術，我不懂，請大家認真研究一下，至少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點苗頭。

大家可以討論討論，抓電子化能不能促進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抓電子學、電子技術、電子工業，在各方面會引起些什麼連鎖反應？

為此，要研究一下：

電子學與其他各種學科的關係；

電子技術與其他新技術的關係；

電子工業與其他各種工業的關係；

應該這樣考慮一下，抓電子化會怎麼樣？不抓電子化又會怎麼樣？

我們要"趕上"和"超過"，就不能沿着舊的路子，只從後面按部就班地追，這永遠也趕不上。我們是無產階級革命者，要敢幹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最新的成果，打破老常規，跳躍趕上去。

1965年3月24日的談話

一、馬克思說工業有三個組成部分，動力機——傳動機——工作機。進入電子化以後，可否成為四個組成部分，動力機——控制機——傳動機——工作機。假如說機械工業是工業的首腦，電子技術在首腦中又是什麼作用？

二、電子技術在發展機器製造工業中的地位、作用和前途如何？

三、除電子技術以外，列出一批新技術的單子，並說明其相互之間的關係。

四、在利用電子技術和其他新技術方面，中國有沒有獨創性的條件？我們應該如何利用這樣條件來發揮自己的獨創性。

以上四個問題，希望再組織人，好好談談。從以前幾期印出的材料上

看，有的談得不錯，總是有多方面的意見才好。

以上問題，可以再談兩個禮拜，然後轉入具體佈置，佈置中又會接觸到一些問題。先漫談，再落實。落實中又充實漫談中提出的問題。要先提出十年規劃來，然後再搞二十年的規劃。二十年規劃可以比較輪廓一些，最好一個月內搞出來。

1965年4月3日的談話

日本有些科技界著名人士認為，"動力機械的發明引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現在高度發展的電子技術滲透到各行各業中去，正在引起第二次工業革命。"為此，他們"建議政府把發展電子技術作為國家方案，促使電子技術以劃時代的速度前進。"東德專家認為，"世界主要國家都以電子技術的應用程度來衡量工業的發展水平。"西德專家也說，"工業電子化是大勢所趨。"

以上這些提法，妥不妥，站得住，站不住？我們不要盲目跟人家走，要獨立看這個問題。認為發展電子技術就否定了其他技術，這是可笑的。這種意見沒有人正面提，也不能成立。

只要電子技術，撇開了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這也是笑話。

我主張將目前正在發展中的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接過來，從這裏開始迅速發展我們的工業技術，如電子技術、氧氣煉鋼、化工、綜合利用等等。這種提法對不對？我認為這就是躍進，用世界上最新的成果帶動我們後進的工業技術。

希望你們約一些權威性的科學家，最好是包括有各種不同意見的人，大家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討論。我們不要暗示、不要組織，讓大家自由的展開討論。在學術問題上，我們只能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

1965年4月21日的談話

請你們研究電子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電子技術和其他新技術的關係；電子工業和其他工業的關係。

一句話，研究電子技術的作用和前途。

關於電子技術的發展，產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議論很多。這些議論在兩年前就對我有所啟發。日本人曾建議把發展電子技術作為國家方案，這是很重要的提法。東德提出電子技術是衡量各主要工業國工業水平的標準，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一項中心任務。電子技術的特點就是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朝自動化方面大大發展。雖有蒸汽機就有自動化，但是，現在是電子控制的自動化，大概就是電子控制系統。資本主義所以戰勝封建主義是由於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由於有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提出了共產主義等於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的公式，當時他沒有看到電子技術發展這樣快、這麼深。列寧這句話提了四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技術發生了很大變化，電子技術可以產生比電氣化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它標誌着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一個人可以做幾千個人的事，正象神話裏說的千手觀音，萬手觀音。而且這個手不是陳舊的"老手"，而是好用的"新手"。因此，我們可以說是無產階級專政加電氣化加電子化。這樣也不否認列寧的話，又不停留在電氣化階段。

陳伯達的這些講話，距今已將近四十年了。儘管在個別詞句上，它還帶有那個時代的某些特徵，在個別提法上，還有某些不足；但是在今天讀來，仍會使很多年紀大一些的人感到新鮮，也會使很多人感到遺憾，感到惋惜。畢竟這是將近四十年前的講話呀！這四十年間，我們國家發生了多少不該發生的事，耽誤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啊？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陳伯達再次提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提出"以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結果再次被否定，並在實際上導致了陳伯達的倒台。陳伯達的"唯生產力論"和"電子中心論"從此被列為中國報刊的主要批判靶子。這就是在中國的現實政治紛爭中，陳伯達這個受人擺佈的文人的命運。

關於毛澤東當年對陳伯達談電子技術的講話寫的批語，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僅收錄了兩篇。現將這兩篇毛澤東的批語以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寫的注釋，全文(按照原書體例，正文中的宋體字為毛澤東所寫，楷體字為陳伯達原稿) 轉錄如下：

第一篇[1]

對陳伯達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

已閱。

毛澤東十月廿三日

根據手稿刊印。

二

我們辦工業，必須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蘇聯的那一套。凡辦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這兩種能力。凡辦事，首先要看得

[1] 本篇（一）是毛澤東寫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伯達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日為送閱他的兩個講話稿給毛澤東的信上。兩個講話稿：一是陳伯達同年九月十六日在討論發展電子工業問題座談會上的插話摘要，一是陳伯達同年十月七日在科學院黨組會上關於科學研究機構改革問題的講話要點。本篇（二）是毛澤東審閱前一個插話摘要時修改的一段話，用宋體字排印的是毛澤東加寫和改寫的文字。

到。如果連那件事看都沒有看到，當然談不到抓的問題。有許多人，對於當前已經出現的苗頭，甚[至]大量出現了的事實，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覺和理解），當然談不到抓起來做的問題。至於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種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對於某些事，不是沒有看到，甚至著書立說，長篇大論。至於做，他就抓不起來了，或者抓了片斷面，忘了全面。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又要抓得緊。抓不起，等於不抓。抓不對，就要壞事。抓得不緊，也等於不抓。看也有看得對不對的問題。看得不對，等於不看，或者還要壞。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對，又抓得緊，雷厲風行，又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發展我們的工業。大慶油田，就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

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第二篇

對陳伯達同余秋里談話記錄稿的批語[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印發給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副總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學在我們黨內盛行，辯證法拋到九霄雲外，連一些大老爺也在所不免。現在應該是想一想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手稿刊印。

---

[1] 這個批語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報送他十二月十一日同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的談話記錄稿給毛澤東的信上。陳伯達同余秋里談話的主要內容是中國的工業革命問題。陳伯達說，外國報刊說電子技術正在實現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有可能由

從毛澤東的這兩篇批語看（主要是前一篇，後一篇批語有點走題），在1964年秋冬時節，毛澤東對陳伯達關於抓緊採用電子新技術以實現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意見，曾明確表示過贊成。可惜他後來沒有能繼續這種態度，沒有能真正抓起、抓緊發展電子新技術的事業，轉而一心一意去抓階級鬥爭去了。

陳伯達還談到了他的主張被否定之後，他仍想辦法促進有關部門大力發展電子技術的一些情況：

"我提出的發展電子技術的意見，雖被否定，還是得到一些同志贊同。羅瑞卿同志提議我參加國防科學技術的領導班子。我找過去曾是馬列學院的學生，當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張震寰談話。我說你們可以向中央打一個報告，請求試驗發射衛星，衛星對電子技術要求很高，一定要把電子技術搞上去。張震寰他們的報告送上去以後，得到中央的批准。1970年4月，衛星發射成功，五一節我在天安門上遇見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我對他說，祝賀你們發射衛星成功。羅舜初也不管當時的環境，當着很多人說：'這也是你的功勞，我們都知道是你建議的。'羅舜初這句話大概給他帶來了麻煩。我倒了以後他就被調離國防科委，在東北給他另安排了工作。

"九大以後，我到一些工廠、科研單位和大學，再次講到應加快半

中國來完成。我們必須採用一系列新的技術。另外，要改變工業管理機構，要搞一系列設計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要搞政治設計，進行政治領導，不搞技術、工藝設計。余秋里說，在我們那裏，實際上是部黨組在搞這種設計，要以主席思想掛帥，要合乎總路線要求，要通過討論確定工作方針、戰略部署、技術政策。我的理解，工業革命，首先是思想上、方法上的革命，這種革命的統帥是毛澤東思想，沒有思想上、方法上的革命，就沒有技術上的革命。陳伯達說，我們不能老是在人家的後面趕人家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水平。余秋里說，這是跟着人家跑，我們應當根據主席思想，闖出自己的路子來。

導體技術、雷射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希望我國的電子技術能迅速發展起來。我還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以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

1970年9月陳伯達倒台以後，中國報刊上連續出現批判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電子工業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的文章《“電子中心論”批判》。當時，“批陳整風”運動正在全國緊鑼密鼓地鋪開，指導“批陳”的紅頭中央文件正在迅速逐級下發，但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在公開的報紙上，暫未正式點出陳伯達的名字，凡須要點陳伯達名字之處，都用“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這個新名詞來代替。

8月12日《人民日報》的文章這樣寫道：

> 六十年代初期，電子技術的新成就，電子工業作為一個新興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此即陳伯達的代稱——引者注），打着發展新技術、關心電子工業的幌子，炮製了一個“電子中心論”，拼命鼓吹“中國工業要以電子為中心”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
> 他們編造了一套“電子神話”，鼓吹什麼抓住了電子工業和電子技術，“不僅是國防工業，而且會使整個國民經濟都帶動起來。”他們聳人聽聞地提出，“現代化電子工業的發展，將促進我們工業的大躍進，將是在我國進行人類歷史上一次新的工業革命的出發點”；“現代化電子技術的迅速普及”，將“使我國成為第一流新電子化，第一個新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最強國”。他們力圖使人們相信，電子技術是萬能的，抓住了電子工業就有了一切。
>
> 這個“電子中心論”，在政治上是極端反動的，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是非常有害的，必須予以徹底批判，肅清其流毒。

文章把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歸結為兩點：

一、“電子中心論”是反對“以鋼為綱”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反動方針；

二、“電子中心論”是“技術中心論”的新變種。

經過對陳伯達“電子中心論”的一連串“批判”，中國的電子技術終於坐失了六十年代的最佳發展時機，中國工業的現代化勢頭也因此從整體上受到了牽制。而與此同時，真正實行了“電子中心”的日本、韓國和中國的台灣地區，卻從優先發展電子技術中飽嘗了甜頭，實現了經濟的跳躍式前進。

5. 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毛與劉少奇的關係走向破裂

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形成過程和毛、劉關係逐漸惡化的歷史成因，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者們關注的問題。陳伯達晚年在談話中也曾多次涉及過這個問題：

“六十年代初，國家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自然災害，黨在工作上的失誤，蘇聯斷絕經濟援助，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國內外對新中國懷有敵意的人，對此感到高興，感到有機可乘。蔣介石派遣了一些武裝人員襲擾沿海，中印邊界也發生了戰事。在這種形勢下，毛主席重提了階級鬥爭。

“毛主席雖然有失誤，但在當時黨在國內外都遇到巨大困難的局面下，毛主席沒有驚慌失措，他主持安排制定《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等文件，使農業生產較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穩定了大局。

“毛主席從蘇聯的變化中受到了刺激，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不穩定因素，存在倒退的可能。

“蘇聯赫魯雪夫給我們造成的傷害，人們已經忘了，有的人把困難

只歸咎於中國人自己。我們不諱言自己的失誤，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糾正錯誤。但是，只要回想一下那幾年很多公共汽車頂上都背着一個大氣包的情景，就應明白赫魯雪夫撕毀合同，中斷石油等物資的供應，給中國經濟的打擊。

"蘇聯的變化引起毛主席的思索。他認為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階級關係出現了新的情況，共產黨內部產生一些蛻化變質份子，這些人利用職權搞特殊化，對下壓迫羣眾，對上欺騙拉攏。毛主席認為這些人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說他們是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終歸是要搞資本主義。他的這個觀點集中體現在對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語中，陳正人的這份報告，記得是薄一波報送的。另外，毛主席還對陶鑄、謝富治等人的報告寫過批語。這幾份報告的原文都是寫得很尖銳的。

"毛主席認為幹部隊伍中的問題雖然嚴重，但大多數人還是可以教育好的，所以他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清理幹部隊伍中的貪污份子、蛻化變質份子，教育幹部要密切聯繫羣眾，和羣眾打成一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這個詞最早是河北省保定地區叫的，指清賬目、清倉庫、清財務、清工分。後來中央採納王任重的意見，改稱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四清的重點是要解決幹羣之間的矛盾。

"四清的兩個文件，前十條是毛主席主持的，彭真負責起草，很多重要的段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後十條少奇同志管得多些，田家英負責起草，我按照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意見參加了兩個文件的討論修改。那時我主要在搞工業調查，也起草過一部分國際問題的文件，主要是起草國際共運二十五條，寫了《再論陶裏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九評》我基本上沒有參加，《九評》主要是小平同志和康生主持的，具體寫文章的有吳冷西、王力等，小平用王力比較多些。說起來，我本來也

是釣魚台寫作班子的主持人之一，但是康生先搬進了釣魚台，在那裏指揮這個指揮那個，我就索性不管了。

"當時劉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是贊成搞四清的。通過四清蹲點，中央和國家機關的許多同志擺脱了高高在上的狀態。大家深入農村，接觸了農民，瞭解到農村基層的許多情況。當然，錯誤也是有的，主要是把一些問題看得過重了。

"那時，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工作也很不滿意，認為文藝沒有很好做到為工農兵服務。毛主席要我轉告周揚同志，讓他下去到農村接觸實際。毛主席還說了一句很嚴重的話：'如果他不願意下去，可以派軍隊讓他下去。'這雖是一句氣話，但表明毛主席態度很嚴肅。我和周揚同志談了，又和天津市的同志談，要天津市給周揚同志安排一個離市不太遠的地方。天津市的同志安排了小站。周揚同志去後，我去看他。那時他是住在一個支部書記的家中。我向他建議，最好不住在支部書記家，住到普通農民家，羣眾反映問題方便些。結果這樣一個變動羣眾反響很大，紛紛揭發支部書記的問題。後來天津市抽調了一些幹部組成工作組，主要有王亢之、方紀、江楓等同志。小站的工作我過問的比較多。天津市委寫的關於小站'四清'的報告後來被中央批轉了，少奇同志寫的批語，毛主席也稱讚過。現在小站'四清'被完全否定了。這事我還不能完全理解。我在報上看到，那個翻了案的幹部説她是受國民黨特務陳伯達的迫害，集體向她進行退賠，現在還欠她四千多元錢。四千多元錢在那個年代可不是個小數目，那時候不像現在這樣通貨膨脹。她一個農村支部書記，又不參加勞動，哪來那麼多錢？

"説我是國民黨特務，也是一件怪事。特務總是有組織的，怎麼也沒有人問一問我這個特務都和誰聯繫？再説特務總得有任務，難道給我這個特務的任務就是寫《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編出

這種瞎話只能讓國民黨看笑話。

“少奇同志對四清是積極的。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我看後開始也覺得好，曾建議傳達。後來少奇同志向毛主席寫報告提出傳達，毛主席當時還是批了。但後來少奇同志講開調查會過時了，不下去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這些話就說得過份了。

“少奇同志是承認階級鬥爭的。他與毛主席的差別在於，他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基層，在下面；而毛主席認為問題主要出在黨內，在當權派。少奇同志與毛主席歷史上就有過一些分歧，這時他們的矛盾又發展了。

“鑒於團結的重要，我曾努力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向毛主席建議，可以由少奇同志總管四清。毛主席說：好，一會兒就找他談。後來他們談的怎樣，我就不知道了。沒有想到，在討論二十三條時，矛盾更突出了。”

談到這裏時，我插問了一句：

“毛主席講的1962年的右傾是怎麼回事？”

陳伯達說：

“大概指的是兩件事。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了報告。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都看過，毛主席修改過。但是少奇同志在做報告以後，大家討論的時候，另有一個講話，這個講話毛主席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會的討論我沒有參加。我因起草少奇的報告很疲勞，中央讓我在玉泉山休息一段時間，所以具體情況我不清楚。七千人大會後不久，少奇同志又召開了西樓會議，對經濟困難做了比較嚴重的估計，而毛主席經過一些調查，認為情況已經在好轉，不應悲觀。當時財政和工業方面問題多些，但農業在落實六十條以後，已經逐步好轉。

“另一件事指的是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做法1961年曾希聖在安徽

省就搞過一次，那次搞的不成功。大躍進時，曾希聖在安徽省搞的很'左'，農業情況很不好，後來又搞包產到戶，羣眾有意見，說大家原來依靠集體，現在遇到困難，集體反而不管了。1962年，陳雲同志聽了他的一個江蘇同鄉的建議，認為可以搞包產到戶。他這個同鄉是個有名的勞動模範，名叫陳永康。有一天，田家英來找我，說陳雲的意見他已經和少奇、小平同志說過了，大家都同意。他對我說：'你什麼都不要說，我去找毛主席談。'當時我什麼也沒有說。結果他去找毛主席談後，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要我立即起草一個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我在這個決定中還是吸收了他們的部分意見，說在經濟落後的山區和偏遠地區，也可以搞包產到戶。這是1962年夏天的事。

"我覺得，搞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搞集體經濟也可以增產。1962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堅持集體經濟，包產到戶是少數，但落實了六十條以後，當年農業總產值增加6%以上。1963年至1965年，全國基本上不再搞包產到戶了，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加11%。1966年下半年，先後有一千多萬紅衛兵到北京，毛主席、周總理決定，來北京的紅衛兵吃飯不要錢。要不是農業豐收，哪里能做得到？所以認為只有包產到戶才行，也不符實。作為共產黨人，要搞社會主義事業，總是希望集體經濟能搞得好一些。'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時間農業停滯不前，主要是老搞政治運動，不抓生產。如果一直好好抓，增產不會太慢。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基布茲，類似於人民公社，勞動生產率在世界上是很高的。近幾年我國的農業增產，主要得益於科學種田，得益於良種、化肥。如果講農業機械化，還是集體經濟容易做到。應當允許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平等競賽，互相學習，不應當搞一刀切。聽說現在有些搞得好的農村，仍堅持集體經濟，雖然不讓叫公社、合作社了，但他們仍實行集體經營，走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路。共產黨人至少不應歧視集體經濟。現在

很多地方只扶助個體，不扶助集體，把大片的田地又分割成小塊塊，連幫助過中國農業的美國友人韓丁看了都感到難過。只發展個體，一小部分人會很快富起來，但很難避免兩極分化。”

我又問：

“毛主席1970年在和斯諾談話時說，他是在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那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陳伯達說：

“那次中央會議上，有一天毛主席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麼，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在說劉少奇不許他發言。”

我插言道：“這件事就有點奇怪了。即使在一般的單位，第一把手的發言如果被第二把手半截打斷了，不能講完，也會被看成是不尋常的事。劉少奇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犯糊塗了，忘了是毛主席在講話，所以一直講了下去？”

陳伯達答道：“我也不明白，按理是不應該出現這種事的。”

我接着問：

“毛主席認為劉少奇要搞資本主義。如果劉少奇真的掌權，他也並不會搞資本主義吧？”

陳伯達說：

“這個事不好說。少奇同志過去做過許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寫得也很出色。他過去是反對王明路線的，在和王明路線做鬥爭時，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風以後，少奇同志的地位提高到黨內第二位，這與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開的。但是，另一方面，少奇同志的思想有時變

化又很大，很突然，令人難以理解。他做事有時也是武斷的，別人不容易和他商量問題。可以說，他和毛主席的脾氣比較相似。沒有在工作上和他接觸的人覺得他很溫和，實際上不然。

"從他的思想來說，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歧大概是抗日戰爭時期他寫給續範亭的一封信。續范亭拿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當時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話，表示不同意劉少奇的觀點[1]。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與國民黨的和戰問題上，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意見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1951年對待山西省農業合作社的批語，毛主席有過批評意見。但那時的不一致，是黨內同志之間的正常現象，毛主席並沒有當成大的問題。從總的方面說，毛主席對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後高崗拿少奇的天津講話攻擊少奇，說少奇不執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當時毛主席是反對高崗的，是保護少奇的。當然，高崗的話可能也給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後來毛主席繼續與少奇發生矛盾時，毛主席就把過去的分歧聯繫了起來。

"劉少奇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問題不好說，歷史不能假設。我覺得他更多的可能是繼續中蘇友好。

"毛主席後來整少奇同志整得過份了，本來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卻錯誤地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結果造成了一個大悲劇。"

我又問道：

"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能走的通嗎？報紙上不是一直都說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嗎？"

陳伯達回答道：

---

[1] 續范亭原是西北軍將領，後來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47年病逝後被追認為共產黨員。——筆者注

“說是那樣說，但實際上是能走通的。我不贊成搞資本主義。如果搞了資本主義，將來終歸也還是要回到社會主義，但那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了。我們宣傳上是說資本主義走不通，但既然其他國家能走通，中國當然也能走通。”

6. 調和毛、劉關係，以方孝孺《深慮論》勸諫毛澤東

陳伯達談到 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討論“二十三條”的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衝突後的一些情況：

“毛主席在那次會上拿出黨章以申明他在會上有發言權之後，一天晚上，他連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個文件。他口說，我匆匆記了下來，後來他又做了幾次修改，經中央討論修改後通過。這個文件就是‘二十三條’。毛主席找我談時，表示了對劉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見，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團結很重要，要想個辦法避免事情發展。我與列席會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鑄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談，請他向毛主席做個檢討，緩和一下關係。

“為調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關係，我做過幾次努力，這一點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是清楚的。後來毛主席批少奇同志時，說我在他和少奇之間搞投機，就是指我調和他們的關係的事。我夾在他們兩位之間，很難啊！對毛主席最後確定了的事，我也只能服從。秘書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古今中外都如此。

“有一次，少奇同志說他那裏缺秘書，我曾說過，我可以給他當秘書。這是閒談時隨口說的。‘文革’中，江青就經常拿這件事攻擊我，說我願意給劉少奇當秘書，不願意給毛主席當秘書了。我在毛主席那裏工作，是有過困難的時候，毛主席對我也並不滿意，經常批評我‘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可是連外國人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助手，我

怎麼可能自己離開主席呢？我對毛主席是很崇敬的。他雖然有缺點，有失誤，但是他歷盡艱辛，領導黨從弱到強發展起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國家一百多年來積弱挨打，人民如一盤散沙的狀況。我作為毛主席領導下的一個工作人員，總是要服從毛主席的意見，這是大局。在這點上，我沒有過多的想法。”

談話中我插了一句：

“毛主席好像對身後的事情考慮得比較多，總是擔心他去世後國家的命運，擔心會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想防止國家出現蘇聯那樣的變化。所以他對選擇接班人的事考慮得多。毛主席幾次更換接班人，都是出於這種擔憂。”

陳伯達接着說了一段我沒有想到的話：

“是啊，可是人終歸是要死的，將來的事情怎麼可能都管得到呢？明代的方孝孺說：‘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從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到現在才多少年？康有為和孫中山在當時都是很高明的人物，都是當時最有遠見的政治家了，可是他們誰都沒有預見到會出現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他們去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不過只有二、三十年的時光。可是，國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他們卻都沒有能預料到，更不可能管得到。所以最主要的應該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而不是老想着將來會怎麼樣。至於說到接班人，中國歷史上好幾個雄才大略的人物，都對這個事處理得不好。漢武帝、唐太宗和清康熙皇帝，都在接班人的問題上跌了交[1]。所以，也可說有點規律性。”

我說道：

---

[1] 漢武帝晚年有巫蠱之變，逼反太子據；唐太宗廢掉謀反的太子承乾，欲立“英果類我”的李恪而未成；康熙兩度立廢太子胤礽，此後不復言建儲事。——筆者注

"毛主席稱讚的皇帝是劉邦和朱元璋。"

陳伯達說："劉邦和朱元璋，身後事也都沒安排好。我認為最好的皇帝還是唐太宗和康熙皇帝。六十年代初，我向學術界提出過，可以多寫一寫唐太宗和康熙，也是想影響一下毛主席。後來劉大年他們按我的建議，寫了論康熙的文章。"

我又說："你剛才說，人顧及不到太遠的事。這一點我過去就沒想到過。這個道理你跟毛主席說過沒有？如果勸說勸說他，或許他晚年不至於把主要精力用在搞政治運動上。"

陳伯達說："勸說毛主席不是件容易的事，話說得直接了，有時起反作用。我試着勸過他。我剛才引的方孝孺的那句話，出自《深慮論》[1]。有一次我和毛主席談話時，就向他推薦《深慮論》。我說：'方孝孺的《深慮論》很值得一讀。'毛主席卻說：'他自己的結局怎麼

---

[1] 方孝孺的《深慮論》全文如下：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于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樣？他自己都慮不到自己的命運，還談什麼深慮。'話就沒有辦法再談下去了。方孝孺因為不肯為明成祖草詔書，被夷十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件。問題是，我不是在談方孝孺個人的命運如何，而是在談他文章中的道理，可毛主席故意岔開了話題，他明白我想說什麼，不願讓我繼續再談下去。實際上方孝孺的《深慮論》寫得很好，你可以找來看一看。"

6 “文化大革命”的歲月

陳伯達晚年生活於清冷枯寂、蟄居頂樓的保外就醫窘境中，惟有筆者的陪伴，使他有了一個可以隨時一吐胸中塊壘的談話對象。在漫長的時光中，中國現代史上令人目眩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兩人交談中不可避免要經常談到的。不過一般來說，關於“文革”的談話大多是圍繞某些具體的事件，就事論事地展開的。陳伯達在談話中講述了一些我過去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事，澄清了某些傳聞，但是他沒有對“文革”進行比較系統的回顧。之所以會這樣，一方面是因為陳伯達自身曾被歷史大潮捲入旋渦中心，經歷了從身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到被定性為“修正主義份子”、“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代表人，直到淪落為監獄犯人這樣劇烈的變化，在“識盡愁滋味”之後，難免有“欲說還休”的悲歎；另一方面，還因為“文化大革命”這件事確實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一件極為特殊的事件，決不是簡單的個人交談所能勾畫得清楚的。

正是由於“文革”課題的複雜性質以及在此時期內發生的各種事件極其繁亂，陳伯達在談話中只能就他自身直接經歷的事情，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點問題進行敘述，這些談話雖然有時只是涉及一些事件的片段，但因他畢竟曾是中共中央核心成員之一，所以他的談話對於瞭解某些重要情況仍是不可或缺的。

1. 文革前夕的一些情況

陳伯達對“文革”羣眾運動發生之前他經歷的一些情況，做過如下敘述：

“1964年，中央成立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在文化學術領域搞批判的事[1]。我那時在搞工業問題，很多時間是在天津，不瞭解這個小組的工作。有時我從報上看到一些批判文章，開始是批判周谷城、陽翰笙，後來批判到楊獻珍。

“楊獻珍同志原是我請到黨校來管教育的，後來他和艾思奇等同志的關係搞的不好，他們在若干哲學問題上發生爭論，我也插不上話。1965年，報上對楊獻珍同志上綱越來越高，黨校向中央送了材料。這個時候是彭真同志和康生在管黨校。

“周谷城原來是毛主席的朋友，解放後多次和毛主席見過面，這時也受到了姚文元的批判。再後來報紙開始批判翦伯贊和吳晗。當時把在文化學術領域開展的批判稱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批判翦伯贊主要是批判所謂‘讓步政策’論。歷史上，封建統治階級在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後，往往對農民實行‘輕徭薄賦’的讓步政策。這個觀點最早是我提出來的。翦伯贊只是照搬了我的觀點。我看了批判翦伯贊的文章，認為矛頭是對着我的，就想在天津寫文章反駁。彭真同志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知道了我的意見，派范若愚到天津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批判‘讓步政策論’不涉及陳伯達，還說批判‘讓步政策’是毛主席同意的。我就沒有再對這個問題說話。1970年我倒了以後，又把我和‘讓步政策論’聯繫起來批判。

“我有幾年沒有直接管《紅旗》了。《紅旗》的工作實際由范若愚、胡繩他們管。本來，鄧力羣也是《紅旗》的副總編輯，可後來毛主席對鄧力羣有意見，說鄧力羣的哥哥鄧飛黃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叫我不要用鄧力羣。我就讓鄧力羣先到南方去鍛煉一段時間。我不直接管《紅

[1] 該組組長為彭真，副組長為陸定一，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做具體工作的還有胡繩、姚臻、范若愚等。——筆者注

旗》，重要的事他們還是和我打招呼。我囑咐過《紅旗》不要轉載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這件事後來也被算做我的一件罪狀。

"1965年底，毛主席把我和艾思奇、胡繩、田家英、關鋒召集到杭州談為馬列的幾本著作寫序言的事。談話中毛主席主要談了哲學，也談了文藝方面的事，還說到《海瑞罷官》的事。1959年的廬山會議曾把我劃為彭德懷的同夥，我只得迴避此事，我始終沒有看過《海瑞罷官》的戲和劇本。

"在杭州時田家英拉着艾思奇每天早上跑步，艾思奇本來有高血壓，一跑步病更重了，回到北京就去世了。

"1966年初我離開杭州，到四川攀枝花等地去看了三線的建設，繼續搞工業調查，後來又去長沙、武漢調查工農業生產的情況。

"過了段時間回到上海。毛主席讓我修改那個林彪委託江青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我按照毛主席的意見，做了些文字修改。這個文件毛主席自己改了幾次，文件反映了毛主席當時的一些想法，當然也有江青、張春橋完全錯誤的提法在裏面。文件中批判'國防文學'的話是毛主席寫上的。

"3月份，毛主席在杭州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學術批判方面的事。在毛主席講到接班人問題時，我插了一句話：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毛主席岔開了我的話。

"這一段時間，我還主持編輯了一本《毛主席語錄》，內容比解放軍總政治部編的那本多，也更有系統。可後來毛主席還是用總政治部編的，大概是為了加強林彪的影響吧，因為名義上那本是林彪主編的。我編的這本只印了少量，發給《紅旗》等單位的同志參考。

"那時，我和很多同志一樣，對文化革命沒有思想準備，但是出於對毛主席的崇敬，相信主席和中央是正確的，對主席和中央的指示，都

是服從和照辦的。和毛主席、黨中央保持一致，既是黨的紀律要求，也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本份。這是當時的實際思想。

"在我將離開上海時，得知周揚同志到上海養病，我準備去看望他一下。結果江青知道了，阻攔我去，説毛主席已經決定正式批判他，你還非要去見他，不是跟毛主席擰着嗎？我就沒有去見，只委託了秘書代表我去看過他。

"離開上海，回到天津，我還是繼續研究工業問題。我找胡昭衡、李樹夫談話，研究抓電子化、工業體制改革和試辦托拉斯的事。試辦托拉斯最早是我提出來的，後來劉少奇同志也講過。但是少奇同志講的托拉斯與我講的並不相同。他是主張自上而下地搞，實際就是官辦的托拉斯。我是主張自下而上地搞，要自然形成，不搞官辦的。我向李富春同志解釋過這兩種做法的差別。

"在天津期間，4月初的一天，彭真同志打來電話，要我立即回北京。我正忙着搞工業問題，不想馬上回去，就説考慮一下吧。夜裏老是睡不着，就給康生打了個電話，談到彭真來電話要我回北京的事。康生説：叫你回北京是中央決定的，要顧全大局，你還是回來吧。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參加了中央召開的會。中央讓我幫助起草一個關於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我找了吳冷西和王力，一起邊看《二月提綱》，邊寫批評意見。這個最初的稿子應由我完全負責。這個稿子後來在杭州會議期間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寫了。

"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了彭真。會議氣氛緊張。彭真打電話給我，想談一談。當時我正好不在住處。後來彭真的秘書又來電話約，我覺得此時談話不方便，讓秘書回話：現在開會很忙，還是回北京再談吧。回北京彭真已沒有了自由，就沒有談成。

這件事彭真大概對我有意見，但是他也應理解，我沒有能力改變毛主席的決定。

“在杭州會議上有同志提出毛主席的講話很重要，應整理成一個文件。後來就把王任重同志記錄的毛主席講話的內容吸收到《通知》裏，又經過毛主席多次修改，形成《通知》正式的稿子。”

陳伯達敘述的上述情況，我曾向陳伯達當年的機要秘書王保春做過核對。王保春説：

“陳伯達對批判‘讓步政策’有意見，最先是劉叔宴給康生打電話反映的，康生當時就回答這個事情不牽涉陳伯達。范若愚來天津是在劉叔宴打電話之後。

“陳伯達1966年初去三線視察的行程，在我的工作日記上有記錄。他是1月15日下午離開杭州到上海，25日上午乘飛機離上海，中午到達成都。在成都視察了420工廠、317工廠。後來他又到德陽、西昌、攀枝花、自貢、瀘州、重慶等地視察。前後大概視察過二十多個工廠。陪同陳伯達搞調研的有國家計委楊波、天津李樹夫、北京劉義立等同志。2月17日陳伯達乘輪船離開重慶，19日傍晚到武漢，當晚10點半上了毛主席的專列，12點專列駛離武漢，20日早上8點到長沙。在長沙期間，陳伯達還去韶山參觀過。2月27日陳伯達乘16次特快離長沙到武漢。3月3日乘飛機離開武漢到上海。

“陳伯達在上海委託秘書去看周揚一事，當時是派我去的。3月22日上午，陳伯達説他因工作忙，讓我代表他去看一下周揚夫婦，安慰周揚好好養病。我中午到周揚同志住處，見到了他們夫婦，轉達了陳伯達的問候。周揚是在北京剛做完手術，來上海療養的。3月22日下午4點多，陳伯達乘22次火車離開上海，23日到達天津。”

王保春同志讓我看了他的工作日記。他的日記記的不是很全，但

是我注意到在長沙期間2月26日這一天的日記上寫有如下兩句話：

"上午徐業夫來電話問我怎樣走法？伯達同志去他處面談。

下午二時到總理處談話一小時左右。"

徐業夫是毛澤東的秘書，句子裏的"他處"即是指的毛澤東住處。陳伯達在長沙期間曾先後與毛澤東、周恩來談過話，見之於此記載。可是查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一書，在1966年2月26日這一天，沒有任何記載。在該書下卷第16頁上僅有這樣一句話：

"2月24日—28日會見來中國訪問的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同他進行五次會談。"

一個外國總統來訪，連續在北京停留五天的可能性極小。看來，周總理在此期間或是陪恩克魯瑪到南方參觀過，順便到過長沙；或是他單獨去過長沙。總之，王保春日記記錯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周恩來年譜》恐怕確有疏漏。

關於陳伯達提到的1965年楊獻珍同志受到康生等人錯誤批判的情況，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463頁，有一篇《對中央高級黨校關於楊獻珍問題和處理意見的報告的批語》。毛澤東的批語如下：

彭真同志：

都看過了。此件尾頁上，列舉附件四份，去掉侯、孫兩份，剩下兩份，漏掉楊的"說明"一份，應添上。

毛澤東九月廿四日

中央文獻研究室對此篇文件加寫的注釋說，中央黨校的報告在陳述了對楊獻珍的批判經過後，建議中央撤銷楊獻珍的領導職務，中共中央同意了這一建議；報告的附件中還有侯維煜和孫定國的材料各一份。毛澤東的批語是寫給彭真的，說明彭真當時是處理中央黨校問題的負責人。

關於修改《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情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23頁至28頁有毛澤東的親筆批語和修改共十八處。其中第十一處（見該書第26頁），毛澤東親自寫下了如下的話：

>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三十年代的後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

按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印刷準則，凡是毛澤東親筆寫的字都用宋體字印刷，不是毛澤東親筆寫的字則用楷體字印刷。事實很清楚，將"國防文學"的口號稱為資產階級的口號這一段話，是毛澤東親筆寫的，而並非其他人寫的。可是葉永烈在《陳伯達傳》一書中卻將此段話說成是陳伯達寫的，並就此議論，說陳伯達如何一反自己三十年代認為"國防文學"的口號駁不倒的觀點，提出批三十年代云云。這種說法與史料的記載是不符的。關於"批三十年代"的提法，最早也是1964年中宣部於該年8月給毛澤東、鄧小平、彭真、康生送上的《關於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國江南》、《二月》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的（參見陳晉著《文人毛澤東》一書第580頁）。將毛澤東提出的和陸定一領導中宣部時已經形成的錯誤提法歸給陳伯達，只因為陳伯達是個倒台人。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24頁還有毛澤東對彭真1966年4月1日送審的中央轉發《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指示稿作的批語："已閱，同意。退彭真同志。"說明這個紀要在中共中央於4月10日正式轉發前，也是經過彭真審閱同意的。

關於陳伯達在1966年3月杭州會議上曾提出過"接班人要自然形

成"一事，可證之於毛澤東在該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現根據筆者手頭的一份《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3月20日)》的鉛印記錄文本，將有關部分摘錄如下(為清楚起見，將毛澤東的講話和陳伯達的插話分別起行排印）：

"毛澤東：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誰融化誰，現在還沒有解決。

陳伯達：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個馬林科夫，不行，沒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毛澤東：就是不要這些人接班，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毛澤東3月20日的講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廣泛收錄在羣眾組織編印的各種版本的《最高指示》、《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書中。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陳伯達針對接班人問題的插話與毛澤東的想法做法之間存在抵牾。這是迄今為止，史料中有關中共中央高層會議上對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提出異議的唯一記錄。雖然陳伯達的意見被棄置一旁，未起作用，但是這種意見畢竟也需要有人敢於說出來，才能引起人們的思考。

關於1966年4月杭州會議上的情況，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華北局第一書記的李雪峯在1998年第4期《百年潮》上發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一文有較為詳細的敘述，現摘錄部分段落如下：

"4月9日至12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會後馬上就召開了第二次杭州會議，又叫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彭真到杭州後，要求和毛主席見面談話。彭真和徐業夫講時我正在旁邊。彭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講20分鐘，請你轉告。'徐業夫

會轉告的，可是主席沒有見彭真。這樣我們就知道事情大了。

會還沒有正式開，18日關於彭真問題的材料就出來了。……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裏開了幾次會。主席談的很活躍、和緩。但講話中插的那幾句話就重了。主席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在那裏住，願到上海來。那時柯慶施和江青已聯繫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來密謀策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我們在西泠賓館吃過飯出去散步時，六個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我還和他講話，因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級，關係可以。但我們也只能講些廢話，'天氣熱了……'。誰也不敢講正話。

4月21日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後回到杭州，主持了類似政治局的會議。因為少奇從3月2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瞭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王任重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將毛主席的講話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全黨。陳伯達說：那你根據你的記錄寫一下。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王任重記錄的特點是誰的話都記，但只記要點。我的記錄是記毛主席的原話，但是別人的插話就記不下來了。我一看他的記錄同我的不盡相同，就沒有往外拿我的記錄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後來改動很大，康生說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比如劉志堅回憶：4月14日總理把他叫到釣魚台8號樓說，中央確定劉和陳亞丁到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討論和修改，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倆飛上海，當天陳伯達、康生、江青召開會議讓大家討論，5月1日劉回到北京。這就是說，第二次杭州會議還沒有開，中央已在組織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會議基本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

通知》）草稿。

會議結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窮兩人和彭真一道乘飛機回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車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飛機上，都沒話講。開始三個人在一起，面對面乾坐着，後來宋任窮離開前艙，到工作人員那邊，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裏都明白，我們倆的任務是‘護送’他回來。

到機場後，我們各自坐車走了。後來有人說我把彭真交給安子文了，這是不對的。

上海會議搞羅，三月會議點楊尚昆、陸定一，四月會議批北京市委，批彭。這時誰都知道，問題剛剛開了個頭，還沒有完。誰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發展。這時的北京大家都很緊張，到處打聽消息。"

據王保春回憶，在杭州會議期間，他確實看到過會議列印的王任重的記錄稿。這說明《五一六通知》的正式稿子是在王任重記錄的毛澤東講話的基礎上加以補充修改形成的。由於參加起草的每個人都只參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所以沒有一個人能說清起草的全過程。

2. 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新文革小組的成立

杭州會議結束後，5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會議。對這次會議以及會後成立文革小組的有關情況，陳伯達曾簡要談論過：

“五月的會議毛主席沒有參加，是劉少奇同志主持的。會議的一個主要議題是關於彭、羅、陸、楊幾個同志的問題。康生和林彪做了長篇講話，周總理和我也在會上講過話。林彪的講話對事情上綱很高，得到參加會的多數人的稱讚。這個講話後來經過康生整理，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審查我的人曾問我是否做過文字修改，我說記不清了，有

原件可查。

"我當時的講話，以及此後的許多講話，錯誤之處很多。主要是基本方向錯了，把黨內的問題當作階級鬥爭的反映，得罪了許多同志。我說過，這些同志要怎麼處罰我都可以。

"毛主席過去常批評我'就怕得罪人'，可是在運動中我被放在那樣的位置上，要貫徹中央有關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決定，就不由自主得罪了很多人。

"人的認識需要有個過程。周總理有時也說了些錯話，現在說他說了違心的話，違心的話是有的，我也有過。可是人不可能經常說違心的話，主要還是認識上的原因，當時就是那樣一種認識。

"從感情上，從紀律上，我不可能不站在毛主席一邊。毛主席的威望是歷史形成的，大家都講要保衛毛主席嘛。同時我也相信周總理直接領導的審查工作是認真的。總之，當時把黨內一些不正常的現象看得過重了。

"比如在毛主席身邊安竊聽器的事。現在也承認有這事，只是說出於好意安的。既然是好意，為什麼不能告訴毛主席呢？不要說對領袖，對一般人也不能這樣。我不信小平同志會高興別人背着他安竊聽器。所以，當時把事情看重了是難免的。"

談到這裏，筆者插了一句："美國總統尼克松就因為在民主黨的樓裏安竊聽器下了台，西方國家更不允許這種事。"

陳伯達接着說：

"毛主席本來就有些多疑，一些背着他搞的事不可能不引起他做出反應，所以，毛主席做了防範，也可說是事出有因。只是毛主席的一些做法過了度，把問題擴大化了。凡事都應有一個度。過了度，就會引起壞的後果。事情的發生都有個過程，人們的認識也有個過程。現在毛主

席的錯誤能說，其他人的錯誤都不能說，都是完人，這樣是否就能解釋歷史呢？

“五月會議的另一個議題是討論通過了中央的《通知》。這個文件因為在杭州會議上已討論過了，所以在這次會上沒有提出什麼意見，在5月16日的全體會上一致通過了。

“中央的《通知》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當時，周總理找我談過幾次，要我當新的文革小組的組長。我不肯當，我說我不行，沒有這個能力，康生原來是文革五人小組成員，有經驗，讓他當吧。總理說康生不合適，說在中央裏面我的文化高，要我當。我推辭幾次，最後總理說：‘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只好同意了。總理說：‘那你可開個小組的名單。’我考慮文革小組是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的一個工作機構，可先列上毛主席在起草文件時用的人，於是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列為副組長，王力、關鋒、戚本禹列為組員，寫成名單交給周總理。

“這個名單後來有增加。陶鑄同志調到中央工作後，我提出增加陶鑄同志當顧問。各中央局也都推薦了一兩個人，中南局的王任重、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劉志堅和華東局推薦的張春橋都列為副組長。小組的名單是經過中央常委同意後確定的。[1]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主席提出，我是個書生，當不了組長。毛主席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我沒有辦法，只好當了。

“毛主席回北京前，文革小組雖然已成立，但是並沒有自己的辦公

---

[1] 陳伯達在談話中沒有提到的文革小組其他成員有：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公佈文革小組名單。——筆者註

機構。那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少奇、小平同志。文革小組作為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在京的成員都參加了少奇、小平同志在懷仁堂召集的中央工作會議。"

值得研究者們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段極其複雜的歷史，研究這段歷史，觀點有差異是正常的，沒有差異才是不正常的。但是不管研究者的觀點如何，都應遵循同一條規則，就是基本事實應搞準確。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編的《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4期刊登一篇《關於"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再思考》的文章，文中說："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劉少奇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要求對《五一六通知》作些修改時，遭到了康生、陳伯達的一一拒絕。"這種說法是違背事實編造出來的。

當年出席該次會議的李雪峯在《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一文中記述了5月16日當天會議的情況：

> "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議，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

李雪峯在文章中曾講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一開始，劉少奇心情就很不好。但是在5月16日的會議上討論《通知》時，並沒有人提出過不同意見，這也是事實。李雪峯如實記述了這一點。《關於"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再思考》一文說"劉少奇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對《五一六通知》作些修改"，這裏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又是誰呢？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什麼不寫出姓名呢？他們提出了哪些修改意見，康生、

陳伯達又是以何種理由一一拒絕的，也都應該交代清楚才對。這樣嚴肅的歷史場面，怎麼寫得如此含糊呢？《再思考》一文的作者在文章的註腳中曾一一注明所引資料的出處，但是在此事上卻沒有注明任何出處。這些情況都表明該文的寫作缺乏起碼的嚴肅性，為了給自己的論點增加論據，不惜杜撰歷史細節，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3. 人民日報工作組和6月1日的社論

1966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向人民日報社派出了工作組，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兩件事，因後者於1980年被特別法庭宣判為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諸多有關文革歷史的作品加以評述。事情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呢？對此我詢問了陳伯達。他是這樣回答的：

“向人民日報派工作組的事，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會上議論後，少奇、恩來、小平三位常委研究決定的。工作組的成員是小平同志讓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報社挑選來的，《紅旗》也去了兩個人。當時很匆忙，部隊的幾位同志我都不熟悉，但主要工作還是靠他們。

“5月31日下午在懷仁堂召集會議，鄧小平同志講了話，宣佈了工作組的事，對人民日報的工作做了指示。

“我讓解放軍報的同志寫一篇社論，當晚他們把寫好的社論交我審閱，我改動不多。討論時，覺得原來的標題太長了。他們重擬了幾個標題，我用了其中一個，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個提法以前報上已經有過，沒想到十幾年後法庭就根據這個定我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了。當時，社論雖然沒有來得及送杭州請毛主席審閱，可我記得在北京的幾位常委是送了的，他們並沒有提出意見。”

我問道：

"那你為什麼在法庭上對事情不做解釋，只是說社論是你口說的，還說'可以判死刑'呢？"

陳伯達答道：

"社論不是我寫的，但經過我審改，標題是我定的，現在人家說是反革命煽動，我不能牽連別人，自己一人承當就是了。既然定為反革命煽動罪，那還不是想判死刑。罪名都定好了，還說什麼呢？所以我說'可以判死刑'。

"我在復興醫院看了起訴書後，曾向看管人員要那篇社論看了一遍。那篇社論現在看，不難找出錯誤之處。但是整個看來，主要講的還是毛主席講過的要批判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當政後要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問題。講了這些，就是反革命煽動？社論引用的馬克思和毛主席的話，也是反革命煽動的組成部分？我想既然這樣，那整篇社論都算是我的好了，所以我對法庭說是我寫的，我口說的。

"'文化大革命'確實搞得不好。後來越來越亂。對它的原因需要冷靜分析。我自己也是文革中倒的，批我是搞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從1970年起我就被關押。1982年周揚和我談話時說，文革中我的帽子戴得最多了。

"文革中發生動亂，原因很複雜。黨的決策有錯誤，以及社會矛盾長期積累，一時激化，等等，有歷史的原因，有制度的原因，這些都應認真分析，得出教訓。把動亂的原因歸結到一篇文章，歸結到偶然用的幾個詞，就不是嚴肅的態度了。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不是哪一個人的私人報紙。報紙是公開發行的，社論大家都看過。把黨中央機關報的社論說成是搞反革命煽動，那把黨中央放到什麼位置上了呢？我個人定什麼罪並沒有關係。"

陳伯達的談話比較籠統，連人民日報工作組成員的姓名都未提

到。筆者查閱到一些有關材料。將這些材料加以對照、分析，就可以對事情的原委有比較清楚的瞭解。

一件重要的史料是1966年5月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領導人聯名寫給毛澤東的信。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61頁的注釋摘引了這封信的主要內容，雖然只是摘引，但與其他書籍相比較，此書的摘引最詳。現將該書第61頁的全部文字照錄如下：

關於同意派臨時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的批語[1]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

同意这样做。

毛泽东五月卅日廿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這件史料說明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決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負有中央交給的任務的。這個任務就是改變《人民日報》威信下降的局面，使"報紙版面改觀"。

為什麼《人民日報》的威信會下降呢？這要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才能瞭解。

原《解放軍報》負責人、人民日報工作組成員、6月1日社論《橫

---

[1] 劉少奇、周恩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給毛澤東寫信說，兩個月來，《人民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影響。由於報社編委會不能改變現在的局面，許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去。我們今日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的直接領導下，掌握報紙每天的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五月三十一日即進報社工作。報社內部進行整風，學習文件，也可以繼續寫大字報。一部分態度較好、願意積極工作的編輯人員，要集中力量維持每日版面。在報紙版面改觀後，再進一步解決內部問題。信末還附有臨時工作組在京人員名單。毛澤東閱後寫了這個批語。

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主要撰寫人之一朱悅鵬，在1994年第7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到，5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人民日報工作組的會上做了重要講話。朱悅鵬雖然沒有透露鄧小平講話的詳細內容，但他提到鄧小平在講話中曾說道：

"最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民日報》宣傳跟不上中央的步調，許多重大問題都是先由《解放軍報》報導，外電說，現在是軍隊的報紙領導中央的報紙，這是個極不正常的情況。"

這就是說，中央認為《人民日報》跟不上中央的步調，形成《解放軍報》領導中央報紙的不正常情況，導致"《人民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影響。"中央要求陳伯達帶領的工作組迅速改變這種局面，跟上中央的步調。

《解放軍報》如何就能跟得上中央的步調呢？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當時《解放軍報》鼓吹"文化大革命"的調門最高，發表的大批判文章最多。"把一切牛鬼蛇神堅決、徹底、全部消滅乾淨"、"掃蕩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提法早就見諸5月份《解放軍報》的報端。這些情況就不必詳述了。

陳伯達奉中央之命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顯然是為了完成中央交辦的使《人民日報》改變局面，改變版面，"跟上中央的步調"的任務。

那麼中央當時認為陳伯達的任務完成的如何呢？在北京的中央常委沒有對陳伯達提出過批評意見，在杭州的毛澤東也沒有提出過批評意見。《人民日報》"跟不上中央的步調"的帽子被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摘掉了。

但是十四年後，特別法庭判決陳伯達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這就必然產生一系列的問題了。

委派陳伯達去人民日報社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他們正在主持中央的工作，擁有與任何反革命行為做鬥爭的權力，他們怎麼就聽任陳伯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在黨中央機關報上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呢？而且當時中共中央不僅不對陳伯達進行鬥爭和懲罰，反而還對他加以重用，在兩個多月後的中央全會上將他從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都是黨的八大選出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久經考驗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這算怎麼一回事呢？

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就曾明文規定："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參見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127頁）沒有聽說過中共中央規定黨報可以自由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要追究也必須等待十四年之後。

當初，《人民日報》只是"威信下降"，中共中央都立刻採取了措施，而現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社論，中共中央反而連批評一聲都沒有，這又算怎麼一回事？難道中共中央對黨報沒有領導權嗎？

關於6月1日社論的寫作情況，朱悅鵬的文章說社論是他和錢抵千、尚力科三個人按照5月31日上午陳伯達的談話寫的，這也不是事實。因為第一，社論的章法、行文與談話記錄性質迥異。任何肯用腦的人重讀一遍社論都會明白它不是談話。第二，社論引用了大段毛澤東的話，整段林彪的話。陳伯達不可能在談話時背誦這些話。第三，朱悅鵬自己在文章中說："社論草稿雖兩千多字，但頗費周折。有時一句話，一個字，要摳半天。"既然完全是按照陳伯達的談話寫的，還用得着費周折，摳字句嗎？而且他文章最後還說："6月1日晨，人民日報開印後，我們都松了口氣，帶着興奮的情緒，拖着疲倦的身子，穿過王府井

大街，路經故宮、北海，回到平安裏三號宿舍。”如果他們寫的社論只是記錄了陳伯達的談話，又有什麼可值得興奮的呢？只有自己寫作出來的作品得到發表，才會使作者感到興奮，這是普通常識。

朱悦鵬、錢抵千、尚力科作為人民解放軍的重要宣傳幹部，在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時，按理應堅决宣傳貫徹鄧小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在工作組的會上所做的革命講話。可按照他們的自述，他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將陳伯達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的談話奉為神物，“一字不漏”地予以表達，不遺餘力地為反革命宣傳煽動效勞。既然這樣，陳伯達是反革命主犯，他們至少也得列為從犯。可奇怪的是，文革後他們竟然沒有受到任何法律的處罰，黨員照當，官照當，軍服照穿。他們在回憶文章中提到自己撰寫反革命社論一事時，連一點自我批評的影子都沒有。

4.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出自五月各報刊，此提法曾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共同使用

有一種説法，特別法庭所説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主要指《人民日報》6月1日社論的標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法庭認為這個後來在運動中被到處亂用的提法是陳伯達提出的。那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究竟是不是出自陳伯達呢？只要仔細翻閲一下6月1日以前，也就是陳伯達領導的工作組進入人民日報社以前的報紙，就會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早就見諸於各大報的文章之中。

筆者因條件所限，只借閲到1966年5月份的《北京日報》。僅憑這一種報紙，已經可以幫助我們大體弄清當時的情況了。

現將《北京日報》5月份使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法的情況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5月12日第2版下部轉載《河北日報》5月10日一篇署名文章，結

尾處寫道："橫掃牛鬼蛇神，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5月17日第1版刊登《北京日報》通訊《本市團幹部在團市委擴大會議上紛表決心……》。該通訊末尾一段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後注明（團市委供稿）。

5月17日第2版刊登新華社十六日通訊，通訊的大字標題為《保衛天安門永不變顏色堅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5月27日第1版轉載《解放軍報》刊登的《哲學研究》編輯部長篇材料《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第1版登不完，轉至第2版，右下方一大段的標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搞掉資產階級黑線，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永保勞動人民的紅色江山》

以上四條，除第一條少"一切"兩字外，都是完整使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的，其中5月17日刊登的新華社十六日訊，以大字標題提出"堅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版面上十分醒目。

事實證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並非出自陳伯達。

應當說明的是，類似的提法，甚至是措辭更重的提法，在1966年5月份的報紙上比比皆是。

仍只以《北京日報》為例。

5月6日第3版在版頭標題下有《北京日報》的編者按，其中寫道："……一定會把各式各樣的牛鬼蛇神通通剷除！"

同一版文章《緊握黨給的筆上陣殺敵》中寫道："一定要讓一切牛鬼蛇神碰的頭破血流！"

5月8日第1版刊登署名文章，標題是：《徹底鬥垮一切牛鬼蛇神》

5月12日第2版轉載《河北日報》5月10日署名文章，其中寫道："把一切牛鬼蛇神堅決徹底消滅乾淨！"

5月13日第6版刊登署名文章，標題是：《明的，暗的，文的，武

的，一切牛鬼蛇神統統都要消滅！》

5月16日第7版轉載5月12日《四川日報》一篇署名文章，末尾寫道："剷除一切牛鬼蛇神，捍衛黨的領導"。

以上是筆者翻閱《北京日報》時隨手記下的。其他報紙的情況如何，筆者未做瞭解，但據在新聞界工作過的人說，各報的情況相差不多，在"一切牛鬼蛇神"前面加"剷除"、"消滅"、"掃蕩"、"打垮"等詞的可能更多些，這些詞的嚴重性不比"橫掃"輕，甚或有過之。

翻閱這些史料，可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最初是出自普通的編輯、記者、黨團員和普通的幹部羣眾的筆下，他們對共產黨懷有深厚的樸素的感情，又受到共產黨多年的階級鬥爭的教育，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自發地提出了各種各樣表現階級鬥爭內容的提法、口號。這是共產黨長期進行階級鬥爭教育，強化階級鬥爭意識的一種結果。

歷史已經證明，過份強調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十分錯誤的，是極為有害的。然而，人們也不應脱離歷史背景，拿今天才有的認識去要求過去。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牛鬼蛇神"一詞，從五十年代起就被毛澤東、劉少奇等共產黨的領導人用作階級敵人的代名詞。事實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或類似提法的出現，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是當時中共中央政治路線邏輯發展的產物，而並不是某一個人的行為。當時，上上下下都在使用這類詞語。

稍微看一下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使用"牛鬼蛇神"以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詞語的情況，就可以明白這個問題。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中提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

大字報的措辭比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要嚴重。

眾所周知，毛澤東曾稱讚這張大字報為"馬列主義的大字報"。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說：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73頁)

1966年8月28日，史料記載：

"毛澤東在接見唐平鑄、胡癡時說，現在學生心思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我們在領導上，在報紙宣傳上，不要違反學生的潮流。"(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52頁)

順便提一下，在毛澤東作出這一指示的前兩天，8月26日陳伯達因肺炎住進解放軍301醫院。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

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

"搞場革命一定要搞輿論。'六·一'《人民日報》奪了權，中央派了工作組，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我不同意另起爐灶，但要奪權。"(參見"文化大革命"中印行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這段話清楚表明向《人民日報》派出工作組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都是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辦的。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樣，都不曾認為《人民日報》社論是反革命宣傳煽動。

劉少奇同志有關"牛鬼蛇神"問題的指示，現在正式的出版物中極少提及。只有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第25頁在敘述工作組問題時講到：

"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的意見和部署]》時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從劉少奇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他對"牛鬼蛇神"一詞的界定與毛澤東是有差別的，他側重於將下面"攻擊"領導的人稱為"牛鬼蛇神"。但是他們都將"牛鬼蛇神"視為壞人，視為"階級敵人"的同義詞，這是共同的。從《人民日報》6月1日社論中不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點來看，社論起草人對毛澤東和劉少奇對"牛鬼蛇神"一詞的界定採取了折中的態度。社論也因此受到過部分羣眾的指責。

另外，劉少奇還在1966年7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聲明》中使用過"牛鬼蛇神"一詞。該聲明強調指出：

"胡志明主席揭露了美國的'和談'騙局。這是對美帝國主義'以炸迫和'陰謀的一個迎頭痛擊。對於那些同美帝國主義合謀製造'和談'騙局的牛鬼蛇神，也是當頭一棒。"

劉少奇主席的聲明刊登於7月22日中國各報第一版，影響遍及全世界。這是在國際問題上使用"牛鬼蛇神"一詞。

關於周恩來總理使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情況，本書也只引用官方的正式出版物。

1966年6月24日至28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6月29日，國內各大報紙都曾刊登周恩來6月27日在地拉那羣眾大會上的長篇重要講話。周恩來在這篇講話中說道：

"目前，我國的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的知識份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粉碎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篡奪黨和國家領導的陰謀。這是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包括在文化領域內的專政。我國廣大人民，正在徹底破除幾千年來剝削階級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對於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筆者摘錄的這段話見於1966年6月29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各大報紙的第三版。

另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00頁記載：

周恩來1966年12月7日"接見中國科學院京外單位代表。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能橫掃一切幹部，不能把有點毛病、有點壞習氣的都叫牛鬼蛇神。"

周恩來的講話表明，他贊成的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是他反對橫掃一切幹部，反對把有點毛病、有點壞習氣的都叫牛鬼蛇神。

周恩來總理的講話，尤其是他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在地拉那羣眾大會上的講話，清楚地表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當時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共同使用的提法。眾所周知，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講壇的正式發言，必須經過中共中央的批准。

周恩來在地拉那的講話還表明，《人民日報》6月1日社論發表後，社會上並沒有出現動亂，所以周恩來講話的態度是明朗的，語氣是有信心的。事實上，社會上出現動亂是在8月份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運動之後，而不是在這之前。

鄧小平也使用過"牛鬼蛇神"一詞。早在1966年5月6日，他在上

海市歡迎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大會講話中就明確說道：

“美帝國主義要孤立我們，蘇共修正主義領導集團也要孤立我們。他們正在聯合一切牛鬼蛇神，拼湊一個反革命‘神聖同盟’，企圖孤立中國，……”（見5月7日各報所載新華社上海六日電）

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使用“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以後鄧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給毛澤東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又寫道：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在信中表明瞭他對清除黨內牛鬼蛇神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的擁護。

毛、劉、周、鄧等中共領袖都使用過“牛鬼蛇神”，毛澤東、周恩來都使用過“橫掃牛鬼蛇神”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什麼領袖們用了這些詞語就沒事，陳伯達同樣用了就犯了反革命罪呢？

這個問題不僅筆者和很多人弄不明白，甚至連官方的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在其名著《大動亂的年代》的後記中也說：“老實說，有些事我自己還沒有弄清楚。例如，為什麼說《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陳伯達的‘罪行’，我就弄不清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辦不到的，不如從略。”

寫完此節，筆者看到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1949—

1976》下卷第1312頁摘錄了毛澤東1963年2月2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一段講話：

"再有幾年，我們的幹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個個拿來槍斃，不能用那個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講的斯大林那個辦法，動不動就殺人，那不解決問題。"

該書沒有披露劉少奇講斯大林那個辦法的原話。但不管怎樣，毛澤東這段話說明，毛澤東、劉少奇關於"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的思想，早在1963年就已經提出了。1966年出現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不過是這一思想的簡約表達方式。它並不比領袖們最初的提法更重，而且，如前面已經論述過的，這一簡約表達方式也根本不是陳伯達首先提出的。這就是事情的本來面目。

5. 進駐學校的工作組與部分學生發生衝突，陳伯達建議撤銷工作組

1966年6月上旬，由於聶元梓大字報的轟動效應，許多學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出現了反對校黨委或黨支部的大字報。一些學校的領導工作發生困難。劉少奇經過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進駐學校伊始，學生普遍是歡迎的，但為時不久，就出現了問題。許多工作組的工作重點是組織對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行批判，而對於原來的校黨委或黨支部則基本採取維護的作法。結果，一部分學生轉而反對工作組。一些學校甚至發生了驅趕工作組的事件。

面對這種局面，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生了爭論。劉少奇認為工作組是不能反對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要把那些造工作組反的學生作為牛鬼蛇神揪出來組織批判。

本書前文提到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中記載，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的報告時指示：

"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鄧小平支持劉少奇的意見。陳伯達則提出異議，認為工作組不應當對學生採取對立態度，在目前一些工作組與羣眾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可以先撤銷工作組，避免衝突加劇。

值得注意的是，對劉少奇6月13日的指示，近些年出版的很多關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的書籍，都迴避引用，包括以摘引資料豐富著稱的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也沒有加以引用。這種做法似乎有失歷史學家應客觀公允對待史料的傳統風範。

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45頁寫道：

"6月20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驅逐工作組之時，中央文革小組向中央第一線提出書面的建議，其中說到'建議全國大中學校、機關單位在適當時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領導文化革命運動。''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時候，可以由上級派工作組。'7月13日、19日、22日，陳伯達在中央會議上又三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組的問題。這些意見，為參加中央會議的多數人所拒絕。"

筆者目前無法看到檔案中有關的原始資料，只能借用王年一的書中引用的材料。這些材料雖然不是全文，只是片段，但是也可以看出陳伯達的建議是在出現羣眾驅逐工作組的現象後提出來的，他並沒有完全否定工作組的形式，但他認為適當時應由學校師生自己成立文化

革命小組領導運動，僅在最必要的地方和最必要的時候可由上級派工作組。此後他三次建議撤出與羣眾發生衝突的工作組，但均被劉少奇、鄧小平否定。

陳伯達認為黨的領導在與羣眾發生對立時應先聽取羣眾的意見，主張讓羣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他並沒有盲目支持羣眾。對於羣眾中發生的一些過火行為，例如北京大學的“六·一八事件”，他開始也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與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的分歧在於他反對將有錯誤行為的學生當作“右派”或“反革命”，反對一些工作組把給自己提批評意見的學生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

有關這段歷史情況的檔案材料現在還沒有如實客觀全面地公開，所以我們目前還不可能詳細評述這段歷史。

陳伯達晚年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只簡單說過這樣的話：

“派到學校的工作組與羣眾發生對立，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議，被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否定了，實際上還沒有拿到會議上討論就否定了。這件事是我與少奇同志之間第一次發生衝突。過去，我與小平同志之間曾有過一些意見不和，但是與少奇同志的關係一直是比較好的。現在看來，我的意見也有錯誤和不慎重的地方，主要是沒有對工作組進行區別，主張一風吹散，也沒有先搞試點看看再說。當時，事情很緊迫，很難把事情考慮細緻。

“主張撤銷工作組也被算作我的罪過之一。但在那時，如果不撤銷工作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難說。當時工作組已經把許多學生和教師定為‘右派’、‘反革命’。不撤銷工作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狀況，不允許羣眾批評領導，一批評就說人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給定為‘右派’、‘反革命’。一個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人，羣眾不能批評，每個單位的黨委書記都認為自己代表

黨，反對他就是反對黨，這種狀況是不合理的。不改變這種狀況，仍還照過去的做法去處理羣眾批評領導的問題，終歸是行不通的。”

關於當時北京高等院校師生被工作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人數，有兩個差別很大的統計數字。

一組數字是1967年“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在“6月23日”的記載內容中說：“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裏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革命教師打成‘反革命’”。

另一個數字是在中共中央徹底否定文革之後（所謂“徹底否定文革”，只是對毛澤東的想法和做法予以否定，並沒有否定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工作時工作組的做法），王年一於1988年12月出版的《大動亂的年代》中引用王力的回憶說法：“一百幾十個學生被打成反革命”。

前一組數字公佈的時間距離事情的發生時間比較接近，當然這個數字也有可能對事情有所誇大，但後一個數字的公佈則是在事情過後二十二年，此時主張撤銷工作組的陳伯達已被定為反革命主犯，這個數字顯然對當年工作組把學校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情況有所遮掩。

筆者在此敘述一件親身經歷的事，這件事對瞭解陳伯達1966年7月間的境況可能會有所幫助。

文革發生前一年的1965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中畢業，原想報考大學文科。此時，中央高級黨校新成立了一個青年訓練班，有關領導決定保送我去學習。可是，陳伯達既不同意我學文科，更反對我進入高級黨校（原因無疑是陳伯達知悉毛澤東對文科教育意見甚大，擔心我將來捲入是非）。於是我放棄了高考，響應黨提出的知識青年上山下

鄉的號召，於1965年8月到內蒙古臨河縣狼山公社插隊務農。

1966年夏天，我們這些在內蒙古的北京知青從報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但對於北京的真實情況卻一無所知。自治區安置知識青年辦公室的領導也同樣不瞭解形勢，他們仍按往年的慣例，於7月中旬組織了知識青年回京匯報小組，準備到北京各中學做報告，以動員部分畢業生上山下鄉。我和呂秋夢、田苗等五人是這個小組的成員。

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發現各個學校都在忙於搞運動，匯報小組無法進行工作。大約三天後，帶隊的安置辦公室幹部（記得是徐丙寅同志）只好讓我們各自回家看看即準備返回內蒙古。

7月19日，我回到中南海的家中，沒有見到父親陳伯達。20日我離家歸隊，登上了返回內蒙古的火車。過了幾天，我在內蒙古臨河縣農村收到了陳伯達的來信，信的全文如下：

> 小農：
>
> 聽說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時來看你，不遇，甚憾。你繼續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貧下中農學習，作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並且要隨時拿這一點來考察自己，不斷教育自己。要拜群眾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麼幹部的子弟，就覺得自己有點特殊的樣子。黨和人民把你養成人了，此後一切，每時每刻，都是要想怎樣才能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惠。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最最害人的東西。永遠永遠不要讓個人主義盤踞你的腦子，這樣，才能看得寬，看得遠，才能前進，才有前途，才會使自己成為人民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樣，我們總只是群眾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點，決不能學。但是我總認為，我的生是屬於人民的，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這是毛主席的教訓，黨的教訓，希望

你永遠記着。

勿勿

祝路上平安

爸爸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時

筆者引錄這封家信的全文，是因為這封信寫於不同尋常的時刻(這封信筆者當年曾給李曉峯、張木生等同學看過，1971年“批陳整風”時上交給了黨組織)。

當時，陳伯達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建議在中央會議上連續被否定。一些將持不同意見的學生定為“右派”、“反革命”的工作組負責人以及支援他們的某些中央幹部，私下把陳伯達稱為“右派的後台”，聲稱“北京有個大右派”。這些情況使陳伯達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他感到自己隨時有被打倒的可能，但是他認為自己的建議並沒有錯，黨的領導機構再也不能和學生繼續對立下去了。他在思想上已準備為保護受壓制的羣眾而倒台，所以他在給我的信中寫出了這樣近似遺囑的話：“不管怎樣，我們總只是羣眾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點，決不能學。但是我總認為我的生是屬於人民的……。”

現在一些書刊把當時的形勢描寫成是毛澤東和江青在南方一直遙控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組，指示陳伯達等反對工作組並提出撤銷工作組。這是與當時的真實情況有出入的。實際上，毛澤東只是6月初在杭州說過一句“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毛澤東講此話時，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均在場，他們是專程到杭州請示工作的)，並沒有說過不能派工作組或以後要撤銷工作組。毛澤東在杭州講的這句十分含糊的話可能對陳伯達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議主要是基於他自己的認識。他提出這樣的建議，並不知道毛澤東是否一定會支持他。如果毛澤東不支持他，他是倒定了。

7月18日，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並在隨後分別聽取了不同觀點的匯報。

從陳伯達在7月19日和22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議仍被拒絕的事實看，毛澤東在回京之初並沒有馬上對工作組問題作出明確的表態。現有的材料表明，毛澤東在7月23日以前表示過對工作組的工作不滿意，但是他決定撤銷工作組是在7月24日上午。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搞。"7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各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6-47頁）

毛澤東最後支持了陳伯達的意見，使陳伯達從頭頂上那把"右派後台"的達摩克利斯劍下解脫出來，這無疑促使陳伯達在當時毛、劉對立的狀況中別無選擇地站在了毛澤東一邊。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在一些重要問題上，陳伯達不假思索地擁護毛澤東的主張，執行毛澤東的決定，不由自主地犯了許多不應該犯的錯誤。然而，在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人們對陳伯達所犯錯誤的估量卻未必是正確的。陳伯達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建議，以及這個建議最終被採納，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長時期裏那種認為領導者是絕對正確的，反對領導者是絕對錯誤的，反對某個黨組织的領導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為僵化的思維模式。由於此種僵化的思維模式在很多人的頭腦裏已經根深蒂固，其慣性勢力十分強大，一旦被打破，它所遇到的反作用力也十分猛烈。因此，這種思想觀念上的衝突隨着運動的發展逐步轉變成羣眾中發生兩派鬥爭的思想基礎。這當然有令人遺憾的一面。然而，思想觀念的解放總是要有代價的，總是要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由量變到質變地，逐步地向前邁進的。如果將文革以前形成的那種在每一個單位內，羣眾絕對服從黨委書

記，黨員只能做黨組織的馴服工具的狀況永久化、固定化，那自然不會有文革，但同時也就不可能有人們在文革時期複雜紛亂的政治變動中經過直接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而逐步成熟起來的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文革結束後人們在思想觀念的解放上的質的飛躍。

現今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都諱言一個基本的事實：“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初期曾經得到過大多數羣眾的擁護。如果沒有大多數羣眾的擁護，這個運動是不可能那樣廣泛迅速地開展起來的。羣眾之所以會擁護的原因，就在於這個運動在它的初始階段帶有相當程度的思想解放的成分。從過去長時期的領導至上，一變而為羣眾至上，這是一個大變化，這是一個很多羣眾長久以來可望而不可即的大變化。它使很多被單位領導的權威壓抑得過久的羣眾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了精神上的解脱。這個變化來的過於突然，過於猛烈，結果導致了社會的劇烈動盪。

6. 八屆十一中全會與十六條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重新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該文件有十六條內容，故簡稱十六條）。對這次中央全會及十六條的起草工作，陳伯達做過如下回憶：

“十一中全會調整領導班子時，毛主席和周總理擬的常委名單把我排在周總理後面，我找到毛主席，說：‘我能力不行，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樣靠前’，毛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名單最後面的陶鑄同志的名字鉤到我的名字前面，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

“十六條的起草工作主要是我做的，毛主席、周總理和陶鑄、王任重同志等都做了一些修改。文件經過參加會議的人的共同討論後通過。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十六條中有錯誤之處。但是，十六條也第一次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則。雖然這些原則在運動的混亂狀態中沒有能貫徹下去，但不等於這些原則的提出沒有意義。

“十六條中規定，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經過羣眾充分醞釀提出候選名單，選舉產生文化革命委員會，當選的人如果不稱職，羣眾可以批評，可以改選、撤換。我寫這一條，是想用選舉領導人員的辦法來改革過去單純依靠上級任命的做法。任何領導人都必須接受羣眾的監督。毛主席那時也同意我的這些意見。但是後來這一條沒有能具體實行。

“十六條中還規定了‘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這一條原則也很重要，可惜後來也沒有能做到，直到今天也沒有能做到。但是我想，將來的人們是會認識到它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行的。

“十六條中還提出，要讓羣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包辦代替的辦法。人民羣眾終歸是歷史的主人。羣眾的解放是羣眾自己的事，不能依靠任何人的恩賜。國際歌裏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任何不尊重人民羣眾的人，把自己淩駕於羣眾之上自吹自擂的人，絕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十六條中關於‘要用文鬥，不用武鬥’這句話，我原來參照二十三條的文字，寫的是‘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逼供信’，毛主席採納其他同志的意見，改為‘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我覺得，從意思明確方面來說，我的原話可能更好一些。

“十六條中一個大的錯誤是只強調了黨中央的領導，而沒有寫各個單位的黨組織應起什麼作用。因為毛主席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確定為運動主要的對象，所以基層黨組織的作用也就不好寫。這也

可以說是削弱了黨組織的作用吧。這個後果是起草文件時沒有想到的，當時沒有預料到運動會有那樣大的規模。

“關於毛主席使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概念，我當時的理解，這主要是指那些政治上脫離羣眾、壓制羣眾、當官做老爺的人。要說完全沒有經濟方面的內容，那也不是，但是這個詞主要是指政治方面，而不是經濟方面。

“解放以後，我們的幹部制度實行的是上級任命制。很多幹部在一個地方一當官就是十幾年，沒有羣眾監督，時間長了，逐漸脫離羣眾了。有些人爭級別，比享受，對羣眾的事不關心，遇到羣眾提意見，就對羣眾施威。這樣下去怎麼能行呢？

“天津市有個幹部俱樂部，房子、設備是解放前外國人留下來的。解放後，對一定級別的幹部開放，一般羣眾不能進去。楊尚昆很欣賞這個東西，就想在北京也建一個，他知道毛主席不會同意他在中南海搞這些名堂，就在中南海北面不遠的養蜂夾道胡同建了起來。俱樂部建好後，聽說有些幹部經常去。文革前我一次也沒有去過，文革後偶然去一回，才知道那裏麻將室、游泳池一應俱全，蓋的很講究。把國家的錢用在這方面，不是嚴重脫離羣眾嗎？過去我們黨與人民羣眾同甘共苦的傳統作風，一些幹部已經淡忘了。

“文革開始時，有些幹部在對待羣眾的問題上是不是有過錯誤，看一看他們在文革後如何對待羣眾遊行的問題就知道了。羣眾遊行，領導幹部應該出來接見。有什麼問題可以當面談嘛！有時候羣眾提出的意見不一定都對，對的接受，不對的可以批評，做思想工作嘛！出來見一下羣眾會怎麼樣？大家肯定會鼓掌歡迎！為什麼和羣眾見一下都不行呢？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同他們過去的錯誤是一脈相承的。

“文革中，毛主席只搞階級鬥爭，只搞運動，沒有及時把運動轉到

搞好生產上去，這是錯誤的，最後運動也失敗了。文革後中央吸取了過去的教訓，吃一塹長一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這是正確的，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一件事有一件事的是非。一個人現在做對了一些事，並不表明他歷史上也一切都對。有了成績，也並不表明工作中沒有缺點、錯誤。還是應該謙虛謹慎，尤其不能脫離了羣眾。脫離了羣眾，即使經濟搞上去了，也不能保證社會的健康發展，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陳伯達在談話時沒有談到他個人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的情況。據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一書第50頁記載："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毛澤東主持，鄧小平、劉少奇、陳伯達先後講話。"該書在介紹了鄧小平、劉少奇的講話內容後，在第51頁寫道："陳伯達主要講了兩點：一是工作組做了壞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脫離羣眾。"

另據香港北星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376頁記載：

>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林彪講話後，毛主席要陳伯達講話。那次講話，陳伯達就說他不過是劉盆子（注：是前漢亡後，一個放羊的，因為是宗室，被抬出來當皇帝。）意思很清楚，他說他不過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組是江青當家。"

王年一和王力分別在書中引用了陳伯達講話的片言隻語。筆者目前還沒有條件查閱檔案中的陳伯達講話的原文。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還發生了兩件大事：8月1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致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對這兩件事，陳伯達在談話中偶有涉及，但未做詳談。有一次，我與陳伯達閒聊時，我說："你是不是相信

羣眾過了頭，以為羣眾一定不會亂來？"陳伯達說："也不能說相信羣眾過了頭。問題是毛主席開始主要依靠的是紅衛兵，紅衛兵都是些小孩子，他們有時會亂來，他們和工農羣眾還是不一樣的。"陳伯達還談到當聶元梓在北京大學貼出毛澤東的大字報時，他按毛澤東的指示迅速趕到北京大學加以制止。此事已見之於《陳伯達遺稿》的有關篇章，這裏不再復述。

7. 反對血統論與制止武鬥

正當中共中央領導層在工作組的問題上出現分歧的時候，1966年7、8月間，北京的一些學校中，尤其是中學生當中，流行起一股"血統論"的思潮，一些幹部子弟提出了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謬論。這股思潮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長期以來一部分幹部子弟嚴重脱離工農羣眾，頭腦中的優越感思想在社會環境面臨變化的形勢下反射性地惡性膨脹的產物，是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思想的一種改頭換面的新形式。從存在決定意識的角度來說，它是社會上存在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羣這個現實在人們意識上的反映。由於這股思潮打着"階級鬥爭"的旗號，一時迷惑了許多人。

無可否認的是，在一段時間內，有些中央高級領導人曾發表過助長幹部子弟優越感思想的言論。1966年7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曾說過："要使工農革幹子弟逐步掌握學校的領導權，這要成為一種趨勢。"（參見1986年在美國出版的《知識份子》雜誌春季號，原刊不在手邊，這裏只記大意）

部分青年學生中冒出來的"血統論"思潮在一段時間內不斷蔓延，並迅速傳播到北京以外的地區。在毛澤東發表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以後，當時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早期紅衛兵中的一些人，錯誤地以為毛

澤東對他們的一切言行都是支持的，於是起勁地鼓吹這種思潮，並把這種思潮美其名為"無產階級階級論"。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極端錯誤的思潮，一些領導幹部缺乏識別能力，他們或表示支持，或欣賞附和，以為這股思潮有利於進一步提高他們的子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有利於他們的子女將來接掌權力。

在這種十分複雜的局面下，陳伯達不顧一些黨內高級幹部的反對，挺身而出，率先對這股思潮加以駁斥，指出這股思潮根本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階級論"，而是剝削階級的"血統論"，有效地遏止了這股思潮的氾濫。

筆者在這裏不想重複一些書籍已經記述過的這股思潮的氾濫經過以及陳伯達批判這股思潮的有關講話。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讀者可以詳細閱讀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第七章和1999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葉永烈著《陳伯達傳》第八章的最後一節(這兩部書在總體上與官方的觀點保持一致，但仍記述了一些重要事實，前一部書主要記述了血統論氾濫的情況，後一部書摘錄了陳伯達批判血統論的一些講話)。筆者在這裏再插敍一段自己的經歷和見聞，可使讀者對相關的歷史背景有更多的瞭解。

1966年7月，我們知識青年回京匯報小組工作無果，返回內蒙古。我回到臨河縣狼山公社民強三隊，照常從事農業勞動。8月22日左右，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中學生李曉峯、王延平從北京來了。他們找到我和張木生(張是初中畢業下鄉，與我同住一村，張與李、王曾是初中時的同班同學)，說現在北京各學校都已停課鬧革命，請我們回北京看看。年輕人都有好奇心，第二天我們四個人一塊乘火車回到北京。

當時，因只有我一個人家住中南海，他們三人都家住西郊，為聯繫方便，我沒有馬上回家，先住在人民大學校園內的張木生家裏。張木

生的母親是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她與我繼母劉叔宴是重慶地下黨時期的同事。解放後她曾到過我家，對我並不生疏。

有一天，大家聚集在張木生家交流聽來的消息。王延平說："我聽同學們說，因為陳伯達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紅衛兵給他貼了不少大字報，把國務院機關事物管理局的院子都貼滿了，有的大字報上面寫着：陳伯達的屁股坐到哪裏去了？"

我本能地覺得那個對聯是不對的，但又為父親得罪紅衛兵有些擔憂。早期的紅衛兵，大多是高幹子弟。在北京，他們人多勢眾，依仗父輩的功勞和權位，幾乎不把一切人放在眼裏。當時，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兩個人外，紅衛兵對任何人都敢反，任何與他們作梗的人都可能被他們打倒。

我很快回了一趟家。沒有見到陳伯達，只見到劉叔宴，她皺着眉頭對我說："現在情況很複雜，連少奇同志都有大字報，我們也隨時都可能倒。不要以為你父親現在是什麼組長，不知什麼時候就下台了。我看你還是早一點回去好。"

此次回家還發現，中南海加強了警戒，大門口的盤查更嚴了，而我因戶口現不在北京，按規定不能發給出入證，這使我頗感不便。

回到人民大學後，我和張木生對於是否應馬上回內蒙，一時定不下來。忽然有人提議，現在學生坐火車不用買票，有羣眾組織的介紹信就行，咱們也成立個組織，去南方轉一轉。大家一聽，都贊成。那時，已經是"天下大亂"，誰也安不下心來。

我想，我和張木生兩個人現在是農民，不能用學校裏的組織名稱。我過去讀歷史，對五四運動時期的《少年中國學會》印象頗深，於是提出，可以叫《紅色少年公社》。大家都同意，於是就成立了這個類似學會的小組織。我們一行八人，8月底從北京出發，先後到了廣州、長沙、韶山、

武漢，遊覽了名勝古跡，也看了許多大字報，9月初返回北京。

北京的許多學校仍在辯論那個對聯。

一天，張木生從外面看大字報回來説，有一篇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的講話，看的人很多。他看後思想有改變，原來覺得那個對聯的提法不好，看了譚力夫的講話就不那樣認為了。我和李曉峯覺得奇怪，就一起出去找到那份大字報。看完我們邊往回走邊議論，認為譚的講話是錯誤的。我們跟張木生説，我倆的看法和你相反，這篇講話違背了黨的政策，不僅不能贊同，還應堅決反對。

譚力夫的講話煽動對出身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的歧視，甚至使用了這樣的語言，説什麼過去國民黨搞白色恐怖，對革命烈士的子女斬草除根，現在反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學，還要怎樣？對他們要七鬥八鬥才能團結，等等。這篇講話具有極大的鼓惑性。

在我和李曉峯指出了譚力夫講話的錯誤和荒謬之處後，張木生很快轉變了觀點。我們商量要對譚力夫的講話進行批判。

關於我們批判譚力夫講話的經過，在1989年3月出版的《海南紀實》第3期刊登的陳小雅《北京知青歷程回顧》一文中，記錄了李曉峯比較詳細的回憶，我這裏就不重複了。

現在有的歷史學家寫的書，只講譚力夫全力維護工作組，反對中央文革，把他歸為英雄人物。至於譚力夫講話的主要作用是在煽動血統論，卻被完全掩蓋了。只有高皋、嚴家其的書寫到了這樣的事實：

"譚力夫的講話很快風靡北京，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人用紅紙轉抄，而且張貼在路人皆過的要道旁。這樣一來，學校裏非'紅五類'出身的人，哪怕是運動的旁觀者都成了紅衛兵'專政'的對象。……在一段時間裏，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被紅衛兵集中在一起看報、學文件。上廁所都要向'紅衛兵看守'請假，回來稍遲一步，便不是遭白

眼，就是遺訓斥。

"譚力夫的講話對外地的影響就更大了。……以福建省為例，那裏的省市負責人都認為'講話'寫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長的時間裏，全省就複製了幾十萬份'講話'，並由新華書店發行到工廠和農村。"

這就是譚力夫講話的真實作用。有的省、市的領導，寧可聽從譚力夫這個高幹子弟的(譚父曾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文革後譚力夫在軍隊任高職)，也不肯聽從中央文件的，因為譚力夫的講話為一部分人塗着"革命"色彩的等級思想撐了腰，反映了一部分人想將政治權力世襲化的願望。這是當時衝突加劇的原因之一。

大約是10月15日，北京十幾個大專院校在工人體育館開"捍衛十六條"的會，我們也去聽發言。中央文革派穆欣到了會。陳伯達不知從什麼途徑聽說我去了會場，他不願意我捲入運動，派王保春找到我，把我叫走。我跟着王保春到了釣魚台的一個房間，看到陳伯達正和王力、關鋒在討論一篇社論的清樣，社論的內容是強調"用文鬥，不用武鬥"。王力我過去見過，但見到關鋒，這是唯一的一次。

陳伯達見到我，放下清樣，問了我幾句會上的情況。然後，他問我："現在社會上流行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你認為對不對呀？"我回答："當然不對。"陳伯達說："那些說法完全是胡說八道！因為我批評了那種說法，很多人反對我。我很可能倒！不要以為我現在是什麼'組長'，就怎麼樣了，我隨時都可能倒的。"

我當時感到他受到的壓力很大。顯然，在中央高層，在反對血統論這件事上，他勢單力薄。如果他得不到毛澤東的支持，反對血統論的努力就可能半途而廢。

1966年10月8日至24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兩個月來運動的總結》的講話。他講了

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兩條路線的鬥爭，並着重講到了批判血統論的問題。講話稿經毛澤東的修改和與會者的修改，定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作為中央文件印發。這使得對血統論的批判獲得了中央的認可，血統論從此逐漸走向衰落。由於特定歷史條件的局限，陳伯達的講話也無可避免地存在許多錯誤，但是，講話強調反對血統論和保護少數，卻不應全被否定。

在講話中，陳伯達例舉有一位高幹子女在稱讚譚力夫的講話時宣稱："我們高幹子弟要掌權"。陳伯達接着批駁道：

"我們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什麼因為是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掌權？難道他們的血統高貴嗎？

"最近一個時期，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他們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着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製造這種謬論的人，就是過去用各種手段打擊、排斥工農子女的人。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同時，那些製造和散佈這種血統論的人，如果願意回到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上，就

應該改正錯誤，停止散佈這種謬論。"

陳伯達批判血統論的這些講話，第一次從理論上剝掉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謬論所披着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外衣，還之以血統論的本來面目。在他之前，還沒有人這樣明確和斬釘截鐵地講過。這一場爭論，決不是可有可無的爭論，而是關係到國家的權力究竟是歸人民大眾所有，還是歸少數有過功勞的人物和他們的子女所有的原則性的問題；究其實質，是關係到中國革命的目的究竟是建立一個人民享有政治平等的民主國家，還是建立一個少數人因其家庭高貴而享有特殊政治權力，而另一部分人因其家庭不高貴就要長期受到歧視的等級制國家，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

文革初期的武鬥現象也是同血統論氾濫的現象密切相連的。不認真徹底地批判血統論，就不可能有效制止武鬥。鼓吹血統論的兩個主要組織，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和後來的聯動，都曾以參與武鬥而知名。現在，這兩個組織的此類事蹟已經被一些人有意加以掩蓋了。

陳伯達晚年獲准保外就醫以後，大約是1982年，有一天，陳伯達過去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來看他。三個人在一起聊天，談起當年陳伯達批評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的往事，講到了一件不為外人所知的事。他們聊天時我也在場。現綜合他們三個人的談話內容，將此事記述如下：

1966年秋季的某天（王保春記得是在國慶日之後），文革小組快報組出的《快報》上有一篇解放軍報記者寫的報導。這篇報導說，昨天有十三個從天津徒步來北京的初中學生(當時中央號召學生步行，以減輕交通負擔)，住在西城區西安門的一個小旅館，當晚受到西城區糾察隊的盤問。在得知這些學生中有幾位的家庭出身是資本家時，西糾的隊員對他們大打出手，連旅館的電燈也被打碎了。西糾的隊員還勒令

他們滾回去。幾個學生在黑暗中抱頭痛哭。他們本來是高高興興來北京見毛主席的，萬萬沒有想到會在北京遭到毆打。他們決定第二天就返回天津。

陳伯達看了這篇報導，走進王保春和王文耀的辦公室，一邊把報導遞給他們，一邊就坐在地毯上掉下了眼淚，説道："沒有想到運動會搞成這個樣子，人家是毛主席的客人，就這樣把人家趕走了。"王保春看到陳伯達這樣難過，趕緊説："您別着急，他們是步行回天津，走不快，我現在沿着去天津的路去追，也許能追上。"

王保春先到快報組，找到那個寫報導的解放軍報記者，兩個人乘坐一部汽車，一路尋找過去，遇到旅館或紅衛兵接待站就打聽有沒有天津來的學生。終於在晚11點多，在快到通縣的八里橋附近的一個小旅館裏，找到了這十三個學生。學生們已經入睡，王保春和記者叫醒他們，説明了來意，對他們加以安慰。然後王保春打電話給陳伯達，問這十三個學生找到了，現在怎麼辦？陳伯達給公安部長謝富治打了個電話，請他派兩個員警護送這十三個學生回天津，免得他們路上再遭不測。公安部派的員警很快趕到了八里橋。有人提到，這些學生步行回天津，一路上還要吃住，於是王保春與記者等幾個人把隨身帶的一些錢和糧票湊了湊，交給了學生們。

兩位員警護送十三名中學生回到天津後，天津的學校寫了個收條，證明學生們已平安回校。員警返京後將收條交到釣魚台的陳伯達辦公室。事情才算完結。

那時，快報組的記者還報導，西糾的隊員在火車站盤問每個來北京的外地學生，問他們的出身是什麼，凡是出身地主資本家的，西糾的隊員就拿皮帶抽打他們，叫他們滾回去。

陳伯達看了這些報導，就在講話中對西糾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可

是他不知道西糾的成立得到過周總理的支持，周總理曾派周榮鑫等和西糾聯繫，給西糾提供過物資，讓西糾協助維持秩序。結果，陳伯達一批評西糾，總理那裏感到很被動。這使他們之間發生一些誤會。陳伯達急於制止西糾等組織的打人行徑，要解散西糾，不僅得罪了許多高幹子弟，也引起高幹中一些人的惱怒。但在當時，為了解救一大批因為所謂出身不好就挨打挨整的人，是顧不了這麼多的。

筆者認為，西糾實在不能不解散。讀一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75頁關於西糾在北京六中對所謂"黑七類"、"狗崽子"實行的種種殘酷行為的記載，任何人都不難明白這一點。

接着發生的事就是香港出版的《陳伯達遺稿》第85頁裏陳伯達親自筆述過的：

"'文化革命'初期，一次在北京政協禮堂，看到一個工廠被打的女工，遍體血痕，我當即起草一個'禁止私設公堂、拘留所'的佈告[1]，並請當時北京市的負責人來，把這佈告印出張貼。隨後，這佈告經過毛主席批准，轉發全國。

有幾晚，我約當時北京市負責人到北京市區附近一些地方，發現有私設公堂和拘所的，立即解散這些私設公堂和拘所，立即放人。我還到過一些學校、機關處理這類事件[2]。……"

---

[1] 指1966年月11月18日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發出的《重要通告》。《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允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全國各地陸續轉發了這一《通告》。

[2] 198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曾記載："《通告》發佈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到北京市六中'勞改所'參觀後，指出：'無論對什麼人，都不能這樣搞'，並命令'西糾'立即解散'勞改所'。"(參見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76頁)

陳伯達曾與筆者談到解救六中被關押人員的情形：

“我們到了那裏就把被關的人都放了。幾個被關的老師說：‘你們晚來一天，我們可能就沒命了。’他們當時都不敢回家，害怕學生找到家裏。我通知公安部來人，先把他們保護起來。”

上述事實在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錄》裏也有記載，現將王力書中第691至692頁的有關文字摘錄如下：

“十一月，毛主席要陳伯達約我和關鋒到北京各地去看，哪裏私設公堂，我們當場把人放了，不許這樣搞。我們到一個中學，他們把女校長、教導主任關在地牢裏，我們把他們放了，他們不敢回家，寧願到公安局去。我們當場打電話叫北京市公安局把這兩個人保護起來。我們還簽了字。我們到了幾個地方，後來起草了十一月十八日北京重要通告。……”

王力這段文字說，是毛主席要陳伯達這樣做的，而陳伯達的筆述中卻沒有這樣說。筆者聽陳伯達講這些事情時，他也沒有提到毛主席有具體指示。而只是說毛主席事後批轉了他起草的北京市重要通告。陳伯達的秘書回憶，當時收到了羣眾的揭發信，陳伯達就立刻叫上人一起去解散非法關人的場所。後來，陳伯達起草了北京市的重要通告，並到各學校、機關、工廠檢查，隨時取締私設公堂，釋放被關人員。筆者認為，王力之所以要說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害怕有人起哄，不承認這些制止武鬥的事是已經倒台的人做出的。

其實，當時如若真的有毛主席的具體指示，一切就都很好辦了，只要一說是奉毛主席之命，下面誰敢不從？事實上卻沒有這樣簡單。陳伯達制止武鬥的努力，雖有一定效果，卻仍十分有限。為什麼當時不能由中共中央或國務院或公安部向全國發一個通告呢？那樣不是效果更好威力更大嗎？為什麼只以中共北京市委的名義發通告呢？因為陳伯達個人的權力很

有限，能做到以中共北京市委的名義發通告，就已經不容易了。

1966年12月底，又發生了聯動（全稱是"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後又稱"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事。現在的一些書刊對聯動倍加稱讚，因為聯動的綱領是反對中央文革的，他們的打人砸物、堅持血統論的暴力行為也就變成光明行為了。聯動被中央取締後，部分成員一度被關押，不久全被釋放。其過程很多書都有描述，不用再重複。陳伯達本人對聯動問題說過哪些話呢？

筆者手頭僅有一份陳伯達1967年2月6日在北京師大一附中的談話紀要，其中有幾句談到了聯動問題。陳伯達說：

"聯動的錯誤是搞了些恐怖活動，參加聯動不一定完全錯誤。

"希望他們以後不要搞恐怖活動了，過去搞的教育教育就算了。如果他們現在不聽教育，以後慢慢會聽的。"

陳伯達的這些談話說得很和緩，並沒有過份嚴厲的話。

被捕的聯動成員於1967年4月被全部釋放，其後，聯動成員們又做了哪些事呢？高皋、嚴家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第119頁寫道：

"他們每天在天安門廣場騎車飛奔，高呼口號。不少學校的聯動成員還召開了'老紅衛兵新生大會'，並參與中學生中勢均力敵的'四、三''四、四'兩大派鬥爭。五月初，全市聯動成員串聯在一起，與北京二十八中的對立派發生武鬥，佔領北京二十八中學三天之久，還在全市搜捕與之對立的人。失而復得的自由使他們用各種方式發洩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仇恨。他們高喊'把狗崽子斬盡殺絕！叫你們永世不得翻身！叫你們屍體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殺盡你們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邊站，紅五類要掌權！'聯動在這時無法把矛頭直接對準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成了他們發洩仇恨的對象。

"在一片批判的聲浪中，聯動組織鬆散了。然而，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地下室仍設有聯動的聯絡站，雖然處境十分困窘，卻也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後。"

認真讀一讀這些記載，可以明白很多事。

試設想，如果聯動在當時得了勢，其主張果能得以實現，中國將會變成一種什麼樣子？不知道那些一味稱頌聯動的人們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在1967年秋的混亂局面中，還發生了一些紅衛兵到處損毀文物的現象。陳伯達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採取了保護文物的措施。陳伯達回憶道：

"有一天，戚本禹拿來一封羣眾來信，反映一些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搞得文物四散，一些銅佛像被送到工廠化銅水，舊書打捆送廢品公司，運到造紙廠要銷毀。我馬上說：'這種行為必須制止！文物是文物，四舊是四舊，不能混為一談。'我讓戚本禹先管一下，與北京市聯繫，由文物書店[1]把東西趕快收集起來，好好保管，不讓文物散失毀掉。我當即寫了三句話：(一)未啟封的，一律暫封不動，還要看守好。(二)已送派出所的，一律要保護好，待處理，不要送廢品公司。(三)已送廢品公司的，不得擅送工廠銷毀，也要等待處理，同時，注意保護。[1]後來中央採納我的意見，發了個保護文物圖書的文件。戚本禹倒了以後，北京市由丁國鈺同志領導文物清理小組的工作。"

由於歷史的局限，當時文物圖書的收集、清理工作難免存在種種缺陷，但是這一措施畢竟搶救、保護了大量的文物圖書，避免了更嚴重的損失。

---

[1] 即中國書店和文物商店，陳伯達習慣將二者合稱。——筆者注

[1] 此三條據陳伯達手寫原件排印——筆者注

8. 文革小組的變化——從分歧走向分裂

文革小組成立初期，其成員在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大體維持了鬆散的一致。1966年7月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8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此後，局勢瞬息萬變，事件頻出，小組也屢經變易，後改組為有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其間種種變化，難以備述。陳伯達在與筆者談話時，着重敘述了他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從發生分歧到走向分裂的過程：

"文革小組剛成立時，只是中央常委起草文件的班子，沒有正式的機構，小組成員出席中央的會。6、7月間，江青、張春橋他們在上海，有時來電話傳達毛主席的意見。7月底他們來北京。不久，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召開十一中全會。在這之後，小組的矛盾就開始了。

"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不久，我生病發高燒，住進醫院。我提出可由江青代理組長，中央同意[1]。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我正在醫院，江青代表小組致辭。從此江青就在小組中橫行跋扈，我的話就沒人聽了。

"記得有一天，王力到醫院來，他叫我不要管事了，說宣傳方面的事現在陶鑄同志管，小組的事現在江青管，我再發表意見不好，讓我安心養病就行了。後來陸續有一些同志來醫院看我，我提出對一些事情的看法，結果就觸怒江青了。我的病還沒有好，江青就讓關鋒叫我出院。

"我開始曉得江青很難對付。過去我和她直接的接觸很少，對她缺乏瞭解。一段時間，我和周總理都說過她的好話，這是出於照顧她和毛

---

[1] 8月26日陳伯達因肺炎住進解放軍301醫院。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陳伯達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筆者注

主席的關係，另一方面，認識她需要有個過程，她自己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出院後，我撇開江青，找王力、關鋒、戚本禹起草一個擬送中央的文件，規定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下的一個工作機構，意義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請示，不能擅自做主。這就要使江青受到約束。會議未完，江青來了，大鬧一番，嚷道：‘我還是不是代理組長？我還是不是第一副組長？’。代理本來是臨時的，她代理起來還沒有完了。我現在記不起她要加一句什麼話，但她說，‘我這句是最重要的。’從此以後，文革小組就沒有再單獨開會。毛主席指示：以後開會，由周總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頭會。

“我的最大錯誤是提了所謂路線問題。雖然這個問題不是我先提出的，但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是由我去講的。毛主席批示了我的講話，到處就都這樣講了。這件事是我最大的罪過。還有我隨便接見一些人，偏聽偏信，亂說瞎說，使一些同志受了難。這些同志要怎麼處理我都可以。但是，我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也經過了從分歧到分裂的過程。我同他們發生了很深的衝突，這也是事實。

“中央工作會議後，有關制止武鬥，起草北京市重要通告，取締私設公堂，解救被關押的人，等等，都是在沒有江青參加的情況下，我自己辦的。我經常到學校、工廠、居民點去向羣眾瞭解情況，只要我知道哪裏發生打砸搶的事，我都是要去制止的，有時帶了一些沒收的打人兇器回來，為的是要告訴小組的人知道有這類事。江青便說：‘你放着小組的會不開，搞這些幹什麼。’

“江青責怪我只出席周總理召集的會議，不再召集小組的會。其實，小組開會，就聽她一個人瞎想瞎說，跟她不能討論什麼事。這樣的會沒有意義，反而給她利用小組名義的機會。毛主席已決定由周總理召

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我就不再召集小組單獨開會了。

"11月份，發生上海安亭事件。王洪文領着一些工人中斷了鐵路交通。我給上海安亭的工人和華東局寫了電報。我在電報中強調：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工人同志們應當立即回到工廠，把生產搞好。同時，周總理和陶鑄同志決定張春橋乘飛機回上海處理此事，由張春橋將我寫的電文帶給安亭的工人。

"可是張春橋到了上海後，沒有按照我的電報中的意見解決問題，反而對我的電報進行批判，説我的電報只講生產是大道理，沒有講革命是大道理。他自行決定，答應了部分工人提出的條件，並且簽了字。他這樣一來，事情就複雜了。當時毛主席同意了張春橋的做法。

"1967年1月，上海發生羣眾組織奪上海市委的權的事，被稱為'一月風暴'。這件事我是反對的，中央開會時，我表示了反對意見，認為可以建立羣眾監督領導的機構，但不應當搞自下而上的奪權。毛主席批評了我，我只好放棄自己的意見。這些情況是有記錄的，後來審問我時，審問人員為啟發我回憶一些事，曾把記錄拿給我看過。

"1967年，毛主席提出要批判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給《紅旗》雜誌下了個'勒令'，要求公佈這本書的修改和發表的經過。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事前也不要求討論一下，就在這個'勒令'上一致批了'同意'，然後才把材料轉給我。我在材料上面寫了'不同意'三個大字。江青質問我為什麼不同意。我説，一個黨刊，竟接受一個學校團體的'勒令'，不覺得羞恥嗎？江青理屈，不能置辭。

"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我修改的，延安時期的舊版也是我修改的。毛主席提出要批判，我也沒有辦法。江青他們利用聶元梓要求公佈修改發表的經過，是想給我一個下馬威。他們自以為是多

數，我就只能屈從他們了。

"1967年夏天，全國很多地方發生羣眾組織之間的武鬥。我提出應當收繳羣眾組織的武器，卻遭到江青反對。她反過來提出要'文攻武衛'[1]。我的收繳武器的意見就落了空。

"科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周總理來電話，希望文革小組參加成立會。江青自己不去，還阻止小組其他成員同我一起去。我再三叫戚本禹、關鋒同我一起去，他們就是不動。我就自己一個人去了。這件事表明，他們聽江青的，不聽我的。

"有一次，江青走進我的辦公室裏，到我的書架跟前查看，看到書架上有一本精裝的《宋慶齡文集》，就拿下來摔到地上，用腳踩。她知道宋慶齡在解放初時曾托人問候過我，就故意在我面前這樣做，簡直就像發神經。

"有一段時間，我好久沒有到文革小組的那個辦公樓了，有一天，我不經意地走進了那個辦公樓，看看管電話的同志，順便在開會廳坐了一下。忽然，江青、康生來了，姚文元就在樓上，一叫就到。江青宣佈開會。接着他們三個輪流責罵我，問我為什麼不召集小組開會。我只得讓他們罵，不作回答。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不肯召集小組單獨開會這點本能，來抵制江青。"

"大概是在1968年，有一回，江青來電話說要在她那裏開會。我去了，江青、康生、姚文元都已先在。江青突然斥責我：'你要逼死《人民日報》的李希凡。'[2]我一時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康生說：'你沒有看他寫的東西？那是絕命書呀，'我說我沒有看過李希凡的絕命書，報

[1] 據悉，江青的提法得到過毛澤東的同意。——筆者注

[2] 江青自1954年向毛澤東推薦了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後，即視李希凡為知交。——筆者注

館編輯部內部互相審查歷史，我沒有發動，沒有參加，怎麼是我要逼死他？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麼？他們接着就把李希凡接來了。江青和李希凡抱頭痛哭。然後江青把桌子上的一個茶杯拿起來，往地上使勁一摔，摔得粉碎，來表示對我的憤恨。我覺得外面的戰士看見這個場面會很奇怪，就把碎了的杯子撿起來，讓我那裏的工作人員放到人踩不到的河溝裏。

"過了不久，《人民日報》有個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張像片，又找到江青一張，就拼湊到一起。據說，這也是李希凡授意的。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忽然對這張像片的事發言說：'人家說我要當武則天、慈禧太后，我又沒有她們的本事。李希凡有什麼歷史問題，也不跟我說。'我插了一句：'你說我要逼死他，誰敢給你說？'江青大聲說：'你造謠！'周總理對江青說：'你是說過呀。'江青就跟總理對頂起來。我離開會場，轉了一圈，又要進會場。周總理說：'你回來幹什麼呀？'我聽了周總理的話，就回到住處。

"當夜，有兩位同志來，一位在總理那裏管警衛工作，一位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是總理讓他們來的，我很感謝總理的關心，說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關係，誰理她呀？'

"衝突最嚴重的一次是在起草九大報告的時候。中央確定的起草人名單是我排在前面，張春橋、姚文元排在後面。我對他們說，你們寫你們的，我寫我的，寫完再把稿子拿到一塊議。我就是不願同他們合作。我起草的稿子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而他們卻認為主要任務是繼續搞運動。

"後來，我的稿子被否定了，中央決定只討論他們的稿子。我在會上批評他們的稿子，我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第二國際的伯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

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立刻反駁我：'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會議上沒有人支持我。最後，中央決定仍用他們的稿子。

"可是，我在會上批評他們的話異常激怒了他們。過了兩天，中央專門開了一個會，對我進行了言辭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毛主席也在會上講了話，說帝國主義的本性不可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也不可改變，批評我總是把經濟放在首位。

"九大前夕，江青還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藉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了一次有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他們對我來了個突然襲擊。江青自己宣佈，她是會議主席，會議的議題是'陳伯達做檢討'。我剛說一句話，就被江青打斷了。江青說：'陳伯達不做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其他人發言。當時工作人員都穿軍裝，我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服上的帽徽領章。我看這個會是專門為打倒我開的，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就喊了一句'大字報上街'！意思是贊成把打倒我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葉羣在會上高呼：'擁護江青同志'。這次會議的情況後來沒有公開。據說，到會人的記錄也都上繳了，大概是打倒我的時機還不成熟。"

下面摘錄兩段與陳伯達談話內容有關的史料。

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出版的《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2期刊登有王年一編寫的《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茲將該刊第27至29頁中與陳伯達有關的部分資料摘錄如下：

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1979年12月8日寫的
《關於"安亭事件"中斷行車的情況》

"1966年11月10日凌晨，自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夥，沖進上海火車站，強行登上602次列車。開車不久，接到上級指示：應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進京。於是由鐵路領導決定將602次列車扣在

安亭站。602次列車上的人員則卧軌攔車，甚至連乘有外賓的14次滬京特別快車也不讓通過。這樣，就將列車攔阻在安亭，造成了滬寧線行車中斷。從11月10日上午9時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時54分止，共中斷行車31小時34分。

據檔案材料，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訊問時說：'我雖然不主張他們攔截火車，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責任還是我，因為我是頭。'傳說王洪文不僅卧軌，而且帶頭。這可能不符合事實。

陳伯達態度明確，要工人返回上海。他在'安亭事件'事發當日致電在安亭的上海工人，電報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們：10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管理局爭執不下，我們打了個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志(韓是華東局第三書記)請他們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的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轉。剛聽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經回去，這樣做是很好的，很對，很對。但據說還有些工人同志還是留在車站，不願意回去。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須緊緊牢記毛主席和黨中央再三強調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守生產崗位，完成國家計畫。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就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在注視我們，注視我們的活動，注視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動態。工人同志是為我們國家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革命，而是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麼你們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搞好的。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這樣那樣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重要的道理。

工人同志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對社會、對國際的影響，時時刻刻要顧全大局，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我們絕對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利益，因為一部分人意氣鬧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偉大祖國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事實上，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

這是我們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最高敬禮

陳伯達1966年11月11日（12時）

張春橋到上海處理"安亭事件"：據檔案，陳伯達1979年11月29日被訊問時說：是周恩來、陶鑄派張春橋去處理此事的。

陳伯達又說："張春橋到上海後給打了第一個電話。他問：'是先到上海市委去，還是先到羣眾中去？'我答覆說：'先到羣眾中去，趕快制止羣眾到北京來，很快把問題解決了。'"看來張春橋到上海後即去安亭，不是自作主張。

安亭的情況，幸好在現場的甄文君（當時名義上是《解放軍報》記者，實際上是中央文革小組駐滬聯絡員）當時作了報導。下面是甄文君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時10分致周總理的電話的記錄（據檔案材料）：

張春橋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談話情況

張春橋同志昨晚9點多抵滬，即赴安亭車站，跟9個工人代表談判，談判中間有波折。9人中有3個同志同意說服工人回上海，6個不同意。一直談到天亮，未達成協定，他們堅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7時，春橋同志又到現場找工人談話。

工人對伯達同志的信（按即電報）有意見，說只講生產，不講革命，他們不同意。有些人談起來情緒激昂，進行控訴。

現在看，有少數人是堅決主張到北京的，他們起領導作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上海聯絡站支持他們。

第二種是多數人。他們提了5個條件，如答應他們，他們就回上海：1、承認工人造反司令部，發給袖章；2、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3、此次事件的責任在市委；4、曹獲秋要做檢討，承認錯誤；5、後天要開控訴大會。

第三種人，也是少數，主張應聽中央的話，回上海去。但他們不占領導地位。

據有些工人私下談，他們有顧慮：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個單位，除一個單位來的人很多，有300多人外，都是零星的來一些人，其中有些還是受過批評的，擔心回去後被圍攻、挨整。

擠在安亭的工人，生活問題市委已注意，不會出問題。

鐵路交通，昨天已恢復，工人的那一列車，停在叉道上。

張春橋同志還在安亭。”

以上摘錄的是王年一整理的有關上海“安亭事件”的資料。

關於1967年1月陳伯達反對上海“奪權”作法的具體情形，《王力反思錄》第797至798頁有一段記載，現摘錄如下：

“毛主席這些作法（指毛澤東支持上海奪權——引者注），大家都認為很英明，看得深，看得遠，認為形勢很好，但是中央最高層有人對究竟怎麼回事，應該怎麼提法，是否叫‘自下而上的奪上海市委的權’有疑問，有一個人沒請示毛主席，擅自在北京慶祝中央給上海賀電的大會（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十萬人參加，十三日或十四日開的。）上講了不同的提法，這個人就是陳伯達。大會有上海的人來，有王洪

文。陳伯達說上海自下而上的奪權，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眾組織只能監督，不能奪權。陳伯達的話人家不懂，我給他當翻譯。在大會上王洪文這一派的人還作了檢討。當天下午剛散會，毛主席馬上知道了，馬上開了個會批評陳伯達，支持上海。毛主席明確地批評了陳伯達。毛主席說，上海造反組織來奪上海市委的權，怎麼能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呢？是他們（上海市委）採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眾把他們的權奪了。毛主席說，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毛主席然後講了一大篇的話，後來寫成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就是號召奪權口號的背景。這是毛主席的系統的思想。是第一篇公開號召奪權的文章。

"毛主席開會批評陳伯達，講了一大篇支持上海奪權的話。根據毛主席的話，我同關鋒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寫文章本來都是陳伯達、王力、關鋒三個人寫，或我們寫後跟他商量、修改、定稿。可這篇文章同他的提法不同，是批評他的，把他作為對立面，所以他不參加起草。而且打破慣例，過去文章送毛主席時由陳伯達送，他簽陳伯達、王力、關鋒三個名字。這次他寫的是，主席：'這是王力、關鋒同志為紅旗雜誌寫的一篇文章，請審閱。下面是他簽名，表明他沒有參加寫。陳伯達搞了另一篇文章，題目叫《響應毛主席號召，到群眾裏面去》，這當然也很好，有些領導幹部怕到群眾中去，應該讓他們到群眾中去，但這不是運動發展中最迫切的問題，不疼不癢。過去紅旗社論也是我們三個人寫，這個是他寫的。這兩篇文章是1月15日送的，主席當時退回，陳伯達寫的那篇主席畫了圈，王力、關鋒寫的那篇毛主席批了'寫得很好，照發'。這篇文章當晚廣播，震動全國。陳伯達把他那篇用紅旗社論的形式發表，把毛主席批的'寫的很好，照發'的

文章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的形式發表。但是，當時群眾、幹部，並不因為是評論員文章而看輕它，也並不因為陳伯達寫的是社論就重視它。全國重視，北京敲鑼打鼓到紅旗雜誌社報喜，也是報的評論員文章。上海非常滿意，認為黨中央全面支持上海奪權，也是指評論員文章。社論無聲無息，人民日報發表時也把評論員文章放到第一版，社論放到第二版。"

這兩件材料清楚說明了陳伯達對待上海問題的態度。陳伯達 1966 年11月致上海安亭工人的電文，是陳伯達親筆所寫的一個重要文件，它真實反映了陳伯達本人的思想。陳伯達 1967 年 1 月對上海發生的奪權明確提出了反對意見，則標誌着他與毛澤東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思想分歧。從此，陳伯達開始失去毛澤東的信任，被毛澤東視為自己思想路線的反對者。

9. 周總理遇到困難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周恩來總理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和林彪。長期以來，周恩來在人民羣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對全國各級幹部和廣大民眾的影響力實際上超過林彪，僅次於毛澤東。沒有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的中央最高層裏孤掌難鳴，"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比較順利地開展起來。然而，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處境卻又經常是艱難和微妙的。他所遇到的許多難題和難關，也需要十一中全會以後的中央領導層中有人幫助，才能克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陳伯達是經常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重要一員。陳伯達晚年與他過去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一起聚談時，曾多次回憶起這方面的往事。

先說一件鮮為人知的事。

1982 年春，陳伯達之妻劉叔宴在經過中央紀委的重新審查後，得

到平反，恢復了黨籍、工資和級別，被安排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離休。陳伯達與兩位前秘書都對這件事的解決感到滿意，並自然議論到事情之所以能如此解決的原因。

王保春、王文耀回憶起文革初期，劉叔宴與鄧穎超之間不同尋常的一次來往。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過後不久，一天，劉叔宴收到一封鄧穎超的來信，隨即又接到了鄧的電話，說要來拜訪。劉叔宴很感意外，對保春、文耀說："這怎麼得了，大姐要來拜訪我。"

原來，事情起因於周恩來在毛澤東那裏不知因何事受了批評，毛澤東的話可能說得很重，致使總理心中忐忑，回家後傾訴於妻子。鄧穎超為此惴惴不安，就親自寫信向自己的老熟人、老部下劉叔宴求援，希望劉能促使陳伯達從中調和。

當時，周恩來一度心情很差，連日常工作也受了影響。許多應由國務院處理的行政文件，國務院各部的生產、業務報告，經中央辦公廳轉到了陳伯達辦公室。陳伯達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怎麼能這樣？這些文件不能接，要由總理處理。"

保春、文耀記得，陳在一次會議上講過文件的事後，中辦不再轉送應由國務院處理的文件，情況隨即恢復正常。

陳伯達回憶說，退回國務院文件這件事，他有印象。有些事情，細節已記不清了，但他確實在主席面前以及在各種場合為周總理說過話。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像周恩來這樣有崇高地位和威望的人，受幾句毛澤東的批評，何以會困窘無奈至此。但是熟悉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由於毛澤東在中共創業史中所起的扭轉乾坤的領導作用，毛澤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確實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之前，絕大多數的中共黨員和中國勞動

人民，都是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的。

經陳伯達為之緩頰，周恩來很快擺脱了這次困境，毛周關係得以轉圜。

1967年，隨着形勢日趨複雜和動盪，陳伯達的處境變得安危莫測，夫婦間的糾葛隨之而起。1968年，劉叔宴甚至要求陳伯達寫一份離婚書。鑒於劉身心俱差，周恩來親自主持的中央會議決定將她送到青島療養。陳伯達倒後，劉受株連，在青島被隔離審查。華國鋒、汪東興時期，劉叔宴向組織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請求，結果得到中央辦公廳的一紙文件，她被開除黨籍，安排到山東棲霞縣的一個農場工作。

1981年陳伯達在被判刑之後，向上面寫了一封信，提出應解脱劉叔宴。陳伯達在信中提到，劉在文革期間只做過一件錯事，就是負責過范若愚（《紅旗》副總編輯，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案子，此事他也有責任，劉的錯誤可以都算到他的頭上。此後不久，中央紀委即調劉叔宴回北京。當時，中央紀委第一書記是陳雲、第二書記是鄧穎超。

鄧穎超無疑在接到陳伯達的信後想起了自己曾在文革初期求援一事，遂指示中紀委迅速為劉叔宴平反，將其安排在中央辦公廳離休。在中國，一個倒台人物的妻子能恢復原有待遇已屬不易，能仍然安排在中樞機關則實為絕無僅有之事。劉叔宴平反後，曾有人想説和她與陳伯達的關係。但陳伯達表示，過去與劉已感情破裂，現在自己是囚犯，不可能再與劉共同生活。所以，雙方未能破鏡重圓。陳伯達1989年去世後，劉叔宴送了花圈，表示悼念。

第二件事是幫助周總理為聶榮臻解圍。陳伯達、王保春回溯了事情的經過：

1966年11月的一天，聶榮臻忽然來釣魚台找到陳伯達，訴説道："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非要讓我去一趟，要批判我。我給總理打電話，

總理有事不在。現在我該怎麼辦？"陳伯達說："你不要着急，我陪你一起去。"陳伯達隨即陪聶榮臻來到學生們的集會場所。王保春記得那是在西城區後庫附近的一個場館，學生們早已等候在此。陳伯達和聶榮臻剛一走進門口，學生們就高喊："打倒聶榮臻！打倒聶榮臻！"陳伯達馬上制止學生們，說："你們喊錯了。你們不僅不應打倒聶榮臻同志，而且要歡迎聶榮臻同志，要向他學習。你們知道他從哪裏來嗎？他剛剛從我們的導彈試驗場回來，剛剛指揮我國導彈的成功發射。他是有功之臣。你們要歡迎他，學習他。"陳伯達話音一落，學生們馬上就改口高喊"歡迎聶榮臻同志！向聶榮臻同志學習！向聶榮臻同志致敬！"

這是一次成功的解圍。聶榮臻元帥滿意而歸。事後，周恩來得知了事情的經過，對陳伯達說："你幫了我的忙，做得很對。"

十多年後，陳伯達已將此事忘諸腦後，可1983年，他偶然在報上看到摘錄的聶榮臻回憶錄裏，不乏貶損自己的不實之辭，就不由得想起這件往事，在與老熟人晤言一室之時，互相憶敍慨歎一番。

第三件事是幫助周總理為陳毅元帥解圍。陳伯達和兩位前秘書述及了當時的情況：

1967年夏季的一天，陳伯達在釣魚台接到了鄧穎超打來的電話。鄧穎超說："今天外交部的羣眾組織開批判陳毅同志的會，恩來原來準備去參加，現在因病得很重，實在去不了，希望文革小組能去一下，讓會早一點散了。"陳伯達馬上帶秘書王保春乘車到中南海西花廳。陳伯達進入客廳和鄧穎超談話，王保春在屋子外面等着。陳伯達出來後說："已經先讓李富春同志去了，我回去再叫幾個人一起去。"

陳伯達回到釣魚台，把情況和江青以及文革小組的其他人講了一下，希望小組多幾個人去。沒想到，他們都不肯去。江青還說："就讓他（指陳毅）在那裏多站會兒。"陳伯達十分生氣，立刻返回西花廳，

將文革小組這邊的情況向鄧穎超做了反映，隨即出來對王保春說："我們現在馬上去大會堂。"

到了人民大會堂，陳毅正站在主席台上接受羣眾組織的批判，會場氣氛緊張，李富春很為難地主持着會。陳伯達見狀說道："請陳毅同志先坐下來。"即刻讓人搬來一把椅子請陳毅坐下。陳伯達說："陳毅同志是個老同志，為黨做過很多工作。他有缺點、錯誤，你們可以批評，但是不能這樣搞，不能讓他站着聽你們的發言。陳毅同志能這樣虛心聽取你們的批評，是很不容易的。……人民大會堂是開會的地方，你們不能再佔用了，要儘快離開這裏。"

在陳伯達的規勸下，會議氣氛和緩下來，時間不長就散會了。陳伯達回到釣魚台後，還打電話給人民大會堂的管理人員，問會場裏的人是否都已撤離，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後，他向鄧穎超通報了情況。

還有一次外交部羣眾開會，陳伯達到了會。針對一部分人提出要批判所謂的"陳毅黑話"的要求，陳伯達說："陳毅同志是個詩人，詩人講話經常是浪漫主義的，不能那麼認真，不能說成是'黑話'。"戚本禹當場反對陳伯達的講話，說："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話不能算浪漫主義。"陳伯達接下來說的話，戚本禹也不斷地頂嘴。這些情況，當時的大字報上都曾有過記載。

陳伯達在極端複雜的情況下，多次為陳毅同志說過話，是外交部許多幹部、羣眾都知道的，也是當年在外事部門工作過的一些外國人報導過的。但是，陳伯達倒了以後，有人寫文章，卻把陳伯達維護陳毅的行為說成是"假惺惺的"。有讀者私下議論道："那要怎樣做，才算不'假惺惺的'呢？"

1967 年 5 月以後，北京出現了一股反對周總理的歪風，一個叫作"五一六兵團"的反動組織公開貼出炮打周總理的大字報，外語學院有

一個叫“六一六”的組織也公開攻擊周總理。陳伯達立即以鮮明的態度對這股反對周總理的反革命歪風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筆者手頭缺乏有關的原始資料，僅轉錄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一書中譯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9 頁引用的陳伯達當時的一段講話。陳伯達說：

“周總理在國內外都受到高度尊敬，他是中國人民的代表，負責執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有任何人找周總理的麻煩。”

陳伯達的這段講話是當時維護周總理的最強音。

由於毛澤東 5 月 29 日在唐聞生、王海容反映社會上出現攻擊周總理的風氣的來信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 359 頁）在一段時間裏，江青等人表面也講過幾句反對炮打周總理的話，但是江青僅僅只是說：“五一六兵團表面上反總理，實際上想從‘左’的或右的方面動搖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她迴避對周總理本人做明確的評價，這與陳伯達的講話有着實質的不同。

對於陳伯達的支援，周總理也是有所感知的。周總理曾在一些場合稱讚過陳伯達。前幾年，有人在文章中以奚落的口氣說，陳伯達在文革初期被戴上了“傑出理論家”的桂冠。據筆者所知，只有一個人在公開場合講過：“陳伯達同志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這個人就是周恩來。其他任何人都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英國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文版（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2 頁中寫道：

“周也與陳伯達合作，陳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是毛以前的秘書和‘紅旗’雜誌的總編輯。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周對他表示尊重。”

當然，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周恩來與陳伯達之間的互助關係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其重要的原因是，自從1967年1月陳伯達對上海奪權表示了反對意見後，毛澤東對陳伯達已經另眼相看，已經不再信任，並在處理一些事情時為將來倒陳預置了伏筆。按照1970年10月毛澤東自己的話說：陳伯達"是個可疑份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毫無疑問，毛澤東所說的"揭發"、"打招呼"都是背着陳伯達進行的。事實表明，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葉羣、謝富治，都是毛澤東打過招呼的人。所以，對於周恩來來說，他不可能同陳伯達過於接近。

陳伯達與筆者談話時，還回憶了他與周總理私下交談過一些當時不便公開談論的話題。陳伯達說：

"有一回，周總理對我說，他看了別人轉交給他的江青三十年代寫的文章，覺得還不錯，就轉給江青，以為她會很高興，沒有想到她卻大發雷霆。周總理說，他完全是好意，沒想到江青的反應卻是這樣，真是讓人莫名其妙。

"廬山會議前，我對總理交流過對江青的看法。我說，江青對毛主席並不忠實，有三次對我談過，她要離開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棗園，她說，她要離開毛主席，可找兩個看護料理毛主席的生活。第二次在西柏坡，有一回我去找毛主席，他剛不在。江青又說，她要離開毛主席，到旁的地方去。第三回，解放後，在北京西山，我去看毛主席，他也剛好不在，江青再一次說，她要離開毛主席。

"總理聽到我說北京西山的事，就接着說：'西山這一回，我是知道的，是毛主席要我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

"文革中，劉少奇同志的案子，我感覺主要是江青搞的。周總理對這件事是很為難的。

"毛主席批評我過去在他和少奇之間搞調和。江青説我過去是劉少奇信任的人，説我文革前就不想給毛主席當秘書了，要去給少奇同志當秘書。所以中央審查少奇同志的具體經過，沒有告訴我。直到1968年初，江青在大會堂小禮堂的一次羣眾會上突然公開宣佈給劉少奇同志帶上三頂帽子，嚇了我一跳。她説的那些內容，我過去從來沒有在會議上聽過、議過，這使我感到驚惶。

"劉少奇同志去世後，我向周總理問過少奇同志晚年的情況。周總理説，他後來不肯吃飯，就沒有辦法了。我問，他為什麼不為自己辯護呀？周總理説，外面的事，他什麼都不知道，沒有讓他知道。"

看來，審查劉少奇的做法同後來審查陳伯達的做法是一樣的，都是背着本人搞審查，專案組搞出來的所謂材料，也不向被審查者進行核對。被審查者自然也就無法有針對性地進行自我辯護。最後，只憑指控方的一面之詞，就定案了。

處理劉少奇同志專案的問題，或許是周總理在運動中所遇到的最大難題。

英國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一書第170至171頁中寫道：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殘存的中央委員會對劉的'罪行資料'進行研究。會上指定周恩來主持討論特別調查組的調查結果。同時周主持了對劉的問題作出決定的會議。在付諸表決的時候，周像其他在場的人一樣，投票反對劉少奇，唯一例外的是一位勇敢的婦女，她的名字叫陳少敏。

9年之後，在1977年，我問鄧穎超説：'我也寫過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東西。他目前已恢復名譽。當時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確實的材料。現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開道歉？'

鄧穎超回答説：'有什麼必要？你沒有反對過他。你是聽信了我們。

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由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周恩來和劉的關係好像並不融洽。在與蘇聯爭論中，周堅決站在毛的一邊，深信劉的主張會使中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但是在處理經濟改革方面，周的意見和劉一致。現在劉被譴責為內奸、叛徒、工賊，而且'永遠開除'出黨。

周恩來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對開除劉，對他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毛澤東要使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大國，決心把劉開除出黨。劉確實設法從毛那裏攫取權力，在毛看來，劉在暗中計算他。毛認為權力落入劉的手中最終會導致中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毛的這一想法也許是對的。”

韓素音這段文字在“劉確實設法從毛那裏攫取權力”一句後面原有一個注釋，但中譯本沒有譯出。

陳伯達倒台前的兩年，周恩來與陳伯達各有各的難題，他們之間，基本上處於誰也幫不上誰的狀態。

10. 陶鑄倒台原委

1967年1月，發生了中共第四號人物陶鑄倒台的事件。這件事的經過曾有很多書刊作過描述，已為人們所熟知。陳伯達不諱言這件事是運動中最使他感到內疚的事件，並講述了一些內幕情況：

“陶鑄同志過去和我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他以前來北京，幾乎每次都要給我帶些廣東的土特產。有時他送的東西比較多，我就送到大食堂一些。如果說，我在黨內有什麼朋友的話，那陶鑄同志就是我的一個主

要的朋友。

“可是，在文革中，我處在那樣一個位置，經常身不由己，糊裏糊塗地把朋友都得罪光了。陶鑄同志的事情就是明顯的例子。

“陶鑄同志調到中央來以後，在一些事情上，是有不同的看法。毛主席談過話，我也發過言。主要是陶鑄同志認為運動要由黨組織統一領導，羣眾組織要服從原來黨委的領導。毛主席認為運動要依靠羣眾，相信羣眾，領導幹部要在羣眾運動中接受新的考驗。我當時服從毛主席的意見，沒有同意陶鑄同志的意見。另外，中南地區逮捕了很多反對省委市委的羣眾，這也加重了認為陶鑄同志犯有路線錯誤。

“現在看，很多事情陶鑄同志是對的，但也不是全對。”

我插了一句：“陶鑄同志講過‘除毛主席和林彪外，都可以懷疑’。”

陳伯達說：

“周總理當時說：這樣講，我就不好開展工作了。

“陶鑄同我原來關係很好，但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不好，這就是對李達同志的處理。李達是黨的一大的代表，也是我在北平中國大學教書時的同事。他1927年脫離黨以後，一直還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解放後重新入黨，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文革初，湖北省委和中南局把李達當成敵我問題來處理，開除了李達的黨籍。記得當時有過一個批判李達的記錄片，看了讓人很難過。那時候，中南的問題是陶鑄、王任重同志管的。這件事影響了我同陶鑄同志的關係。

“1月4日那天凌晨我才服安眠藥睡下，沒有醒過來，就被叫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大夫說過，我的安眠藥量是很大的。接見湖北的羣眾組織的會，是江青組織的，她要我講話的那個口氣，讓人以為是毛主席同意的，我就暈頭暈腦地把中央會議上講過的對陶鑄同志的批評講了出

來。這件事是我辦的最大的蠢事，我被江青利用了。

"點陶鑄同志的名確實是我的嚴重錯誤，但是我當時只是作為路線問題講的，我還是稱他為同志的。如果毛主席、黨中央不同意我講的話，可以加以扭轉。可是過了幾天毛主席在會上也講陶鑄問題很嚴重。我受到批評是在事情又過了一個月後，在一次中央的會上，毛主席對我批評得很嚴厲，說我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要我作檢討。"

關於陶鑄問題，毛澤東發表過兩次內容迴然不同的"最高指示"。

第一次，是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會議，研究陶鑄倒後宣傳工作的安排。出席者有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癡。毛澤東在會上講到陶鑄問題。現根據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150頁的記載，將毛澤東的講話轉錄如下：

"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麼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這個部那個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可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擴大會，第二次講到陶鑄問題，這次講的與上一次有很大差別。陶鑄倒台後，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據《王力反思錄》第973頁記載，這次常委會的情況如下：

"參加的有常委：主席、林彪、總理、陳伯達、康生、富春，此外還有葉劍英、江青、我。會上，主席發火了，罵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指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

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這是最重要的幾句。然後罵江青：'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裏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只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這是因為主席原來沒有看到陳伯達一月四日接見中宣部揪王任重代表團的講話記錄[1]，看到以後，非常不滿。一月份，陶鑄剛被打倒時，主席也說了陶鑄很多壞話，打倒陶鑄他是贊成的，但不贊成陳伯達和江青那麼樣打倒。"

毛澤東這兩段講話，不僅前後矛盾，而且存在一個疑點。各種記載表明，當年毛澤東十分關注紅衛兵和各種羣眾組織的小報、傳單等宣傳品。陳伯達和江青1月4日的講話，從當天下午開始就被廣泛印載於全國各種小報、傳單，毛澤東不大可能在當時沒有看到過，而要等到一個多月後才看到。

毛澤東1月8日的講話表明，陳伯達1月4日關於陶鑄問題的講話，並非全是個人行為。

然而，毛澤東亦有因思慮不周而感到後悔之時。陶鑄被打倒後，中央有一些老幹部提出意見，認為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是不合程式的。毛澤東本人對這些意見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可能以此自責，於是就在2月10日的會上對陳伯達、江青加以嚴厲的訓斥，以期求得責難者的諒解。

毛澤東對陳伯達突如其來的斥責，尤其是還把陳過去調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説成是專門在毛、劉之間進行投機，使陳伯達感到無以自處。陳伯達本來是個性格懦弱的文人，他聯想到文革以來自己被夾在

[1] 此句文字有差誤，應是中宣部整理的講話記錄。——引者注

各種政治力量劇烈衝突的夾縫中，隨時會被擠碎。他既要貫徹毛澤東的指示和意圖，也要承受毛澤東的不滿和責難，還要承受對毛澤東的方針、政策持不同或對立意見的人的攻擊和譏諷，更要承受毛澤東夫人江青的逼迫以至假傳聖旨的捉弄。在這種苦不堪言的處境之下，他動過自殺的念頭。

《王力反思錄》第976頁有如下的記載：

“十四日下午，開會批評陳伯達。在這之前，陳伯達很緊張，想自殺。他先是單獨對我說的。我說你怎麼要自殺呢？主席批評你是好事，他說過，我批評一個人，就是說這個人還有希望，沒希望的人就不批評了。陳伯達說，我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的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他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勸他不要自殺，要請求總理幫助。陳伯達說他再找總理、康生、關鋒三個人談談。我說，你這樣的心情，檢討寫不下來，不如給主席先掛個號，寫幾句，備個案。他說幾句也沒法寫，要我替他寫，他抄。陳伯達說：打倒陶鑄會上發言的事，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說，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陳伯達又說：我服了安眠藥沒醒，亂講一通。我說，這不對，你講得很有條理。他說，我自己沒有法了，不講不行。我說：你要向總理談清楚。陳伯達打電話，要到總理那裏去談，總理說我馬上就到你那裏去。總理同他談話後，他才不自殺了。”

王力1981年7月5日在秦城監獄中曾給胡耀邦、鄧小平、彭真、胡喬木、黃克誠寫過一封反映陳伯達在文革中一些情況的信。該信中也簡略提到過陳伯達1967年2月想自殺一事。陳伯達在去世前的1988年12月看到過王力這封信的複印件，他表示，王力信中所例舉的幾件事都是存在的。他說：“文革中，我的處境猶如‘騎虎難下’，沒有一點

辦法。文革給我帶來的痛苦很多，現在不想再提這些事情了。"

正是由於陳伯達1967年2月陷於精神苦悶幾至不能自拔的境地，所以他對人們經常說道的"二月逆流"或"二月抗爭"事件，記憶很模糊。他只記得，在2月16日懷仁堂的會上，譚震林和張春橋吵得最厲害的時候，他並不在場，他在隔壁一間屋子和余秋里正在商談幾個生產方面的事情。等他回到主會場時，爭吵已經過去了。在接下來的會上，陳伯達也一直沒有發言。事後，江青曾當眾說過："政治局中只有謝富治的立場是堅定的，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

雖然毛澤東在2月10日的會上對打倒陶鑄一事進行了批評，但是陶鑄問題仍沒有能按照黨內問題來解決。據聞，這與陶鑄的一個哥哥寫了陶鑄在國民黨監獄中一些情況的材料有關。他的這個哥哥曾是國民黨的一個高級軍官。結果，陶鑄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這件事在陶鑄親屬寫的回憶錄中也有述及。1967年9月，姚文元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評陶鑄的兩本書》，將陶鑄完全作為敵我矛盾來定性。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陶鑄才得到平反。

筆者以為，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能繼續保護劉少奇、鄧小平和一部分老幹部，是不容易的，是值得稱道的。陶鑄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共做過很多工作，應當充分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在文革初期，陶鑄也講過一些嚴重的錯話，這也不應加以掩蓋。1966年9月，筆者在武漢探望母親時，曾看到滿街的大字報都在宣傳陶鑄的講話指示，諸如"每個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麼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炮轟的，如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就轟不垮"，"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對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每個人都可以懷疑"等等。這類講話在當時確實起過不好的作用。現在某些權力人物對此一概不予承認，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陶鑄同志說得好：應當有"從客觀實際出發的態度，

是就是，非就非的態度"。

八十年代後期，陳伯達從報上看到過陶鑄夫人曾志寫的一些回憶文章，認為其中有失實之處。

陳伯達說：

"曾志的文章說陶鑄早就對我有看法，說我1930年離開福建是'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我離開福建是因為在當地已無法隱蔽，是福建省委請示中央，中央同意後才離開的，是黨組織安排的工作調動。是不是我應當等着敵人抓住我才算不'貪生怕死'呢？

"曾志還說陶鑄在七大選中央委員時就公開反對選我，在小組會上還發過言。這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呢？黨的七大開得很民主，代表提的意見都會反映給本人的。"

事實上，陳伯達在七大和八大分別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都是以高票當選的。陳伯達說過，這兩次選舉，他都沒有投自己的票。七大和八大的當選名單都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的。看一下七大候補中央委員名單上陳伯達排列第三位就知道，除了陳自己沒投票，其他人投棄權票或反對票是極少的。如今薄一波說七大時曾揭發陳伯達是"自首叛變出獄"，曾志說七大時陶鑄揭發陳伯達"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既然中共要員紛紛揭發陳伯達，怎麼就沒有效果呢？莫非其他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喪失了黨性原則，偏偏喜歡叛徒和逃兵？不把叛徒和逃兵選上就不高興？對待歷史，能不能實事求是，從這些小事上亦可看出。

11. 華北問題

1967年，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奪權以後，各省市的領導班子都推倒重來，建立實行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和羣眾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革

命委員會。當時，中央協調解決各地問題的機構是周恩來主持領導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楊成武、葉羣、汪東興等。1968 年 3 月楊成武倒後，由黃永勝接替，並增加吳法憲等人。由於除台灣外，全國共有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組織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量很大，所以中央進行了大致的分工，由陳伯達參與天津、河北問題的解決。這就是陳伯達過問華北問題的起因。

陳伯達談到了當時的一些情況：

“為了解決各省市的問題，中央在周總理主持下做了分工。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華東問題，康生參與內蒙、山西問題，我參與天津、河北問題。後來山西和內蒙沒有解決好，形勢穩定不下來，中央改讓我參與。

“天津在1958年取消了直轄市的地位，改為河北省轄市。我建議恢復天津為直轄市，中央同意了。以前我在天津搞過工業調查，又在小站和周揚同志一起搞過四清，對天津的幹部比較熟。中央決定解學恭(原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任天津市革委會主任。革委會的組成名單，我提出過胡昭衡、王亢之、江楓(胡原為天津市市長、王原為副市長兼市委宣傳部長、江為市公安局長)。但是天津部分羣眾組織抓住胡昭衡同志在入黨前被捕過一事，非要把他打成叛徒。我建議胡昭衡暫時不參加革委會的領導班子，在革委會下面的生產指揮部做領導生產的工作。

“天津的形勢很快穩定下來。沒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在天津有個親戚叫王曼恬[1]。江青利用這個人專門和我作對。這個人過去在釣魚台見

[1] 王海容的姐姐。——筆者注

[2] 王為深澤縣人，其家庭為深澤望族。——筆者注

過一次，江青給我介紹時，我沒有搭理。我在天津用的幾個幹部，王曼恬都要鼓動人打倒。1968年春，江青來了個突然襲擊，用大卡車把天津所有的積極份子都拉到北京，我要阻止已來不及，還被迫也參加。江青在講話中說什麼有個深澤縣叛徒集團，結果回到天津，王亢之同志即自殺[2]，江楓同志被關禁閉。天津的形勢又亂了一陣。最後，他們也沒有查出江楓、王亢之有什麼問題，江楓在禁閉中也病逝了。實際上，江青就是要用打倒這幾個幹部來為打倒我做準備。我倒了以後，江楓、王亢之、方紀等同志都被說成是我在天津的死黨，批林批孔的時候，天津的報刊點名批他們。

"王亢之同志臨自殺前留下了遺書，把他珍藏的兩本宋版書送給我。1979年我在監禁中知他已平反，就向上面提出把他的兩本宋版書交給他的家屬。我倒後，書都在公家手裏，聽說他們按我的要求辦了。

"1967年12月，中央開會研究，要我和李雪峯、鄭維山（當時任北京軍區代司令員）同志到河北的幾個地方去瞭解處理當地一些問題，為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做準備。我們先到了唐山，然後到保定、石家莊，到邯鄲時，中央來電話要我回北京處理戚本禹的問題。

"我們到一個地方，都要聽取當地軍隊支左的同志和革籌小組的同志匯報情況。到唐山時，他們匯報說，過去冀東黨組織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也相信了，在一次會上也照着講了。我還留了餘地，講可能是這樣，沒有完全肯定他們的說法。後來，法庭說我的話導致多少人受迫害，多少人死亡。這完全出乎我意料，因為我走的時候，唐山兩派聯合的氣氛很好，過年時還開了聯歡會。我沒有提出過要立什麼案。我離開唐山以後，也從來沒有人向我報告過唐山發生的事，連一個案子的消息都沒有聽說過。"

陳伯達說到這裏時，我插了一句：

“你在法庭上怎麼沒說是聽當地領導人的匯報才那樣講的？”

陳伯達答道：

“我說了，怎麼沒說？我沒有說是哪個人匯報的，這麼多年，我當然記不得匯報人的名字，再說也不能連累別人。但我說了我是聽來的。”

我應道：

“噢，那是電視報紙故意不報導你說的話。”

陳伯達說：

“當地瞞着我搞了這樣的事情。我不知道情況，但河北省和唐山市的負責人總該知道情況，總是和這事有關係的，可是法庭好像也沒有問。這麼大的事，沒有一個人跟我說過。審判時，這個案子最冤枉了。”

我說：

“1967年初譚震林向毛主席報告農林口的運動情況時，毛主席就批示過：‘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變節份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羣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人家按這個批示辦事，用不着向你報告。”

陳伯達接着談到：

“離開唐山，我們到了保定，住在三十八軍的駐地。他們對我們招待得最好了，我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好的飯菜。可是我還是批評了三十八軍支援的那派組織，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檢查兩派是否都上繳了武器的時候，省軍區支持的這一派確實已沒有武器，可是三十八軍支持的那一派卻有武器，我很生氣，就批評了他們。”

我又問道：

“你知不知道三十八軍和林彪的關係？”

陳伯達答：

"我不知道。延安時我當過軍委副秘書長，那時侯軍隊的情況我知道。離開延安後，我和軍隊就很少接觸，解放後更不管軍隊的事了。"

我說：

"河北很多人都認為你和林彪是對立的，因為三十八軍和林彪的關係很特殊，是林彪的嫡系。"

陳伯達說：

"都是黨領導的軍隊，還搞這一套？我沒有想那麼多，我就是看到那一派還有武器，我有意見。後來，楊成武同志出事後，保定又打了起來，有的地方還打得很厲害，簡直莫名其妙。我想再去保定解決問題，中央沒有讓我去，我也沒有辦法。本來，我一路上都是強調兩派聯合的。我的講話也難免會有錯誤，那時侯情況那樣亂，那樣複雜，要一句話都不講錯也很難，但我的目的是要使局勢儘快穩定下來。我當時和北京軍區的同志接觸比較多，看法上也會受些影響。

"從河北回北京後，我向中央作了匯報。考慮到天津已經恢復為直轄市，而河北各地區，屬石家莊的形勢最穩定，生產情況也很好，石家莊是1967年全國唯一完成國家生產計畫的中等以上工業城市，我建議河北省的省會可以遷移到石家莊。毛主席同意我的建議，他說，石家莊不僅是軍事重地，還是交通樞紐，位置很重要，省會遷到石家莊好。

"1968年初，我和李雪峯談話時，囑咐過他，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報紙上不要點林鐵同志的名字，也不要點其他人的名字。"

筆者認為：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主要是為了穩定河北省的局勢。可以說，他此行的目的基本上達到了。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河北省的生產建設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在這之後，河北省十個地區中，惟獨保定地區又出現了兩派武鬥的混亂局面，其原因

是十分複雜的。而中央遲遲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來解決保定問題，更有深層的原因。

1970年7月，陳伯達的第二次華北之行，則主要是為了解決華北地區生產建設方面的一些問題。

下面，筆者想從自身的視角，將自己所知的與華北問題相關的一些情況寫出，供讀者參考。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久，筆者因身體等原因離開了內蒙古，幾經周折，來到石家莊市制藥廠當了工人，此後在石家莊市工作了十四年。在1968年春至1970年夏這段時間，我與陳伯達、李雪峯都有過一些接觸，並在1970年7月向工廠請了十天假，跟隨他們到山西、內蒙古的一些地方參觀。因此我多少有一些獨自的見聞。

我來到石家莊以後，才聽說了保定問題，得知駐保定的三十八軍和駐石家莊的六十三軍支左觀點不同。六十三軍在長期駐守石家莊的過程中建立了良好的軍民關係，可以說，當地絕大多數羣眾是擁護六十三軍的。但也有少數羣眾反對六十三軍，他們得到了三十八軍的支持。三十八軍原駐東北，解放戰爭中為東北野戰軍一縱，系林彪主力，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戰功卓著，有"萬歲軍"之稱。1966年，毛澤東為加強安全力量，調三十八軍入關進駐保定。聽石家莊的羣眾說，由於三十八軍原不屬於北京軍區管轄，自恃有特殊背景，在軍力上又是一個機械化加強軍，相當於兩個軍的實力，所以不把北京軍區放在眼裏，在文革中，它和北京軍區原所轄各軍的關係都不太融洽，在保定更與河北省軍區嚴重對立。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省會遷移到石家莊，這使三十八軍領導人感到不滿。1968年3月楊成武倒後，他們利用六十三軍原系楊成武的部隊這一背景，提出要揪楊成武的黑後台，與省革命委員會發生對

立。在保定地區，三十八軍支援"農大造反團"，壓制擁護省革委和省軍區的對立派，武鬥頻繁發生。這一出現在北京南大門的複雜局面，本應引起最高方面的注意，以有力措施加以轉變，可實際情況卻不然。

1969年春節期間，我從石家莊回北京過節。一天，陳伯達來到我住的房間小坐了一會兒，心情似乎不太好。隨後我陪他回書房。在走到書房過道時，陳伯達突然對我說："我想九大以後到保定去，我準備被人打死。聽說保定地區打得很厲害，簡直莫名其妙！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搞？讓他們打死我好了！"我當時無法回答陳伯達的話。在石家莊，幾乎人人都知道三十八軍的一些舉動是沖着陳伯達來的，這早已不是什麼秘密。

從陳伯達的談話可以看出，他對保定出現的武鬥局面極感痛苦和不解，他寧願自己被打死，也不願看到保定的局勢再混亂下去，可是他卻無能為力。中央既不讓他再去保定，也不派其他領導人去保定解決問題。

三十八軍把矛頭對準陳伯達，絕非偶然。陳伯達倒台後，毛澤東在親筆批示中寫道：陳伯達"是個可疑份子，我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

毛澤東究竟認為陳伯達有哪些"可疑"之處？他背着陳伯達，在政治局的會議上究竟做了何種揭發？毛澤東從未解釋過，因為他的猜疑並無實據。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同個別人打的"招呼"早已不脛而走，傳至某些重要部門和信得過的軍隊。既然早有倒陳的打算，就必然會預做部署，為日後倒陳準備條件。保定的局勢無法平靜，原因即在於此。

文革結束十二年後，1988年，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在其所著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第410頁上這樣評論"保定問題"：

"'保定問題'極其複雜。三十八軍和河北省軍區各支持一派，這兩派尖銳對立，武鬥不斷。三十八軍堅決反對省革委會一負責人，這負責

人卻是中央所信任的。問題並不能歸咎於陳伯達。"

王年一所說的"省革委會一負責人"，指的是李雪峯。王年一認為"問題並不能歸咎於陳伯達"，所論甚為正確。但同時，他也將事情做了簡單化的處理。既然中央信任李雪峯，又為何坐視不管呢？

1970年初，倒陳的步伐加快。中央以加強備戰為由，在華北進行軍事大調動。這次調動似非單純的軍事行動。調動的關鍵之點是將鄭維山曾任軍長的六十三軍從石家莊調至太原，另調原駐無錫的二十七軍，北上進駐石家莊。原駐太原的六十九軍調至大同。從純軍事角度講，如果山西軍力需要增強，可直接將二十七軍調至大同，可節省大量財力、物力和時間。可是中央卻舍易從難，實施幾個野戰軍的連環大搬家，大換防。這顯然含有政治原因，因為陳伯達同北京軍區以及六十三軍關係良好，而石家莊的軍民觀點又比較一致。毛澤東吸取了武漢"七．二〇"事件的教訓，要避免在倒陳時出現麻煩。另外，增調原葉飛所部二十八軍至晉南，也非偶然。葉飛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是指責陳伯達為彭德懷同黨的主要人物，倒陳一旦展開，二十八軍與二十七軍即可協同三十八軍，共同應對可能出現的新問題。可以說，這次調動是向北京軍區摻沙子的重大步驟。

筆者的這一分析，並非單純是個人的看法。

以下接着述說陳伯達的第二次華北之行。

1970年7月，陳伯達離開北京，先到天津，後到石家莊。大約是7月11日，王保春電話通知我陳伯達來了，讓我去陪一陪父親。陳伯達在石家莊期間，參觀了化肥廠、焦化廠等工廠，還去了紅旗雜誌在滹沱河的五七幹校，參加了一會兒積肥勞動。在幹校時，他提出想見一見鄧力羣和胡繩，但幹校的軍宣隊領導人極力阻攔，他就沒有再堅持。李雪峯、劉子厚等一直陪同陳伯達，他們邊視察邊商談生產方面的事。

王保春提議我請幾天假，隨陳伯達到山西等地走一走，我就向廠裏請了十天假。

陳伯達到石家莊時，是天津市領導人解學恭和駐天津的六十六軍軍長劉政陪他一起來的，乘火車離開石家莊時，他們兩人仍同行。

在太原，陳伯達等參觀了太原鋼鐵廠、太原重型機器廠等工廠，並去晉祠看了看。山西省革委會主任、六十九軍軍長兼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負責接待事宜，他過去曾是延安馬列學院的學生，與陳伯達有師生之誼。陳伯達還與山西省的一些幹部進行座談，討論生產方面存在的問題。

離開太原後，陳伯達、解學恭、劉政、謝振華等乘火車到了大同。到大同的第二天，李雪峯從石家莊來了，他是乘飛機來的。陳伯達一行人視察了大同煤礦，並下礦井到採煤作業面直接瞭解工人的生產情況。下礦井時，有些隨行的人感到緊張，因為下礦井有一定危險性。陳伯達一直走在人羣的前面。有一段路十分狹窄，需要貓着腰爬着走過去。爬着走了一段，我都覺得累了。陳伯達坐下來休息，回過頭對李雪峯說："雪峯啊，把你拖垮了，對不起了。"李雪峯連連說："不要緊，我沒事。"

離開大同，陳伯達、李雪峯一行人乘火車到了內蒙古包頭。這時我才知道，陳伯達此行主要是調查解決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工業協作，特別是鋼鐵生產協作的問題。為了更好地解決有關問題，他到包頭後，立即把國務院副總理余秋裏從北京叫來，一起視察包頭鋼鐵廠和白雲鄂博鐵礦。

白雲鄂博在蒙古語裏是"寶山"的意思，它在包頭以北一百多公里。鐵礦基本上是露天的，可以直接開挖。礦山呈深褐色丘陵狀，山石嶙峋，了無樹木，但是山頂和山坡的石縫間稀疏地長着一些一尺左右的

低矮植物，開着白色的小花，在習習涼風的吹拂下散發着陣陣馨香。當地人叫這種花為“鐵花”。站在山頂，舉目眺望，天似穹廬，籠蓋四野，遠處有零星的白色蒙古包點綴在莽蒼的草地上，給人以念天地之悠悠的無盡感觸。

白雲鄂博鐵礦富含稀土和其他稀有金屬，為尖端工業技術所必須。可是這個礦過去在絕大多數時間裏僅只是粗放利用，很多稀有金屬被浪費了。六十年代初，日本人曾以普通價格買走包鋼的生鐵和礦渣，使國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稀有金屬問題是陳伯達最關心的一個問題，他指示有關工業部門一定要進行精細冶煉，充分提取、利用稀有金屬，對於過去的廢礦渣也要認真進行再提取、再利用。

在包頭時，在北京軍區領導人的建議和安排下，陳伯達、李雪峯、余秋里等還觀看了當地駐軍的一次小規模的軍事技術表演，並對部隊的幹部戰士講了話。他們每個人的講話都很簡短，主要是講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戰備工作，防備蘇聯入侵。余秋里在講話中特別說道，他是半個軍人，如果需要，隨時可以上戰場。余秋裏是陸軍中將，曾在戰爭時期負重傷失去了一條胳臂。

在包頭時的閒暇時間裏，有一天，陳伯達問我現在看些什麼書？我說，這次出來就帶了一本《中國哲學史參考資料》，現在正在看柳宗元的《天說》和劉禹錫的《天論》。

陳伯達問：“他們兩個人，誰更高明一些尸？”

我答：“依我看，柳宗元的唯物主義思想更徹底一些。柳宗元認為，‘天地，大果蓏也，……其烏能賞功罰禍’。而劉禹錫認為‘天人交相勝’。”

陳伯達說：

“劉禹錫有一首題名《烏衣巷》的詩，你讀過沒有？‘朱雀橋邊野

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我說："看過，但不是很理解。"

陳伯達拿起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這首詩，說道：

"劉禹錫這首詩寫得好。事物都是變化的。東晉的王導、謝安，曾住在南京烏衣巷，那裏有堂名'來燕'，後來世事變遷，連燕子也改換了棲身的環境。詩人撫今思昔，感歎人事滄桑。你凡事都要依靠自己，靠爸爸是靠不住的。爸爸倒了，你怎麼辦哪？"

我對他的話感到突然，沒有應聲。他接着又說了一句："爸爸倒了，你怎麼辦哪？"

見我仍未回答，他就不再問了，說："好，你回屋看書吧。"

陳伯達的幾句話，給我印象很深。這年年底，得知他倒了以後，我不由得回想起他提到的劉禹錫的這首詩。這時我才明白，他早已做好了下台的思想準備。

十幾年後，陳伯達在保外就醫期間，一次和我閒聊時談到：

"在包頭時，一次許信（當時任六十三軍軍長——筆者注）和我談話，我說，我也是會倒的。他笑了笑說：'你不會倒。'他以為我只是隨便說的。"

事實已經證明，陳伯達的第二次華北之行，沒有政治目的，只有經濟目的。他想在臨倒台前給華北的經濟工作推把力。在包頭時，他周圍聚集了華北的幾位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和幾位軍隊領導人，那是為了研究解決華北經濟協作的問題，當時的地方事務很多由軍隊幹部兼管，才出現同行者中軍人較多的現象。

7月21日左右，陳伯達結束了華北之行，從包頭乘飛機返回北京。兩天後，我準備回石家莊。臨走前一天，我向陳伯達告別，他正在修改一篇東西。他對我說："這個你也可以看一下，好知道為什麼去這

些地方。”

我接過來看，是一份寫給黨中央的匯報信，文字有兩頁。

信的抬頭寫的是：“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常委：”

下面的內容，先後次序已記不清，約略記得有如下幾點：

天津、石家莊、太原、包頭鋼鐵廠的生產情況，提倡開展生產競賽的情況。包鋼提煉、利用白雲鄂博鐵礦稀有金屬的情況。建議內蒙古的農業實行廣種薄收與精耕細作相結合。建議從天津至保定或天津至石家莊，修建一條鐵路，以減輕東北入關的客流、貨物經常要繞道北京，給北京鐵路造成的壓力，等等。

我看完匯報信，就想在辦公桌旁的書架找兩本書帶回石家莊看，翻到有本書中夾着張稿紙，打開一看，上面寫着：“經主席批准，明天就準備到下面去，擬先到天津，後到石家莊……”。這是陳伯達離京前寫的請示信的底稿。

陳伯達在華北之行前後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的請示信和匯報信，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也都看到過。這些材料理應都有存文件。

1970年陳伯達倒台以後，12月16日，毛澤東就三十八軍黨委的批陳報告寫過一個著名的批示。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批示，中共中央主持召開了華北會議，以解決所謂的華北問題。中共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第410至412頁裏對有關情況做了如下論述：

“1970年12月10日，中共陸軍第三十八軍委員會寫了《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送軍委辦事組並報中共中央。報告說：‘陳伯達千方百計地突出自己，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陳伯達不擇手段的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陳伯達在處理保定問題中，大搞分裂，挑動武鬥，鎮壓群眾，破壞大聯合，三結合。’說陳伯達反毛澤

東、林彪，都是無稽之談。'保定問題'極其複雜。三十八軍和河北省軍區各支持一派，這兩派尖鋭對立，武鬥不斷。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堅決反對省革委會一負責人，這負責人卻是中央所信任的。問題並不能歸咎於陳伯達。但是毛澤東認為找到了'石頭'。12月16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毛澤東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志：

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託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説，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以上建議，是否可行，請酌定。'

林彪對毛澤東所説，純系捏造。'太上皇'一説，也非事實。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和討論了毛澤東對三十八軍報告的批示。華北到會的有鄭維山（北京軍區司令員）、李雪峰（北京軍區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等九人，北京衛戍區到會的有吳德、吳忠等三人。大家一致擁護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先開北京軍區黨委常委會，後開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

"12月22日，華北會議召開，揭發批判陳伯達，株連到李雪峰、鄭維山。……（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代表黨中央在華北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揭露了陳伯達，宣佈了中央的決定：'將李、鄭兩同志調離原職，繼續進行檢查學習，接受群眾教育，待有成效後，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1月26日，鄭維山、李雪峰作了檢查。

綜觀華北會議前前後後，從三十八軍的檢舉揭發到鄭、李的檢討，既有正確地揭發批判的一面，又有許多不實之處，揭發批判陳伯達的'大方向'掩蓋了不實事求是。會議文件中說：'陳伯達……反對……林副主席'。'陳伯達投靠……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他對彭德懷、高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陶鑄、胡喬木、周揚、楊獻珍等反黨份子都很親'，'他是肖華、楊、余、傅……的黑後台'，'反革命份子……楊成武'，這類說法都是違反事實的。從根本上說來，中央文革小組倒曾是各地區的'太上皇'，華北地區和北京軍區並未與陳伯達狼狽為奸。當時人們信奉'句句是真理'，必然造成錯誤。"

王年一的著作是受到官方認可的，他既不能違反權力部門全盤否定陳伯達的決定，也就不能完全否定華北會議的批陳做法。但是華北會議究竟批判了陳伯達什麼呢？除了王年一已經做了解釋的所謂保定問題，華北會議主要是批判陳伯達反對林彪，投靠劉少奇，"對彭德懷、高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陶鑄、胡喬木、周揚、楊獻珍等反黨份子都很親"，"是肖華、楊、余、傅……的黑後台"。如今，這些所謂的罪行都已明顯不能稱之為罪行，但是權力部門卻並不想在陳伯達問題上說哪怕一句公道話，更不用說做客觀、公正的評價了。因為陳伯達已被鐵定打倒，罪名可以變來變去，替罪羊的倒台身份卻決不會改變；這個罪名實在不能成立，可以換別的罪名；舊的罪名不能成立，可以編新的罪名。

華北會議過後不久，李雪峯、鄭維山等都被打成陳伯達反黨集團的成員。李雪峯、鄭維山被說成陳伯達這個所謂"太上皇"的文武二臣。文革結束後，他們被一一平反。1971年初中共中央文件中所說的陳伯達反黨集團只剩下了陳伯達一個人。

12. "抓叛徒" 的目標從劉少奇輪到陳伯達

自1967年初開始，全國各地出現了一股"抓叛徒"的風潮。這股風潮是由康生掀起的。文獻記載，早在1966年9月16日，康生即向毛澤東寫信，提出重新審查1936年劉少奇採納柯慶施建議，批准安子文、薄一波等履行"出獄手續"一事。康生在信中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此信的內容參見《大動亂的年代》第224頁) 毛澤東最初對康生的意見未加置理，但隨着運動持續發展，毛澤東的態度逐漸發生改變。1967年1月28日譚震林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對農業部、林業部、水產部等單位的運動情況談了自己的看法。1月30日，毛澤東對譚震林的報告做了批示，內容如下[1]：

林彪、恩來同志：

此件值得一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變節份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你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澤東一月卅日

一個多月後，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此後，各地的"抓叛徒"之

---

[1] 筆者轉錄毛澤東這個批示，其文字參考了《大動亂的年代》第226頁的引文和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的《草嵐春秋》一書第245頁注釋的引文。

風愈演愈烈，但凡歷史上曾被敵人逮捕過的人，都被視為“可疑份子”，重新予以審查。本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着極其嚴格的組織紀律的黨，對歷史上有過被捕經歷的黨員，都是經過組織部門的嚴格審查，確認沒有問題並做出組織結論後，才恢復黨籍的。可是在康生掀起的“抓叛徒”的風潮中，原有的組織結論被隨意推翻，1937年和194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所確定的“自首變節”和“叛變”的標準也被廢棄。其結果是，所有歷史上曾被敵人逮捕過的人，除了犧牲的烈士外，幾乎統統被當作“叛徒”看待。

由於中國革命經歷了極為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不宜簡單地絕對地認為不會有一個漏網的叛徒混入黨內。問題是，文革中的所謂“抓叛徒”，失去了嚴肅的歷史審查的意義，而變成了政治鬥爭中的一種“砝碼”。最初，“抓叛徒”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其後，又轉向打倒陳伯達。他們兩個人的案子於是成為文革中最大的“叛徒”案子。

很多人不知，陳伯達在尚未倒台之前，就已經因歷史上曾被捕過而受到了暗中的審查。筆者現據自己的見聞，在這裏略作敍述。

1967年下半年，一些羣眾組織在江青、王曼恬的鼓動下，已在調查陳原道、劉亞雄、劉甯一、陳伯達等1931年在天津被捕的情況。由於陳伯達本來沒有問題，所以當時羣眾組織貼出來的調查結果是：“王通因病保釋”。王通是陳伯達在獄中的化名。陳伯達在被捕後始終沒有暴露過自己的真實姓名，因為他是剛到天津的當天晚上就被捕的，而此案唯一的大叛徒、出賣所有被捕人員的河北省委書記許蘭芝(也叫徐蘭芝)，只知他是剛從上海派來做宣傳工作的，還沒來得及知道他的真實姓名。陳原道與陳伯達在蘇聯留學時相識，但他沒有說出陳伯達的真實姓名。這個事實說明，除許蘭芝外，其他被捕人都是嚴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紀律的，在因被叛徒許蘭芝出賣，被迫承認個人身份時，都沒有供

出其他人的情況。所以，事情絕不是後來專案組搞出的假材料所説的那樣，什麼所有的被捕人都互相指認了身份，等等。那完全是誣衊不實之辭。

1968年初，事情又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劉寧一突然被隔離審查了。劉寧一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增選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他過去是著名的中國職工運動領導人，長期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1931年，他與陳伯達在天津同時被捕，是同案人。劉叔宴認為，劉寧一被隔離審查，是整陳伯達的前奏。劉叔宴當時很不安地對我説："他們搞劉寧一，實際上是想搞你爸爸。你爸爸處境不好，天津江楓倒了，就對他壓力很大，現在又搞劉寧一，這也是沖着他來的，有人想在他被捕的事情上做文章。"

已經持續了兩年多的運動所造成的社會動盪，使劉叔宴敏鋭地感覺到，上面要找替罪羊。拋出王、關、戚還不夠，因為王、關、戚的職務太低，替罪作用有限，下一個要被打倒的很可能就是陳伯達。劉叔宴後來與陳伯達的關係越來越僵，就是源於這種潛意識，她擔心將來會連累到她，想及早劃清界限，以至於因心理負擔過重，精神失去了常態。

1968年2月，我回家住了段時間。那時我們家已經完全搬出中南海，在府右街西面的新建胡同安了家。一天，劉叔宴去釣魚台辦事，回來後對我説："劉寧一寫了個檢查，有些失實的地方，你爸爸寫了一篇批評的文字，我已經看了，覺得寫得比較清楚。你明天可跟你爸爸要來看一看，也好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時，凡是歷史上有過被捕經歷的幹部，其親人們都在心裏敲小鼓。誰弄得清究竟是怎麼回事，誰不為自己的親人擔心呢？

第二天，我就去釣魚台找父親。

陳伯達那時每天要忙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我到了釣魚台，也很難

找到說話的機會，只好等到他上衛生間時和他搭上話。

我問他：“外面有羣眾組織調查你們被捕的事，你沒有問題吧？”

話問得很唐突，可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我想讓父親親口回答我這個問題，才覺得心裏有底。

陳伯達皺起了眉頭，說道：

“我沒有問題。胡錫奎(六十一人之一，曾任西北局第二書記——筆者注）說他們出獄是我接待的。我只接待了殷鑒，是組織上讓我去的，沒有接待別人。他們出獄登的‘反共啟事’我沒有看到。我和他們出獄的事沒有關係。我沒有問題。”

當時社會上一些人把陳伯達和六十一人的案子聯繫到了一起，陳伯達以為我也聽到了這種說法。

停了口氣，陳伯達又鄭重地說了一句：“你應該相信中央嘛！”

聽到這句話，我心裏為之一震。是呀，應該相信中央。中央信任父親，我還來亂問，連中央都不相信了，真是不應該。可再一想，現在中央說話也有時常變化多端，沒有一定之規，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呢？不容多想，我又抓緊時間問道：“媽媽說你寫了一個和劉寧一有關的材料，能讓我看一下麼？”

陳伯達擺了擺手：“你要想看，可以找他們要來看一看。”

我轉身退出了衛生間，去找王保春。王保春從文件櫃中取出材料交給了我。記得陳伯達主要是在三個問題上批評了劉寧一。

一個問題是，劉寧一的檢查中，在敍述 1931 年 4 月被捕的經過時，逐一寫下了同時被捕的人的名字，可是他卻完全沒有提到陳伯達的名字，也沒有提到陳伯達的化名王通。

對劉寧一的這種寫法，當時王保春等認為他可能是想避免把陳伯達捲進調查中。但是劉叔宴以為可能有人故意在給陳伯達出難題，指

使這樣寫。因為如果陳伯達對劉寧一的這種寫法沈默不語，那就會被認為是心虛迴避問題；如果理睬了劉寧一，那就勢必把自己也列入了審查對象。

陳伯達沒有迴避問題，他批評劉寧一沒有實事求是寫情況，他明明和劉寧一是同案人，劉寧一卻故意不寫他，這是不能理解的。陳伯達還寫道，解放後他和劉寧一見面，常談論當年被捕的事，議論過那個省委機關設得不好，把那麼多人集中到一個樓裏，讓敵人一網打盡，為何劉寧一現在把事全忘了。

第二個問題是判刑問題。劉寧一在檢查材料中沒有寫判刑的情況。陳伯達敘述了自己堅持不承認黨員身份，迫使敵人推出叛徒許蘭芝來對質，對質後因身份已暴露才承認是黨員，後被押解到北平張學良司令部，又乘九一八事變局勢變化，翻供否認了黨員身份，假稱只是互濟會員，最後以互濟會員身份被判了兩年或兩年半的刑，1932年初因病重被贖買保釋出獄。

第三個問題是劉寧一後來還在唐山等地被捕過，檢查中卻沒有述及。

陳伯達在批評劉寧一的同時，陳述了自己從被捕到出獄的所有情況。這使那些在暗中想整他的人一時無話可說。

王保春對我說："你爸爸寫的這份材料，還用毛筆工整抄寫了一份送中央存文件。"

陳伯達倒台後，我在石家莊閱讀了中央專案組對陳伯達的審查報告。當時中央文件曾發至每個工作崗位，閱後即收回。我一邊讀，一邊在心裏默默和陳伯達1968年寫的這份材料加以比對，發現中央專案組的文件裏存在很多情節不通的假材料。傳達的中共中央文件對陳伯達親筆寫的這份材料及相關內容隻字不提。

中央專案組的文件裏也有一份真實的材料，即遠鋭1932年9月6日

寫給河北省委的意見書。遠銳在意見書中寫道："我們在公安局的口號一方面是'打死不承認'，另一個是'有人對堂才承認'，所以第一堂除徐（許）蘭芝外都能執行打死不承認"，這恰恰推翻了專案組編織的其他假材料。本書前部分在《一件可靠的歷史證據》一節裏已有詳細的分析，這裏不再重複。

文革結束後，與劉少奇一案有關聯的所有被戴上"叛徒"帽子的人，包括安子文、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案子，都得到了平反。而陳伯達自1970年倒台後又在1980年被定為反革命主犯，其所謂的歷史問題不可能得到權力部門的澄清。儘管如此，歷史還是微微露出過一絲希望。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時，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的名字，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這種文字表述方式，是經過認真思考的，它為客觀評價陳伯達留了餘地，表明胡耀邦等領導人有實事求是處理複雜問題的意願。決議通過不久，中央派人探望了被關押的陳伯達，向他説明中央認為他與決議點了名的那幾個人是有區別的。1982年4月23日，周揚在家中約見陳伯達，兩個人進行了四個小時的交談。10月，黎澍將陳伯達寫的《求知難》一文在《讀書》雜誌發表。其後，胡喬木批示將陳伯達寫的《認識的漸變與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上的頓漸兩派》一文在遼寧的《理論與實踐》雜誌發表，供研究者參考。兩篇文章的發表沒有征得陳伯達的同意，它們之所以能被刊出，只是反映了許多人的一種願望。

然而，陳伯達命運多蹇，即使在保外就醫期間，仍又一次經受了打擊。1984年8月，薄一波突然在講整黨問題時説什麼陳伯達是"叛徒"，"有案可查"等等，擺出要再搞一次"抓叛徒"的架勢。陳伯達從報上看到薄的講話，立即找北京市公安局幹部楊鍾咸、肖清河談話，

對薄的講話作了嚴肅的駁斥，隨即寫了《記兩件公案》的長文，詳細敘述自己從被捕到出獄的經過，再次向中共中央進行申訴。《記兩件公案》一文已經收入香港出版的《陳伯達遺稿》一書，本書前部分《天津被捕》一節已作摘錄。

薄一波突如其來的講話打破了陳伯達及其同情者希望中共中央實事求是對待歷史的幻想。接着，薄一波又有驚人之舉。1986中共中央向全黨印發了薄一波所作的《關於中央一級生活會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報告》。該報告羅織罪名，大批胡耀邦，迫使胡耀邦同志辭職，並由此導致了兩年多後的中國政治大風波。薄一波在中國政壇上的勢力於此可見一斑。據傳說，胡耀邦同志病重時留下遺言："不能讓薄一波參加我的追悼會。"胡耀邦去世後，鄧小平等領導人都參加了追悼會，而薄一波果然未露身影。

自從1984年薄一波的講話見報後，筆者曾與陳伯達多次談論有關話題。

有一次，我問陳伯達：

"1931年春你們在天津被捕後，於9月初被轉押北平，關進草嵐子監獄，和薄一波等人關在一起。雖然兩撥人不是一個案子，總算是難友了。後來你和薄一波又長期在黨中央共事，同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現在他說早知你是'叛徒'，那是明擺着說瞎話。他早幹什麼去了？他早不吭氣，還和你禮尚往來，平起平坐幾十年。我想不通，他這樣說的動機是什麼？是不是文革中他們被說成是叛徒時，你正在上面，他嫌你沒有替他們說話？"

陳伯達說：

"他們被說成是叛徒，我也被視為嫌疑份子，受到暗中調查，我能怎麼辦呢？我自己隨時可能倒，又如何幫得上別人？

“我沒有說過他是叛徒，但也為他們說不上話。他們出獄的具體情況我也不瞭解。我那時在北方局辦刊物，不是北方局的領導成員。

“他們出獄時，組織上讓我接待殷鑒同志。殷鑒同志是獄中黨組織負責人，當時病得很重。我把他安頓到德國人開的一家醫院治療。後來病情好一些，殷鑒就出院了，出院堅持工作，又病倒了。我再次把他送到醫院，沒能救過來。他的後事也是我料理的。與他們有關的，我只做過這一件事。他們登的‘反共啟事’，我當時沒有看過。他們是登在《華北日報》上。那時北平的報紙很多，《華北日報》是官辦報紙，我很少看。

“剛解放時，薄一波他們要回草嵐子監獄看一看，請我一起去，說要大家一起照相。我因工作忙，沒有去。再說，七大時有人對薄一波出獄登‘反共啟事’提出過意見，中央做了解釋，說這個事中央知道。雖然解釋了，但意見並沒有完全消除。作為在中央工作的人，要注意各方面同志的團結。因為一起做過牢，就搞聚會照相等活動，不太好，容易讓人誤會是搞小團夥。我沒有參加他們的這個活動，薄一波可能不高興。”

我說：“原來是這樣。那麼，這是不是屬於黨內的宗派主義？薄一波是不是嫌你不願意跟他套近乎，就排斥打擊你？”

陳伯達說：

“這就讓後人去評論了。當年在北平監獄裏，劉格平和他們是一個案子，劉格平不肯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很晚才出獄，解放後卻受到排擠。文革中劉格平在山西搞的不好，後來把他和張日清都調開了，這是另一回事。劉格平在監獄的表現確實是好的。薄一波他們對劉格平的態度，可能反映出一些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安子文、薄一波、楊獻珍他們平反是應該的。那件事責任不在他們。但是，薄一波自己平反了，就說別人是叛徒，這

就沒道理了。除了薄一波，其他人好像沒有這樣。七大時，薄一波是代表資格審查委員。八大時，他的好朋友安子文是代表資格審查委員，安子文又長期擔任組織部長。我如果真有問題，他那時說一句話，我能當選嗎？他現在有了權，就可以不講道理了。

"楊獻珍同志和我是比較好的。是我請他到黨校工作的。他後來挨批判，我也沒有辦法。當年我在國民黨的監獄裏病得很厲害，淋巴腺結核一天天腫大，監獄讓天主教醫院修女給我開刀，結果淋巴結核不但沒有收口，反而更加蔓延，是個可怕的樣子。那段時間，監獄叫同獄的人到醫院照看我，我記得楊獻珍同志照看過我。雖說是派的差事，還是要感謝他。他平反後，在1981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還替我說過話。這也是不容易的。像薄一波那樣的人是個別的。"

寫到這裏，筆者想摘錄一段《王力反思錄》中有關劉格平和陳伯達的內容。《王力反思錄》這部書有些缺點，主要是王力在講自己時偶有誇張處。但是王力在講其他情況時，還是如實講出了一些別人不敢講的事情。

《王力反思錄》第750頁寫道：

"毛主席對劉格平印象很深，少奇同志也跟他講過劉格平的好話。劉格平是一九二二年的青年團員。劉少奇當順直省委（相當北方局）書記時，彭真當組織部長，劉格平負責津南特委。劉格平長期坐國民黨的監獄，出獄時劉格平沒有簽字，沒有發表反共啟事，他寧可坐滿刑期也沒簽字。他說，'是黨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執行。'少奇同志對他是欣賞的，毛主席也是欣賞的，少奇同志同我談過，他說解放後他找了劉格平，少奇同志說：'你不瞭解形勢，當時需要大批像你們這樣的人投入抗日戰線，發揮很大的作用，你不出來對黨的事業有影響，你自己也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做不了多少工作。'劉格平說：'我不是

不瞭解形勢，我瞭解形勢，也相信中央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可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看了反共啟事，於心不忍，我不能在上面簽字。既然是中央指示，別人出去我並沒有反對，只是我不能簽字。如果形勢發展很順利，我想不簽字我也會出來。我也沒想到國民黨又把我交給日本人，快到抗戰勝利才坐滿刑期出來。'少奇同志認為劉格平黨性很純，解放後他重用了劉格平。開國大典時劉格平是作為少數民族代表，在開國大典上講話的。"

王力接着敍述了劉格平在建國之初在民族問題上的建樹。劉格平曾糾正過王震、李井泉等在新疆、四川民族問題上的錯誤意見，他對加強我國的民族團結做出過重要的貢獻。可是後來，劉格平卻被撤職，貶官，當了山西省的副省長。王力在該書第752頁寫到毛澤東查問為什麼劉格平在文革前會被打倒：

"……毛主席要瞭解為什麼把他打倒，劉格平說打倒過程很可笑，中組部開了個會，說他這毛病那毛病，有人提出說他出獄時不簽字是錯誤的，安子文馬上制止說，這個不提，只說他右傾、民族主義。我們向毛主席匯報，說那次打倒不一定是劉格平不對。民族問題我們沒研究。我認為劉格平是讀馬列主義書的人，動腦筋的人，堅持意見的人。那次打倒並不是因為他工作中有什麼問題，而是有人覺得劉格平這人放到中央不合適，劉格平沒有簽字，反而有人說劉格平是叛徒。我們黨內動不動說人是叛徒，一說叛徒就否定一切，這是老毛病，不好。陳伯達廬山會議以後不但成了壞人，又成了叛徒，陳伯達也是草嵐子監獄的，沒有在反共啟事上簽字，他是因為淋巴結核快死了，通過了一個同鄉（山西軍閥）[1]關係用錢贖出來，保外就醫的。他沒簽反

[1] 王力記憶有誤，應是福建軍閥。——引者注

共啟事，履行一般手續取得釋放的。這些事本來大家都知道，可是葉永烈的書至今還說陳伯達是叛徒。"

王力寫的這一段內容很重要。本來，陳伯達被捕和出獄的經歷，在中共中央領導層裏，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因為在過去，一個共產黨員經受了監獄鬥爭的考驗，受過敵人嚴刑拷打，仍堅持革命，不改初衷，是值得引以為榮的，那是他人生的亮點，自然會被周圍人們所知悉。可是，現實的失去理性的政治鬥爭卻偏要把這亮點變成疑點，進而又把想像出來的疑點，人為地變成了污點。這是對歷史的極大篡改和嘲弄。

為了探究薄一波為何在文革後仍要誣指陳伯達為"叛徒"，筆者查閱了眾多史料，以期找到開啟薄一波的動機之鎖的鑰匙，結果發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第169頁，有一篇毛澤東《對中央關於劉瀾濤出獄問題的覆電稿和張聞天有關證明材料的批語》，該批語的注釋[2]中有段文字，似乎透露出事情的某些端倪，很值得未來的歷史學家們細細閱讀。

為保存歷史真實材料，現將這篇批語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加寫的注釋全文照錄如下：

對中央關於劉瀾濤[1]出獄問題的覆電稿和張聞天有關證明材料的批語[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九六七年二月）

一

照辦

二

張聞天[3]關於一九三六年處理北方局領導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簡單手續"，以便早日釋放關在北平監獄中的幹部，給中央的信及附件（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中央軍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組）

汪[4]辦。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1] 劉瀾濤，一九三一年在天津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時被捕（此句有誤，據人民出版社《草嵐春秋》第22頁記載，劉瀾濤是在北平同仁堂藥鋪前被捕——引者注）。一九三六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同薄一波等共六十一人履行簡單手續後集體出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一九七八年被平反。

[2] 周恩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給毛澤東寫報告說，"送上西北局來電和劉瀾濤來信"，"因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現擬電如另紙。如妥，請批發"。周恩來代擬的中央給西北局複電指出："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本篇一就寫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本篇二寫在張聞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給毛澤東等的信上。張聞天在信後附送了一份證明材料。材料中說："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給我寫了一封關於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幹部問題的信。""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幹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長，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個不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他信中提議即辦此事。""他還附帶寄來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覺得不要什麼代價就可以解決當時確實缺乏的工作幹部問題，豈不很好"，"就復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中組部的報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大錯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他們履行的出獄手續是"組織上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

[3] 張聞天，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負總責。

[4] 汪，指汪東興，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筆者一字不漏地全文轉錄這份材料，以避免有斷章取義之嫌。其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寫的注釋[2]中所引用的張聞天的證明是關鍵部分，須逐字逐句看。細心的讀者自會發現事情的某個環節存在問題，即張聞天明明寫的是，劉少奇同志當年寫給他的信中說"只要履行一個不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犯人即可出獄。"可是薄一波等卻是發表了

《反共啟事》出獄的。這與劉少奇同志的信和張聞天同志的復信都存在着不一致。此事恐怕別人全無責任，除了薄一波，因為他是獄中黨支部的負責人，對事情有隨機決定權，獄中別的黨員按照紀律都要服從他。

現在出版的講述六十一人案的書刊，在引用張聞天的證明時，都把"簡單手續"一詞前面的"不反共不發表"這六個字刪掉了。其實，正因為有"不反共不發表"這個定語，才能稱之為"簡單手續"。

筆者以為薄一波本不必為這個歷史的小環節感到心虛，畢竟那時環境複雜多變，難以不出紕漏。他已獲平反，無人再議此事，可他偏偏放心不下，以為陳伯達接觸情況多，是半個知情者，若不封住其口，心中總不安。而封住其口的絕好辦法，就是繼續維持文革中給陳伯達戴上的"叛徒"帽子。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上，只有把人定為叛徒，才能抹殺他的一切，他所做過的一切有益的工作，他所説的一切話，統統都被視為假的，無人再敢相信。當年薄一波對不服從在"反共啟事"上簽字決定的劉格平那樣耿耿於懷，恐怕也是出於同樣的心病。

總之，這裏有個死結。或者是實事求是，或者是按照權勢人物的需要隨心所欲地解説歷史，而根本不顧及事情本身的邏輯關係。

13. 九大前後

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尤其是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上，陳伯達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對此，已經有一些著作有所披露，但大都敍述得十分簡略，惟有王文耀、王保春在2003年3月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上發表的《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一文所述較為詳盡。他們的文章吸收了陳伯達生前談話的大部分內容。為了把這件中共黨史上值得認真研究的事件清楚地展現在人們面前，筆者先將該文中的重要部分摘錄出

來，然後再根據陳伯達與筆者的談話，做一些補充。

王文耀、王保春在文章中寫道：

"1969年1月底的一天夜裏，陳伯達開會回來和往常不同，一進大門不到他自己的辦公室，而是興沖沖地直入我們(即本文作者，當時任陳伯達的秘書）的辦公室。

進來之後便沒頭沒腦地對我們說：快給我準備準備！我們看他興奮而又嚴肅的樣子，便問道：準備什麼？他說：嗯，準備材料、紙和筆。中央、主席決定讓我起草九大報告。我們問他有誰參加。陳不耐煩地說，還有上海那兩個（指張春橋、姚文元），主要是我自己寫。

我們說，那他們來問怎麼辦？陳說，不管他，他們自己願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我們看他一提到'那兩個'就情緒激動，也就不再多說別的了。

陳伯達靜靜地沉思了一會兒，對我們說了一下中央碰頭會決定召開黨的九大和起草政治報告的情況，說時間只限一個月完成，寫什麼內容沒有講，由陳伯達自己考慮。接着陳向我們講了他要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主題設想，他說：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你們倆幫助我搜集這方面的資料，要各地方有關在經濟建設、生產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資料。

由於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裏（毛家灣）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託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

陳伯達回辦公室後，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帶着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後由我們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主席。

主席很快圈閱退回，就這樣，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工作是開始了，但我們感到最不好辦的是中央決定由三人起草報告，而陳伯達甩開張、姚自己幹。我們也向陳提出，張、姚他們來問怎麼辦，怎麼答覆？陳固執地說：不管他，他們想的和我不一樣，他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

果然，姚文元來電話，問陳起草報告怎麼進行。陳不接電話，讓我們答覆他說：'告訴他們：他們覺得應該寫什麼就先寫吧，我有些身體不舒服。'張春橋又來電話問陳怎麼辦，是否談一談。陳也是用同樣的辦法讓我們答覆：'不是有個提綱嗎？讓他倆自己覺得應該寫什麼，就先寫着吧。' 張、姚一連來過幾次電話，以後再也不來電話了。

我們對陳說，你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是不會閑着的，他們是會向上報告的。陳說：不管他，中央決定主要是要我來寫，他們就是想要塞進他們那些東西，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

陳的態度很堅決，我們也不是反對他的想法，但是，擔心的是怕他這樣硬頂，張、姚會找岔來破壞，使陳搞不成功。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希望他這個報告能夠寫成功，便努力按照陳伯達的思路四處搜集資料。在這之前，汪東興同志送來過一批北京'六廠二校'的材料。除此之外，我們首先是找北京市要資料，陳伯達對北京市抱很大希望，認為謝富治會支持他。可是我們打電話向謝要有關生產方面的資料時，謝說：'寫九大報告，要北京市的資料，是'中央文革'要可以給，其他人要不能給。'

我們碰了釘子，陳還不完全相信。就在這時，在人民大會堂118（北京廳）——毛主席那裏開會，散會後出來，陳伯達有意和謝富治並肩而走，向謝提出要北京市的資料。王文耀緊隨其後，聽到謝對陳說：'伯達同志，你可別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

少，我給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給，請你理解我。'

陳自己碰了釘子，在回家的車上沉思不語，可以看出他那時心情很不好。到家一進門陳對我們說，北京市不給資料不要了。你們可向河北省委要，向李雪峰同志要些材料，河北省有不少好的典型。我們向李雪峰同志那裏要了些，但主要的資料還是從新華社和中辦要來的。

在這期間，新聞口是由陳伯達、姚文元兩人共管的，而實際上是姚文元一人抓住不放，輿論界都在不斷地宣傳'旗手'。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姚文元寫了個關於宣傳江青的'在部隊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和樣板戲的報告。而主席看後把江青的名字和'紀要'全給刪掉了，批示（大意）：我以為不妥，送伯達同志，由碰頭會商議。

陳看了毛主席的批示非常興奮，毫不掩飾地把自己心裏話說出來了。他說，主席早就批評她說：就是幾個樣板戲；要江青管文藝就沒有文藝了！主席的批評他們就是不聽，他們就是在吹噓她，說什麼30年代的旗手是魯迅，60年代的'旗手'是江青；為她造輿論，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她的所謂'紀要'開始的。我的這個報告裏就是不吹捧她，就是不從她的所謂'紀要'開始，而是提前到八屆十中全會開始，貶低她的影響。就是要把報告寫得非常嚴謹，使得在討論它時，無法加進她的'紀要'！

陳伯達這個報告寫得很艱苦，長時間的思考、推敲。時間在不斷地向前推移，我們心裏非常焦急，生怕中間出了問題。我們向陳建議是否把已寫出來的第一部分稿子報送主席，寫完第二部分時再送，陳同意先送第一部分。可是送出的稿子沒有回音。

第二部分寫完後，我們實在憋不住了，在陳休息時提出是否將第二批稿子送主席。陳說不用，寫完後一起送一個完整的稿子，主席就會一口氣看完的，這是他的習慣。不能一段一段給主席看。他講得有他的道理。

但是，規定完稿的時間臨近，稿子進展緩慢，我們很是替他着急。看得出陳也同樣着急，但他不讓江青主張的一套插進報告的強烈心情，使他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細斟酌。當他的稿子寫到只剩下最後一點時，中央開會了。主席第一句話就問，九大政治報告寫得怎麼樣了？周總理説，看來恐怕不行吧！主席對陳不能按期交出報告稿，可能延誤九大的召開表示不滿，便接着説：不行就重新搞嘛！請康生主持重搞。

就這樣，陳伯達一句話未説，辛苦了近一個月的報告稿，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決了。陳非常痛苦，在散會時問周總理：我那個稿子只剩下一點了，怎麼辦？總理安慰他説：那你就把它寫完吧，作個紀念也好嘛。

當天晚上，總理讓陳先拿出寫完的報告稿交'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談了一下。後來，在會上還是被張、姚攻擊為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而否定了。

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由中央辦公廳送來之後，陳伯達在他房間裏很快看完，就拿着稿子急匆匆地來我們辦公室，很激動地對我們説，他們這個稿子你們看了沒有？他們這個是伯恩斯坦的！就是説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就是搞運動！運動！運動！你們看看是不是這樣的！

中央開會在討論張、姚的稿子時，陳伯達很激動地抨擊了張、姚的報告稿子，説：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説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反駁陳説：你説的是'唯生產力論'……會上爭論很激烈。後來毛主席説，可以考慮在報告中加進陳伯達的意見。

會上大家都表了態。最後，陳伯達説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主席

說：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九大開幕了。陳伯達作為主席團成員雖然依次坐在主席台的顯要位置，但心情是不好受的，因為他一事無成。他早有下台的思想準備，但如何下，他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而這時的張春橋、姚文元、葉群都在積極活動進政治局，並且積極擁戴江青進常委。此時的江青風頭正盛，也自認為她是當然的常委。

一天，周總理來到陳伯達的住所向他通報人事安排方案，對陳說：這下好了，主席的意見江青不能進常委，原來的常委不動，這個結果是我沒有想到的。

陳對總理想說常委他就不再當了，話未出口，總理很嚴肅地對陳說：不要說了，主席已經定了的，不要再提了。

九大在進行大會選舉時，在預選中江青得了全票，她很得意，滿心以為她會是全票當選，可是正式投票選舉時，她沒有得全票。對此，她極不愉快。陳伯達回來說：我就沒有投她的票。在各小組開會時，有的人竟提出要追查這些在'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名字上打 x x 的人，說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聽說要追查，陳非常不安地給汪東興打電話，問他們會不會查驗筆跡。

九大開完之後，我們收到毛主席處退回的一件文件。我們仔細查看了一下：原來是陳伯達呈送毛主席的九大報告稿的第一部分，原封未動。主席用粗粗的鉛筆大大地寫着'退陳伯達同志毛澤東'，後面署着日期。毛主席的字跡幾乎占滿了封面。我們和陳看了都愣了，原來主席從未拆封看過，我們倆一聲未吭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只剩下陳一人在他的屋子裏呆坐着。"

這篇文章的兩位作者都是事情的親身經歷者，他們的敍述已十分詳實。現根據陳伯達與筆者的談話，做三點補充。

第一點，陳伯達曾說：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按照當時的提法，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後，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志報告過。"

第二點是關於九大政治局常委的選舉。陳伯達說：

"九大選舉常委的事，是周恩來同志告訴我的。他對我說：'沒有想到你仍舊列入了名單。江青放言，黃永勝如果當常委，她也要當。許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單可以照舊不動。毛主席同意了許世友這個意見。'"

第三點是，在中央確定使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報告稿後，中央政治局曾專門開了一次批判陳伯達的會。關於這個會的情況，陳伯達說：

"討論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時，我批評他們的稿子是伯恩斯坦的觀點：'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雖然我寫的稿子已流產，但我說的話異常激怒了康生、江青、張春橋。他們要找機會對我提出的這個比擬進行報復。過了兩天，中央開了一個會，對我進行了言辭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他們主要是批判我提出的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的觀點，說我是'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我倒了以後，他們在報上反過來說我是伯恩斯坦。

"毛主席也在會上講了話，說有人在大船將沉的時候來個老鼠搬家。以前，毛主席提到在延安時，張聞天想留住我，我猶豫不決，也說過這話。他此時這樣說，是指我覺得搞運動的路行不通，就走搞生產的路，不能和他同舟共濟。毛主席還說我本性難改，總是看重經濟，說帝國主義的本性不可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也不可改變。"

另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 283 至 284 頁記載，1969 年 3 月 7 日和 3 月 8 日的中央會議上討論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的情況如下：

"3 月 7 日到毛主席處開會，談九大政治報告和蘇軍入侵等問題。會上，毛澤東對陳伯達沒有按期交出九大政治報告全稿表示不滿，說：索性把（起草）小組取消，歸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大家來議，請總理負責。

3 月 8 日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由陳伯達起草的部分九大政治報告稿和九大準備工作會議的時間、議程。會後將會議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林彪：'九大書面報告稿，伯達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還有兩個半問題（國際、毛澤東思想和團結起來），請伯達同志三天內將它寫完，然後大家來議。'[1]"

政治見解的分歧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結局。毛澤東將陳伯達背離以階級鬥爭為綱，提出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的改弦易轍行為，視為老鼠搬家(毛澤東 1959 年批彭德懷時也用過這類話，說彭德懷是"船要沉了，老鼠趕快離開船"，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中的"8 月 1 日常委會")，視為對他的背棄，視為在搞"修正主義"。所以，毛澤東後來把他所發動的"批陳整風"，又稱為"批修整風"，用一個"修"字來概括陳伯達。

敍述至此，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 1949—1976》第 1546 頁和香港明鏡出版社《晚年周恩來》第 269 頁均引用吳法憲的談話，說什麼陳伯達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一個人

---

[1] 原註為："後來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被指責為'鼓吹唯生產力論'，遭否定。林彪在九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改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

天天往毛家灣跑，同林彪商量怎樣寫"，這種說法是違背事實的。陳伯達秘書的文章寫得很清楚："由於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裏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託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幾天後，"陳帶着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後由我們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主席。主席很快圈閱退回，就這樣，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因此，陳伯達在起草九大報告時，總共與林彪只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是和張、姚一起去的，第二次是和林商量提綱。這個提綱向毛澤東報告過，並得到了毛的批准。所謂陳"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麼寫"，純系吳法憲的杜撰。熟悉中共上層情況的人都知道，政治局常委們作息習慣不同，除了開會以外，他們之間的會面須事先約定，秘書、警衛還要做相應的準備。無論是林還是陳，都無法背着秘書去見客。

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在《紅色警衛》一書第123頁說："據林彪的一位秘書回憶，陳伯達去毛家灣的次數很少"。《毛澤東傳》第1545頁則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寫道，在3月7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對陳伯達沒有按時交出報告稿很不滿，"他問陳伯達：你究竟什麼人在搞。陳伯達回答：我自己一個人在寫。"這些事實都足以證明吳法憲的說法實屬謊言。另外，陳伯達在同張春橋爭論時，沒有援引過任何"林副主席指示"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也說明林彪對起草九大報告沒有表示過具體的意見。當時，林彪的權威僅次於毛澤東，其接班人的地位即將被寫入黨章，在毛澤東否定陳伯達的稿子之前，他不會因懼怕張春橋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意見。陳伯達也不會想到一年多以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動搖，而不敢搬出"林副主席指示"來反擊張春橋。

根據王文耀和王保春的文章，陳伯達的報告起草完後，沒有給任

何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定了，所以《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所謂“陳伯達為此曾私下徵求過周的意見，周表示支持。這樣一來，林彪更加受到鼓舞……”這一段話也是毫無根據的。該書在敘述這件事時，也沒有注明有任何出處，更證明這件事的杜撰性質。

關於林彪同九大政治報告稿的關係，1988年春秋出版社出版的林彪秘書張雲生著《毛家灣紀實》第210至212頁中早有明確的記載：

> 林彪慢吞吞地說。“主席讓我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用事先寫成稿子，叫我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摘用記錄稿。我提出，在黨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會那樣，我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通過的稿子為准。主席同意了，最後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起草政治報告。”林彪停了一下，又說，“但是你們都知道，我向來很不習慣念別人寫成的稿子，而只願意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我口頭講話用的‘條子’。這個‘拉條子’的任務，由你們幫助我來搞。……”
>
> 2月下旬，林彪把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召到毛家灣，商量“九大”政治報告起草的事。林彪會客，向來不讓工作人員在場，但負責迎送的工作人員不准擅離崗位。我在林彪門外等着他們談話的結束，大約不到一個小時，陳伯達等三個人從裏邊出來了。在他們分別登上自己的汽車以前，我聽張春橋、姚文元都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
> 一天夜深之後，毛家灣的工作人員正在準備吃夜餐，葉群從釣魚台回來了。她慌慌張張地走進秘書辦公室，用一種非常急促的口吻對我說：“老張，快把所有參加‘拉條子’的人給我叫來，我要親自給他

們開個會！我要不催，別人是不會着急的。"

……"我對你們說，"葉群用的完全是教訓人的口氣。"你們給首長在'九大'講話'拉條子'，現在可到了火燒眉毛的時候了。我剛從釣魚台開會回來。我們討論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一部分初稿，爭論非常激烈。有的人說陳伯達的稿子是鼓吹唯生產力論，我沒表態。但陳伯達寫的東西都挨批了，你們搞的東西還能有把握嗎？我不親自抓，你們也可能放黃槍；首長也跟着你們放黃槍，那個責任誰來負？現在你們都說說，你們分工'拉'的那些'條子'究竟寫了些什麼，我來把把關。……限你們在三天之內交卷！"

但還不到三天，葉群就從釣魚台回來吹風說，陳伯達遲遲寫不出報告稿，誤了"九大"的召開，因此主席決定改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張、姚負責執筆。張、姚的筆頭比陳伯達快得多，僅僅用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就把報告的初稿突擊出來了。與此同時，陳伯達那個業已被廢的初稿也全部寫出來了。兩個初稿都用鉛字排成清樣，分送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聽葉群透露，中央文革碰頭會只討論了張、姚寫的那個稿子，陳伯達借機反唇相譏，說它是一個"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張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但沒有受人理睬。

康生給毛家灣來電話，向林彪極力推薦張、姚的稿子。他這個電話是打給葉群的，葉作了記錄，讓林辦保密室存文件。"康老的電話，由我向首長講。"葉群對我說。"張、姚寫的稿子，我只能向首長講文革碰頭會討論的情況；稿子的內容，就得由你們去講了。老夫子的稿子已經不能用了，但他堅持印出來，還托我勸首長看一看。說是首長看，實際上還得靠你們去講。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對他說首長已經看過他的稿子了，這是為了給他一點安慰。但你們給首長講的時

候，不要講得太細，以防止首長腦子一熱，又對老夫子的東西發生了興趣。至於張、姚的稿子，文革是討論過了，但還不知道主席的態度。可等主席有了態度之後再說。"

張雲生的記述説明，林彪事先並沒有對九大政治報告應如何寫的問題表示過意見。陳伯達的部分初稿受到批判後，葉羣匆忙召集給林彪"拉條子"的人開會，才緊急研究林彪發言的"條子"應按什麼調子來寫。陳伯達在寫完全稿以後，儘管他的稿子已遭否定，他仍托葉羣轉話，希望林彪能看一看。但林彪可能出於對理論文章無甚興趣，始終沒有去看陳的稿子，後來，他也沒有去看張、姚的稿子。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林彪事件發生兩年以後，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説"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實際上是一種不顧實情的連罪做法，因為陳伯達的稿子原本是為林彪在九大作報告準備的，現在既然林彪倒了，就索性把兩個人栓在一起進行批判，這不過是延續歷次政治運動的習慣做法。當然，或許林彪在心理上傾向於陳伯達的觀點，但這只是一種推測，是一種想當然，並沒有真實的根據。

14. 批判相對論事件

這是一件筆者原本不願提及，而現在又不得不提及的公案。

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報紙上出現了一條消息，説什麼文革中陳伯達曾提出要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制止了。這是一條嚴重歪曲了事實的消息，它有意誤導讀者。

先就陳伯達和周培源的關係説幾句。

很多人都知道，陳伯達和周培源的關係原本不錯。周培源曾當眾稱道與陳伯達的談話很有獲益。文革中，陳伯達曾提議周培源擔任北京

大學校長，但遭到北大羣眾組織頭目聶元梓的反對。

1967年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陳伯達遇見聶元梓。周恩來想緩和陳，聶之間的僵局，隨口說了句："我建議陳伯達當北京大學的校長。"聶元梓將周恩來的話傳回北大，於是大街上貼出了許多大標語："擁護陳伯達同志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這件事至今許多人還會有印象。

1968年1月我回家時，曾問及事情的經過。陳伯達說："聶元梓這點很不好，她自己想當北京大學的校長。她又沒有學問，哪有這個資格？我對她說，北京大學的校長不能讓沒有學問的人當，周培源可以當，因為他有學問。在天安門上，周總理開了句玩笑，說：'我建議陳伯達當你們的校長'。我說：'我不能當，我沒有學問。周培源可以當，周培源有學問。'聶元梓為了反對周培源當校長，就鑽空子，把周總理的玩笑話寫成標語到處貼。"

周總理在天安門上說的雖是句玩笑話，但是它也婉轉地表明周本人也不贊同周培源當校長。陳伯達能打破黨派成見，提出周培源當校長的建議，在當時是不容易的，卻終因缺乏其他人的贊同而無法實現。

筆者知陳伯達與周培源關係不錯，故對文革後報紙上所說的陳提出批判相對論，遇到周的反對等說法甚感詫異。1981年秋，筆者調回北京照顧保外就醫的父親，曾專就此事做了詢問。

在聽完我的詢問後，陳伯達嚴肅說道：

"這個事情，報紙上是亂說一氣。當時，是毛主席給我寫了張條子，說請考慮一下，可不可以批判相對論。這個問題我是外行，我自己是不會提出這種問題來的。因為有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向一些科學家請教。有的說可以，有的沒有表示意見。周培源說，有的地方可以批，有的地方不好說。過了一段時間，我考慮這件事我們畢竟不懂，還是不要

搞了，就吩咐科學院的人，文章不要發表，這件事不要再進行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是我決定不要再進行這件事了。可是後來報紙上卻說成是我要批判相對論，周培源如何堅決反對。怎麼能這樣說呢？我很生氣，就在監獄裏跟看守嚷了起來。我本來受優待，一個人住在一個三層樓上，自從我為這件事發了脾氣以後，就把我弄下了樓，關到普通單人牢房裏去了。這件事實在令人生氣。"

陳伯達說完，我問道："毛主席寫的那張條子保存下來沒有？"

陳伯達答："這類條子一般不會保存。"

我說道：

"即使條子沒有保存下來，事情基本上也是能說清楚的。你在台上的時候，報刊上並沒有發表過批判相對論的文章，你倒了將近五年以後，上海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雜誌》1975年第2期卻刊登了《相對論批判》一文。該刊的目錄上還是用黑體字印的標題。上海在1975年刊登出《相對論批判》，已證明這件事並不是出自你的意見，而是另有原因，可是現在寫文章的人卻對上海發表《相對論批判》的事隻字不提，這是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

1975年，國內仍處於批林批孔運動中，批判陳伯達的所謂先驗論正是這一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張春橋、姚文元控制下的上海《自然辯證法雜誌》刊登了八位作者聯合署名的《相對論批判》一文。可以說，此事恰是證明批判相對論一事絕非陳伯達所指使的鐵證。當時的上海，在理論宣傳方面被樹為全國的樣板，因此，這篇文章的發表在中國的思想理論界十分引人注意。很奇怪的是，這樣一篇公開發表的有特殊內容的文章，在文革結束後卻被故意忘記了。

筆者手中恰好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雜誌》1975年第2期（總第8期），這是我1975年秋在石家莊市買到的。那

時，國內的出版物極少，每種新的出版物都容易引起讀者注意。

《自然辯證法雜誌》為32開本，1975年第2期於當年7月出版。在目錄中，《相對論批判》的標題以黑體字印出，標明是重點文章。該文的作者為羅嘉昌、季梁、徐湛、沈乃澄、張達華、邵濟羣、朱清時、李雲，共八人。寫作陣容可謂強大，足見該文來歷非同尋常。當時，一般的研究者決不可能組織起這麼多人共同寫作一篇文章。

當代的輿論權威是怎麼敍述批判相對論這件事的呢？

2002年8月28日《科技日報》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章道義的文章《周培源：中國科教界一顆明亮的星》。該文中有一段文字頗有代表性，現摘錄如下：

"周培源是一位坦誠、正直的科學家，一貫主張科學家說真話。認為人云亦云的人，有失科學家的本性。尤其當上級領導不懂這門科學時，就更要說真話。否則，豈不是要把領導引入歧途。他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因此，在十年動亂中，當陳伯達提出要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逼他表態時，他當着陳伯達的面說：'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已被事實證明，批不倒。廣義相對論在學術上有爭議，可以討論。'陳伯達根本不懂相對論，堅持要批判。在陳伯達的鼓動下，一些年輕同志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批判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要在《紅旗》雜誌上以顯著地位刊出；另一篇是批判相對論理論本身的，要在《中國科學》上以第一篇的位置刊出。當時主持科學院工作的劉西堯同志，為慎重起見，請了許多知名學者進行'討論'。會上發表了各種不同意見，有支持的，有主張慎重的，有避不表態的，也有少數青年人表示反對的。輪到周老發言時，他介紹了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的歷史，以及他和愛因斯坦的交往過程，而對這兩篇文章卻隻字未提。中午休息時，他得知這兩篇文章要拿到《紅旗》雜誌發表，即鄭重其事地對

劉西堯說：'這兩篇文章可不能拿去發表！這要鬧出大笑話的！'劉西堯深知周老這話的分量，當即對幾位執筆者說：'看來你們的文章還不成熟。'於是，這場很可能在國際上被視為笑柄的鬧劇，隨着陳伯達的很快垮台也就煙消雲散了。"

這篇文章寫得很奇怪。

是"陳伯達提出要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嗎？是"陳伯達根本不懂相對論，堅持要批判"嗎？是"隨着陳伯達的很快垮台也就煙消雲散"了嗎？

該文作者無視最起碼的事實：陳伯達未倒台前，中國國內沒有發表任何批判相對論的文章；陳伯達倒台近五年後，中國的上海赫然發表了《相對論批判》。為什麼作者對此視而不見、閉口不談呢？

十年前，許良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周老與愛因斯坦》一文稱，周培源對陳伯達說："廣義相對論可以討論，狹義相對論搞不動。"（見1993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第十一版）如今在章道義的文章裏，"搞不動"又變成了"批不倒"。

章道義的文章把陳伯達奉毛澤東的指示向科學家請教，稱為"逼他表態"，陳伯達有什麼資格逼周培源這樣的大科學家表態呢？既然是"當上級領導不懂這門科學時，就更要說真話。否則，豈不是要把領導引入歧途"，那麼，為什麼當主持科學院工作的劉西堯請了許多知名學者討論兩篇批判文章時，"會上發表了各種不同意見，有支持的，有主張慎重的，有避不表態的，也有少數青年人表示反對的。輪到周老發言時，他介紹了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的歷史，以及他和愛因斯坦的交往過程，而對這兩篇文章卻隻字未提"呢？

難道陳伯達有這樣大的權威，使許多知名學者在對文章表態時都踟躕不前，連周老都面有難色，對這兩篇文章不敢直接說"不"，只好

以"隻字未提"來應付麼？

況且劉西堯是周恩來總理派到科學院的聯絡員，陳伯達沒有權力支派他做這做那。組織眾多知名學者對一兩篇文章進行討論，是極其罕見的事，絕非陳伯達個人的能力所能做到。

不錯，文章提到"也有少數青年人表示反對的"。注意，文章用的是"少數"，足見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反對的人都是少數，多數人是不反對的。

可是為什麼知名的老科學家們在表態時都犯難，不敢當面表示反對，有的還明確表示支持，只有"少數青年人"敢於表示反對呢？難道老科學家們不如青年人知識淵博？不如"少數青年人"理解相對論？

道理很簡單。當時，只有高級別的人士知悉此事有毛澤東的背景，一些內情沒有擴散到青年人中。

總之，該文留下了諸多破綻。

從歷史上的思想觀點來分析，陳伯達也不可能提出批判相對論這樣的問題。陳伯達不是自然科學家，對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所知有限，但他仍是中國較早評介相對論的人物之一。1935年8月27日，陳伯達以他常用的筆名周金在北平《晨報》發表的《論近人講惠施及其他辯者（二）》中，在分析古代哲學家惠施的辯證思想時，論及現代哲學界對空間時間問題的一些爭論。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們知道，自從愛因斯坦發表了相對論之後，哲學上許多唯心論的區別，是曾經如何地企圖來解愛氏的相對論，企圖借此來否定空間時間的客觀存在，否定這空間時間的兩個客觀區別的範疇。事實上，愛氏相對論否定了絕對的空間和絕對的時間，填平了空間和時間不可過度的鴻溝，可並不否認了空間時間的客觀存在。空間與時間的區別是相對的，但這種相對的區別，是在客觀存在（'實有'），而非主觀的'錯

覺'，卻又是絕對的。這是相對論真諦。"

這篇文章收入了為深入批判陳伯達而由張春橋、姚文元主管的中央宣傳部門於1974年編輯的《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陳伯達言論集》第四集中。這篇文章說明陳伯達在歷史上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持肯定的態度。

15. 九屆二中全會之謎

中共中央於1970年8月末至9月初召開了第三次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這一次會議，被中共黨史學家稱為"雲遮霧罩的廬山會議"。會上圍繞憲法草案是否設置國家主席的問題和所謂天才問題發生了爭論，結果導致了陳伯達倒台和毛澤東與林彪關係破裂等一系列巨大的政治變故。在1971年9月發生林彪墜機事件之後，這次會議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文件稱為"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變"。究竟在會議上發生了什麼情況？這是一個令許多中共黨史的研究者都感到茫然的問題。

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是關於這次會議的許多細節，人們仍然知之甚微，要想對這次會議進行客觀的評論，仍然存在許多難點，以至連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迴避對這次會議做文字上的論斷。重要的原因即在於，一些基本的事實曾被掩蓋，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有所披露。

陳伯達作為這次會議的一個關鍵人物，他的回憶有助於人們瞭解事情的真相。現將陳伯達的幾次談話綜合記述如下：

"憲法草案是康生主持的，起草班子中的主要角色是張春橋。毛主席回北京時，曾在會議上提出要我參加憲草。因此，我參加了8月份在懷仁堂開的討論憲草的會。這是我參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修改憲

草的會議。

“開始討論《序言》，我記得是：原稿幾乎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而僅談文化革命。會議對此做了一些改動。原稿沒有提毛澤東思想，這次會議也添上了。在討論期間，我到衛生間，聽到吳法憲的聲音很大，可以說是聲震屋瓦吧。我回到會議上時，已歸於平靜。會議散後，我問吳法憲出了什麼事，吳法憲說張春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他就和張春橋吵起來了。我當時是同情吳法憲的。

“討論國家主席的問題時，我說過贊成設，希望毛主席能當主席。這是當時多數人的願望。毛主席後來否定了這個意見。會後，我還對憲法草案加過幾點條文，交給周總理。康生對此也很不高興，因為我是交給周總理，而不是交給他。

“到廬山下飛機時，我告訴吳法憲，這次憲草修改後，主席如批發，就很好，不要再提什麼意見了。記得，後來吳、邱、李幾個人到過我那住處一次，我又再重複這個話。

“葉羣到我那裏只一次，她說的話我現在已記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說過，毛主席還在，林彪如當國家主席，也不好。我當時聽了以後說：沒有林彪要當國家主席這個問題吧？我倒了以後，有人以為我是擁護林彪當國家主席的，其實，我從來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

“有一回，周總理來電話說，他還未見到毛主席，不過，有些人主張還要國家主席，你可否準備一個條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見，備而不用。我把第一個憲法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照抄了一下，沒有拿給別人看過。在毛主席那裏開會時，談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我表示贊成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毛主席說明了他不願意擔任的道理，我就沒有再提建議了。因毛主席還是不贊成設國家主席，我回來就把那個條文抄樣扯

掉了。周總理給我打電話的事，我也從沒有跟別人說過。會上批我批得那樣厲害，一說，事情就會牽連到周總理。有許多事，我都自己一個人吞下了。

"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他人，在另一個房間等待，等的時間不短。他們談完出來後，大會開了。原定的議程是康生報告憲法草案的問題，並沒有林彪講話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搶先講話，記得是講關於憲草裏寫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和關於天才的問題。林彪講話似乎有一個擬稿，但語言無序。

"林彪講完後，康生便要我先講。我沒有講。康生就夾七夾八地講了，還引用了林彪當時的一些話。

"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談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極，竟相信了。這件事，我本應直接去問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求見毛主席很困難，每次求見時，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總是說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主動求見毛主席了。

"從林彪那裏出來後，我又到林彪下面'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住處，議論江青一陣。他們問我可否找一些馬恩列斯關於天才的語錄，我答應給找。此事我做的很鹵莽，因為上山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就這個問題發表什麼意見。回到住處，就在帶去的幾本書中找關於天才的語錄，找到一條，便給打一次電話。

"因林彪的講話很亂，我給葉羣打電話，要她把林彪講話記錄拿給我整理，當然是想給林彪抹粉，我沒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關係已出現了裂痕。

"聽林彪講話的錄音，不知是誰佈置的，聽錄音時，我的坐位和汪

東興靠近。我把已經找出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天才的語錄匯在一起交給汪東興，記得對他說過，可以考慮列印一下。

"我去參加華北小組的討論，對林彪的講話表示了擁護。小組把我說的，也有別人說的，作成了簡報，對所指的人沒有明言。實際上，我和汪東興的發言是針對張春橋的。簡報中措辭最尖鋭的話，如'把人揪出來'等話，並不是我說的，而是汪東興說的。這個簡報在發出之前，我沒有看過，更沒有修改過，但追源禍始，我是有責任的。

"在華北小組的簡報發出後，江青、張春橋到毛主席那裏告了狀。毛主席召集會表示盛怒。江青、張春橋見了'華北組簡報'，開始有些恐慌，因為他們慣於'揪人'，現在卻有人也想把他們'揪出來'。我估計，誰提出'揪出來'，他們是會知道的。郭玉峯參加華北組，他經常去康生、曹軼歐那裏，康生、曹軼歐又經常同江青、張春橋在一起。

"在毛主席那裏開會時，江青、張春橋都未到，因為他們先向毛主席告狀，殆已獲得勝利，他們可不必出席，而李雪峯和我雖然出席卻是處在被告的地位。提出'揪出來'的汪東興，也沒事，他出沒出席，已記不清了。在事情發展的過程中，我去見過恩來同志。記得他說：'江青、張春橋是先到我這裏要談話的，還沒有見面，他們卻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裏去了。'

"在這次嚴重的會議之後，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兒，毛主席那裏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這是最後得見毛主席。見面握手以後，他責備我許久不找他談話，說：'這幾年你官做大了，不來見我了，也不寫文章了。'其實，我一直想見他，卻總見不到。這個時候也無法解釋。他批評我參加'軍事俱樂部'。我說，我願做自我檢討。毛主席說，這樣很好，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這個寬大的盛意，但一下子，說不了很多話。

“毛主席還問了我幾個人的情況，問葉飛在哪裏，吳冷西在哪裏，還問到胡繩。毛主席想不起胡繩的名字，說：‘那個《紅旗》的副總編輯……’，我說：‘是指胡繩吧？’毛主席點頭說是。我告訴毛主席，我只知道胡繩在《紅旗》的五七幹校，葉飛和吳冷西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裏。告別時，毛主席同我親切地握手，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從毛主席那裏回到住處後，我打電話給韓先楚，問葉飛在哪裏？韓先楚說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周總理安置起來的。我又打電話給北京人民日報的軍代表，問吳冷西在哪裏？他們說是在五七幹校。我把問到的情況電話告訴毛主席的秘書。我感覺，毛主席在考慮一些人事安排。

“離開毛主席時，毛主席說：‘你可以找那幾個和你共過事的人談談。’還有，他問過我：‘李訥現在在哪裏？’於是，我去找江青。到廬山後，這是第一次到她那裏，她故意嘲笑地說：‘稀客，稀客。’接着，她說：‘我們到康生那裏去。’我只好隨她走，一到，看見張春橋、姚文元都早在那裏了。江青劈劈啪啪罵起來：‘你們名義上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張春橋說，‘你為什麼不見毛主席？你藉口徐業夫同志的電話不好聯繫，有什麼不好聯繫呢？’姚文元罵我，為啟蒙運動事，讓他坐等了好久……總之，一個接一個，各有各的罵法。

“回到我的住處，我又打電話找‘軍委辦事組’那幾個人，我給他們說，我見了毛主席，他讓我找些人談談，所以找他們來。江青他們那些話，我當時簡單記下幾句，也給他們看了。

“有一次，葉羣來電話，要我到林彪那裏做檢討。我在電話上說，我請求下放到下面去。參加林彪召集這個會的，除了‘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外，還有汪東興。林彪和汪東興問了我一些解放初陪毛主席訪問莫斯科時的事，問我看芭蕾舞劇《紅罌粟》的經過，問我搬到駐蘇大使

館去住的經過等等，問得很是奇怪。好像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忽然變成了可以證明我有罪的大事。

"隨後，由周總理、康生幫助我做檢討。康生提的意見特多，我都記錄下來。不管康生自己的存意怎樣，我當時接受了，便算是我的。但檢討提到陳毅同志(陳毅在華北組的發言內容同陳伯達相似，被中央指責為'二陳合流'。——筆者注)，這的確完全不是我的意思。當時我勉強記下來，我認為那些話是應該删去的。

"在我做檢討的會上，非常感謝周恩來同志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寫就的稿子。會畢，就在會場上，我高興地去感謝恩來同志。康生也在那裏，恩來同志說，你感謝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地說：'不要怕醜'。

"檢討會的第二天，我覺得事情完了，回家務農好了。一想，心為之一寬。可能是恩來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護士來看我。我要出去往廬山上一遊，請他們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塊走，遇到風景好處，同大家照了幾張相片。照相後，又繼續遊山玩水。這一天是到廬山後最高興的一天。

"但是，風聲所播，就興盡悲來了。流傳的話就是：'陳伯達並沒有沉痛，還去遊山玩水哩。'於是，會又開了。這時我已不能參加任何大會小會，但簡報還看得見。有些關於我的事，是從簡報上看到的。

"後來聽說，在一個會上，有人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來同志解釋說：'是在一些大的問題上沒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還舉例說，在反對蔣介石的時候就配合了。在那樣條件下，周恩來同志還能維護我，使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

"關於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當時鄭維山同志說，這是毛主席的第二張大字報。我對文章中的有些話不大理解，但我在會上向黨表

示，接受毛主席的批評，願意重新學習，更新自己。會上各小組同志的嚴峻批評，對我教育很大。我平常很少做記錄，但就我所在的華北組，我曾努力把同志們的批評記下來。現在我還多少記得一些非常中肯的批評，例如，批評我沒有什麼實踐，腦子裏儘是'封、資、修'，等等。我幼年讀私塾，熟背書經、詩經、左傳、四書，三十年代發表了討論古史的文章，又在大學教授古代哲學，腦子裏的確儘是古東西。在延安時，毛主席把我從古代拉回到現代，鼓勵我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我很感謝他。但我有時還是積習難改，解放後工作忙，空閒時仍常去琉璃廠買古書、碑帖。文革初，有羣眾來信反映文物四散，我很焦慮，建議成立文物清理小組，由公家書店把東西收集起來，避免文物散失毀掉，後來東西堆得多，我也去買了些。平時我還花錢修補過不少古書。作為黨的理論工作者，這樣嗜古的確不好，同志們的批評給我觸動很大，人生有限，還是應把精力放在學習研究馬列著作上。"

除了陳伯達自己談的上述情況外，筆者還特別問到一個十分重要的敏感問題：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不明白。既然毛主席說，他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那你們為什麼還要提出設國家主席呢？"

陳伯達側身坐在沙發上，聽了問話後皺起了眉頭，使勁向我擺了擺手：

"不要說了！"

我很納悶，不禁又問：

"怎麼了？究竟是怎麼回事？"

陳伯達長出了一口氣，說道：

"哪裏有這回事？什麼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說過，中國農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

我甚感意外，又接着問：

“毛主席還用了這些話：‘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是不是會議開得很亂？”

陳伯達回答：

“毛主席想像力強，喜歡用這些驚人之語。第一次廬山會議他批彭德懷時也說過這類話，說彭德懷‘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我沒有這種感覺。會議沒有什麼特別不正常的，開會麼，有不同的意見有什麼關係？要說不正常，就是汪東興說‘把人揪出來’這句話，說得不是時候。可是汪東興又沒事。”

陳伯達的這些話說到了問題的關鍵：陳伯達不知道毛澤東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會上發言最激烈的是汪東興，可是挨批判被打倒的是陳伯達，汪東興卻沒事。

王安石讀史詩雲：“當時黮闇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

歷史從一開始就被蒙上了層層面紗，連官方的正式文件都打了馬虎眼，更不用說街談巷語小說家言的失真了。

起初，筆者以為，可能僅僅是陳伯達個人不知道毛澤東對國家主席問題的指示，因為既然毛澤東說他早已認為陳伯達是個可疑份子，並和一些同志打過招呼，那麼，按照“疑人勿用”的古訓，他很可能已將陳伯達這個“疑人”置於閉目塞聽的境地，造成別人都知道的事而陳伯達卻不知道的局面。但是，在筆者認真閱讀了《周恩來年譜》等書後，發現事情的經過並非這樣簡單。

茲摘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1970年部分的幾段文字。

第380頁記載：

“7月17日-22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在十七日會議上，宣佈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成

立，由毛澤東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委員會成員共五十七人。十八日，在會議東北、西南組小組會上發言，提出修改憲法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即：（一）宣傳毛主席對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二）明確國家的性質，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三）突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黨是我國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國武裝部隊的統帥，林副主席是副統帥，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四）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五）要總結歷史經驗。十八、十九日，根據會議討論情況，起草並多次修改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和通過四屆人大代表問題的通知稿。"

第385頁記載：

"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憲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問題。會上，張春橋和吳法憲就憲法草案稿中有關提法發生爭執。張以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諷刺'為據，提議刪去草案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等語。吳對此反駁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會後，吳法憲到陳伯達處詳細談了爭吵情況，並通過黃永勝報告了林彪。之後，吳也向周恩來報告了此事。

"8月1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憲法修改草案定稿事。會前，葉群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要他們準備'天才'問題的語錄，在會上和張春橋等人'鬥爭'。但在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等人未再堅持刪改意見，憲法草案稿獲得通過。"

第386至387頁記載：

"8月22日到毛澤東處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九屆二中全會

的會期、議程、分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也附和。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毛澤東還強調，要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分裂的、失敗的會。"

第387頁還記載了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當天的情況：

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宣佈全會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討論戰備問題。隨後，林彪作長篇發言，提出：這次憲法草案"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非常好，非常好！"這是整個憲法草案三十條中"最重要的一條"、"最根本的經驗"。"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志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發言後，康生表示對林彪的發言"完全同意，完全擁護"。並提出，在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當（國

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

這幾段官方史書的記載說明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一、根據周恩來7月18日在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東北、西南組小組會上的發言，毛澤東關於國家主席問題的指示，原話應即是："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 由此可知，毛澤東在全會召開前的指示，雖有傾向性，但仍蘊涵着靈活性。他提出"可以考慮不設"，沒有說已經確定不設國家主席。因此，在全會議定此事前，這應是一個尚在考慮、允許討論的問題。這也正是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四個常委和汪東興等中央委員都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的一個前提條件。就算陳伯達膽大妄為，想推翻毛主席，難道周恩來、康生、汪東興也都一起膽大妄為想推翻毛主席不成？從廬山會議前中共中央安排董必武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一事，也可看出中共中央領導層對今後設不設國家主席舉棋不定。

二、陳伯達不是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7月17日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時，他還在華北調查解決生產建設方面的問題。7月22日會議閉會時，他剛於21日從內蒙古包頭返回北京，正在家中休息。二十多天後，雖然毛澤東讓他參加了最後一次修改憲法的會議，但他畢竟被排除在起草班子之外，毛澤東的一些指示他的確可能無緣知悉。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9年發生毛澤東拒絕審閱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這種反常情況之後，陳伯達又一次被排除在四屆人大準備工作的領導班子之外。根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353頁記載，1970年3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一）成立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工作；（二）成立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

的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工作；(三)由周恩來、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稿。從這三個工作班子的組成看，張春橋身兼兩個班子的成員，謝富治已身患重病，仍榜上有名，而陳伯達作為第一部憲法的主要起草人和中央起草重要文件常倚重的人物，卻被排除在三個班子之外。這實際上已是一種預示。

明乎此，則1970年7月陳伯達的華北之行亦可從另一視角得解。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要在北京開會，作為理論工作者的陳伯達卻被閒置一旁，不免會使中央和陳伯達都感到尷尬，與其讓陳幹呆在北京，不如藉故讓他到外地走走，免得他礙手礙眼。

三、8月13日的會議上，張春橋確曾提議刪去憲法草案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的句子。後來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發言說，憲法草案加上"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是經過鬥爭的，並非憑空杜撰。張春橋提議刪去草案中"毛澤東思想"的句子，事甚蹊蹺，除了他有十足的把握，深知無論怎樣毛澤東都會保他外，不能排除他有故意挑起爭端之意。

四、《周恩來年譜》記載得很清楚，直到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夕的8月22日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除毛澤東自己外，四位常委仍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直到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幕，康生仍在大會上明言在國家主席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請注意，康生說的是"如果主席不當(國家)主席"，該如何如何，他直到會議已經正式開幕了，仍還不能肯定毛主席一定不當（國家）主席。

所以，事實很清楚，在中央常委中，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的絕不僅是林彪、陳伯達兩個人，而是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四個人。陳

伯達倒台後，毛澤東在巡視南方的講話中說："五個常委，瞞着三個"。就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而言，這句話是違背實情的。

有人會問，1971年12月傳達的中央專案組整理的文件《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中說，1970年4月11日夜，林彪讓秘書于運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掛電話，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這件事又該怎麼解釋呢？

筆者以為，毛澤東可能確有此批示，但是這個批示對已被定為可疑份子的陳伯達是封鎖的，不僅陳伯達與筆者談話時表示他完全不知此事，而且由於毛澤東的批示顯露了他與林彪之間有隙，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極端機密的事，有可能連周恩來、康生都不甚了了。惟有毛澤東最信得過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可能知道此批示，林彪作為事情的當事人也應該知道，但目前都還缺乏確切的證據。另外，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最早見於林彪墜機三個月後的1971年12月的中共中央文件，1998年收錄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94頁時，編者注明批示是根據1971年的文件刊印的。對於這樣極為重要的批示，似應注明有無手稿。

汪東興在全會上所起的作用是最令人難以理解的，很值得研究。按道理，他是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人物，沒有人比他更瞭解毛澤東的意圖，可是他在華北組的發言中卻毫不猶豫、毫無疑慮地表示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現摘錄兩位知情人對汪東興當時情況的記述，以供關注這段歷史的人們研究。

曾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鄔吉成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紅色警衛》一書第172頁中這樣說道：

"汪東興隨之表態擁護林彪的講話，還說：'中央辦公廳機關和八三四

一部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復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八三四一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

早在第三次廬山會議的準備時期，毛主席就多次談到，不主張設立國家主席，自己也不當這個主席。有些相關的談話，還是讓汪東興向其他中央負責同志傳達的。因此毛主席對是否設立國家主席的態度，汪東興應該是很清楚的。"

曾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和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吳德，與汪東興關係極好，兩人同屬於堅持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的人，他的回憶處處維護汪，但仍有參考價值。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的《共和國要事口述史》載有吳德談《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在該書第111至112頁裏，吳德談道：

"8月24日下午的華北組討論會，陳伯達迫不及待首先發言，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經過很多鬥爭的。他講了一通'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並閃爍其詞地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並且說有人聽說毛主席不做國家主席了，就高興得手舞足蹈了。這個講話很有煽動性。

汪東興跟着講了話，主要的意思是設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他也許講了有人反對毛主席的問題。

當時，陳伯達講話，大家還有疑惑，江東興一講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別人更多的是相信他的講話。

散會後，吳忠告訴我發言的情況，他說陳伯達、汪東興講了話，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

我急忙問，是誰反對毛主席。

吳忠說，他們沒有點名，不知道是誰。

這時，大家已經議論紛紛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會場碰到了汪東興，我問汪東興：有人反對毛主席，是什麼人。

汪東興說：'有人。槍桿子、筆桿子。'

我問李雪峰，李雪峰說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這是指什麼人了。"

在該書第115至116頁裏，吳德繼續說道：

"這時聽到他們說反對毛主席的是張春橋，也是針着江青、康生等人的。停止小組會後，政治局作了一個決定，要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檢討，還決定收回6號簡報。

開檢討會時，周總理、康生主持，各大組組長參加了。我不是組長，但周總理通知讓我聽他們檢討。陳伯達是第一個檢討的，吳法憲、李作鵬等也檢討了。陳伯達等人的檢討很不像樣子。

汪東興找李雪峰和我談過一次，他說是毛主席讓他找華北組的幾個組長談一談的，他犯了錯誤，毛主席講過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個意見還是他傳達的，但在這次會上，他又提出了與毛主席相反的意見。汪東興還在華北組檢討過一次。

汪東興講話的內容與陳伯達講話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聽了陳的講話說有人反對毛主席，一時憤激的發言，是被人利用了。後來調查，也沒有發現他參與林彪集團的活動。

毛主席對汪東興一直是保護的。汪東興回北京後在機關檢討了幾次後就不再檢討了。

8月31日，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批判了陳伯達。這以後，憲法問題不討論了，計畫問題也不討論了，大家都轉到學習毛主席的

《我的一點意見》。"

鄔吉成的書引用了汪東興在會議上發言的原話。吳德則按照當年中共中央文件的調子，替汪東興百般解釋，說汪的發言是受了陳伯達的煽動云云，但他也承認汪東興起的作用很特殊："陳伯達講話，大家還有疑惑，汪東興一講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別人更多的是相信他的講話。"

事實上，陳伯達是沒有能力煽動汪東興的，汪早知道毛澤東本人的意見，而陳直到8月22日才明白毛澤東本人確實不願當國家主席，此後他沒有再提這類建議。至於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74頁在摘引時有個註腳，注文是："陳伯達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汪東興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70年8月24日"。這個註腳說明，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在汪東興發言時的插話，可見汪的發言並非晚於陳的發言。另據一位廬山會議的知情者告訴筆者："在華北組，發言的主要是汪東興，陳伯達的發言很少。"所以，說汪東興是受了陳伯達挑動才發言，是說不通的。他們之間究竟誰挑動了誰，還是個問題。

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以及華北組的第6號簡報，從來沒有真正公佈過。過去的文件以及現在寫歷史書的人引用這些材料，都僅只摘取了隻言片語，文字上還常有出入。既然是值得大批特批的反革命政變材料，為什麼就不敢全文公佈，也省得讓人懷疑是斷章取義呢？

在華北組，汪東興的發言才是真正起煽動作用的。汪東興明言要求設立國家主席，明言要求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這些都是陳伯達的發言中所沒有的。連汪東興自己也承認，華北組的簡報主要是刊登了他的發言。汪東興在1970年9月15日的檢查中煞有介事地說：

"我建議中央派人追查陳伯達，事先是否看過修改過這期簡報，這期簡

報發出最早最快，而且簡報內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陰謀，有鬼。"

毫無疑問，中央按照汪東興的要求做了追查，這種追查也很容易進行，簡報從整理到發出的每一過程都有人證，是否修改過也有筆跡可查對。可追查的結果如何呢？再也沒有下文了。因為陳伯達既沒有看過，更沒有修改過這期簡報。

陳伯達充其量不過是在發言中不點名地反對了張春橋，這就是所謂的"陰謀"！他反對張春橋，是在會上講出來的，並沒有背着人，按照毛澤東的語言，這是"陽謀"，而不是"陰謀"。這就犯下了所謂"反黨"的不赦之罪了。在事實已經證明張春橋不是好人的今天，陳伯達仍然背着"反黨"這口大黑鍋。1997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汪東興著《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繼續堅持文革中"批陳整風"運動的調子，口口聲聲說什麼陳伯達有陰謀，他汪東興是上當者，而且作者為了達到讓人相信的目的，不惜任意剪裁史料，歪曲篡改基本史實。

何蜀、王年一在《我們對汪東興這本書有不同看法》一文中這樣評論汪東興的書：

"作者在所記敘的事件中是重要的當事人。在該書中，作者用了三頁多的篇幅記敘九屆二中全會大會開幕之前於1970年8月2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者列席了這個會議並擔任記錄。該書詳細記敘了誰先發言，誰後發言，甚至連毛澤東'看了康生一眼'這樣的細節都寫得清清楚楚，但是隻字未提有關'設國家主席'的討論。

然而，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年下卷)中第386—387頁裏，卻有這樣的記載：

'8月22日到毛澤東處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設國家主席

的問題，計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

'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是被毛澤東定為'反革命綱領'的。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作者卻迴避了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澤東以外全都贊同設國家主席的發言。這能說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嗎？像這樣有意識地對歷史事實加以剪裁從而誤導讀者的地方，書中還有不少，本文不再一一列舉。

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在汪東興'如實寫出來'的敘述中迴避重大的歷史事實，並將毛澤東對中共黨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過的錯誤評價不加任何說明而當作偉大領袖的英明大量引用，這樣作，又怎麼談得上'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呢？也更說不上是對研究歷史的'總結、提高、發展'了。”

何蜀、王年一的評論是十分確當的。

在廬山會議上，多數人贊成設立國家主席，原因出於幾個方面。一是因為在情理上，按照歷史慣例和國際慣例，一個國家應有一個首腦，猶如一個工廠不能只有黨委書記而沒有廠長。二是因為毛澤東本人的意願表達得不很清楚，他只是說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他不當國家主席，沒有明確說不再考慮設國家主席。他還說過：“中國農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此話雖因陳永貴名望低而顯得不太嚴肅，但卻發出了國家主席的人選可以斟酌的資訊，誤導了與會者。另外，林彪的想法和態度，汪東興代表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建議由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這些情況也都對會議發生了重要影響。

還應當看到，撇開人為的因素，多數人贊成設立國家主席，實際上還反映了人們這樣一種普遍心理：希望及早恢復國家正常的、規範的政治體制和行政秩序。

正因為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所以才會出現多數人贊成設立的現象。換句話說，此一現象的出現並不依賴於是否有人煽動。實際上，大多數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的人都是自發地提出他們的主張的。如果允許人們自由表達意見，那麼，反對設立國家主席的人一定是少數。無視這一點，就不可能對廬山會議作出客觀解釋。

會議如若表決，設立國家主席的議案勢必會獲得通過，這是毛澤東不能接受的。他決意以打倒陳伯達來殺一儆百，迅速扭轉會議方向。由於陳伯達在發言中並未堅持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即以天才問題為突破口，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然後迂回論及國家主席問題，阻止任何人再議此事。

毛澤東打倒陳伯達並非出於偶然，據《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 392 頁記載：1970 年 9 月 3 日周恩來參加九屆二中全會東北、華北和華東組討論，他在發言中"提及《我的一點意見》時說，這是毛主席考慮了三天後才寫出來的；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他的問題遲早要暴露的。"已透露出倒陳原在中央預案中，何時倒陳只是個時機問題。所謂"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主要是指陳伯達在路線問題上長期不合作。毛澤東等人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陳伯達則主張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長期堅持"唯生產力論"。這種在路線問題上的不合作遲早要對雙方的關係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至於作為倒陳口實的所謂天才問題，原本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主要是在陳伯達與張春橋之間進行的。從尋常角度說，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有如一般咬文嚼字的文人間常見的抬杠，不

值得最高領袖親自裁決，但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等人也對天才問題發了言，使毛澤東覺得拿天才問題巧做文章，可以一石二鳥。筆者將在下一節對有關天才問題的爭論做些評析。

附帶說一句，廬山會議上還有一個至今未解之謎，即遭批判的華北組簡報並不是最先報送的，卻不知何故最先被印發，致使該簡報犯了"搶先發出"罪，成了挨打的"出頭鳥"。此事甚蹊蹺。據說主管簡報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接到過一個電話，要求先印發華北組簡報。這個電話是什麼人打的，長期查不清，後因王良恩於1973年1月26日不幸自殺而成疑案。現在可以肯定的只是，打電話人不在倒台人之列。

16.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淺析

毛澤東於8月31日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之後，廬山會議的原有議程被擱置一邊，全體與會者集中學習這篇被稱為毛澤東的"第二張大字報"的極富特色的文章，口誅筆伐所謂的"天才論"。1971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定為"反革命綱領"，其後，批判"天才論"的文章連篇累牘地充斥於全國的大小報刊。

天才問題值不值得這樣大做文章，一些外國觀察家是有疑問的。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封毛澤東為'天才'的建議多少是一件十分莫名其妙的事情。"另一位美國人威廉·A·約瑟夫說："陳伯達玩世不恭地策動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實際上，連陳伯達自己都對事情被上綱到如此高度驚愕不已，他引用恩格斯和列寧稱"天才"的語錄，起初也確有玩世不恭的因素。一年前起草九大報告時，他與張春橋、姚文元激烈辯論黨的主要任務究竟應該是發展生產還是沒完沒了地搞運動，在這樣關係國計民生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央和毛澤東對他的強調發展生產的稿子不屑一顧，反而採納了張、姚"運動就是一切"的稿

子。這是毛澤東決計拋棄他的明顯徵兆。他憂國而遭申斥，誠篤而受懷疑，於是乃效箕子佯狂故事，以玩世不恭態度敷衍諸事，現在聽說張春橋否定毛主席是天才，就不由得想跟張頂一頂牛，譏誚一番，煞一煞張的氣焰，於是答應幫助吳法憲等查找有關天才問題的語錄。

張春橋此人，如郭沫若所言，是四人幫的狗頭軍師，他讒諂蔽明，邪曲害公，又詭計多端，處處拿毛澤東當擋箭牌，別人向他投槍，須投鼠忌器。陳伯達揀了"天才"這個小題目來與他爭辯，實在也是一種無奈。

陳伯達和吳法憲等要和張春橋辯論的問題是：世界上有沒有天才？毛澤東可不可以被稱為天才？他們並沒有要求非在文件裏寫上毛澤東是天才。可是毛澤東卻抓住了這個題目，上綱上線，做足了文章。事情被小題大做了，既然已被大做，人們也就不得不當作大問題來探討。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全文如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

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毛澤東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錄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114至115頁)

毛澤東這篇短短七百字的文章，是毛澤東生命最後十來年中親筆所寫的最長文字。文章上下古今，縱橫捭闔，極盡誇張之能事；初一看，金剛怒目，氣沖牛斗；細分析，處處矛盾，似是而非；與第一張大字報相比，確有異曲同工、珠聯璧合之妙，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特點，很值得研究。

先從毛澤東開篇的三條指責說起。他指責陳伯達搞的語錄："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實際上，馬克思並非沒使用過"天才"這個詞。陳伯達沒有例舉，一是因為馬克思稱讚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二是語錄搞得倉促，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話。馬克思不僅不否認有天才，而且認為天才是廣泛存在的。例如，馬克思說過："像拉斐爾這樣的個人能否順利地發展他的天才，這就完全取決於需要……。由於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羣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9至460頁）

毛澤東接着說："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本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恩格斯的話只找了一句，更印證了編者的倉促，而毛澤東說"《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本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則是不正確的。正是在這部書裏，馬克思論述了"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毛澤東說到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隨後就寫下了那段很著名的話："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在這段話中，毛澤東以三次廬山會議為例，撇開"天才"一詞本來的內容，從政治制高點向陳伯達發射排炮，完全剝奪了陳伯達的申辯權。毛澤東先點明陳伯達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是彭德懷的同夥，說明不管陳伯達為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的事在中央內部挨過多少批判，寫過多少檢討，毛澤東仍念念不忘這件事，陳伯達在毛澤東的眼中，始終是彭德懷的同夥，始終是一個"戴罪"之人。毛澤東使用

他，並不是真正信用他。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

文章例舉第二次廬山會議，僅是作為鋪墊，言之無物，例舉第三次廬山會議才是目的。第三次廬山會議究竟實情如何，上節已有評述，這裏不再多說。至於文章說"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若和第一次廬山會議時作者說過的"共產黨內的分裂派……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447頁），"近日右傾機會主義倡狂進攻，……好傢伙，簡直要把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同上書，第488頁）相比較，即可知這是作者慣用的浪漫主義說法，並非真的出現了天塌地陷。毛澤東是大軍事家兼大詩人，因此他兼有二者的品格：威嚴和浪漫。威嚴才能治軍，所謂"軍令如山"，所謂"慈不掌兵"。浪漫才能做得出好詩，所謂"浮想聯翩"，所謂"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他太看重令行禁止，又太富有想像力，這種雙重品格導致了他一生的悲喜劇。

文章後部分才說到正題。作者寫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結束半年多後的談話中說："《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嚴格地說，陳伯達只是使用了"天才"這個名稱，並沒有提出相關的學說或理論體系，因此，毛澤東在這裏使用"天才論"這個名稱也是不恰當的。無論是陳伯達稱天才還是毛澤東批天才，他們對天才的看法都還只是停留在一些零碎的觀點上，還不足以稱之為"論"，而只能稱之為

“觀”，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只不過是不同的“天才觀”的反映。

17. 白首對獄卒，鐵窗咽悲音

廬山會議結束後，陳伯達返回北京，不久即遭軟禁，一年以後，又被關進秦城監獄。對這一連串的厄運，陳伯達回憶道：

“在回北京的飛機上，人們不再敢和我打招呼。朱老總他們坐在飛機前排，我坐在後排，挨着余秋里。我跟余秋里說：‘你在會上說劉少奇把住房讓給了我，這件事你不大清楚，……’話還沒有說完，余秋里就板着面孔說：‘你不要說了，就是那麼回事。你不要再說了。’我就沒有再說。當時提起這個話，是因為會上號召揭發我時，余秋里揭發了一條，說劉少奇和我關係多麼密切，解放後在中南海，把自己的住房讓給陳伯達。實際上，劉少奇是說過他搬到新房子以後，他原來的房子我可以住。可楊尚昆不讓我住，說那個房子你不能住。結果楊尚昆自己搬進了那套房子，我就另找了住處。這本是件小事，因為在飛機上無聊，才跟余秋里提起。我過去和他說得來，這時他卻不肯搭話。

“回到北京家中，想再三求毛主席和中央寬大一些。一天晚上，打電話到毛主席那裏，想求見他。過了一會兒，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回電話說：毛主席剛開完會，很疲乏。以後又打過幾次電話，徐業夫不是說毛主席有事，就是說毛主席已經休息，總之是不能見。我也就不好再求了。

“因覺得康生和毛主席關係比較好，又硬着頭皮打電話給康生，想請他幫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軼歐接，她也不接。

“當我打電話給恩來同志時，恩來同志的秘書要我稍等。不一會兒，恩來同志來接電話了。他說，本來事情或許還可緩和，汪東興把那個語錄一交出去，就沒有辦法了。他說話的語氣是親切的，這是我終生

雛忘的。

"恩來同志不因為一個人犯過錯誤，遇到困難，就加以鄙棄，卻是給以希望。我想，這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的道德。

"有幾個晚上，為排遣一下自己的苦悶，我到郊外散了散步。隨後就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國慶日將到，怕遇見外國人。

"從此，被禁閉在家裏。看來抄家批鬥是免不了的，我就把自己寫過批語的一些書的書頁撕掉了。像傅增湘的《藏園羣書題記》，我寫過不少眉批，我都扯掉了，免得他們做批判文章。最痛心的是，我把曾祖父陳金城的畫像毀掉了。那幅畫還是姚燮[1]畫的，原來放在老家，都已經黴爛了，我帶來北京，請人重新修補裝裱。可這時想到，一旦抄家，江青這些人會把畫像拿去搞批判展覽，辱及先人，我實在不願意，就把畫像燒了。

"過了幾天，幫我管文件的王保春和王文耀都調走了，說是要他們上學習班[2]。我想去看一下住在後面的小弟[3]，衛兵攔住我說：'都搬出去了，已經不在這了。'

"我已同外面完全隔絕，什麼消息都不知道。一次，我問小繆[4]：'我的問題究竟會怎麼處理？'小繆讓我聽收音機播送的紀念七一的社論。小繆說：'聽到了吧，社論說，要批判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這是在點你呢，你說還能有希望嗎？'

[1] 清道光年間著名詩人、畫家。——筆者注

[2] 實際是禁閉在政法大學一房間內，由專案組看押，五年後得釋放，陳伯達的司機俞子雲也在此處被關押三年。——筆者注

[3] 筆者的弟弟，當時還在上小學，陳伯達倒台後，與保姆陳順意一起被關到衛戍區，三年後得釋放。——筆者注

[4] 繆俊勝，原八三四一部隊幹部，1969 年調任陳伯達秘書。——筆者注

"不久，院子大門內停放了一輛大卡車，天天都停在那兒待命。看樣子，是要逮捕送監。我感到絕望，托小繆：'在要實行逮捕時，請多給我些安眠藥。'我這樣一說，他不願意出事，把藥都退給醫務所了。

"一天夜裏[1]，突然有兩個穿軍裝的人把我從床上叫醒：'快起來！快起來！'我問是怎麼回事？他們板着臉，一句也不回答，一股勁催我快點。然後他們一邊一個拽着我的胳臂，把我塞進了一輛吉普車。車子在夜裏走了很長的時間，到達了一個地方，看來是座監獄。我實在不想坐自己人的監獄。當看守打開一個牢房的門口時，我停住腳不肯進去，我大聲喊道：'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我救過毛主席！'

"我把1948年在河北阜平國民黨飛機轟炸時救毛主席的事，用一句話喊了出來：'我救過毛主席'。這句話我已憋在心裏很久，廬山會議時就想說，因當時聽吳法憲好像說，林彪也救過毛主席，我就猶豫沒有說。現在到了牢房門口，我已經絕望，話就沖口而出了。

"看守不理睬我說的話，硬把我拖進牢房，還說我是'耍死狗'。

"剛進牢房時，連床也沒有，是睡在地上草墊子上。如此待遇，大概是學水滸傳裏那些牢頭們，讓新到的犯人先吃一百殺威棒。

"牢房雖小，但看守在門外很難察覺我在做什麼。我在鋪蓋的掩護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殺了事。我使勁咬破了自己的手腕，想流血而死，可是血流出不多就止住了，沒有死成。

"過了幾天，或許我在監獄門口說的'我救過毛主席'的話已經往上報告了，於是把我轉移到一個三層樓的樓上，整層樓只關我一個人。睡床了，整個樓道可以隨便走動，生活特別優待，每天都有大夫來看，吃的很好，甚至比在家裏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延續到今天，經常感謝

[1] 據繆俊勝回憶，此時即是1971年9月13日夜。——筆者注

秦城監獄管理的同志。當然，他們是執行黨的意見的，我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

"我想：只要還活着，問題是可以說清楚的。因此，心慢慢地平下來，斷了自殺的念頭。

"獄中的生活日復一日，很枯燥，好在還可以借閱一些馬列的書。後來還可以看報紙。"

我打斷了一下陳伯達的敍述，問道：

"從你倒台到十大被開除出黨，他們審問過你沒有？"

陳伯達回答：

"關在家裏的那段時間，沒有人審問過我。在秦城監獄的時候，有過一次審問。時間記不清楚了，記得是在樓下一個大房間，中央放着一張長桌子，郭玉峯[1]領着幾個人，都穿着軍裝，他們坐在長桌子的一邊，我一個人坐在另一邊。

"審問進行了兩天，第一天還隨便，像是談話的樣子。第二天就不同了，他們的座位依舊，卻不讓我靠近桌子坐。在牆根單獨放了一把椅子，讓我坐在牆根邊。他們擺出了審判的架子，說話口氣也變了。"

我問道：

"他們都具體問些什麼？問沒問你解放前在天津被捕和出獄的經過？和你核對過有關的情況沒有？"

陳伯達說：

"他們問得很籠統，沒有專門問什麼。從我年輕的時候，直到廬山會議，所有的事都讓我說一遍，沒有對具體的事進行質證。他們只搞了

---

[1] 中共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康生的親信，陳伯達專案組的實際負責人。——筆者注

這一次審問，以後就沒有來過。過了多年以後，再一次審問就是1980年的審判了。”

我又問：“開除黨籍的決議給你看過嗎？讓你簽字沒有？”

陳伯達答道：

“十大開除我的黨籍，我是在監獄裏看到報上的新聞公報才知道的。沒有給我看決議，更沒有什麼簽字。我看到公報上說我是什麼‘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心裏很難過，坐在地上指着報紙，一邊哭一邊說：‘哪裏有這樣的叛徒特務呀？自己冒着飛機轟炸的危險跑去救毛主席！’”

陳伯達說到這裏，就哽咽着說不下去了。在以後陸陸續續的談話中，陳伯達還說了以下一些零碎情況：

“我一個人住在三樓，一樓二樓還住着一些人，他們都是誰，我無從打聽。但有一段時間，樓下有一個男人經常唱俄文歌曲，還用俄文唱國際歌，我猜想他可能是蕭三。

“十大的公報點了林彪的名，開除了林彪的黨籍。我一點也不知道林彪的事是怎麼回事，還以為林彪也關在秦城監獄。到1980年審判時，給我看起訴書，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謀害毛主席，乘飛機逃跑摔死了。這個消息使我很吃驚。這是真的嗎？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倒就倒嘛，再怎麼也不該這樣做。

“有段時間，監獄允許我在樓下的空地種點菜。唐山地震後，我有一次下樓，見一樓佈置得很整潔，還擺放了一些花。院子外面的空地上還搭起了許多帳篷。那時，報上正在批鄧小平，我還以為是鄧小平要搬到這裏住呢。現在聽你們說，才知道鄧小平沒有來秦城。

“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很悲痛，哭了好幾天。周總理、朱老總去世，我都默哀很長時間。到1980年宋慶齡去世，我也站在復興醫

院的犯人病房裏默哀。過了兩天，一個負責人和我談話，說鄧穎超同志來過電話，說請轉告我，宋慶齡同志去世了，有件事以後就不要再提了。那件事我早忘了。這樣一說，我才想起。我馬上對那位負責人說：‘請不要再說了，我不知道這件事！’那位負責人還說，周總理也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應當諒解。

“毛主席去世後不久，報上登載了一篇文章，說什麼周培源如何反對我批判相對論。我跟監獄的看守發了脾氣，說：‘什麼我要批判相對論？這不是瞎說麼，一個科學家，怎麼能這樣？’監獄就着這件事，結束了對我的優待，把我從三樓趕下來，搬到一排平房牢房裏，雖然還是一個人住，但是條件差多了，就是一間房，外面連着個可以放風的小院子。

“監獄裏犯人洗澡，是輪流在一個澡堂洗，那裏只有淋浴。1978年，一次我洗澡時，正洗到半截，水管裏的熱水突然停了，接着冒出了一股涼水，澆到我的背上。我當時就覺得受不了，趕緊擦乾了。我已七十多歲，經受不了突然的寒冷。第二天，腰疼得就起不來床了。於是就讓我住進了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開始，我站不起來，只能在地上爬。後來我扶着椅子，鍛煉着站起來，慢慢地才能一點一點蹭着走。”

陳伯達自1970年倒台以後，就與筆者音信隔絕。1971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指示石家莊市第一制藥廠通知我：不准離開石家莊，不准與任何親屬聯繫。直到1979年12月，經過我向中央寫信，才被允許探望被關在公安部北京復興醫院犯人病房的父親。當我在相隔九年多之後，第一次和父親見面時，使我大吃一驚的是，父親的灰白鬍子竟有半尺長，舊呢帽子下亂糟糟的灰白頭髮，似有多年沒有理過。他身上穿的軍服棉襖和棉褲，已經磨破，還綻露着棉花。我當時突然一陣心酸，但面對兩位在場監管幹部四目睽睽的凝視，我強忍着眼淚，沒敢流露出自己的悲傷。

探監結束兩天後，正準備買車票返回石家莊，我暫住的《紅旗》雜誌招待所管理員告訴我，剛接到復興醫院監管部門的電話，說父親提出，想再見我一次。第二天，我匆匆趕到醫院和父親見面。這一次，父親的鬍子已被剃掉，頭髮也推理過了，棉襖棉褲也已更換一新。我馬上明白了，實際上，是監管部門顧慮到了上次探監給我留下的印象，才趕緊安排了這第二次探監。

但我的腦海中仍抹不去眼前曾出現的那幅圖景：

狹窄的囚室內，罩着鐵絲網的毛玻璃窗下，一個衣衫破舊的長髯老者，端坐在低矮的木版床上，倚着兩個權當桌子的床頭櫃，就着柔弱的光，在聚精會神地閱讀着已經翻爛的、整整研讀了半個多世紀的馬列書籍，一邊細心地在小本子上寫着筆記。獄卒偶爾從門上的窺視口瞥他幾眼。他在這裏沒有姓名，只有囚徒的數碼代號。他所有的活動都被限制在這間斗室之內（屋內一角有抽水馬桶和水門），他的腿腳日漸退化。沒有人想到他就是三十年代中國新啟蒙運動的發起者，四十年代《評〈中國之命運〉》的作者，新中國開國基石《共同綱領》的草擬者，五十年代《毛澤東選集》的編輯者，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的撰寫者，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者。

當然，嚴酷的獄中生活中似乎也曾有過溫情的一面。如同父親本人所說，毛主席、周總理對他的獄中生活有過關照。1985年，我因事從公安部十三局的一位幹部處得知，當年在秦城監獄中，在毛澤東還健在的時期，陳伯達確實受到了最高的待遇。那時，彭真每月也只有四十元的伙食費，而陳伯達的伙食費是每月六十元。到了毛澤東去世以後，他的生活費降到了只有十幾元，1981年8月以後才又提升到一百元。

毛澤東與陳伯達，共同走過了中國革命最主要的路程。憶往昔，延安聚首，相見恨晚；抗戰艱辛，同論國運；七大盛會，共繪藍圖；八

大凱歌，合譜新聲；誰又能想得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到後來，他們兩位，一個堅持階級鬥爭為綱，一個倡導發展生產為主；意見分歧，蓋難調和。最終毛澤東將陳伯達從座上賓墜為階下囚。這不能不使人想到魏征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過的那段話：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

對於毛澤東與陳伯達的關係所發生的變化，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曾頗有感歎地說：

"毛把陳伯達的思想批評為典型的'唯心論的先驗論'。會後，陳再也沒有公開露過面。

毛如此殘酷地攻擊一個過去曾經與他過從甚密，並為他的傳奇色彩貢獻非淺的同事，似乎令人費解。"

(迪克·威爾遜《歷史巨人毛澤東》中譯本，第47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

陳伯達晚年，對於毛澤東打倒他的一系列做法，始終懷着深深的不解和遺憾。他對我說："毛主席老了，思維不正常了，才會這樣。他過去不是這樣的。你們不要記恨他。他以前對人是很寬厚的。他給過我很大的幫助。還是要念及他的過去。樂毅《報燕王書》說：'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我現在落難了，交絕的狀況，不由自己，但前人的這些話，仍要遵從。"

18. "批陳整風"推向全國

1970年冬至1971年夏的"批陳整風"運動，是背着陳伯達進行的，沒有讓他看過任何文件，也沒有對他進行任何提審。他被羈押在米糧庫

胡同的家中，無從知曉外面的情況，只是通過報紙，看到了一些批判他的文章(這些文章用"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來作為陳伯達的代名詞)。因此，陳伯達對"批陳整風"運動知之甚微。這方面的情況，筆者只得以自己經眼的資料為主來加以敍述。

1997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從周恩來工作日程的角度，記錄了廬山會議結束前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批陳"進行部署的情況：

(1970年)9月4日到毛澤東處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各組組長會議。會議決定再延長兩天會期，陳伯達不再出席大會。毛澤東提出，關於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時間討論了。陳伯達如無政治歷史問題，我的意見還保留中央委員；但要陳再進一步檢查，我看有困難。

9月6日出席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毛澤東在會上就黨的路線教育、高級幹部學習和黨內外團結等問題，發表了意見；並再次提出對陳伯達還要再看一看，有些問題再研究一下，贊成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員。……。會上，黨中央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9月9日飛回北京。次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議定：(一)組成由康生、李德生、周恩來負責的陳伯達專案組，具體工作由中央辦公廳有關負責人處理。

9月14日參加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核心小組成員會議，向會議傳達毛澤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一文，介紹陳伯達的歷史情況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陳的問題。

9月23日陳伯達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所犯罪過，要求給其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毛澤東閱後，建議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一下。晚，在毛澤東處開會。

11月7日與康生、李德生聯名致信毛澤東、林彪，提議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所寫《我的一點意見》，擴大印發範圍至各省、市、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各大軍區、省軍區、各軍、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常委，中央黨和政府各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成員，“以便得到對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發”。並告此建議已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毛澤東閱後批：“略寬為好，如地級、師級；中央應有一指示下達。”十四日，周恩來批改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經當晚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十六日，中央正式下發此《指示》和《我的一點意見》，要求各單位由主要負責人親自傳達。由此，全黨開展“批陳整風”（對外稱“批修整風”）運動。

整個部署，從毛澤東最初的“陳伯達如無政治歷史問題，我的意見還保留中央委員”，到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前後不過兩個多月，調子的改變十分快捷。

鑒於10月14日毛澤東在對吳法憲書面檢查所作的批語中說：陳伯達“是個可疑份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11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中寫入了這樣的文字：“陳伯達歷史複雜，是一個可疑份子。中央正在審查他的問題。各單位在傳達時，要號召瞭解他的情況和問題的同志，進行檢舉和揭發，並請你們將揭發材料妥送中央。”

葉羣在1970年10月13日的書面檢討中寫道：“對於陳伯達問題的認識，過去由於主席在會議上打過招呼，江青同志也幾次同我們打過招呼，對陳伯達錯誤言行是有所察覺的。在一些問題上是抵制了的……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轉引自朱仲麗《女皇夢》第432頁）這證明毛澤東的揭發和打招呼都確有其事，並收到了一定效果。至於毛澤東究竟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什麼事？陳伯達本人是一無所知的，中共

中央文件也沒有透露，毛澤東直到去世，也始終對此事語焉不詳。

沒有任何實際的根據，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號令全黨全國揭發一個人的歷史，這是沒有先例的反常作法。俗話說：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是中共中央號令揭發，那陳伯達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因為既已公告天下，就沒有了退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會容許對陳伯達的審查得出與“可疑份子”相反的結論，來貽笑天下。於是，陳伯達這個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極大努力的知識份子變成了中國的冉阿讓，沙威警官們有事可幹了。

事情的發展果不其然。兩個月後，華北會議結束，李雪峯、鄭維山均被撤職，隨即，中共中央發出《反黨份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

現據《大動亂的年代》一書第408頁的記載，將這一中共中央文件的要點轉述如下：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份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這個材料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陳伯達的反動歷史’，主要內容有：‘家庭出身和入黨前的個人歷史’，‘和國民黨軍閥張貞的關係’，‘被捕叛變’，‘失掉黨的關係問題’，‘托派問題’，‘在天津工作時的錯誤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陳翻案的問題’，‘寫反共文章’，‘裏通外國嫌疑’。第二部分為‘投靠和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主要內容有：‘追隨王明，鼓吹[國防文學]和[國防哲學]’，‘一貫投靠和追隨劉少奇，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秀才和頭面人物’。第三部分為‘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主要內容有：‘陳伯達是肖華、楊、余、傅、王、關、戚[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所進行的幾次突出的反黨陰謀活動’（如‘陳伯達借起草九大報告的

機會，炮製了一個繼承劉賊唯生產力論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分裂黨的黑綱領'），'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採取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分裂的陰謀活動'。第四部分為'投靠王明、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

隨着這份《反黨份子陳伯達罪行材料》的傳達，"批陳整風"運動逐級鋪開。這份中共中央文件在文革結束後已歸文件密藏。但是，自從毛澤東於1970年12月29日對姚文元的學習報告寫下批示："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王明、劉少奇、陳伯達一類騙子"之後，報刊上即以"劉少奇一類騙子"或"王明、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來作為陳伯達的代稱，公開發表了大量的"批陳"文章，這些文章現今仍不難找到，從中可以清楚看出"批陳整風"(即"批修整風")運動發展的步驟和批判的主調。

現僅舉幾篇1971年4、5月間的報刊文章為例。

1971年4月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紀念"九大"召開兩周年的通訊：《熱烈歡呼"九大"團結勝利路線的偉大勝利，決心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奪取新的更大勝利》。文中第一次醒目地提出："狠批王明、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動的'先驗論'、'唯生產力論'、'人性論'、'階級鬥爭熄滅論'。"

4月1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批判唯心論的先驗論》。文章除了從哲學的角度批陳外，還以大段文字批判陳伯達的"唯生產力論"，歷數陳伯達從起草八大決議到文革當中強調生產、強調經濟工作的言論，抨擊陳伯達"妄圖用反動的'唯生產力論'篡改辨證唯物論。"

4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批判唯心論的銳利武器》，第一-

次公開點出“小小老百姓”(陳伯達常用的自稱)，將此次大批判運動的目標明示於天下。

5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社論《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社論正式向全國發出開展“批修整風”的號召：“我們要遵照毛主席關於‘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開展批修整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續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羣眾運動，批判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所販賣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生產力論、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熄滅論，以增強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提高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覺性。”

5月12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冶金工業部寫作組的長篇文章《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發展我國鋼鐵工業》。文章着重批判了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

這一段時期，全國許多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了新的黨代表大會，選舉了新的黨委。所有的黨代表大會在發表的公報中都強調要“狠批王明、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所販賣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生產力論、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鬥爭熄滅論”。

由此可見，“批陳整風”運動在理論上的宗旨，就是批判陳伯達的所謂“黑四論”(即“先驗論”、“唯生產力論”、“人性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當時，還進而把這“黑四論”歸結為一個字，叫做“修”。所以“批陳整風”又叫“批修整風”。現在的歷史書從來不解釋為什麼“批陳”即是“批修”，甚至於還把批判陳伯達的“黑四論”，刪改為只批“天才論”，這是對歷史的有意歪曲。

在上面列舉的一系列歷史事實中，筆者覺得，有三個值得注意之處。

首先是毛澤東思路的變化。

1970年9月4日，毛澤東說："陳伯達如無政治歷史問題，我的意見還保留中央委員"。9月6日，毛澤東再次提出："對陳伯達還要再看一看，有些問題再研究一下，贊成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員。"廬山會議結束後，9月23日，"陳伯達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所犯罪過，要求給其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毛澤東閱後，建議周恩來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討論一下。"

看來，毛澤東最初對是否徹底打倒陳伯達有過短暫的猶豫，以至兩次提出保留陳的中央委員職務。而陳伯達對此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從情理上說，毛澤東的想法並不難實現，但是為什麼這一想法又迅速打消了呢？

筆者以為，毛澤東說保留陳伯達的中央委員，並非出於念舊，而是因為他明白，單憑主張設立國家主席和承認有天才這兩點，就把一個人打倒，理由不充足。他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方面，倒陳的理由有點怪，當時就有人議論，毛澤東如此對待陳伯達，是"不教而誅"。另一方面，《我的一點意見》又把話說絕了，諸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等等，這些詞語只有對待敵人才能使用。毛澤東已不可能收回成文。所以，毛澤東說保留陳的中央委員，只是因倒陳的理由不充足而採用的一種緩兵之計。他需要一些時間來尋找更有力的理由，期待能從"歷史問題"方面找到一個突破口。這個情況也從一個角度說明，在廬山會議結束的當時，與會者並沒有人認為發生了政變。因為如果大家都有政變的感覺，那麼在處理陳伯達的問題上，毛澤東就不會這樣為難了。稱廬山會議是一次政變，是事後將問題不斷加碼，反復升溫，才形成的說法。

第二個值得注意之處是"批陳整風"運動的重點。

“批陳整風”運動，除了批陳的所謂歷史問題外，着重是批兩點，一是批判陳伯達的“先驗論”、“唯生產力論”、“人性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二是批判陳伯達搞分裂。毛澤東曾用“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的提法來點明陳的問題關鍵之所在。而所謂“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就是指陳伯達搞唯生產力論，背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並堅持反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拒絕與這些人團結。當時的批陳文件以及1972年中共中央對陳伯達的審查報告中都寫有這樣一句話：“陳伯達名義上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實際上反對中央文革。”這即是問題的實質。

何蜀、王年一在《我們對汪東興這本書有不同看法》一文中說：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既然‘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那末‘反九大路線’豈不是正確的了嗎？說‘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陳伯達‘反九大路線’，又該讓人怎麼理解呢？”

何蜀、王年一的文章提出了問題，這個問題值得人們繼續深入探究。

第三個值得注意之處是，在批陳中，現實與歷史兩手抓，用所謂的“歷史問題”為倒陳提供最大的支持，全面批倒陳伯達。

自1970年10月毛澤東兩次批示，稱陳伯達是“可疑份子”，並於同年11月由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號召全黨揭發陳伯達之後，毛澤東又於1971年3月24日對黃永勝的書面檢查作出批示：“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份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

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的。"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是在沙威警官們取得了非凡的"業績"的基礎上寫下的，它使"批陳"鬥爭的性質驟然升了級。如若不然，陳伯達的問題最多只能歸入汪東興所犯錯誤一類。但實際上，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是把雙刃劍，即傷了人，也傷了己。而且，正如人們經常引用的一句話：一個戲過份誇張了，就失去了真實性。[1]

19. "林陳聯盟"之說駁議

1971年9月發生"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共中央下發的文件開始把林彪和陳伯達兩個人捏合在一起，稱之為"林陳反黨集團"。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1972年1月和7月又分別下發了(材料之二)與(材料之三)。在連續發出這份文件的過程中，文件的名稱在不知不覺中改為《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此後，"林彪反黨集團"的名稱取代了"林陳反黨集團"。但是，"林陳聯盟"的說法並沒有取消，只是陳伯達被降格為"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至於為什麼陳伯達被降了格，也沒有人解釋過。總之，"林陳聯盟"的說法從1971年9月產生之後，雖發生過一些細微的變化，仍陳陳相因地一直沿用了下來。直到今天，從葉永烈的《陳伯達傳》，到汪東興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再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1949—1976》，都在重彈"林陳聯盟"的調子。

---

[1] 筆者注意到，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在敘述"批陳整風"運動時，沒有再提陳伯達的所謂"歷史問題"。毛澤東有關此事的所有批示，從提出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到認定陳伯達"被捕叛變，成了特務"，該書全都沒有引用。對此，編寫者未作解釋，筆者也不必評說。

“林陳聯盟”的說法符合歷史事實嗎？如果真的符合事實，為什麼又要將“林陳反黨集團”改稱為“林彪反黨集團”呢？如果僅僅是因為陳伯達的職務低於林彪，就不再將他與林並提，那麼，“高饒反黨集團”裏的饒漱石，職務也低於高崗，為什麼不將“高饒反黨集團”改稱為“高崗反黨集團”呢？

這些問題，對於想弄清歷史真相的人來說，是須要探究的。

其實，早就有人對“林陳聯盟”的說法表示過懷疑，在華北地區民間，許多人認為林彪與陳伯達是對立的，理由是文革時期陳伯達批評過林彪支持的某些造反派，而且批陳整風運動中的中共中央文件明確說過陳伯達是反對林彪的，著名的三十八軍的批陳報告就特別強調這一點。海外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也曾質疑過“林陳聯盟”的提法。

最不能接受“林陳聯盟”的說法的，是陳伯達本人。

1983年初冬時節，陳伯達與筆者有過一次談話。

陳伯達說：

“我感覺到毛主席不想再用我，但我想不通毛主席為什麼要打倒我？我又沒有得罪他。雖然在起草九大報告時，我主張強調生產，在其他事情上也提過不同看法，總之是想讓運動?車，但這都是出於好意。在他那裏工作，我還是很小心的。在廬山說他是天才，那也是說好話嘛，緊說好話也不行？”

我想了一想，回答道：

“依我看，他打倒你，是想讓你當替罪羊。運動搞得這麼亂，一些老幹部和軍隊幹部情緒很大，中央得有個交代，這就需要有個替罪羊。你是組長，卻不想幹，想剎車，他就讓你來當這個替罪羊。因為在他看來，你對老搞運動的做法持異議，想撂挑子，就是不忠心。即使他想採納你的某些意見，也會按法家的辦法，‘陰用其計，陽廢其人’。再

說，替罪羊讓江青當，會牽連到他；讓康生當，分量又差些；讓林彪當，恐怕毛主席一時半會兒還沒往那方面想。"

陳伯達問：

"可是我負責的華北地區，是最早安定下來的。我倒了以後，運動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越搞越厲害了，這怎麼說呢？"

我說：

"華北安定的早，說明你和軍隊關係處得比較好，這反而引起毛主席的疑心。他認為有矛盾才正常，像張春橋和許世友關係很僵，他倒放心。你和北京軍區領導人挺一致，他反而覺得不正常，懷疑有名堂。

"凡事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毛主席想找個承擔責任的人，把人們的埋怨轉移開，緩和與老幹部們的關係。他後來陸續解放了一些老幹部，所以也不好說越搞越厲害。另一方面，他又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做法，不想改弦更張，這就使運動停不下來，收不了場。"

陳伯達又問：

"那為什麼非要把我和林彪聯在一起？我和他沒有多少接觸，對他不瞭解。過去毛主席對林彪印象很好。我是因為毛主席信任林彪，才相信了林彪的。"

我答道：

"林彪的事情如果晚出兩年，單獨批你的時間長一些，可能情況會好些。他的事出的太快，離你倒的時間太近，加上廬山會議上你們的意見接近，就給聯在一起了。毛主席打倒你，既是讓你當替罪羊，同時也是'殺雞給猴看'。但這只'猴'沒被嚇住，反而因矛盾激化，鋌而走險了，這大概是毛主席也沒料到的。"

聽了我的回答，陳伯達一時沈默不語，但他的思想疙瘩一直沒有解開，1984年9月，陳伯達在北京衛戍區醫院治病期間，有一天，在

我替換公安局的人去陪床時，他忽然對我說：

"我想請求中紀委派個人來和我談談。"

我很詫異，問："談什麼？"

陳伯達皺着眉頭，大聲說道：

"讓他們說清楚，我究竟和林彪有什麼關係？把我搞到這樣地步，對黨有什麼好處？簡直莫名其妙！"

我鑒於當時的環境，覺得陳伯達這樣發火，沒有任何用處，就息事寧人地說：

"還是算了吧，你已經被開除黨籍了，中紀委怎麼會管你的事呢？你現在是歸公安局管。你提出這些問題，沒人會答覆。再說，審判時你已經說了'有罪，有罪'，雖然有時說的是氣話，但現在改口也不好。你說過，你是忍辱為黨，忍辱為國，那就得看開一些。你不是講過《文中子》中'賈瓊問：何以息謗？通曰：無辯'的典故嗎？"

在我的反復勸說下，陳伯達才恢復了平靜。

陳伯達出院後未再重複這個話題，但他在醫院和我談話時的痛苦表情，卻留存於我的腦際，無法忘卻。從此，我對書刊中涉及"林陳聯盟"的敍述更加留意，覺得無論如何，自己應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些。

時至今日，在閱讀了眾多的書刊後，我發現，關於"林陳聯盟"的種種說法，多由揣測之辭構成，並無經得起推敲的證據。有的文章，乍一看言之鑿鑿，細一分析，其實是對史料進行了剪裁，使其附會於流行的說法，或是利用一些破綻百出的虛假口供來作為立論的根據。

現以"林陳聯盟"的說法中兩個利用率頗高的所謂"事實"為例，做一點剖析，即可窺見某些人是如何歪曲歷史的。

第一件"事實"，見之於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此處只援引後者的說法。

《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8頁寫道：

"七月下旬，毛澤東剛離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內部又發生一場風波。和往年一樣，為紀念'八一'建軍節，中央'兩報一刊'準備發表一篇社論。這類社論稿通常都要經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最後送毛澤東審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跟林彪關係已非同一般的陳伯達同江青的'智囊'張春橋就社論稿上的一處提法產生分歧：陳主張將原稿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語中的'毛主席和'四個字去掉，而張則堅持不改，雙方爭執不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表示：這件事'要請示主席'。

過了兩天，周恩來去上海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他當面向毛澤東講了這場爭論的情況。毛澤東聽後彷彿並不在意，輕鬆地說：這一類的應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經討論過了，我就不看了；至於提法問題，這無關緊要。他還要汪東興代他圈去社論稿中'毛主席和'幾個字。第二天，周恩來寫信把毛澤東的意見轉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員。事實上，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絕非並不在意。他對汪東興講：爭論當中的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嘛！後來，他又多次講過這個意思。

這件事不能不使他聯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軍進入戰備的'第一個號令'這個舉動。去掉了'毛主席和'幾個字以後，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揮'人民解放軍了。這不是一般的提法問題，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為周恩來匯報這場爭論的情況時，黃永勝也在場，毛澤東對這類重大問題還需要觀察，故意沒有把話說得那樣明白。"

《毛澤東傳1949—1976》的作者把偶然發生的文字之爭說成"是一件大事"，卻有意掩蓋了此事中周恩來和康生的態度，給讀者造成陳伯

達與林彪的關係非同尋常的印象。但如比較一下《周恩來年譜》的寫法，即可知《毛澤東傳》的說法是對史料做了手腳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第 381 頁寫道：

"7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修改'八一'社論稿。陳伯達與張春橋就稿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提法，發生爭論。陳主張改回到過去幾年的一貫提法，即將'直接指揮'前面的'毛主席和'四字去掉。張則主張不改。康生亦認為新提法不易譯成外文。對此，周恩來表示：這件事要請示主席。

7月28日將'八一'社論稿送毛澤東審定，同時附信報告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的情況"。

原來事情並非《毛澤東傳》作者所說的那樣，好像陳伯達突發奇想地要刪掉原稿中"毛主席和"幾個字，而是"八一"社論冒出了新提法，陳伯達只是"主張改回到過去幾年的一貫提法"。況且也並不只是陳伯達一個人認為新提法不妥，康生從翻譯着眼，也持同樣意見。在外文中，"領導"一詞常兼有"率領、指揮"之意，新提法有語義重複的毛病。《周恩來年譜》的敍述比較客觀，但仍沒有寫出周本人的意見，沒有透露周寫給毛澤東的信件的內容，這就離實事求是還差了一步。

《晚年周恩來》第 284—285 頁寫道：

"周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兩報一刊'的'八一'社論時，陳伯達與張春橋為送審稿中的一處提法發生爭執。陳主張把'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個字刪掉，理由是自文革以來宣傳中的標準提法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的提法將會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議論。張則毫不退

議，力主維持送審稿中的提法不變。

對此，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得不出來設法擺平雙方的爭執。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他專門作了調查，發現在頭年'十·一'社論的修改過程中已經有人做了手脚，造出了這個新提法，而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正是張春橋、姚文元二人。周知道陳與張、姚二人素有嫌隙，開始還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以為在這場'文字'之爭的背後，不過是大小秀才之間的文人相輕，互不服氣，而沒有馬上領悟到問題並非這樣簡單，實際上是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較勁。更確切的說，是毛澤東為了削弱林彪的權勢，暗中指使張、姚造出來的說法。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認為從維護大局穩定的角度來說，陳伯達的意見更值得考慮。不過，他知道茲事體大，直接涉及到毛澤東和林彪，最後要由毛本人來定奪。於是，他除了聲明'這要請示主席'外，又隨即寫信給毛報告此事的來龍去脈，最後表示：'我個人認為以改回為好。究應如何，請主席決定示知。'"

撇開該書猜測的部分，周恩來也同意陳伯達的意見，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三個常委，都認為以改回舊提法為好，這是出於他們自然而然的認識，並無個人心計攙雜其中。改回舊提法的意見比較合乎情理，因而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得到了多數人的認可，這正是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既然政治局已經討論過了，我就不看了"這句話之所由來。

綜上所述，《毛澤東傳》的作者對史實做了精心的刪改，誤導了讀者。此事原本為張春橋所挑起，政治局成員均反對張的意見，這如何能證明陳伯達與林彪有勾結呢？

下面說一下第二件"事實"。

眾多講述九屆二中全會的書籍，包括葉永烈的《陳伯達傳》和中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在內，都引用吳法憲1971年12月23日的交代，說1970年8月13日晚，葉羣分別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等，要他們準備"天才"問題的語錄，在會上和張春橋等人鬥爭。

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陳伯達當時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進行過詳細瞭解，他們一致認為，這一說法是背離事實的。吳法憲的交代裏有些內容明顯失真。

王保春和王文耀說，廬山會議之前，陳伯達沒有準備過任何"天才"問題的語錄。在陳伯達由繆俊勝（八三四一部隊幹部，1969年後兼任陳的秘書）陪同到達廬山後，在北京留守的王保春和王文耀才接到繆從山上打來的電話，要他們與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聯繫，幫助找一下有關"天才"的語錄。隨後他們將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員找到的語錄交中辦的收發室送至廬山。與此同時，陳伯達讓已隨同上山的史敬棠等也幫找了幾條語錄。如果像吳法憲說的那樣，早在8月13日葉羣就打電話讓陳伯達、黃永勝準備"天才"問題的語錄，那麼上山以後就沒有必要再匆匆忙忙找語錄了。

筆者認為，王保春和王文耀的看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陳伯達交給汪東興列印的語錄，恩格斯和列寧的話一共只有6條，這恰好證明語錄是草率搞出來的，而並非是早有準備搞出來的。語錄中原還有林彪講"天才"的話8條，更證明陳伯達對林彪反對毛澤東沒有絲毫察覺。

特別應指出的是，吳法憲的口頭交代同他的書面檢查存在不一致。1970年9月29日，吳法憲在寫給毛澤東的檢查信中講到他在廬山和陳伯達的接觸：

"8月23日晚12點前後，陳伯達來找過我和李作鵬、邱會作同志，這次他對我們吹噓他自己的功勞，還談了關於'天才'方面的問題，我們問他有馬、恩、列、斯關於'天才'方面的論述沒有，他說可以找

到一百多條，他回去馬上就打電話，轉給我七條語錄……我列印了幾份給軍委辦事組的這幾個同志。"(轉引自朱仲麗《女皇夢》第428頁，其中刪節處為原書所刪)

吳法憲在書面檢查中講述的語錄產生經過，與其他知情人述說的情況是一致的，因此具有可信性。奇怪的是，《陳伯達傳》和《毛澤東傳》的作者對這個具有可信性的材料不置一顧，反而將吳法憲明顯虛假的口頭交代視為至寶。

吳法憲在部分交代中說過假話，是吳法憲本人也承認的。1980年審判期間，林彪女兒林豆豆寫信給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吳法憲在林立果工作安排等事情上說了假話，專案人員找吳法憲核實，"吳法憲承認他撒了謊，提了偽供。"(參見1989年《海南紀實》第3期刊登的蕭蕭《林彪女兒林豆豆今昔》)

本書前文《九大前後》一節中，已經指出過吳法憲的一處假話，即他在九大報告的起草問題上編造了"陳伯達寫時天天往林家跑，商量怎樣寫"的不經之談。可見吳法憲說假話已不是一次兩次。對於他這樣有過偽供前科的人，他的一切供述必須經過多方面的核對和細緻的分析，方能確定其中哪些話為真，哪些話為假。這是普通的法律常識。

《陳伯達傳》和《毛澤東傳》等書的作者，之所以專門選用吳法憲攙雜假話的談話，是因為吳的談話頗能符合某種需要(事實表明吳善於看領導眼色說話)。在語錄問題上，他們以為據此可將"天才"語錄的形成時間挪至廬山會議之前，從而證明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情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然而，半個孤證豈能改變事實。史敬棠、王保春、王文耀、繆俊勝等諸多人證，以及語錄本身，都證明語錄是在山上草率編成的。那個山下的語錄根本就不曾存在過。所謂"預謀"等等，與陳伯達、汪東興、李雪峯、鄭維山等人均無涉。

對於參加九屆二中全會的絕大多數人，包括陳伯達、汪東興、李雪峯、鄭維山在內，事情的發生是自然的，也是偶然的，卻不是預謀的。原因在於，憲法草案原本允許討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本講過天才。黨章規定黨員可以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那麼，在討論中自然會有不同意見。至於誰發了言誰沒有發言，説長説短，這是偶然的。誰也沒有想到，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其實不能討論，要發言只能説不設；天才問題也是言談之禁忌，要談論只能説沒有天才。這種思維方式與發言規則大家一時還沒來得及領悟和適應，故而免不了一個個栽了跟頭，職位高些的更被揪去做了"不教而誅"的示範。當然，林彪的態度對會議確有相當影響，但是多數人本來就認為設國家主席更順理成章，則是基本的事實。即便林彪一開始就表態不同意設國家主席，恐怕與會者也不會異口同聲地跟着説不設。

會議唯一超出了正常範圍的情況是有人提出要揪張春橋。但是，提出要揪人的是汪東興，而不是陳伯達。陳伯達只是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而汪東興卻提出要把人揪出來。張春橋向來不得人心，旁人想找個話題譏刺他幾句，也不足為怪，誰知此人原來碰不得。在要揪張春橋的問題上，即便説有人煽動，也是汪東興為主，陳伯達為次。對此，吳德的口述文章已講得很清楚。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既然要揪人的汪東興能作為黨內問題來處理，連職務也沒降，處分也不給，為什麼陳伯達就要作為敵我問題論處呢？廬山會議結束後，李雪峯等人心中不服，曾就此當面向毛澤東提出意見。結果是，連李雪峯也被定為敵我矛盾，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李雪峯不瞭解，倒陳早在中央預案中，這個問題是不容討論的。

中共的文革史專家王年一説得好："説陳伯達反對毛澤東、林彪，都是無稽之談。"（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10頁）

瞭解陳伯達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沒有城府的人，他擁護毛澤東，也擁護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彪，他察覺不到毛林之間有嫌隙。而且由於1967年以後，他在求見毛澤東時屢屢吃了閉門羹，使他不得不通過與林彪接觸來瞭解毛澤東的意見。這就是他和林彪有所接近的原因。

陳伯達沒有參與過什麼陰謀，從以下幾點被人忽略的小事也可以看出：

一、九屆二中全會決定批判陳伯達以後，林彪對其下屬們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林彪的下屬們果然照辦了(參見1971年12月11日發出的中共中央文件)。

林彪說的話反證陳伯達根本不知道什麼陰謀，所以林彪才如此對陳落井下石，而絲毫不用顧慮此舉會激起陳的不滿，招致陳對他進行揭發。

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9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陳伯達如無政治歷史問題，我的意見還保留中央委員；但要陳再進一步檢查，我看有困難。”(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392頁)

毛澤東未指示陳伯達做新的檢查，就知他進一步檢查有困難，而且，事實上，毛澤東此後再也沒有要求陳伯達做檢查。這說明毛澤東心裏清楚：陳伯達不知道什麼秘密，讓他做檢查沒有意義。

廬山會議結束後，陳伯達先被軟禁在北京家中。在近一年的時間內，他完全處於無人過問的狀態，沒有任何人向他調查廬山會議的情況。林彪事件發生後，他被關到秦城監獄，也沒有人專門向他詢問與林彪的關係，或要求他揭發林彪。過了很久，郭玉峯等專案負責人才對陳伯達進行了一次籠統的審問，讓他將各方面的情況自己說一遍，即草草收場。可見中央各位負責人都認為陳伯達不知道什麼陰謀，沒有必要對

他多加盤問。

三、毛澤東親自把"林陳反黨集團"的名稱改為"林彪反黨集團"。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全國各級黨組織下發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隨後又陸續下發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文件的內容要求傳達到全體羣眾。在接連發出該文件三個部分的過程中，文件在半路改了名，被改為《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按筆者的記憶，名稱是從(材料之二)改變的。文件在傳達完畢後歸文件秘藏，至今概不外借，故目前筆者還無法查核名稱改動的準確時間。

由於當時中共中央對該檔案名稱的改變沒有做出解釋，現今出版的有關史著在提到該文件時不免遇到尷尬：同一個文件，先印發的部分與後印發的部分名稱不一，這是沒有先例的事，在史著中應該如何定名呢？

官方作家們選擇了省事的辦法：按照(材料之一)的標題，統一文件的名稱。理由很簡單，檔案名稱雖改，可倒陳的定局未變，只不過是把陳降格為"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而已，那又何必在檔案名稱上囉嗦呢？

的確，檔案名稱的改變並沒有使事情發生質的變化。但即便如此，這仍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

毛澤東自己曾説過，他是不走回頭路的。雖然他的話不是在正式場合説的，但此話正反映了他的性格。如果沒有重大的原因，經毛澤東親自批示下發的文件，是不會在連續下發的半路突然改名，從而流露出領袖的回違心態的。

顯然，毛澤東對"林陳反黨集團"這個名稱，不是覺得理所當然，名正言順，而是感到理所不然，名實不符。直言之，他心裏明白陳伯達

對他沒有陰謀。他如此倒陳，原本是一種策略，因此他對文件的措辭，終究心有不安，只是木已成舟，覆水難收，他不可能再對文件做大的改動，可又不願無所表示，於是揮筆將檔案名稱中的"陳"字勾掉，以略示筆下留情。聯繫到毛澤東曾指示監管部門對陳伯達的生活給予特別的優待，筆者認為，事情的邏輯，只能做如此的解釋。

對於從不走回頭路的毛澤東來說，他沒有後悔自己決策的餘地。他為批陳寫了那麼多的批示，要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他將"陳"字從標題中圈去，使各種文件和宣傳品點名批陳的頻率降低，這已是極為罕見的歉疚表示了。當然，這種歉疚微乎其微，難以被人察覺。

陳伯達平生，小心翼翼地服務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他有什麼必要，有什麼膽量背棄毛澤東而去與他人結盟呢？他與林彪、周恩來、汪東興、李雪峯，以及與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外的其他人，都想搞好關係，但那不過是平行的同事關係，同志關係，這種關係是建立在認為這些同事都是毛澤東的忠誠追隨者的基礎之上的。至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有什麼彎彎繞，他連想也沒想過。

縱觀波譎雲詭的廬山會議，陳伯達和汪東興的情況最接近，況且他並不比汪東興走得遠，如果一定要說陳伯達和誰聯了盟，那麼，與其說"林陳聯盟"，不如說"汪陳聯盟"。另外，會上還有不少中央要員指責陳伯達與陳毅聯了盟，說是"二陳合流"。廬山會議後，"二陳合流"還被寫進了中央文件。至於陳伯達與李雪峯、鄭維山聯盟之說，更是盛行一時。再加上中共中央在"批陳整風"中追溯既往，指責陳伯達參與了高（崗）饒（漱石）聯盟，參加了彭（德懷）張（聞天）聯盟，並且"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面人物"，陳伯達的盟友可謂多矣。不過人們也會多少有些奇怪，陳伯達與那麼多人聯盟，豈不是太忙了些，而且算計得那麼準，基本上是誰要倒楣，就趕緊和誰聯盟，陳伯

達豈不是又太神了些。

其實，都是盟友，等於都不是盟友。

7 陳伯達晚年概況

陳伯達生命的最後八年，是在筆者陪伴下度過的，其中，有七年處於保外就醫的狀況。這段時期，他在權力部門的安排下，蝸居危樓，遠離塵囂，可生活中仍有一些波瀾。

記得1988年夏天，香港一家刊物在一篇文章中披露，陳伯達曾在內地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為此，引起過某些讀者的疑問。當時，人們並不瞭解事情的真實經過，甚至將文章的發表時間也從八十年代初錯移到八十年代末。

一個從1970年起就被打翻在地，關進囚牢，長期受官方文件和報刊批判辱罵不止，十幾年後也不過是保外囚徒身份的人，竟在刊物上發表了文章，這在中國內地似乎是件破天荒的事，這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呢？

事情先要追溯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

1981年6月，中共中央舉行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這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會議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華國鋒辭去了中央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主席。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凡細心讀過這篇歷史問題決議的人都不難發現，這篇決議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時，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的名字，卻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對於文件中這一與持續多年的流行提法有明顯不同的文字表達方式，中央未曾做出正式解釋。實際上，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時的檔

案並進行了許多調查後，鑒於瞭解到的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所做的一個決定，即不在這份正式的歷史性文件中對陳進行評價。

歷史問題決議通過後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兩位工作人員到公安部管轄的復興醫院犯人病房探視了陳伯達，向他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這幾年陳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為自己辯解的，以後不要再在細節問題上糾纏了。對於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他是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央是瞭解的。他過去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個月後的一天，恰是白樂天《苦熱》詩："頭痛汗盈巾，連宵復達晨"的時節，筆者正在石家莊製藥廠針劑車間揮汗做工，廠傳達室轉來一封北京來信。信中轉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親的近況，希望我盡早到京商量父親的治療問題。讀罷信，我對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廠請好假，並開具了探監的介紹信，隨即搭車北上。

探監在當時實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監是在1979年12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時間我對父親的下落一無所知，用工廠同事的話說：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監是1980年5月初，第三次是父親判刑之後不久，即1981年3月。幾次探監，其間種種詳情，在此不能備述。這一次該是第四次探監了。

我於8月5日到達北京，8月6日一早就趕到了復興醫院，監管幹部卻告訴我，陳伯達已於昨日出去了，現在住進一家大醫院，已不歸他們管了，歸北京市公安局管。我當即按照他們給的電話號碼與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長取得了聯繫，隨後按他的指點到北京友誼醫院做了探視。

父親住在友誼醫院幹部病房二樓頂西頭一間，房子不大但很潔淨涼爽，通走廊處有帶浴盆的衛生間，下午定時供應熱水。父親自病後已

幾年沒洗過澡，現在有了條件，就痛快地洗了個澡。總之，無論是居住條件，還是伙食，與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比起來，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當時公安局安排科員肖清河和一位姓趙的同志輪流照顧他。

在病房裏，當公安局的同志去吃飯時，父親第一次向我講了 1948 年在河北省阜平縣發生的事，他認為這件事是他得到優待的一個主要原因。此事始末，前文已有述及。

父親還講到不久前一件很偶然的事：

"離開復興醫院前的幾天，允許我在樓道裏散步。樓道裏很安靜。一次，我吃力地走着，看到一間病房的門敞開着，有個花白頭髮的人坐在床邊寫東西，我就好奇地走了進去，問那人：'你是誰呀？'那人說：'我是李作鵬。'我很驚訝：'哎呀，完全不認得了。你在寫什麼？'他沒有回答，把寫的東西遞給我，原來是一份'抗議書'，內容是抗議上面下達的剝奪他在戰爭年代一切軍功榮譽的通知。我看後對他說：'我看，這件事就算了吧。共產黨人不計較個人名譽。'他遲疑了片刻，答：'你說得對。'接着我和他閒談了住院的經過。我說，我是在秦城監獄洗淋浴時，熱水斷了，下來一股冷水澆到了背上，我年紀大了，經受不住，第二天就腰腿痛得起不來床了。李作鵬說他心臟不好，實在病得厲害，才讓他住院。"

這次陳李二人的邂逅，是他們生平的最後一面。陳與李是同時保外就醫的，但李與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均被安置在外地居住，只有陳一人留在北京。

在我探視陳伯達期間，公安局王申科長與我商議了治療、護理等事項，至於以後怎樣安排，一時還定不下來。幾天後，我又回到石家莊上班。

醫院本非久住之地。兩個月後，友誼醫院就催陳伯達出院。陳家

早已沒有了住處，家庭成員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尋找一新的安家處所，考慮到陳伯達腰腿有病，開始還想找平房，但平房實不易找，當時已經天寒，而有暖氣的平房更不易找，幾經周折，最後還是把家安在東郊新居民區一幢六層樓的頂層。

根據中央的有關條文，在徵得我母親余文菲（已於1948年與父親離婚）的贊同並對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後，1981年底我離開了已做工十四年的工廠，告別了在我極端困難時曾給予我生活勇氣和諸多幫助的同車間工友，攜妻帶子，遷來北京，照料已是風燭殘年的父親。

1981年11月16日，我同陳伯達以前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肖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輛麵包車，到中南海西苑門內中央警衛局一庫房領取了上面發還的陳伯達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這些東西有些還能湊和着用，有些則已破損不堪，只能當廢品賣掉。

衣物中除了夾有兩本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幾冊《毛主席語錄》外，陳伯達過去花費大部分工資和稿費（陳只使用建國初期的稿費，1958年以後的稿費都已捐給科學院圖書館）購買的書籍卻一本也沒有。陳平生購買的書籍，以學術書為主，古籍碑帖也較多。碑帖為當世所輕，雖稱文物，卻少有問津者，陳懼碑學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畫等物陳也少量買過一些。統共算來，陳的文物與他昔日學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跡藏品相比，無論數量或價值，都只是田的零頭(有人借文物做文章，卻不肯在陳的生前做當面質證，而只在陳的身後弄口舌。智者當辨之)。陳伯達保外就醫後，每天都要讀書寫作，由於過去的書籍去向不明，書的來源就成了一個問題。他先托熟悉的同志從有關部門借了一部分書，又從當時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費中節省近三分之一出來，用於重新購書並訂閱一些報刊。直到1983年2月，他的生活費增加為每月二百元，購書用錢始覺稍寬鬆一些。

陳伯達保外以後寫作的文稿，研究經濟問題的部分佔有較大的比例。他最初寫的供有關部門研究的建議，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論證在迅速發展的世界新技術潮流中，電子技術起着舉足輕重的主導性的作用，其發展水平的高低不僅對各個工業領域的技術水平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響，建議國家對此予以充分重視，加速發展和普及電子技術，改造原有企業的陳舊技術；二是建議縮短工時，將8小時工作制改為6小時，或每週工作6天改為工作5天，這樣做的好處不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時間、擴大社會就業面，而且主要是可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提供必要的學習時間，以適應工業新技術的發展；三是建議發展中小城市和鄉鎮企業(當時是叫社隊企業)，限制大城市的過度膨脹，縮小工農差別，減少工業污染。

在哲學方面，陳伯達1982年寫了〈黑格爾反對絕對化〉、〈科學．假設．實踐〉、〈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和批判四人幫以儒法鬥爭解釋中國歷史的〈儒法兩家"其實是兄弟"(評四人幫雜記)〉，這後一篇文章分析了歷史上不同社會形態中統治階級內部派系之爭的實質。另外，他還寫了些文學評論文章，最初的幾篇是〈《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讀《儒林外史》雜記〉、〈求知難——記讀《西遊記》〉等。

陳伯達在保外就醫的初期，有一條與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聯繫的渠道。他寫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喬木和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胡耀邦並多次對他的寫作有過具體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但陳伯達認為當時研究經濟問題更迫切，就沒有及時採納這一建議。陳伯達在1983年6月寫的

《同痛苦轉變進行搏鬥》一文的篇首，借用西班牙人士的話，強調提出："出路在於革新。不革新則滅亡。"開宗明義地點明瞭經濟問題的迫切性。陳伯達寫讀書筆記，是想借他人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他明白自己只是個犯人，人微言輕。

陳伯達還對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寫點回憶錄，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議，表示不以為然。他說："有比寫回憶錄更重要的事。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能不顧大局。有許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應當關心的，不是個人的名譽，而是國家今後的發展。"

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陳伯達與中央聯繫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後不復存在。

1981年下半年，中央對陳伯達實行與四人幫有區別的政策的落實情況，曾在高層領導閱讀的內部簡報上通報過。作為實行這一政策的推動者之一的周揚，對陳的情況十分關注。眾所周知，周揚是文革時最早被打倒、受衝擊最大的人，而陳也曾在公眾場合講過批判周揚的話。為什麼周揚會力主對陳實行有區別的政策呢？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些歷史檔案可能不再封存，許多被一時的表面現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於世，到時人們將是會理解的。在此，筆者只談史實，而不對史實的成因加以解釋。

儘管實行了有區別的政策，陳伯達晚年仍基本處於與外界隔絕或半隔絕的狀況。凡要求與他相見的人都要經過公安部門的批准。只有兩位他過去的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獲准可以經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揚處工作過，與周很熟悉。

1982年4月22日，記得是個星期四，離五一勞動節放假只有一周了，王保春和王文耀於傍晚時分來探望陳伯達。王文耀談到，他最近剛

去看過周揚，周揚很關心陳的近況，說如果可能的話，願與陳見見面，但周本人並不方便提這個問題。這次談話我是在場的。第二天上午，我把住在隔壁的公安局值班幹部蕭鍵(當時是替換臨時回家鄉的肖清河，1985年以後正式負責監管陳）請了過來，陳伯達向他提出：希望見見周揚，請公安局向上級請示，如果允許相見，見面的時間、地點請公安局安排。當天下午5點左右，公安局方面答覆說：經過請示聯繫，同意相見，周本人的意見是當晚7點在他家裏見面。

這一天，即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在陳伯達晚年的清冷生活中，無疑是重要的一天。在得到公安局的答覆後，他提前吃了晚飯，傍晚6點半左右由公安局蕭鍵和老岳（名字已忘，當時習慣稱大岳）兩人陪同，乘坐警員高英魁駕駛的轎車前往西單西絨線胡同附近周揚家中赴約。那時已入暮春，漸顯晝長夜短，他們動身時街上車輛已稀，但天色尚明。

按照公安人員的意見，我未能陪同父親前去，只好坐在家中靜等。原估計談兩個多小時也就差不多了，因為周陳兩位都已上了年紀，談話過久會很疲勞。但時間過了10點，外面已是夜深人靜，卻仍不見父親回來，我不免有些着急。一直等到晚上11點一刻，父親才終於回來了，他進屋時情緒顯得有些興奮，蕭鍵說，兩位老人已十六年沒有見面了，話說得多了。我簡單問了幾句情況，因時間已太晚，父親沒能多談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父親起床比平時稍晚，吃完早餐，他跟我講了與周揚晤談的詳情。他說，周揚住的地方原是黃炎培先生的舊宅，是個比較大的四合院；晤談是在會客室進行的，參加的共有四個人，除了他和周揚外，還有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和周揚的秘書譚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員沒有在場，他們在另一間房子休息。

陳伯達向我講述的他與周揚談話的內容，我曾簡要記下一些，其主要部分如下：

周揚：你若不是擔任了後來那樣高的職位，情況也就不會那樣了。《紅樓夢》裏說："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沒能及時退身，地位到了那樣高，打倒陶鑄後，又位居第四。

陳伯達：但實際上並不由自己。周總理找我談話三次，要我當組長，我都拒絕了。最後周總理說："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只好當了。至於排第四位，開始調整常委的名單就是把我排在周總理後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說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樣前面。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最後一位的陶鑄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打倒陶鑄同志是後來的事。

周揚：我被關起來後，在監獄裏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後來聽不到再有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難過。文革中你的帽子戴的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這次討論歷史問題決議，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現在採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

陳伯達：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時救過毛主席。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裏，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

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後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周揚：那時我也在阜平，聽說毛主席那次很危險，但不知道是你去救了毛主席。

陳伯達：我垮臺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衝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

周揚：你在廬山是主張設國家主席的，當然現在也還要設國家主席，但和你們那時不同，你們那時是要讓林彪當國家主席。

陳伯達：我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我只提過請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周揚：……文革的後遺症很多。現在的青年人不聽說啊，這個問題不知道怎麼解決？

陳伯達：這個情況我不瞭解。我沒有接觸。

譚秘書：文革開始時，你為什麼把給別人的題字都收回去了？是不是怕別人連累你？

陳伯達：那倒不是，那時我實際上也是隨時可能倒的人，也怕牽連別人。所以運動開始以後，我就讓人把散在下面的題字收回了，有些人並沒有什麼事，我也把題字收回了麼。

譚秘書：可是我這裏就還有一幅，怎麼沒有收呢？

陳伯達：漏掉的也有吧，我跟你不熟麼，不記得你是哪裏的，當然就漏掉了。

周揚：你現在寫什麼東西？

陳伯達：主要搞點經濟問題的材料，也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係的文字，不知你看到沒有？（陳提到幾篇文章題目）

周揚：我沒有看到。

陳伯達：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看。

將來如果能放我的話，你看能不能讓我在你領導的文聯做點小事情，比如搞點材料，我可能還做得來。進你們文聯的門，也需要有點東西(指作品）吧，這幾篇談文藝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點東西。

周揚：這到時候再說吧。

陳伯達：你現在看些什麼書？

周揚：我有時看些文學史方面的書(指指客廳桌上的書，陳看到有不少是外國文學史方面的書）。

陳伯達：你對俄國文學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納耶娃回憶錄》，你看過沒有？

周揚：沒有看過。巴納耶娃是個什麼人物？過去好像沒有聽說過。(陳做了介紹，周讓秘書記下了書名，該書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的，譯者是蔣路、凌芝。)

陳伯達：這本書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界的情況，接觸過很多作家。書裏講了屠格涅夫很多事情，也有許多其他文學家的事情。

周揚：我現在準備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時間都用在這件事上。

陳伯達：你的書出來以後，可不可以送給我一本？

周揚：可以。

以上是陳伯達講述的談話情況，當然，四個小時的談話不只這一點內容。現在參加談話的四個人中已有三位不在人世了，周揚、陳伯達、蘇靈揚三個人均在1989年下半年相繼去世。只有譚小邢秘書一人健在，我想，如果可能的話，她可以從另一角度對談話情況作出補充。

陳伯達還說，他與周揚臨分別時，周揚表示，因時間已太晚，今天就談這些，以後還可以另約時間見面。

五一節過後，市公安局安排了陳伯達十多年來的第一次春遊，這

使他在長期與世隔絕之後，有了一次重新置身於稠人廣眾之中的機會。春遊的地點是北京西郊香山。但令我和父親都感到缺憾的是，公安局沒有讓我陪他一起去。從此我也明白了，除了陪父親去醫院治病外，他的外出性活動，我都是不能參加的。

儘管如此，陳伯達春遊時的興致還是很高的。那天恰好氣溫宜人，天空薄雲舒卷，郊外蕙風和暢。公安局的肖清河講到，老人邊走邊歇地爬上了香山"鬼見愁"的半山腰，途中還遇到一位熱心的遊客過來閒聊，當遊客聽說他已經七十八歲了，還豎起大拇指以示稱讚。

總之，1982年是陳伯達自倒臺以來情緒最好的一年，也是他寫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幾乎平均不到一個月就有一篇文稿完成。他的幾篇涉及文學問題的稿子亦如願被送交周揚閱讀——這些我們都是事後才知道的。

光陰荏苒，轉眼已是初冬。記得是11月的一天，王保春和王文耀又來探望陳伯達。他們剛剛落座，尚未寒暄，王文耀即從提包裏抽出一本32開本的印刷品，遞給了陳。原來這是一本10月10日出版的當年第10期《讀書》雜誌，裏面刊登了陳5月22日寫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求知難》，原文的副標題"記讀《西遊記》"沒有印出，作者署名紀訓，這個筆名倒是原來就寫在稿子上的。

需要說明的是，陳伯達在保外期間所寫的文學、哲學類學術文稿，仍保持自二、三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寫作習慣，差不多每篇寫好的文章都要署上一個筆名，例如他寫的〈讀《儒林外史》雜記〉、〈文藝的魅力〉等曾分別在稿子上署名"郅微"、"幼學"等。瞭解父親的人都知道，"陳伯達"這個名字其實就是他用得最多的一個筆名，因為用得多了，竟逐漸取代了"陳健相、字尚友"的原名。所以，父親於身陷囹圄後寫的文稿仍要署上筆名，主要是出於積習，其次也是希冀在久遠

的將來解禁之後能按他署的筆名發表。正因如此，當父親親眼目睹自己的文章在1982年面世時，他和我一樣感到出乎意料，同時，他亦同任何一位企盼自己的勞動被人認可的筆耕者一樣，心情自然也是喜悅的。

當時王文耀並未細談文章發表的經過，而只是簡單地提到文章是經周揚閱後發表的。直到一個月後的新年前夕，他們再次來訪，我們才瞭解到文章發表的詳情。

原來，首先提出並具體幫助將《求知難》發表的，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總編輯的黎澍。很多人都知道，黎澍對陳伯達曾是有成見的，七十年代末，他在多篇文章中對陳進行過批判，而且措詞之激烈，容易給人留下印象。應當說出現這種情況也是自然的，因為那時黎澍同許多人一樣，只能從過去的文件和一些表面現象來瞭解陳伯達。而此時則已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黎澍已有條件知悉一些重大事情的真實情況，所以對陳伯達的態度也就隨之有了變化。

黎澍與周揚是老朋友了，當年黎澍編輯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一書，就是在周揚的指示下編成的。1982年夏天，黎澍去看望周揚，在周揚家裏看到了陳伯達寫的幾篇有關文藝問題的稿子，他有些詫異地說："過去陳伯達不寫這方面的文章呀！"隨即閱讀了最短的一篇文稿——《〈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與周揚閒談說："陳伯達與外界隔絕得太久了，他不瞭解紅學的研究發展很快，像王朝聞寫的《論鳳姐》，是很厚的一本。"其實，黎澍本人沒有研究過紅學，陳伯達寫的《〈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雖只有千把字，但其中見解並沒有其他人說過，因此是有其自身價值的，後來葉永烈在《陳伯達傳》中全文引錄了此文。

黎澍當時沒有時間讀完陳伯達的其他文稿，數日後，他又再次到周揚家將幾篇文稿借走。經過閱讀，他挑選了一篇認為適宜發表的稿子，

托人送到《讀書》雜誌，這即是刊登於1982年第10期上的《求知難》。

據我所知，《求知難》一文的發表，不僅陳伯達事先不知道，中央書記處事先也是不知道的，所以這件事和中央有關方面並無任何關係。

第二篇文章的發表，情況有些不同。

大約在《求知難》發表一兩個月後，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閱讀陳伯達的一些文稿時，認為《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一文可供研究者參考，於是寫下批示，大意是：可以考慮在外地的黨內刊物上發表，但應保密（包括對作者）。我風聞這個批示，已是1983年春節前夕，此後便久久沒有消息，那時我也不能去打聽。直到中秋節前，那份由我謄抄後送上去的稿子（我父親的底稿留在家中）被用完後退回我處，我才得知此文已在遼寧省7月出版的《理論與實踐》雜誌1983年第2期發表。我立刻到單位的期刊室去找，沒承想，這個發行量極小的刊物在我們這個小單位還有一份。《理論與實踐》畢竟只是一個省的黨內刊物，所以真正讀過這篇文章的人肯定比讀過《求知難》的人要少得多。

與此同時，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83年7月，中共中央出版了《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二版時改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該書中有一篇重要文章《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是鄧小平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鄧小平講話稿中有一句的原文是："林彪、'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陳伯達、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講話稿在收入《鄧小平文選》時，這句話改為："'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明眼人一看便知，此話改寫，是為了刪掉陳伯達的名字。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和鄧小平同志貫徹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在正式文件中點陳名字的一個明證。遺憾的是，這種對歷史問題決議的認真態度並沒有持續多久。

1988年香港刊物披露陳伯達的文章被發表，只提到〈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一文，而沒有提到發表於《讀書》上的《求知難》。是否提供消息者不知道《讀書》上的文章呢？這我就不得而知了，即以發表於《理論與實踐》雜誌的文章來說，香港刊物披露的時間已在文章發表五年之後，本已是遲到太久的新聞，而又未加說明，使不少讀者誤以為就是1988年的事。

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是否與法律的規定有什麼抵牾之處呢？我以為也沒有。陳伯達並沒有向任何雜誌投過稿，兩篇文章的發表事先都未告訴陳本人，這表明他喪失了自己作品的發表權。況且，寫學術文章應屬憲法第47條規定的文化活動而與政治權利無涉。

陳伯達曾談到，在獄中寫不涉及現時政治的學術文章而得到發表，在世界很多國家並不鮮見；解放前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判了刑，當然也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陳獨秀在獄中寫的《實庵字說》、《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東方雜誌》發表。

陳伯達對黎澍能將他的文章拿去發表，內心是感謝的。過去他與黎澍之間互有芥蒂，源於他對黎澍的文章風格有些偏見，八十年代末他在《文匯報》上看到黎澍一篇論述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的文章，覺得黎澍已經一改昔日章法，文章旁徵博引、論證縝密，立論也很有新意，連連稱讚這篇文章寫得好，曾多次說："這是我看到的黎澍最好的一篇文章。"留心文化和學術動態的人或許還記得，黎澍晚年曾提出對歷史創造者問題進行再探討，對此有些人不甚理解；其實，黎澍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部分原因也是有感於毛澤東晚年對陳伯達的批判過於偏頗。

然而更使人感歎的，是陳伯達與周揚的交往。

回首發端於1970年的對陳伯達的全盤否定性宣傳，幾如鋪天蓋地、排山倒海，各種文件、出版物給陳戴的帽子之多之重，堆疊成山，

蔚為大觀；諸如“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軍事俱樂部成員、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頭面人物、尊孔派、大儒、野心家、偽君子、反共老手、政治騙子、黑秀才……”，等等，等等，足足可編一本“陳伯達所戴帽子大詞典”以顯示編帽者們智慧之無窮；而如此深入持久的大批判已逾十載之後，陳伯達又以近八十高齡的垂暮之身被判重刑，處於幾無重見天日之境。當此之時，周揚獨能置個人利害於不顧，一反牆倒眾人推之舊習俗，毅然請陳到家晤談，且以茶點相待，這是需要氣度與膽識的。而這次歷史性的晤談僅僅經過一年有餘，兩位曾為中國革命效力數十年且又都過分拘囿於上命而先後輕重不一跌入俄狄浦斯厄運的病弱老人之間的交往，就在他們生命歷程的最後階段又經受了意想不到的嚴峻考驗。

1983年9月初，一夜寒風過後，陳伯達腿疼驟然加劇，一時幾乎完全不能走路，無奈，只得向公安局請求聯繫住院。那時聯繫住院，須層層報批，手續繁雜，往往要等候很多日子。陳伯達感到身體日衰，想趁等候的時間與周揚再次晤談，即請求公安局給予安排。幾天後，公安局答覆：周揚同意見面，但現在醫院也聯繫好了，他們的意見是先治病，待出院後再與周相見。陳伯達同意了。

很快，陳伯達被安排住進了位於北郊的解放軍262醫院。

10月下旬，報上開始點名批評周揚在5月份發表的有關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講話。在此之前，雖然理論界對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基本是在學術範圍內以討論的方式進行爭論的，而現在上綱為否定社會主義。

陳伯達感到很突然，他想到周揚的為難處境，他甚至懷疑是不是由於他與周揚的來往而連累了周揚，於是托人捎口信給周揚：為避免給周帶來困難，建議將再次見面的時間無限期推移。周揚表示同意。

半個多月後父親出院了，但不久周揚就病倒了。

1984年秋，陳伯達本人也因薄一波在大連突如其來的講話帶來的衝擊，健康狀況變壞，住進衛戍區292醫院。從此，周、陳兩人都處於新的困境之中。雖然困境的性質和程度並不相同，雖然他們此時的地位畢竟極為懸殊，但他們似乎忘了這些，仍常托人互致問候。

當陳伯達得知周揚已基本處於長期昏迷狀態時，他很難過，特地托與周揚相熟的王文耀向蘇靈揚轉達他的關切。蘇靈揚心情很不平靜地說："他自己也很困難，還來關心我們。前幾年不是情況好一些嗎？怎麼現在又變成這樣？"在場的人都對出爾反爾的現象說了幾句牢騷話。

陳伯達曾對我談到："陳獨秀被審判時，他早年留日時的同學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章士釗在當時名聲很大，敢於為國民黨的敵人陳獨秀辯護，是很不容易的。後來陳獨秀坐牢，胡適等還到獄中看他。現在革命勝利了，一個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發表我的文章的同志。"

歲月留給陳伯達與周揚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1988年9月27日，陳伯達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瀦留住進朝陽醫院治療，10月中旬，醫院因保守療法無效，決定手術治療。正在手術的準備過程中，陳伯達服刑十八年期滿的日子——10月17日到了，公安部決定在病房內舉行一個簡單的釋放儀式。

10月17日上午，陳伯達在單人病房裏吃罷早飯，坐在沙發上等候。另一沙發空着，留給公安部的領導。我坐到沙發對面的病床上。

8點多鐘，走廊裏傳來了許多人走動的聲音，但他們沒有進病房，都走進斜對面一間空着的屋子去了。曲大夫進來照例查了病房，說："他們好像已經來了，別着急，得等一會兒。"

過了半個多小時，不見動靜。陳伯達有些不耐煩，說："我都八

十五歲了，人都活到這個時候，不知道還要搞什麼名堂，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我勸慰了他幾句。

又過了一會兒，進來幾個穿便服的年輕人，要支錄像機。因屋子太小，選支放點很費事，最後不得不把輸液架挪走，才在床腳前支放好了。我對其中一人說：“能不能請他們快一些來，老人的病不輕，這樣老等着，他精力堅持不了。”年輕人猶豫了一下，答應去催一催。

九點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個子的公安部領導人在蕭鍵和醫院王浩書記的陪同下姍姍來遲。還有幾個不認識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過來。

病房內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領導坐在沙發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開的門外面。

一位剛才來過的年輕人站在我旁邊，拿起照相機對着老人要照相，老人連連擺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什麼好照的！”年輕人有些尷尬，但還是趁老人不注意時照了兩張。那個錄像機沒有聲音，老人倒沒在意。

蕭鍵先說了一句：“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長（過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後連任多屆中共中央委員的于桑），請他講話。”

于副部長面對陳伯達開了腔：“今天嘛，你的十八年刑期就滿了，以後我們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由他們負責了。還有個附加刑五年，也都由下面的單位去執行了。生活待遇不變，考慮到物價因素，再加五十元，每月二百五十元。怎麼樣，老陳，有什麼要說的？”

“附加刑五年”幾個字說得很重，“釋放”一詞卻不曾言及。

于副部長話音一落，陳伯達的話脫口而出：“剛才你說什麼？還要加刑五年是吧？我說，再加刑八年、十年、一百年，都可以，隨便加

多少！”

于副部長有點尷尬：“老陳，今天應該是你高興的日子。”

陳伯達道：“我今年八十五歲了，又得了這樣的病，已經是快要死的人了，有什麼可高興的？還要搞五年，我是不可能再活五年的。”

蕭鍵一看談話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裏擺弄着一張釋放證明。我問了句：“寫的什麼？”。蕭鍵說：“嗨，什麼也沒有。”我接過來一看，上面確實只寫着釋放日期，並沒有提到附加刑，看來于副部長是故意要強調一下附加刑的，他絲毫不考慮一個垂暮老人的心境。這個老人無疑是當時中國最年邁的犯人。

陳伯達瞥了一眼釋放證明，抬起了頭，凝重地說道：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呀！我個人是很渺小的人，怎麼處理都沒有關係。我不過是一隻螞蟻，誰要踩都可以，什麼時候踩死都可以，沒有關係，聽天由命就是了。”

于副部長道：“不是講唯物主義嘛，怎麼你還相信天，相信命？”

陳伯達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黨。聽天由命就是聽黨由命。”

于副部長：“哦，是聽黨由命。”

陳伯達略喘了口氣，又說道：

“我只說一件事。1948年在阜平的時候，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我聽到飛機響，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裏，跟他說，飛機就在頭頂，要趕快走，趕快走。我看着毛主席他們走到安全的地方，才離開。飛機炸彈劈劈啪啪落了下來……”

我聽到這裏，心頭一酸，實在忍受不住，失聲大哭了起來。

室內一片肅穆的氣氛，持續了好幾分鐘。

我擦乾眼淚，說了兩句希望。

蕭鍵談了將陳伯達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的情況，並站起來介紹了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兼副館長徐世正、辦公室主任范國慧等。

徐世正代表文史館講了簡短的話。

儀式結束後，公安局搞錄像的兩個工作人員過來和我握手，一邊說："對不起，我們不瞭解情況。"

時間進入了1989年。

"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

1989年7月31日，周揚同志與世長辭。8月，陳伯達用已不聽使換的手寫下了輓詞："創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揚同志仲晦一九八九年八月"。周揚親屬收到挽詞後，立刻寫了回信。

一個多月後的9月20日，陳伯達溘然離世，領導部門通知：後事悄悄處理。仍有數十位瞭解陳伯達的人聞訊後自動趕赴殯儀館向遺體告別。在哀樂聲中，人們悲慟的淚水奪眶而出，巨大的哭泣之聲驚動了室外過往的人們，許多人紛紛圍了過來。據說，這種場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幾位從家鄉專程赴京的親戚因北京正在戒嚴，在天津遇阻，只得半途返回。

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副館長、辦公室人員，北京市公安局的幾位幹部，朝陽醫院的醫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報的記者，也參加了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北京市文史館作為唯一的官方機構，送了花圈。

又一個月後，蘇靈揚同志逝世，從此結束了陳伯達與周揚夫婦長達半個世紀的歷盡風雨與曲折的交往。

如今，參加過向陳伯達遺體告別的老人中，有好幾位已先後辭世了。他們當中有史立德、張楠、王拓、洪禹、葉茵、姚黎民、史鳳歧等，前三位曾是三十年代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一二九運動的老戰士；

後幾位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他們不顧年高體弱，不避時忌，自動趕來參加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實際上是代表了許許多多不知道陳伯達死訊的陳的學生和故友們的心願。

行文至此，還有一個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胡耀邦同志。從前文述及的胡耀邦對陳伯達的寫作所提的建議，可以看出，他對陳伯達不僅沒有像某些人那樣採取一筆抹煞甚或辱罵的態度，而且他對陳的人格是尊重的。正像一位朋友向我談論的：胡耀邦是一位在陳伯達已被推入絕境後仍把陳當人看的高級領導人，從這一點也可看出他實事求是的勇氣。是的，胡耀邦跟陳伯達過去並無深交，除了在五十年代時毛澤東曾吩咐陳幫助他擬定青年團的文件外，兩人幾乎沒有什麼來往。胡耀邦是從他直接接觸的檔案材料中，從陳伯達曾為中共及其領袖艱難服務數十年的基本事實中，感覺到批陳運動中的那一套說法是荒謬而不合情理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長時，即在一次談話中對給陳伯達戴上無數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1979年10月，他根據新瞭解到的事實，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講話中第一次果斷地停止點陳的名字，而在原來習慣點陳的地方換上了康生的名字。1981年陳伯達保外就醫以後，正是在他的指示下，使陳的生活與醫療得到較為周到的安排，給陳的寫作創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在百忙之中，胡耀邦不僅對陳伯達的每篇文稿都親自過目，而且曾親筆批示，要求中央書記處的有關人員關心陳伯達的寫作，在1983年那時的歷史條件下，陳伯達那篇談哲學史的文章如沒有他的首肯，也是不可能得以發表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1986年，薄一波突然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中央一級生活會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報告》，全面指摘胡耀邦的工作，並將該文件傳達到全國各級黨組織，迫使胡耀邦離開了領導崗位。

1989年4月17日，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

時光似流水，往事如煙靄。

在此，筆者謹向曾在極其複雜的條件下對我父親給予諸多關照的胡耀邦、周揚等同志的英靈表達深切的感念之情。到今年，他們已去世十五周年了。

筆者並向所有關心或幫助過我父親的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們表達我誠摯的謝意！向北京友誼醫院、公安醫院、解放軍262醫院、292醫院和北京朝陽醫院的醫生護士表達我深深的謝意！我父親在八年間輾轉於以上各醫院，沒有一個統一的病歷，增加了他們治療工作的困難。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我父親的境遇抱着深切的同情，在醫療護理上對我父親關懷備至，使他雖長期處於逆境之中卻仍以高齡辭世。尤其是公安醫院嚴大夫以及朝陽醫院陳大夫、徐大夫、駱大夫，他們高尚的醫德，我永誌不忘。

2004年2月完成初稿

3月開始修改，6月修改完畢